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3](#_Toc54533774)

[照片 6](#_Toc54533775)

[導讀 帝國末日的回憶 30](#_Toc54533776)

[序言 33](#_Toc54533777)

[蘇聯/俄羅斯主要人物表 35](#_Toc54533778)

[導論 38](#_Toc54533779)

[俄國改革家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伯爵 見1906年辭去總理職位的辭呈 39](#_Toc54533780)

[第1章 12月25日：破曉之前 42](#_Toc54533781)

[第2章 12月25日：黎明 44](#_Toc54533782)

[第3章 雇傭摧枯拉朽的“推土機” 50](#_Toc54533783)

[第4章 12月25日：早晨 54](#_Toc54533784)

[第5章 莫斯科的“暴風雨” 58](#_Toc54533785)

[第6章 12月25日：上午 62](#_Toc54533786)

[第7章 一身臟水 65](#_Toc54533787)

[第8章 12月25日：臨近午時 70](#_Toc54533788)

[第9章 東山再起 72](#_Toc54533789)

[第10章 12月25日：正午 77](#_Toc54533790)

[第11章 “煤油過膝” 81](#_Toc54533791)

[第12章 12月25日：正午過后 88](#_Toc54533792)

[第13章 專政采取攻勢 90](#_Toc54533793)

[第14章 12月25日：晌午 97](#_Toc54533794)

[第15章 “劫持”芭芭拉·布什 101](#_Toc54533795)

[第16章 12月25日：臨近黃昏 107](#_Toc54533796)

[第17章 不忠、不法、行為不端之徒 112](#_Toc54533797)

[第18章 12月25日：黃昏 121](#_Toc54533798)

[第19章 分崩離析 125](#_Toc54533799)

[第20章 12月25日：日暮 132](#_Toc54533800)

[第21章 中央無以為繼 136](#_Toc54533801)

[第22章 12月25日：傍晚 146](#_Toc54533802)

[第23章 核桃廳的交易 149](#_Toc54533803)

[第24章 12月25日：入夜 156](#_Toc54533804)

[第25章 12月25日：夜晚 161](#_Toc54533805)

[第26章 12月25日：深夜 166](#_Toc54533806)

[第27章 12月26日：第二天 171](#_Toc54533807)

[第28章 12月27日：掠奪者的勝利 176](#_Toc54533808)

[第29章 爭斗的繼續 180](#_Toc54533809)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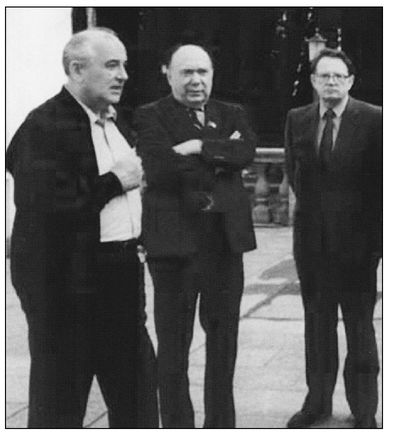
# 照片



1991年8月19日：鮑里斯·葉利欽，旁邊站著他的保鏢負責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爬上一輛坦克反抗共產主義強硬派發動的政變，這是蘇聯終結和戈爾巴喬夫失去權力的開始。



1991年11月：葉利欽開始冷淡對侍戈爾巴喬夫強調他越來越凌駕于后者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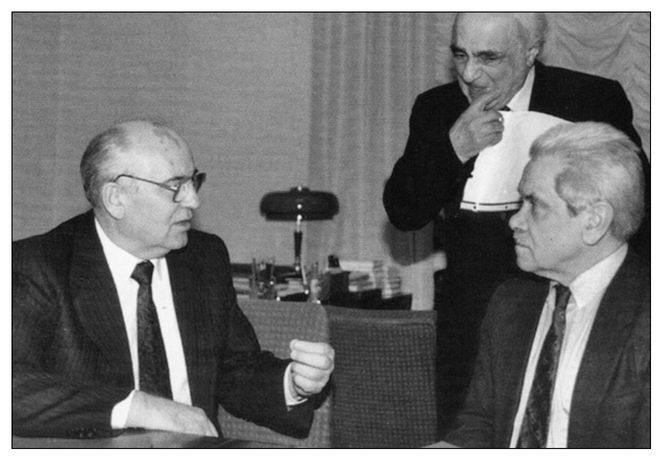
一張罕見的戈爾巴喬夫與背叛他的辦公廳主任瓦列利·波爾金（右）的照片，攝于新奧加列沃，當時正在進行關于新聯盟協議的討論，討論注定要失敗。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站在中間。



1991年11月1日：戈爾巴喬夫在馬德里參加中東會議，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國際活動，會議期間，他被美國代表看作“已經過氣的人”。



1991年12月7日：隨著鮑里斯·葉利欽、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圖中右邊三位）在白俄羅斯的一個國有狩獵屋會面，決定解體蘇聯，時鐘開始朝著12月25日走動了。



我們應該怎樣生存？戈爾巴喬夫與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右）和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討論蘇聯黯淡無光的未來。



1991年12月21日：葉利欽在阿拉木圖。從左往右依次是克拉夫丘克、納扎爾巴耶夫、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他們正在慶祝創建獨聯體來取代蘇聯。



1991年12月23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一起出現在克里姆林宮，進行長達九個小時的關于權力轉移的討論，圖中他們正在脫去外套。之后他們再也沒見過面。葉利欽的保鏢負責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站在戈爾巴喬夫后面。



俄羅斯白宮，葉利欽占領克里姆林宮前的權力基地



1991年12月25日：在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演說即將開始前，克萊爾·席普曼和斯蒂夫·赫斯特采訪打扮得一絲不茍、一副勝利姿態的鮑里斯·葉利欽。



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ABC的泰德·科佩爾的陪伴下走向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



1991年12月25日：圣誕快樂，親愛的喬治！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辭職幾分鐘前致電布什總統，滿懷感情地說再見。



1991年12月25日：帕維爾·帕拉茲琴科在戈爾巴喬夫和布什總統通話時做翻譯——布什總統不知道ABC的泰德·科佩爾正在旁聽。



1991年12月25日：安德烈·格拉喬夫帶著戈爾巴喬夫從真總統辦公室走向為辭職演講準備的模擬總統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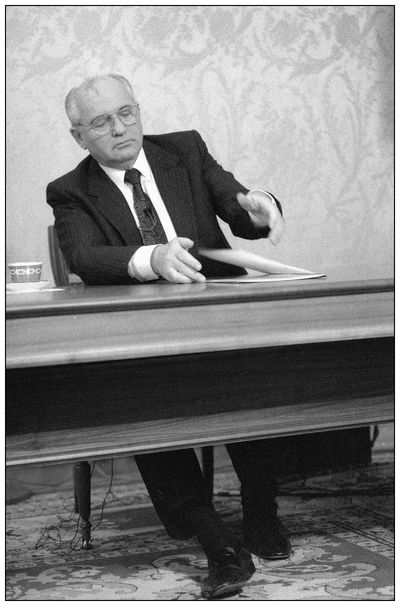
1991年12月25日：格拉喬夫在專用蘇聯筆沒水時將約翰遜的萬寶龍筆（Mont Blanc ballpoint）遞給戈爾巴喬夫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演講前而不是演講后簽署辭職文件，讓電視臺工作人員措手不及。



1991年12月25日：“如果你不得不離開，你就得離開。時間到了。”除了結束他作為蘇聯總統的活動，戈爾巴喬夫什么也不用做了。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合上了他的演講文件，也結束了他的總統任期：劉香成拍攝這幅著名的照片時還挨了克林姆林宮保安的揍，但這幅照片幫助美聯社獲得了現場新聞攝影的普利策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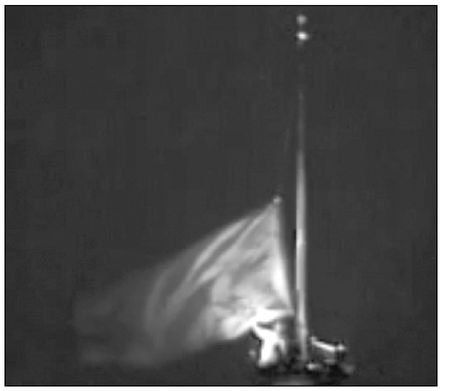
1991年12月25日：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右）幫助戈爾巴喬夫準備進行辭職后的采訪。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人在火車站的電視上觀看戈爾巴喬夫辭職演說的播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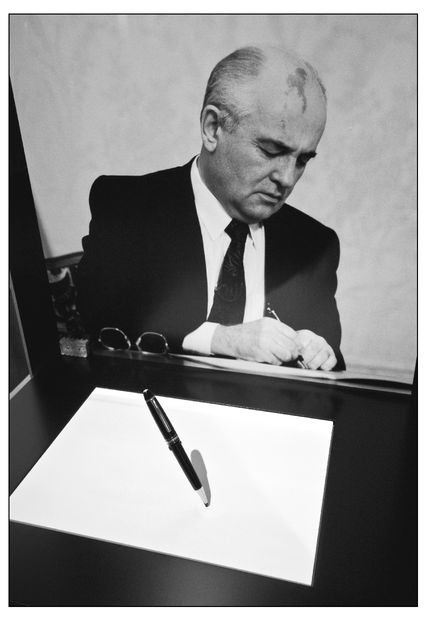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官員最后一次從參議院大樓頂上降下紅旗。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官員收起紅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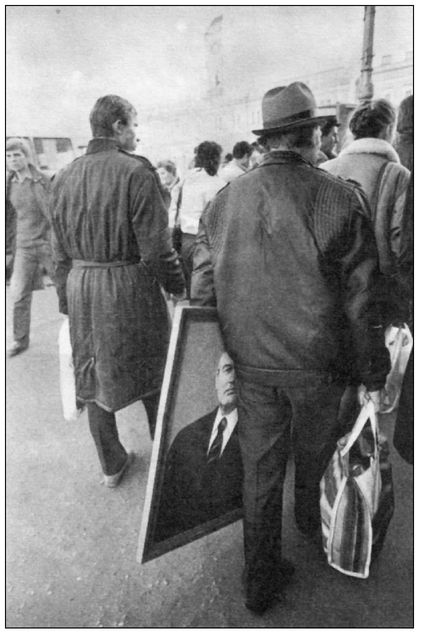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將打包好的紅旗拿到儲物地下室。



戈爾巴喬夫用來結束蘇聯的筆被陳列在華盛頓新聞博物館（Newseum）。



戈爾巴喬夫在列寧山的公寓所在大樓，在辭職那天他被依法驅逐出公寓。



1991年12月26日：圣彼得堡的官員處理戈爾巴喬夫的官方肖像。



葉利欽在贏了戈爾巴喬夫之后不久與布什見面，他最終成為世界領導人集團中的一員。



現在的參議院大樓，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上面，飄揚著新的俄羅斯國旗，這棟大樓現在是梅德韋杰夫總統的象征性住所。

# 導讀 帝國末日的回憶

梁文道

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夸大它的意義，乃至于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干過些什么，剛剛聽到新聞時第一反應是什么，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愷撒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湮滅的關鍵時刻呢？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一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并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1997年7月1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筑，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板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后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著鏡頭和閃光燈涌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紀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征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么我們關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們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后，由于人類記憶的游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敘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干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里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折顯出這命定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滅，事后回想，總是帶著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諸多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愆，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崇禎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于最后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圣索菲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臨終前的垂憐。“蜘蛛在愷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鳴”，無論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么一首凄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奧克萊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后一天》里，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有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廳里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多年保持互稱同志的關系的前共產主義者——打來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們得到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于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媒體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件事會得罪當權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于當權者的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訂。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還是有點用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后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干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奧克萊利這部大作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于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時間，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分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記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于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分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他對整部中國歷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歷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奧克萊利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于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后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分時間都在纏斗不休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作者常常借著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有那么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有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不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后來歷史發展的主因。

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分的蘇聯觀察家看來，1991年8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這場政變所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為沒有人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沖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攪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么直到1990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還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無聲無息？奧克萊利大概就是想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到戈爾巴喬夫最后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著距離，我們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于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后，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后，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獻給斯坦尼斯拉夫與瑪麗埃特

# 序言

本書記錄了一座城市的歷史中的一天。這一天是1991年12月 25日，星期三。這座城市是莫斯科。在這一天，蘇聯結束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了下來。這一天見證了一幕具有深刻的個人和政治意味的戲劇，在最高級別上（和公眾視野外）記錄了喊叫、淚水、回憶和情景劇。這一天的高潮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終向鮑里斯·葉利欽低頭，這兩個非凡的人物相互鄙視，他們之間的互動塑造了現在的俄羅斯。

在重構這個冬日發生的事件時，我將我的采訪和我自己對電視、報紙檔案的研究，與自蘇聯隕落后用英語和俄語出版的一百多本回憶錄、日記、傳記和其他作品結合起來。我還利用了自己密切觀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經歷——在蘇聯統治的最后四年，我是一名常駐莫斯科的記者。在這段期間，我經常出入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白宮，也就是這對對手進行爭斗的地方。我在議會會議和黨的會議上徘徊，在兩位領導人出現的時候抓住每一個機會問他們問題。我采訪了政治局委員、編輯、經濟學家、民族主義者、共產黨激進分子和強硬分子、持不同政見者、罷工的煤礦工人和無數努力維持生活的人。我出現在支持民主的集會人群中、紅場的慶典上、波羅的海諸國的路障旁。我走過俄羅斯的很多地方，從車臣到雅庫茨克，到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愛沙尼亞、哈薩克斯坦、拉脫維亞、立陶宛、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觀察席卷全蘇聯的變化，這些變化導致了1991年圣誕節的結局。從那時候起，我就經常因為工作和私人的關系回到俄羅斯。

我不僅作為一名外國記者，更因為婚姻作為一個俄羅斯–亞美尼亞家庭的一員，有幸經歷了蘇聯的最后幾天和之后所發生的事情。蘇沃洛夫一家住在西伯利亞，在那里，他們經歷了混亂的幾年里的興奮、艱苦和荒唐事，也帶我在他們的別墅里領略了夏天的樂趣。我的妻子然娜是一位哲學家，也是地區蘇維埃的一位代表，后來我們搬去華盛頓后，她的工作單位是國際金融公司，工作內容是俄羅斯1991年后的私有化工程。我的岳父斯坦尼斯拉夫·蘇沃洛夫是一位鞋匠，現在已八十多歲了，還在克拉斯諾雅茨克劇院工作，在舊體制下受了不少苦。他被判入獄五年，只因為一個簡單的投機行為——在賣汽車時賺了點錢。他后來因為給共產黨高層官員提供手工皮鞋而發達。我的岳母瑪麗埃塔是一名黨員，她高興地迎接伴隨著戈爾巴喬夫向葉利欽過渡而來的自由市場，她的評價是，“至少現在我不用為買點奶酪而出丑了”。不管怎樣，我看到了經濟和社會的混亂帶給這個家庭的惡劣影響。我的小舅子亞拉拉特是一名警察，在克拉斯諾雅茨克被黑手黨打死了。我的小姨子拉麗莎是一所音樂學校的主管，因為后共產主義的經濟混亂幾個月都沒有拿到工資，有一天，收到了一紙盒男士短襪來代替工資。所有的一切，加上蘇聯結束后不久克格勃試圖通過威脅然娜為他們工作而累及我，給了我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來觀察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人物的社會中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都是怎樣塵埃落定的。

在整理1991年12月25日的事件時，我只用了我能夠找到來源或能夠證實的信息。所有人物的對話或情感都不是捏造的。當記憶出現混亂、證人們有時候相互矛盾時，我運用了自己最好的判斷力來確定什么時候一個人的回憶是故意誤導我來謀求私利的，或者干脆就是錯誤的。克里姆林宮的一個人的記憶中，1991年12月 25日，莫斯科下著大雪，其他人記得沒有下雪（經過氣象記錄確認，那天天氣干燥而溫和）。一些參與者的記憶很清晰，其他人的則很模糊：安德烈·格拉喬夫（Andrey Grachev）和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都能給我提供關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各自陣營里所發生事情的詳細描述，而葉利欽的合作者根納季·布爾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告訴我，他不記得那么久前的一天的事情了。

關于名字和拼寫的說明：俄羅斯名字包含一個名、一個源于父名的姓和一個姓，如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對一個人的尊稱是名加上源于父名的姓，這在俄羅斯以外的地方會引起誤會——有一次我稱呼電視上的戈爾巴喬夫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個朋友恭維我跟蘇聯領導人關系好到可以直呼其名。在家人和朋友中間，常用名的縮寫形式，例如亞歷山大的縮寫是薩沙，鮑里斯的縮寫是鮑利亞，阿納托利的縮寫則是托利亞。至于俄羅斯名字和單詞的拼寫，我使用的是更易讀的音譯體系，用y而不是i、ii或iy,因此，尤里的拼寫是“Yury”而不是“Yuri”。在參考文獻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版本，那是因為我沒有將出版商的拼寫更改過來。為清楚起見，我列了一個主要人物表。

許多人分享了他們的時間和深刻見解，才讓這本書有機會完成。我要特別感謝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埃德·本特利（Ed Bentley）、斯坦尼斯拉夫·布德尼茨基（Stanislav Budnitsky）、查爾斯·卡迪爾（Charles Caudill）、朱列托·基耶薩（Giulietto Chiesa）、亞拉·奇林加羅娃（Ara Chilingarova）、弗雷德·科爾曼（Fred Coleman）、尼古拉·菲利波夫（Nikolay Filippov）、奧爾佳·菲利波娃（Olga Filippova）、過世的葉戈爾·蓋達爾、葉卡捷琳娜·吉涅娃（Ekaterina Genieva）、弗麗達·吉蒂斯、馬丁·吉爾曼（Martin Gilman）、斯維特拉娜·高爾霍娃（Svetlana Gorkhova）、安德烈·格拉喬夫、斯蒂夫·赫斯特（Steve Hurst）、加布里埃爾·伊瓦克斯（Gabriella Ivacs）、湯姆·約翰遜（Tom Johnson）、伊森·喬丹（Eason Jordan）、里克·卡普蘭（Rich Kaplan）、泰德·科佩爾、謝爾蓋·庫茲涅佐夫（Sergey Kuznetsov）、哈羅德·麥基弗·萊希（Harold Mciver Leich）、劉香成、羅恩·希爾（Ron Hill）、斯圖亞特·H·盧里（Stuart H. Loory）、菲利普·麥當諾（Philip McDonagh）、拉臘·馬洛（Lara Marlowe）、謝默思·馬丁（Seamus Martin）、埃倫·密茨凱維茲（Ellen Mickiewicz）、安德烈·尼克爾亞佐夫（Andrey Nikeryasov）、邁克爾·奧克萊里（Michael O’Clery）、埃迪·俄普斯（Eddie Ops）、坦妮亞·帕列耶娃（Tanya Paleeva）、羅伯特·帕爾尼卡（Robert Parnica）、克萊爾·席普曼（Claire Shipman）、奧爾佳·希尼欽娜（Olga Sinitsyna）、馬丁·席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莎拉·史密斯（Sarah Smyth）、尤里·索莫夫（Yury Somov）、康納·斯維尼（Conor Sweeney），以及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俄羅斯外國文學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另外，要特別感謝格拉斯哥大學的斯蒂芬·懷特（Stephen White）教授為我提供了一些絕版的俄文回憶錄；都柏林三一學院的俄語講師約翰·默里（John Murray）閱讀了全稿，并進行了一些修改，讓我免于尷尬；以及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 Affairs）的克萊夫·普里德爾（Clive Priddle）激發了我關于概念問題的靈感，并在概念的表達上提供了幫助。我對妻子然娜·奧克萊里的研究和編輯技巧的感謝無以言表，她幾次陪著我來到莫斯科查找檔案和信息來源，她參與到這本書的每個階段，從創作到書籍的編輯，讓這本書頗有幾分合作事業的味道。

# 蘇聯/俄羅斯主要人物表

* 阿爾克斯尼斯，維克多：軍隊軍官，進行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活動
* 阿法納西耶夫，維克多：《真理報》編輯，1976—1989年
* 阿法納西耶夫，尤里：歷史學家，支持戈爾巴喬夫的代表
* 阿赫羅梅耶夫，謝爾蓋：蘇聯軍隊元帥，八月政變參與者
* 阿卡耶夫，阿斯卡爾：1990年選舉出來的吉爾吉斯斯坦總統
* 安德羅波夫，尤里：1982—1984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
* 巴卡金，瓦季姆：支持改革的部長，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
* 巴克拉諾夫，奧列格：蘇聯軍事工業集團的負責人，八月政變參與者
* 鮑文，亞歷山大：蘇聯/俄羅斯駐以色列大使
* 彼得盧申科，尼古拉：軍隊軍官，進行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活動
* 彼得羅夫，尤里：葉利欽的助手
* 別利亞耶夫，伊戈爾：紀錄片制作者，戈爾巴喬夫的朋友
* 別斯梅爾特內赫，亞歷山大：蘇聯的外交部長，在八月政變后被開除
* 波波夫，加夫里爾：1990—1992年擔任莫斯科市長
* 波爾金，瓦列利：戈爾巴喬夫的參謀長，八月政變參與者
* 波爾托拉寧，米哈伊爾：前編輯、葉利欽的新聞秘書
* 波納，葉琳娜：安德烈·薩哈羅夫的遺孀
*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1964—1982年先后擔任蘇聯共產黨的第一書記、總書記
* 布爾布利斯，根納季：葉利欽的親密同伴
* 布爾拉茨基，費德羅：支持改革的《文學報》編輯
* 弗拉索夫，亞歷山大：在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時被葉利欽打敗的共產主義候選人
* 蓋達爾，葉戈爾：葉利欽的副總理，負責休克療法
* 戈爾巴喬夫，艾麗娜：戈爾巴喬夫和賴莎的女兒
* 戈爾巴喬夫，米哈伊爾：1985—1991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1990—1991年擔任蘇聯總統
* 格拉喬夫，安德烈：戈爾巴喬夫的新聞秘書
* 格拉喬夫，帕維爾：軍隊將軍，在八月政變中站在葉利欽一邊
* 格拉西莫夫，根納季：蘇聯外交部發言人
* 格里申，維克多：1967—1985年擔任莫斯科共產黨領袖
* 哈斯布拉托夫，魯斯蘭：1991—1993年擔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
* 赫魯曉夫，尼基塔：1953—1964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
* 加姆薩胡爾季阿，維亞德：1991年選舉出來的格魯吉亞總統
* 卡里莫夫，伊斯蘭：1990年選舉出來的烏茲別克斯坦總統
* 卡盧金，奧列格：克格勃持不同政見者
* 科爾扎科夫，亞歷山大：葉利欽的保鏢負責人
* 科濟列夫，安德烈：俄羅斯外交部長
* 科羅季奇，維塔利：支持改革的《星火》編輯，1986—1991年
* 科姆普列托夫，維克多：蘇聯/俄羅斯駐美大使
* 克拉夫琴科，列昂尼德：中央電視臺負責人，八月政變后被開除
* 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1991年選舉出來的烏克蘭總統
* 庫茲涅佐夫，亞歷山大：葉利欽的私人攝影師
* 雷德科博羅迪，弗拉基米爾：負責總統安全的克格勃軍官
* 雷日科夫，尼古拉：1985—1990年擔任蘇聯總理
* 利加喬夫，葉戈爾：政治局的保守委員
* 列別德，亞歷山大：軍隊將軍，在八月政變中站在葉利欽一邊
* 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蘇聯的建立者
* 列文科，格里戈里：戈爾巴喬夫的助手
* 盧基揚諾夫，阿納托利：1990—1991年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八月政變參與者
* 魯茨科伊，亞歷山大：1991—1993年擔任俄羅斯副總統
* 魯日科夫，尤里：1992—2010年擔任莫斯科市長
* 羅斯特羅波維奇，姆斯季斯拉夫：支持改革的大提琴演奏家
* 莫伊塞耶夫，米哈伊爾：軍隊將軍，支持了八月政變
* 穆拉切夫，阿卡迪：自由主義的莫斯科警察負責人
* 納扎爾巴耶夫，努爾蘇丹：1990年選舉出來的哈薩克斯坦總統
* 涅納謝夫，米哈伊爾：國家電視臺負責人，擔任到1990年
* 帕夫洛夫，瓦連金：蘇聯總理，八月政變參與者
* 帕拉茲琴科，帕維爾：戈爾巴喬夫的翻譯官
* 潘金，鮑里斯：八月政變后的蘇聯外交部長
* 普戈，鮑里斯：蘇聯內政部長，在八月政變后自殺
* 普京，弗拉基米爾：圣彼得堡市長的助手，后擔任俄羅斯總統和總理
* 普里馬科夫，葉夫根尼：八月政變后的外國情報安全部主管
* 普列漢諾夫，尤里：在八月政變中幽禁了戈爾巴喬夫的克格勃將軍
* 奇普卡，亞歷山大：戈爾巴喬夫的演講稿撰寫人
* 契爾年科，康斯坦丁：1984—1985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
* 切爾尼亞耶夫，阿納托利：戈爾巴喬夫的親密同伴
* 丘拜斯，阿納托利：葉利欽的副總理，負責私有化
* 日里諾夫斯基，弗拉基米爾：嚴重右傾的俄羅斯政治家
* 薩哈羅夫，安德烈：物理學家，人權運動發起者
* 沙波什尼科夫，葉夫根尼：空軍將軍，在八月政變后被指派為蘇聯國防部長
* 沙赫拉伊，謝爾蓋：葉利欽的助手，別洛韋日協議的起草者
*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激進的經濟學家
* 舒什克維奇，斯丹尼斯拉夫：1991年選舉出來的白俄羅斯議會主席
* 斯大林，約瑟夫：1922—1952年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
* 蘇哈諾夫，列夫：葉利欽的助手
* 蘇斯洛夫，米哈伊爾：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理論家
* 索布恰克，阿納托利：支持改革的圣彼得堡市長
* 索爾仁尼琴，亞歷山大：前政治犯，作家
* 塔拉申科，謝爾蓋：謝瓦爾德納澤的助手
* 特雷季亞科夫，維塔利：支持改革的《獨立報》編輯
* 瓦連尼科夫，瓦連金：軍隊將軍，八月政變參與者
* 沃龍佐夫，尤里：蘇聯/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
* 西拉耶夫，伊萬：最后一任蘇聯總理
* 夏哈納扎羅夫，格奧爾基：戈爾巴喬夫的顧問
* 謝寧，奧列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八月政變參與者
* 謝瓦爾德納澤，愛德華：蘇聯外交部長，1992年被選舉為格魯吉亞領導人
* 雅科夫列夫，亞歷山大：外交家，戈爾巴喬夫的親密顧問，為經濟改革提供靈感
* 雅科夫列夫，葉戈爾：支持改革的《莫斯科新聞報》的編輯，后來成為國家電視臺的負責人
* 亞夫林斯基，格里戈里：激進經濟學家
* 亞羅申科，維克多：葉利欽的助手
* 亞納耶夫，根納季：蘇聯副總統，八月政變參與者
* 亞佐夫，德米特里：蘇聯國防部長，八月政變參與者
* 葉利欽，鮑里斯：1985—1987年擔任莫斯科共產黨領袖，1990—1991年擔任俄
* 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1—1999年擔任俄羅斯總統
* 葉利欽，奈娜：鮑里斯·葉利欽的妻子

# 導論

在我任職期間，我遭受了來自俄國整個社會的口誅筆伐……革命派因為我從良心上強烈支持大多數決定性策略的施行而詛咒我……至于保守派攻擊我，則是因為他們錯誤地將我們政治體系中所有的變化歸咎于我。

# 俄國改革家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伯爵 見1906年辭去總理職位的辭呈

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領導者的六年零九個月里，無論去哪兒，旁邊總有兩位身穿便衣、面無表情、頭發整齊的上校。他們低調到總統的訪問者甚至總統的助手通常都注意不到他們。總統在辦公室工作時，這兩個沉默的軍人就坐在辦公室前廳。總統坐著吉爾牌高級轎車出入克里姆林宮時，他們就駕駛著一輛伏爾加牌小轎車緊隨其后。總統坐飛機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們就坐在飛機的兩個后座上，不管總統是在郊外別墅還是城市公寓里過夜，他們都會出現在同樣的地方。[1](#Pa_La_Zi_Qin_Ke__Palazchenko___W)

這兩位神秘的上校負責保護的是一個小巧的黑色新秀麗公文包，上面有一把金鎖，包重3.3磅，必須時時不離總統左右。這就是有名的chemodanchil，或稱“小手提箱”。所有人，包括戈爾巴喬夫都把它叫做“核按鈕”。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個便攜設備，將總統與莫斯科郊外一支地下指揮中心的“戰略火箭部隊”連接起來。設備里有準許引爆蘇聯遠程核武器的通訊系統，而這些武器中，很多都指向美國。有三位上校被指派來保護手提箱，但其中一個通常不會出現，他們的職責是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就幫助總統將戰略武力設置成警備狀態，并授權攻擊。

核提箱總共有三個。一個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保護，一個由國防部長保護，一個由總參謀長保護。三個設備都足以授權發射一枚導彈，但只有總統能夠合法命令發動一場核攻擊。只要戈爾巴喬夫還控制著核提箱，他就是蘇聯戰略武力的合法指揮官，蘇聯也仍然是一個超級核大國。

所有的一切在1991年12月25日這一天被顛覆。下午七點，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面前宣布辭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龐大而僵化的共產主義磐石，正逐漸解體為各自獨立的國家。戈爾巴喬夫再也發揮不了作用了。接著，鮑里斯·葉利欽作為新獨立的俄羅斯的總統，打算前往戈爾巴喬夫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正式接管核提箱，屆時，那兩位上校將跟戈爾巴喬夫道別，隨葉利欽離開。戈爾巴喬夫從1985年就開始統治這個超級大國，這是支配著橫跨十一個時區的土地和半個地球的超級大國解體的最終階段。自此，俄羅斯作為十五個共和國中最大的國家將成為唯一的核大國。鮑里斯·葉利欽將獲得能夠數次摧毀美國的合法力量。這也是令人敬畏的責任。蘇維埃軍火庫包括27 000件核武器，其中，11 000件被裝載在能夠發射到美國的導彈上。[2](#Wu_Er_Fu__Woolf___Qian_Su_Lian_D)其中任意一枚彈頭都能摧毀一座城市。

這次交接就像是具有莎士比亞作品張力的戲劇的最后一幕。主要演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他們之間頗具威脅的相互影響已經打破了整個世界的力量平衡。這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爭奪最高權力的終點，前者是被資本主義世界偶像化的共產主義者，從容而老練；后者是被西方各國的政要視為破壞者的民主派，沖動又酗酒。

在面對鏡頭時，被驅逐的總統和他的篡位者舉止倒是都頗有政治家風范。但是，在世界歷史上，鮮有如此重大的事件是由兩個人之間強烈的相互厭惡來決定的。早些年，戈爾巴喬夫權力鼎盛時，曾公開羞辱葉利欽。這個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從未忘記這份羞辱，1991年12月，二人的角色顛倒過來了。戈爾巴喬夫變成了受辱的一方，他與妻子賴莎被趕出總統住處時傷心得落了淚。就連為核通訊系統和代碼的轉移而精心設計的安排，也因為葉利欽的暴躁和戈爾巴喬夫的自傲在最后時刻陷入混亂狀態。

然而，葉利欽的敵意和戈爾巴喬夫的虛榮也無法阻擋一個猶如政治奇跡的事件發生。在1991年12月25日，能夠與1918年奧匈帝國覆滅或1923年土耳其帝國垮臺相提并論的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卻沒有國外戰爭或流血革命作為催化劑。共產主義南斯拉夫在烈火中分崩離析，而蘇聯卻在全世界難以置信的目光中幾乎無波無瀾地解體了。強大的蘇維埃軍隊毫不抵抗就將一個由眾多附屬共和國組成的帝國拱手讓出。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直到1991年初，都沒有政治家或學者推測出即將在此年年末發生的歷史劇變的規模和波及范圍。

蘇聯誕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內戰，當時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控制了舊沙俄帝國的絕大部分。隨后，得益于工業化和約瑟夫·斯大林的鐵腕政策，蘇聯在二戰中擊退了納粹軍隊，并發展為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隨之而來的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形成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國際政治和假想。

但是，列寧偉大的社會主義嘗試遭遇了困境。經濟停滯不前，并最終崩潰。中央失去了控制權。1991年12月25日，曾擊潰希特勒德國軍隊的國家不復存在。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話說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在我們眼前轟然崩塌”。

這是人類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是千年俄羅斯和蘇維埃帝國的終結，也是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復興的開端。這一天的到來讓美國的保守派提前慶祝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預言：蘇聯的分裂標志著“歷史的終結”，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將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得到普及。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蘇聯共產主義的結束創造了條件，鮑里斯·葉利欽則發動了致命的一擊。但是，在現代，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被尊為俄羅斯的民族英雄，他們進行權力交接的日子也沒有在莫斯科被人紀念。當代領導人不鼓勵對1991年12月25日進行任何形式的慶祝。就像弗拉基米爾·普京說的一樣，那天所發生的一切被很多俄國人看成一場“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這一天是一個警醒，提醒他們曾經強大的超級大國的失勢被美國當做冷戰的勝利來慶祝，而不是當做人們和平推翻一個政權體系從而采納民主制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勝利來慶祝。前蘇聯總統參謀長亞歷山大·里昂提耶夫在不久后這樣描述：“美國人在蘇聯的葬禮上喝得太多了，以致現在還醒不過來。”

實際上，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共產主義政權臨終時聚攏起來圍觀葬禮的美國人的數量如此之多。俄國人和美國人的利益從未像此刻這樣糾纏不清。冷戰時期長時間形成的不信任和敵對狀態，竟分解成兩個相互競爭的核大國之間不同尋常的短暫接觸。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美國人來到莫斯科，與俄羅斯的政策制定者就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新方向進行協作。當葉利欽的部長們著手一項前所未有的任務時，美國人的引導援助始終伴隨左右：共產主義模型的分解，并被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原始資本主義代替。

就在戈爾巴喬夫辭職前幾天，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訪問了俄羅斯，訪問期間，讓貝克感到震驚的是，在所有的會議上都有一個統一的主題：“想讓美國感到滿意的強烈愿望”。[3](#Bei_Ke__Baker_He_De_Fu_Lan_Ke__D)在每個新共和國都試圖與美國建立積極的合作關系的情況下，他認為“美國對它們行為的影響力”在此時達到了頂峰。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觀察到這些新國家的行為“簡直就是為了專門贏得美國對它們所作所為的支持而設計的”。[4](#Bu_Shi__Bush_He_Si_Kao_Ke_Luo_Fu)所有新出現的國家對美國言聽計從，竟至于宣布它們會遵守布什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民主原則，來獲得外交認可。

在蘇聯最后的日子里，美國外交家和俄羅斯政治人物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們幾乎每天都要相互商議。戈爾巴喬夫稱美國大使為“同志”。詹姆斯·貝克和與其地位相當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去對方的家中用餐，漫談國際事務。中情局和克格勃的高層特工進行友好接觸，他們已經相互監視幾十年了。美國的傳教士出現在莫斯科，興高采烈地傳教。二十位基督教領袖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最后幾天訪問了克里姆林宮，其中最狂熱的一位傳教士告訴戈爾巴喬夫：“你是美國教堂最求之不得的人，你是傳達上帝旨意的人。”[5](#Ge_La_Qiao_Fu__Grachev___Zui_Hou)在最后的24個小時里，克里姆林宮的走廊上回蕩著帶有美國口音的英語，美國的電視臺工作人員都擠進總統辦公室，記錄這最后的時刻。唯一在電視上播放的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個競爭對手的采訪，是在美國新聞頻道播出的。

戈爾巴喬夫將自己視為布什總統的私交，布什最后試圖幫助他維持一個改革過的蘇聯。鮑里斯·葉利欽討好美國總統卻是為了分解蘇聯。前者想要得到的是歷史的認可，后者渴望的是國際上的尊重。二者都通過各自與美國的關系來衡量自己在世界上的立場。他們都熱衷于向華府保證，核武器控制權的轉移不會威脅到世界和平。美國人也同樣急于維持一段能夠提升他們的全球利益和經濟政治哲學的友誼。

因此，1991年12月25日標志著莫斯科與西方世界尤其是與美國關系的一個頂峰。歷史上，俄羅斯只有一次曾以同樣的熱情向西方尋求靈感。那是在三個世紀前，當時彼得大帝引進西方改革并將俄羅斯的首都從莫斯科遷往圣彼得堡——作為通往西方的窗口。他留下的傳統一直沿襲到1917年，直到布爾什維克取得勝利。

在這一天，莫斯科還發生了許多引人注目的事情。繪有錘子和鐮刀的紅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降下，而革命前的白、藍、紅俄羅斯三色旗冉冉升起。國家議會將國名從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俄羅斯聯邦，或簡稱俄國。

蘇聯謝幕之際，保護手提箱的上校向戈爾巴喬夫辭行，并將它帶給新的保管者。

就這樣，正當許多西方人慶祝1991年圣誕節的時候，蘇聯不在了，俄羅斯走出了列寧七十四年前帶領這個國家走進的死胡同，另一個偉大的國家誕生了，從此屹立于歐洲眾國之間。

1. [帕拉茲琴科（Palazchenko）《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第 361 頁。](#1)

1. [伍爾芙（Woolf）《前蘇聯的核武器》（Nuclear Weap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2)

1. [貝克（Baker）和德弗蘭克（DeFrank）《外交政治》（The Politics of Diplomacr），第583頁。](#3)

1. [布什（Bush）和斯考克羅夫特（Scowcroft）《重組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第555頁。](#4)

1. [格拉喬夫（Grachev）《最后的日子》（Final Days），第87頁。](#5)

# 第1章 12月25日：破曉之前

1991年12月25日凌晨，克里姆林宮內救世主塔（Savior Tower）上的大鐘鳴響了夜半鐘聲。這是儀仗衛隊每小時換班的信號，衛隊守衛的是花崗巖筑成的巨大陵墓，里面沉睡著蘇聯的建立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那不朽的軀體。深夜在紅場散步的人，有的是本國的，有的是外國的，他們好奇地圍觀身穿大衣的哨兵們像牽線木偶一樣踢著正步，高舉手肘，走向救世主門（Savior Gate）。接著，新的一班哨兵出現，接管官方所稱的蘇聯第一哨。

在這個干燥、寂靜的星期三早晨，許多旁觀的看客都沒有戴帽子。以莫斯科仲冬的標準來看，這天的天氣應該算是溫和的，氣溫大約零上一度。12月早些時候，溫度最低達到華氏零度，而三天前的一場漫天大雪過后，這樣的嚴寒也被帶走了。[1](#Tian_Qi_Xin_Xi_Lai_Yuan__www_tut)卵石鋪就的偌大的廣場上，積雪已經清掃一空，但在圣·巴茲爾大教堂通體透亮的洋蔥形屋頂和克里姆林宮高大磚墻上的燕尾狀垛口上，殘雪仍在太陽的照射下閃著微光。[2](#Hong_Chang_De_Miao_Shu_Lai_Zi_To)在克里姆林宮內，飄揚著蘇聯紅旗的參議院大樓屋頂邊緣還殘留著積雪，站在紅場上可以清晰地看見紅旗上的金色錘子和鐮刀標志。自1918年俄羅斯首都從彼得格勒遷回莫斯科后，紅旗就一直飄揚在那里。

一小群人聚攏在紅場的西北角，靠近圣·尼古拉斯塔的地方。其中許多人都舉著燭光搖曳的蠟燭，緊靠在一群美國傳教士周圍，傳教士們正在舉行一個午夜儀式。身穿白袍的中年牧師手捧一本碩大的《圣經》，大聲朗讀。這些傳教士特地在今年的圣誕夜來到俄羅斯，在官方仍是無神主義的蘇聯紅場上慶祝耶穌的誕辰，這是他們過去做夢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在克里姆林宮內靠近軍火庫塔（Arsenal Tower）的地方，樹立著一棵高大的yolka，也就是一棵新年杉樹。很多外國人將它誤認為圣誕樹。然而，在俄羅斯，正統的圣誕節是在1月7日，按照舊的儒略歷來計算。

雖然如此，在離此十五分鐘腳程的小盧比揚卡街（途中會經過令人恐懼的克格勃總部那黃色新文藝復興風格的門面），俄語版的《齊來崇拜歌》（O, Come All Ye Faithful）旋律已經飄散在夜空中。在歷經百年滄桑的圣·路易羅馬天主教堂，一千多名禮拜者正在舉行子夜彌撒，他們擠進放置在矮石柱間的十八排木制條凳之間，石柱擋住了圣壇。門邊的一則通知上寫著：“如果你正承受痛苦，如果你厭倦了生活，那么，至少你要知道，救世主還愛著你。”一位主持儀式的牧師對這一天的歷史性質和“我們的政府回歸到一個正常的、基督教的世界”表示出極大的熱忱。

索菲亞·佩昂科娃是一個定期進行禮拜的人，她說教堂的會眾在以前大多數是外國人，但是，她注意到在最近兩年內，許多俄國人也開始來做禮拜了。[3](#Wo_Zai_12Yue_25Ri_Zhe_Yi_Tian_Zh)八十二歲的尤利婭·馬薩絲哈亞告訴一個參觀者，這是她自從八歲即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第一次來到一座莫斯科的天主教堂。她低聲喃喃道：“我從來沒有感覺這么好過，就像是終于回家了。”[4](#Nuo_Yi_Fu__Neuffer___Ji_Du_Jiao)

儀式結束后，禮拜者們紛紛離開，莫斯科昏暗的街道又會沉寂幾個小時。不過，早在破曉前，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從這座城市陰森的公寓樓里涌出。他們身穿有襯里的大衣，系著領帶，帶著裘皮帽，一步一步踩著冰冷刺骨的雪泥去趕早班電車和地鐵。為食物奔波的一天又開始了，這樣的日子，莫斯科的市民們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了。他們最重要的目標是找到通宵發放食物的地方。夜色中，他們在臟亂的商店外焦躁不安地排著隊，苦苦等到的可能是一片面包，一根瘦得皮包骨的雞腿，或是一些蔫遢的蔬菜。

1991年12月的莫斯科，顧客們找的不是食物；他們找的是長長的隊伍。他們聽從俄羅斯電視節目Vesti的建議：“如果你無意中發現一個隊伍，排在后面吧，算你走運。”

自二戰后，莫斯科就未經歷過這樣的匱乏。政府對“能夠獲得肉類產品、黃油、蔬菜油、谷物、面食、糖、鹽、火柴、煙草商品和家用、洗浴用以及其他用途的皂類的地方”強制實行了限量供應。[5](#Gai_Da_Er__Gaidar___Sheng_Fu_Sui)三天前，副市長尤里·魯日科夫承認，莫斯科有三百五十家商店的肉類已經銷售一空了。

莫斯科的所有人——工程師、演員、教授、鞋匠、店員、建筑工人、詩人——都搶購囤積他們能買到的所有東西。如果一批奶酪或意大利臘腸或哪怕是一批面包意外出現，人們馬上排起長隊，能搬多少就買多少。如果在冬天大雪飄落之前，公寓里沒有存上從郊區收獲的幾桶土豆或幾堆卷心菜，很多家庭將面臨挨餓的殘酷現實。

莫斯科為生活苦惱之際，一列蓋著油布的小型卡車從報紙印刷廠出發，在莫斯科坑坑洼洼的路上艱難行駛。卡車路過街上每個報亭時都扔一包報紙在地上。報紙要比往常的輕。大多數日報都被縮減為四版，因為新聞紙和印刷油墨供應短缺。

百姓的擔憂反映在關于物資短缺和即將來臨的價格上漲的故事中。《共青團真理報》的一個標題直接就說，“肉已抵達敖德薩”，但至少這樣的標題要比《真理報》頭版的“克拉斯諾雅茨克面包售罄”更能給人希望。

容量嚴重縮減的報紙上，沒什么內容顯示今天將會是這個國家甚至世界政治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是，在《真理報》上，有一條線索。在頭版的一個獨立段落里，這份共產黨報紙指出，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將在今天結束之前發表一個重要宣言，由國家電視臺直播。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評論。

1. [天氣信息來源：www.tutiempo.net。](#1_1)

1. [紅場的描述來自同期報刊上的報道。](#2_1)

1. [我在12月25日這一天之前曾來到圣·路易羅馬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 of St. Louis）與索菲亞·佩昂科娃（Sofia Peonkova）進行交談。](#3_1)

1. [諾伊弗（Neuffer），“基督教信仰在莫斯科激增”（In Moscow a Christmas Leap of Faith）。](#4_1)

1. [蓋達爾（Gaidar）《勝負歲月》（Days of Defeat and Victory），第 111 頁。](#5_1)

# 第2章 12月25日：黎明

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西邊的鄉間別墅幾乎被云杉和冷杉遮擋住，樹上厚厚的積雪因前夜轉暖而稍稍融化。水滴沿著松針緩緩墜下，車道旁高高堆起的積雪融化后，形成一道道小細流流淌而出，使車道的柏油路面呈現出暗沉的光澤。

在別墅樓上的一個房間里，蘇聯總統和軍隊總指揮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正穿上一件漿硬的白色單袖片襯衫和帶有柔和條紋的單排扣海軍羊毛西裝，這些衣服都是由他在庫圖佐夫斯基大街的裁縫親手縫制的。他從一些真絲領帶中挑選出一條特別的皮圍巾，黑色打底，上面是花紋般的紅色渦紋圖案設計，這是他經常在重要場合佩戴的一條圍巾。

戈爾巴喬夫身材不高，長著一雙迷人的淡褐色眼睛和銀色的頭發，很早以前，他的發際線就后退了，露出額頭上的紫色胎記。這天早晨，戈爾巴喬夫有些疲憊，因為宿醉感到有點難受。他頭天晚上很晚才回家，現在有感染流感的先兆。他作為總統的工作已經基本上結束了，但是，前一天晚上，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逗留了很久，莫斯科的警察局局長阿卡迪·穆拉切夫突然打電話來祝他好運，于是兩人約在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追憶往事。在戈爾巴喬夫統治的最后時刻，很少有人會費心做這樣的事了，于是，一時興起之下，他邀請了自己以前的政敵穆拉切夫來陪他喝一兩杯白蘭地。蘇聯的最后一任總統將核提箱放在桌上離他一臂之遙的地方，竭力想給他的來訪者留下一個印象，即他在對蘇聯進行改革的探索中沒有犯任何錯誤。蘇聯的解體不是他的過錯。[1](#Mo_Li__Murray___Zhuan_Zhi_Zhe_Mi)

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在克里姆林宮停留到深夜已是常事。經常要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他才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睡覺前，他會習慣性地和妻子賴莎在夜色中散步。當他們沿著別墅周圍的小道閑步時，他會告訴賴莎這一天中發生的事情。他對賴莎毫無隱瞞。他曾公開承認與妻子討論國事，一度引起俄羅斯人的流言飛語。戈爾巴喬夫將世界上重量級的政治家列為自己的朋友，但他真正親密無間的盟友是他三十八年來的伴侶和知音。用戈爾巴喬夫的話說，他們“經常為對方的成功高興，也常常為對方的失敗感到痛苦，仿佛感同身受”。[2](#Ge_Er_Ba_Qiao_Fu_De_Bie_Shu_He_T)

早上用完早餐后——冬天通常是谷類食物，由他們的傭人舒拉送到樓上的起居室，舒拉按照賴莎對所有女傭人的要求帶著頭巾，也沒有化妝——總統穿過走廊來到藏書室，書室里一排排玻璃書架幾乎觸及天花板。在書架中間的空隙，放著一幅裝裱過的賴莎的黑白照片，這是戈爾巴喬夫最喜歡的一張照片，當時賴莎還是莫斯科大學一名相當質樸的學生。還有他父親謝爾蓋的一張照片，身穿一件簡潔的軍用短上衣，佩戴有三枚獎章和兩枚因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抵御納粹德國而獲得的紅星勛章。另外一幅珍貴的圣像，是俄羅斯東正教會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在3月份贈予戈爾巴喬夫的六十歲生日禮物。這些照片和圣像將在戈爾巴喬夫一家離開時被小心打包好。

藏書室外面有一間用木板隔出來的小書房，里面有一張卡累利阿樺木做的桌子，桌上有幾部白色電話和一部紅色電話，紅色電話上面蓋著透明的罩子——這部電話是國家出現緊急情況時撥打的熱線，別墅的清潔人員不得觸碰。賴莎近來發現自己非常害怕這些電話的響聲，“就像是打破平靜夜晚的槍炮聲”，它們帶來的都是“絕望的大喊大叫、懇求、苦難，有時甚至是死亡”。[3](#Ge_Er_Ba_Qiao_Wa___Wo_Xi_Wang)

五十九歲的賴莎嬌小迷人，在她身上也可以看出這段時間的政治劇變對她產生的壓力。用她的話說，就是考驗了她的精神、心智和毅力，給她帶來了難以治愈的頭痛和無法入眠的夜晚。在8月份針對戈爾巴喬夫的未遂政變期間，她因為中風而急劇衰弱，從那以后，她的健康狀況一直很差。中風影響了她的言語能力和右臂的行動。從她曾經白皙的肌膚上出現的皺紋可以看出，眼睜睜看著自己丈夫的聲望一天天下降帶給她的折磨。

對于賴莎來說，戈爾巴喬夫是她的真命天子。確實，很多迷信的人將戈爾巴喬夫額頭上與眾不同的胎記解釋成一種預示。但是，米哈伊爾和賴莎認為他們曾經接收到一個預兆，說明他是特殊的。他們二十幾歲時，都夢到了同一個預兆。他們身處一個又深又暗的井中，試著爬出去，但一次又一次摔下來。最后，當他們成功逃離后，面前出現的是一條大道和一輪旭日。賴莎那時就喚著他的昵稱告訴他：“米沙，你注定會成就偉業。”[4](#Xia_Ha_Na_Zha_Luo_Fu__Shakhnazar)

戈爾巴喬夫開始將自己視為天意的化身。他說他的使命是被選中來進行蘇聯的經濟改革——這項任務的初衷是建設社會，而對他來說則意味著俄羅斯的歷史復興。他將自己的被迫退位視為一場宏大的善與惡、忠誠與背叛、希望與幻滅、寬容與仇恨之爭的后果。他認為，他下臺的這一天是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

在書房里時，蘇聯總統還有機會無數次地將目光投向他加滿批注的辭職演說稿。這將是他一生事業中最重要的聲明之一。這個聲明會定義他本人和他留下的傳統的主要特征，并標記這個國家未來發展的特征。當然，對于這個國家的未來，他現在幾乎已經無能為力了。他正被迫將權力轉移到那些能力不足又不負責任的人手中，他堅定地認為，那些野心勃勃的冷酷政治冒險家正以犧牲蘇聯為代價，來滿足他們接管克里姆林宮并將他驅逐的強烈欲望。不到兩個星期前，戈爾巴喬夫還在電話里告訴喬治·布什他非常自信蘇聯能夠挺過難關。那時，他還有理由相信，自己將會繼續作為總統一直住在莫斯科河岸邊拉茲多里小鎮上的這棟國家別墅里。發生在四個月前的八月政變導致蘇聯開始崩潰，共和國一個接一個宣布它們脫離聯盟的意圖，而這位列寧的后繼者已經想盡辦法讓聯盟維持下去。他的嗓子因為嘗試說服共和國領導人、來訪政治家、新聞工作者，以及任何愿意聽信這個國家不應該解體、解體國家是荒謬的并將導致饑荒、內戰和殺戮的人而變得嘶啞。

上個星期六，戈爾巴喬夫所繼承的這個超級大國的消亡變得無可避免，所有的共和國甚至聯合起來抵制一個削弱了的中央政權。直到兩天前的星期一早上，他在無可奈何之下，才決定在今天晚上宣告辭職。而在星期一下午，他才與他憎恨的競爭者確定和平過渡的條款。確定條款的過程對戈爾巴喬夫來說是痛苦的。他甚至沒有被給予舉辦一個莊重的告別儀式的尊嚴。

至少，他不用像最近被免職的兩位歐洲共產主義領導人——東德的埃里希·昂納克和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那樣面對被流放或死亡的命運。但是，他知道，有不少人熱切地想通過敗壞他的名聲來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正名。

根據過渡條約，戈爾巴喬夫夫婦有三天的時間來準備離開總統別墅，離開他們生活了六年的家，之后他們必須把鑰匙交給俄羅斯的新統治者。他們要將許多款待世界領導人和夜談如何重塑世界的回憶留在這里。現在，他們有很多相對平凡的事要做。他們要分類整理書籍、照片和文件，打包衣物和私人物品，然后搬到新家。他們在莫斯科列寧山上的城市公寓里也有類似的事情要做，這套公寓也是國有的。

戈爾巴喬夫一家搬到總統別墅時，他們以為會在那兒住一輩子。這棟別墅的官方名稱是巴爾維哈四號，它象征了戈爾巴喬夫這位最頂層的蘇聯官員的最終成功。在他爬升到蘇聯權力頂峰的過程中，他們也住過政府提供的規模小一些的別墅。這些國有住宅顯得特別沒有人情味，賴莎也不喜歡他們“老是搬家，感覺像是房客”。但這是他們的最后一站了。這棟別墅與眾不同，是他們親手創造出來的。這幢黃色的三層大樓是在戈爾巴喬夫1985年成為共產黨總書記之后，在他親自監督之下，模仿第二帝國的建筑風格建造的。當時，這位黨的領導人有著皇帝般的指揮權，這棟別墅是由蘇聯軍隊的一個特殊兵團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建成的，軍團的將軍們還因此獲得了幾枚勞動勛章。這是賴莎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她曾經說：“我的家不僅僅是我的城堡，它是我的世界，是我的宇宙。”

被保鏢稱為狼巢的總統別墅配有一些廚師、女仆、司機和保鏢，這些人都在樓下或附屬建筑里有自己的住處。別墅里有幾間配有大壁爐的起居室，一個寬敞的餐廳，一個會議室，一個配有醫療人員的門診部，一個家庭影院和一座游泳池，每層樓都有寬敞的浴室。到處都是大理石嵌板、鑲木地板、烏茲別克斯坦織造的地毯，以及水晶枝形吊燈。別墅外面，偌大的花園和直升機降落場是砍伐了一百六十英畝的林木建成的。別墅周圍的區域以清新的空氣、樹木成林的山巒和俯視寬闊而彎曲的莫斯科河的視野而著稱。

半個多世紀以來，蘇聯的領導人都住在沿著莫斯科河西部流域分布的華美房子里。自從十七世紀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明令禁止在此建造任何生產設施起，這里就成了莫斯科精英們偏愛的靜養地。斯大林曾居住在離城區更近的孔策沃高岸上的一棟兩層宅邸里。這棟布利茲納亞別墅隱藏在占地十二英畝的樹林中，周圍有雙層防護網，還曾一度由八架經過偽裝的三十毫米口徑高射炮和一支三百人的內政部特種軍隊保護。而在戈爾巴喬夫的別墅，有一個軍事指揮部，為核按鈕和它的操作者們準備的設施和一個特殊的車庫，車庫里面有一輛底座強度可媲美軍事坦克的逃生車。

戈爾巴喬夫之前的歷任蘇聯領導人中，除了一位，其他人都是在花圈環繞中離開他們的別墅的。斯大林是執政期間在他的鄉村宅邸逝世，他的后繼者也都是在仍掌控這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的時候逝世的，有利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只有斯大林的下一任繼承者尼基塔·赫魯曉夫，一個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改革者，是在1964年被剝奪了權力，導致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真理報》是這樣描述原因的，“決策和行動脫離現實”。

現在，戈爾巴喬夫將要承受和赫魯曉夫同樣的命運。他離開總統別墅時仍是蘇聯總統。當他晚上回到別墅時，將變成戈爾巴喬夫先生，一個六十歲的領退休金的人——甚至比赫魯曉夫被免職時還年輕十歲。

早上九點半左右，戈爾巴喬夫向扎哈卡告別（他喜歡深情地稱呼賴莎這個名字，他曾見過十九世紀畫家維涅齊昂諾夫的一幅名為《扎哈卡》的女性人物畫像，覺得畫中人物與賴莎肖似）。他走下木制樓梯，經過掛在樓梯間墻上的照片，其中有一幅出自孩童之手的彩色貓頭鷹畫，是賴莎的一名小小仰慕者寄給她的紀念品。樓梯底部直到最近都擺放著一間小玩具屋，旁邊放著一副雪橇，提醒他與孫女們（十一歲的謝妮亞和四歲的納斯特婭）慶祝新年的計劃；只不過他們一家人現在要到別的地方慶祝了。他先到寬敞門廳右邊的衣帽間換下拖鞋，穿上外出的鞋子，然后圍上一條上等的褐色圍巾，披上大衣，戴上氈帽，接著穿過雙層玻璃門，手里拿著放在薄薄的軟皮文件包里的辭職演說稿。

屋外，早晨明亮的陽光下，他的司機已經打開了他專用的加長版豪華轎車吉爾–41047的前排乘客車門。這輛車是為黨和國家制造的專用車隊中的一輛。戈爾巴喬夫在司機旁邊的皮制座椅上坐下。他總是坐在前排。

那兩個便衣上校從他們在一層的臨時房間里出來，拿著片刻不離總統左右的手提箱。他們鉆進一輛黑色的伏爾加小轎車，跟在總統的吉爾車后面去往莫斯科。這是他們最后一次和裝載著發動核襲擊通訊設備的手提箱的保管人同行了。

隨著輪胎摩擦路面的聲音，這輛防彈的豪華車——實際上是一輛裝甲車，結果做成了一輛豪華轎車——拐過彎道，通過綠色木柵欄上的一扇大門，門前的警衛在車經過時敬禮。然后，車開上了Rublyovo-Uspenskoye高速公路。這輛重型汽車行駛的前五英里路上方，都是披著積雪的杉樹伸出樹枝搭成的拱頂，車前車后都有閃著藍色閃光燈的警車。它緩慢通過頻繁出現的彎道，這些彎道的設置是為了防止刺客在蘇聯官員們往返克里姆林宮的路上瞄準目標的。近來，因政府部門缺乏資金，一些國有宅邸被賣給外國人，還有許多往日到處可見的警察崗也被撤銷了。

護航車隊在到達庫圖佐夫大街時開始加速。車隊沿著為官員車隊預留的中間車道疾行五英里，從斯大林時期建造的大片牢固住宅區旁急馳而過，在莫斯科的凱旋門（Triumphal Arch）下馳過，穿過莫斯科河到達俄羅斯首都的中心。這輛黑色轎車以平穩而舒適的速度沿著新阿爾巴特大街行駛，幾乎沒有減速，人們看不到坐在深色車窗后的沉思者。

這位蘇聯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領導人計劃在今天晚上的電視上向觀眾們解釋，他解散了這個蘇聯共產主義政體，帶給他們自由、公開、政治多元主義和民主政治，并為冷戰畫上句號。而為此，他將得到全世界的贊頌和崇拜。

但是，在俄羅斯，戈爾巴喬夫因為無法改變公民的命運而受到嚴厲的批評。睡眼惺忪的顧客在食品商店外面被踩實了的臟雪上走來走去，他們幾乎沒有人會為了他的離去而落淚。他們對他的評價已被空蕩蕩的商店櫥窗扭曲了。

對于這些，戈爾巴喬夫很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向國外政要講述一則針對他的段子，講的是一個關于排長隊買伏特加最終空手而歸的人，他見人就說他要去克里姆林宮斃了戈爾巴喬夫，結果回來的時候卻抱怨道：“想殺死戈爾巴喬夫的人在克里姆林宮前排的隊更長。”

然而，自我批評并不是戈爾巴喬夫心理技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他犯過很多錯誤，但他只會不情不愿地承認他的錯誤，就像他在辭職演說中回顧為人們所做的事情時一樣。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幾乎總是在凌晨兩點開始他的一天。[5](#Ye_Li_Qin___Wei_E_Luo_Si_Fen_Dou)這位俄羅斯聯邦總統被嚴重的失眠癥所擾。他不喜歡吃安眠藥，發現吃安眠藥對他的睡眠也沒有什么作用。在深夜就寢幾個小時后，他習慣性地從床上起來。這位高大的前建筑工程師六十歲了，粗糙的農民面孔上別扭地長著一雙小藍眼睛，滿頭銀發。每遇到這種情況，他就穿著日式酒店薄睡袍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以緩和頭痛和胃疼，然后在大約一小時后，喝一點茶，再回到床上。如果碰上周期性的痛風發作，情況就更糟了，會讓他的大腳趾產生劇烈的疼痛。

葉利欽后來在回顧他人生中的這個階段時，回想起的都是“一陣又一陣讓人衰弱的抑郁消沉，使人苦惱的深夜沉思，失眠和頭痛，因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臟亂而貧困的面貌產生的絕望……媒體的批評，俄羅斯議會里的爭論不休，以及決策的重擔”。他常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而這是令人討厭的事情”。他的大腦一直保持著運轉，相比白天在辦公室而言，凌晨的他對自己更加坦率，“仿佛全身的開關都打開了”。他發現，在凌晨兩點，“你會想起各種各樣的事情，還會反復咀嚼那些并不愉快的事情”。[6](#Ye_Li_Qin_De_Jia_Ting_Sheng_Huo)

在這個12月的冬日早晨，葉利欽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有些是令人愉快的，有些則不然。今天，在經歷了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長期不和與積怨后，他將成為勝利者。他暗自承認，自己許多行為的動機都跟與蘇聯總統的尖銳沖突有關。直到不久前，他的助手瓦倫汀娜·蘭瑟娃還懇求他停止與戈爾巴喬夫之間這種愛恨交加的關系。他反駁道：“別再教我該怎樣生活！”他再也不用跟戈爾巴喬夫協商，忍受他的夸夸其談，忍耐他的苛責，或承受他滿是臟話的斥責了。戈爾巴喬夫這個富有魅力和經驗的世界政治家嘴里冒出來的臟話能讓周圍的空氣都變得下流，而葉利欽這個來自邊遠落后地區的酗酒的西伯利亞人雖在很多國際圈子里被看做小丑一般的人物，但說話從來不帶臟字，并且極其討厭嘴巴不干凈的人。

今天，他必須在全世界的電視上作為一個政治家自娛自樂，并告訴世界不要怕他——甚至應給予他敬重。在今天結束前，仍在戈爾巴喬夫手中的核提箱將會轉移到他的手中，世界也將會知道核提箱在他手中是安全的。他會在被他扔到政治荒原的男人面前表現得有總統氣派、威嚴而又慷慨。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他還需要處理自己陣營里的一些危機，這些危機會威脅到他的政府的穩定性和他為新獨立的俄羅斯制定的激進計劃。

通常，葉利欽在起床前能夠抓緊時間睡幾個小時，起床后，他穿著T恤和短褲到廚房吃早飯，先喝一些燕麥片粥和茶水，然后是用黃油煎的雞蛋、洋蔥和西紅柿。他的妻子奈娜和三十歲的女兒坦妮亞一起準備早餐。他們居住的這套國有公寓位于莫斯科中部靠北的特維爾–亞姆第二大街五十四號的一棟九層大樓的四層，從公寓可以看到位于白俄羅斯火車站附近繁華區域里的因為救世主教堂改造而荒廢的修道院。他們的公寓里沒有仆從。公寓中央是一個寬敞的客廳，貼著銀灰色條紋相間的壁紙，高至天花板的書架上擺放著一套套藍色、棕色和綠色封皮的俄羅斯經典著作，其中葉利欽最喜歡的有：契訶夫、普希金和“鄉村作家”謝爾蓋·葉謝寧，他們的詩作在每個自尊自重的俄羅斯家庭都能找到。客廳里有一棵大橡樹，還有烏拉爾山脈風景畫和一幅頗受贊譽的野雛菊油畫。房間里還有成堆的葉利欽最喜歡的歌手安娜·喬曼的錄音磁帶。他太喜歡這位波蘭藝術家了，每次聽她演唱她的一首流行歌曲《一年一度果樹花開》時，他一向嚴肅的面龐會呈現出豐富的表情。

公寓里還有一個寬大的門廳，兩間有單獨浴室的大臥室，一間客房，一間相當大的帶陽臺的廚房和一間小辦公室。辦公室里堆滿了葉利欽擔任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以來的文件，剩余的空間只夠放一把扶手椅和一張桌子，地板上堆放著他的自傳《總統筆記》的幾冊復印本，這本自傳去年被譯成英語出版，標題為《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

這套住所是在葉利欽六年前作為掌權派——直到最近都在管理國家的共產黨高層官員的統稱——嶄露頭角的一員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來到莫斯科時分配到的。葉利欽、奈娜和女兒坦妮亞、第二任女婿利昂尼德·吉契科以及十一歲的外孫鮑里斯住在一起，當有客人夜里留宿的時候，鮑里斯只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葉利欽為小博卡[13](#Bao_Li_Si_De_Ni_Cheng)感到自豪，因為他是個真正的打架好手，也是同學中間的頭頭。

公寓里的家具都是牢固耐用型的，是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現在被稱為葉卡捷琳堡，因為它在三個月之前恢復了革命前的名字——制作的。葉利欽自夸道，“它們要比莫斯科制作的垃圾質量好多了，也堅固耐用得多”。奈娜（葉利欽也叫她娜婭）通常會給客人一個墊子，以防從沙發里抻出來的彈簧掛壞衣服，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廚房里一把凳子也有一顆釘子冒出來了。他們有三部電話。用來接電話的那部現在又能用了——在八月政變的混亂中，葉利欽一家弄丟了電話賬單，當時那部電話被掐掉了。

葉利欽強壯的保安主管和酒友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常常擔心特維爾大街對于總統來說不夠安全。“在街道入口處很容易瞄準射擊，很容易堵住總統的車，如果窗簾沒有拉起來，鄰居們也能輕易透過窗戶看到總統家里的一切。”坦妮亞曾經被一個男人襲擊，他看著她鍵入大門的安全密碼，尾隨她進門，然后“一把抓住她”。[7](#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跟戈爾巴喬夫一樣，俄羅斯領導人也有一棟別墅，位于莫斯科城外約二十英里處，莫斯科河岸邊Rublyovo-Uspenskoye高速公路附近的阿爾汗金斯科二號樓。盡管空間有限，外面的街道又臟又吵，但他在工作日更愿意待在市區公寓里，他們一家人只在周末的時候去別墅度過。

葉利欽也在準備搬家。他和他的家人將在戈爾巴喬夫一家搬出去后接管總統別墅，并交出他們屬于俄羅斯聯邦的小一些的鄉村別墅。他認為蘇聯總統的宅邸應該成為俄羅斯總統未來的住所。葉利欽不擅社交，也就從來沒被邀請去過戈爾巴喬夫在列寧山——挨著莫斯科大學的一個精選城郊住宅區——的市區公寓，因此，他不知道要不要也占用這套公寓，他要在視察后才能決定是要這套，還是他現在住著的那套。

葉利欽洗完澡后，奈娜會替他吹干并打理頭發，幫他穿上一件昂貴的白襯衫，系上藍紋領帶，最后穿上定做的深色時髦西裝。他會坐下來讓奈娜給他系鞋帶，因為對于身軀龐大的他來說，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往常一樣，他的黑皮鞋被擦得像鏡面一樣反光。[8](#Suo_Luo_Wei_Yue_Fu__Solovyov_He)

當葉利欽在6月被選舉為蘇聯十五個共和國中最大的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時，他的副總統、前空軍上校亞歷山大·魯茨科伊認為，俄羅斯最高官員的著裝應該更加高雅。魯茨科伊用自己的軍用優惠券買了一件昂貴的西裝和幾件上等襯衫送給葉利欽。葉利欽接受了魯茨科伊的禮物，但堅持要支付費用。魯茨科伊經常這樣讓他難堪。有一天，魯茨科伊走進葉利欽的辦公室，一臉驚悚地說：“你從哪兒弄來的那雙鞋子？你不應該穿那樣的鞋。你是總統。”第二天他再出現的時候，拎著六雙意大利名牌皮鞋。[9](#Ye_Li_Qin___Wei_E_Luo_Si_Fen_Dou_1)

在去玄關之前，這位像熊一樣壯實的俄羅斯領導人溫順地讓他的妻子和女兒對他進行最后的檢查。每天早晨，奈娜都要保證她的鮑利亞領帶是挺直的，肩膀上沒有一粒灰塵，他那頭盔一樣的濃密頭發一絲不亂。在整飾完葉利欽后，她通常會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放上十盧布鈔票，這樣他就可以自己買點心或午飯。

鮑里斯管理俄羅斯，奈娜則管理著他們的家。她是家庭主婦（Khazyaika），在家里有強大的控制權，就連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人也要每月上交工資。自從他們三十五年前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結婚后，這就成了慣例，奈娜會從工資中拿出一部分作為他的零用。葉利欽承認：“如果沒有她，我不會從這么多政治風暴中挺過來……比如1987年和1991年。”[10](#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296)但是，對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鮑里斯做決定。奈娜曾經解釋道：“他總是最后下定論的人，他像堅固的城墻一樣保護著我們。”[11](#Jin_Ke_Wei_Qi__Zenkovich___Chuan)

而在晚上，儀式是反過來的。家里的女人們排成一行歡迎他回家，替他脫掉衣服，只剩下貼身衣物，幫他換上在家穿的拖鞋。據科爾扎科夫觀察，“葉利欽要做的就是抬抬胳膊和腿”。在葉利欽的助手列夫·蘇哈諾夫看來，奈娜是這個國家最堅忍的妻子。“她經歷著與她丈夫有關的一切，這是其他任何人沒有經歷過的。她感受得到丈夫與政黨機器之間斗爭的所有結果，我可以作證這些斗爭是絕對殘酷而卑劣的。”[12](#Su_Ha_Nuo_Fu__Sukhanov___He_Ye_L)

九點整，葉利欽離開玄關，在玄關放著的傘中間有一根高爾夫球桿，他在兩年前開了莫斯科第一家高爾夫球場，這根球桿就是瑞典冰球運動員瑟文·圖巴當時送給他的。葉利欽不打高爾夫，但對網球和排球很有熱情，他樂此不疲地告訴外國來訪者，他是俄羅斯聯邦排球隊的一員。這不是真的，但他自己顯然深信不疑。

乘坐公寓大樓的電梯下來后，他走出電梯踏入一輛已經發動的黑色尼瓦牌汽車。葉利欽在七個月前爭取選票時乘的是一輛普通的莫斯科人牌汽車——這對于他站在人民這邊的形象有幫助——但自從他當上總統后，科爾扎科夫堅持使用這輛笨重的四輪驅動的尼瓦牌汽車以保證安全。葉利欽坐在后排靠右，科爾扎科夫坐在他前面的副駕駛座上，抱著一件自動武器。其他兩名保鏢也揣著小手槍。尼瓦車前后都有載著民兵警衛的車輛。整座城市充斥著流言，說會有軍隊支持蘇聯的頑固分子發動第二次政變，破釜沉舟以保留蘇聯。作為葉利欽私人保鏢的頭領，科爾扎科夫絲毫馬虎不得。

尼瓦車駛過實行交通管制的特維爾街道，沿著大格魯林街前進，穿過破敗的城市動物園地界，到達科布什科夫大街。五分鐘之后，車子到達了目的地，這是一幢位于莫斯科河堤岸的摩天大樓，由大理石和混凝土建成，被稱為俄羅斯白宮。車子開入地下車庫。目前，這棟建筑是葉利欽的權力基地。很快，他的權力基地就會變成克里姆林宮。

1. [默里（Murray）《專制者民主》（A Democracy of Despots），第 136 頁。](#1_2)

1. [戈爾巴喬夫的別墅和他們夫婦生活方式的描述源自以下書籍：戈爾巴喬娃（Gorbacheva）的《我希望》（I Hope）；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Memoirs）；切爾尼亞耶夫（Chernyaev）的《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科爾扎科夫（Korzhakov）的《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in）和波爾金（Boldin）的《震撼世界的十年》（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2_2)

1. [戈爾巴喬娃《我希望》，第174頁。](#3_2)

1. [夏哈納扎羅夫（Shakhnazarov）《杰娜·斯沃博德》（Tsena Svobody），第493頁。](#4_2)

1. [葉利欽《為俄羅斯奮斗》（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3頁。](#5_2)

1. [葉利欽的家庭生活細節描寫來源于阿倫（Aron）的《鮑里斯·葉利欽》；科爾頓（Colton）的《葉利欽》（Yeltin）；科爾扎科夫的《鮑里斯·葉利欽》和波爾金的《震撼世界的十年》。](#6)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170—171頁。](#7)

1. [索洛維約夫（Solovyov）和克列皮科娃（Klepikova）《鮑里斯·葉利欽》，第91頁。](#8)

1. [葉利欽《為俄羅斯奮斗》，第32頁。](#9)

1. [科爾頓《葉利欽》，第296頁。](#10)

1. [津科維奇（Zenkovich）《穿粉褲子的男孩》（Malchishki v Rozovykh Shtanishkakh），第388頁。](#11)

1. [蘇哈諾夫（Sukhanov）《和葉利欽在一起的三年》（Tri Goda s Yeltinym），第233頁。](#12)

1. [鮑里斯的昵稱。](#13)

# 第3章 雇傭摧枯拉朽的“推土機”

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標志著一場曠日持久的、尖銳的權力爭奪落下帷幕。這場爭斗從他的前任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去世，1985年3月11日他被選為蘇共總書記不久后就開始了。對于蘇聯來說，作為一黨制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管理整個國家的人。戈爾巴喬夫立刻開始組建自己的領導團隊。他最先做的幾件事情之一就是吸收鮑里斯·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繼承的蘇聯已經停滯不前。表面上看來，社會似乎是穩定的。俄羅斯以外的共和國似乎都默認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蘇聯的工程師將人類第一次送上了太空。在軍事方面，蘇聯的武器可以與西方比肩。蘇聯的運動員躋身于世界頂尖運動員之列。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受過教育的，高等教育對每個人來說都唾手可得。

但是，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在拘留營里日漸憔悴，這是斯大林時期的遺留問題。那時候，沒有獨立的媒體，沒有集會的權利，不能自由移民，沒有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受限，并且完全不能容忍大眾對高層官員的批判。腐敗和酗酒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法院聽命于黨，警察和克勃格可以逮捕任何人而不需要承擔法律賠償。秘密警察杜絕一切未授權的活動，不論是藝術展還是學生討論組。外國書籍、雜志和電影如帶有未經批準的內容將會被取締。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斯大林強制實行的指令性（中央管制）經濟遭遇危機。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尚過得去，但大多數農村人口的境況非常悲慘。缺乏競爭和過于依賴世界石油銷售遏制了國內制造業的發展。國家陷入與西方的軍備競賽，這些競賽耗資巨大，極其危險。蘇聯還在阿富汗卷入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蘇聯軍隊在1979年也入侵過阿富汗。

這是一個充斥著憤世嫉俗情緒的社會。很多人開玩笑說，他們假裝在工作，然后，政府假裝付給他們薪水，而農業面臨的四個最嚴重的問題是春、夏、秋、冬。

社會需要一些改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國家在自由度和生活水平方面被資本主義世界拋在了后面。新一代俄羅斯人變得對審查制度和旅游限制不滿。這也是他們轉向高層官員中最年輕也最有精力的同志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原因。

戈爾巴喬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俄羅斯南部肥沃草原上的一個小村莊。他從十幾歲起就是一個熱誠的共產主義者。在他性格形成的幾年間，這個國家被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束縛著。十八歲時，他從學校畢業，因一篇題為“斯大林——我們的斗爭榮耀；斯大林——我們年輕人的榜樣”的文章獲得一枚銀質獎章。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法律期間，接觸到各種新觀念，意識到偏離官方路線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他是大學里共青團（年輕人的共產主義團體）的活躍分子。在那里，他遇到了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季塔連科，一個認真的哲學系學生，對馬列主義有著堅定的信仰，盡管她寫的關于集體農場的畢業論文讓她洞察到了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農民悲慘的生活。1953年，他們結婚，同年，斯大林去世。戈爾巴喬夫后來開玩笑說，她是“我們家庭黨組織”的領導人。

善于調解、處事圓滑又健談的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天生的政治領導人，引起了他的前輩們的注意。他二十一歲時加入共產黨，并很快適應了黨政官員（apparatchik，以管理為職業的高水平黨員）的角色。作為一個野心家，他尤其以批判的眼光看事情。他很早就堅信“我們的國家出了問題”。1969年，當他跟隨一個黨代表團訪問捷克斯洛伐克，遭遇憤怒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粗魯行為之后，這種想法就更加強烈了。訪問捷克的前一年，蘇聯的坦克摧毀了帶來布拉格之春和更加繁榮公正的社會前景的捷克共產主義改革運動。

1970年，他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面積相當于西弗吉尼亞州一個肥沃的農業區）的黨委第一書記——相當于統治者。在視察他的領地時，他發現到處都是“徹底的貧困和荒蕪”。他碰到了在附近的黑海度假勝地度假的蘇聯重要人物，并成功地向他們施展了自己的魅力，他們后來在他的仕途升遷中給予了支持。八年后，他被調到莫斯科，并在不久后被委派到政治局（由十二個資深共產主義官員組成的團體，決定蘇聯的一切事務，大至戰爭與和平，小至伏特加和面包圈的價格）。他用他的年輕活力、堅韌和相信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辯論和想象來解決的樂觀主義，從老一輩同志中脫穎而出。

盡管戈爾巴喬夫負責的是農業，他還是被送往國外接觸國外的領導人。他的精明練達和敏捷才智傾倒了政要顯貴，這些政要已經習慣了喜怒不行于色的蘇聯領導人像設定的程序一樣說不。他關于國際關系的新思路——協商而非對抗——吸引了瑪格麗特·撒切爾，使得這位鐵娘子友好地評論道：“我喜歡戈爾巴喬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合作。”國外的人發現他幾乎是一個顛覆性的人物。當一個訪問莫斯科的法國官員問他，延遲了他們會面的農業問題是什么時候出現的，這位未來的總書記笑著回答：“1917年。”

戈爾巴喬夫認為國家處于非常惡劣的狀態，只能通過根本性的改革和結束冷戰來挽救。他的忠實伙伴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跟他的觀點一致。1984年12月，當他們一起在黑海的皮聰大（Pitsunda）旅游勝地度假時，這個格魯吉亞人告訴戈爾巴喬夫，“一切都是腐敗的。現狀需要改變”。在當時，大聲說出這樣的話幾乎是大逆不道的。現在被政治局賦予最高職位幾個小時后，戈爾巴喬夫私下里附和了愛德華的話。1985年3月12日，當他下午四點從克里姆林宮回到家時，在讓人瑟瑟發抖的華氏十五度的空氣中，他跟賴莎在他們的莫斯科郊區花園散步時告訴她，“我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即使是共產黨總書記也不敢冒險在室內談論這樣的事情，以防克格勃竊聽。

其他一些有影響力的呼聲也促使戈爾巴喬夫進行改革。《真理報》的編輯瓦列利·波爾金已擔任他的私人助手五年，提醒他經濟的崩潰可能隨時引發社會動亂。

當戈爾巴喬夫為共產黨陣營四處尋找新生力量時，他那滿頭銀發的副手葉戈爾·利加喬夫向他推薦鮑里斯·葉利欽，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黨組織領導人。利加喬夫興奮地說：“這就是我們要的人——我們一定要選他。”

鮑里斯·葉利欽1931年2月1日出生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省布特科西部一個貧困的西伯利亞村莊。他的一生是從撲通一聲開始的。在洗禮的時候，喝醉的牧師把他掉進了圣洗池，最后他是被他媽媽撈起來的。青少年時，他身體健壯，固執任性，直言不諱，動輒與人爭吵。他還愛出風頭。在一次學校晨會上，他指責一個不受歡迎的老師虐待學生，引起了一陣騷動。這個老師最后被解聘了。盡管他成功將老師趕了出去，但學校記錄上他的行為規范是“不合格”。他常常充當蠻勇膽大的小頭目，在和伙伴們擺弄一個偷來的手榴彈時炸掉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葉利欽在大學里學的是工程學，畢業后成了一位模型建筑專家，后來被晉升為總工程師，然后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建筑集團的處長。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是一座高度工業化的城市，不對外國人開放。1956年，他與奈娜·伊奧希夫娜·吉麗娜結婚，當時奈娜還在繼續深造，打算成為一名環境工程師。

葉利欽直到三十歲才申請加入共產黨，當時主要是為了確保晉升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建設處處長。憑借他的人格力量和組織能力，他在黨內節節高升，1976年，他被提升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第一書記，這意味著他成為蘇聯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之一的領袖——這一地區的面積與華盛頓州差不多，人口有四百五十萬。

葉利欽的作風強硬專斷，他通常使用舊式共產主義“猛攻”慣例，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完成一項工作。他曾經承認他是眾所周知的非常典型的俄羅斯人形象，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的身體力量，還需要不斷給自己充電來趕走疲憊。不經過通知就參觀工廠、突然走進學校課堂、爬下礦井、步行穿過田野和擠在破舊的公交車上直接聽人們談論問題，已經成了他的慣例。他解雇不稱職的腐敗管理者，與市民舉行電視會議來回答他們的問題，解決他們的控訴，這一切在當時都是相當大膽的行為。

盡管他有著平民主義的行事風格，卻還是順從盛行的正統理念，慣例性地譴責西方帝國主義。1977年9月，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他下令推倒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切夫別墅，以防它成為反蘇聯的圣地，沙皇一家就是在這棟兩層宅邸被殺害的。

葉利欽來到莫斯科參加例行公事的最高蘇維埃議會會議時，與戈爾巴喬夫碰面了。他們像同志一樣友好地擁抱，但他們的個性卻天差地別。他們做事情的方法也不同。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發言是信手拈來的事，而葉利欽的口舌則稍顯笨拙。來自斯塔夫羅波爾的男人有點自命不凡，說話滔滔不絕，有時也非常迷人，作為一個天生的內行，他精于玩政治游戲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男人是一個有著很強存在感的現場型領袖，坦率直言又愛出風頭的運動員式人物，他相信親力親為的管理模式，并愿意就自己的政治本能進行豪賭。戈爾巴喬夫被看做一個處事圓滑、溫文爾雅的莫斯科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生，喜歡引用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詩歌[1](#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和在黨的會議上無休止地發表自負的演說，讓他的同志們感到惱火不已；而葉利欽是來自極其貧困的烏拉爾地區的鄉下人，他讓同志們惱火的方法是用木勺敲打“卡林卡舞曲”，有時甚至頑皮地在助手的頭上敲，導致助手們只要見到有勺子擺出來就小心翼翼地從他身邊移開。[2](#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1)

起初，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很熱情，將他看做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領導人，開放、真誠而坦率。而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一開始卻對這個來自烏拉爾的猛攻者有所疑慮。他后來描述，葉利欽曾被扶著離開最高蘇維埃的一次會議，在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同志笑著解釋“這在我們的第一書記身上時有發生，有時他確實喝得多了點”時，他退出了葉利欽的視線。[3](#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

對于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葉利欽而言，他在參加莫斯科的黨會時，發現那位新的總書記自視高人一等。他對戈爾巴喬夫偏愛熟稔的稱呼方式感到不自在。戈爾巴喬夫隨意使用ty而不是更正式的vy，這在葉利欽看來意味著對別人的不尊重。像大多數俄羅斯成年人一樣，葉利欽只在稱呼家人和最親密的朋友時才會用ty。

在戈爾巴喬夫收到一份批評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畜牧業的報告之后，他們的關系就變淡了。葉利欽申辯這個報告歪曲了事實，但戈爾巴喬夫不分青紅皂白對他一頓痛斥。不過，在利加喬夫的建議下，戈爾巴喬夫還是邀請葉利欽來莫斯科領導中央委員會下屬的建筑部。這個職位意味著管理全國的建筑項目，但葉利欽覺得受到了侮辱，并以這個職位不夠高為由拒絕了邀請。他之前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第一書記們在被召到莫斯科時得到的職位更高。1985年4月 4日，利加喬夫給葉利欽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關乎黨的紀律之后，他才答應接受。葉利欽同家人一起搬到了莫斯科。他是帶著滿腹的不滿和過高的期望來到莫斯科的。他有點嫉妒戈爾巴喬夫，同樣的年齡，戈爾巴喬夫沒有管理過像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一樣大或一樣重要的區域，卻提升得更快。

葉利欽去往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老廣場中央委員會大樓五層的會議室，向戈爾巴喬夫表示問候。當時的慣例是蘇聯領導人的行政辦公室要放在這棟靠近紅場的格局凌亂的大樓里，而克里姆林宮只用來進行黨員聚會或接待重要客人。總書記坐在一張寬大的寫字桌后面跟葉利欽說話，他后面正上方墻上是一幅大型的列寧肖像，畫中列寧警覺的目光時刻落在總書記的身上。只有高級別的官員才能坐在列寧肖像的正下方。對于低級別的官員，列寧的畫像必須放到一側。[4](#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1)

葉利欽省去禮儀性的東西，直接進入他作為黨的建設部部長的工作狀態。他到蘇聯各處視察重大的建筑項目。在烏茲別克斯坦，一個克勃格官員悄悄遞給他幾份文件，上面顯示，當地的共產黨領袖奧斯曼·霍加耶夫收受賄賂。他將這些文件帶給戈爾巴喬夫，結果戈爾巴喬夫——用葉利欽的話說——暴怒，還指責他居然會被愚弄。戈爾巴喬夫說，利加喬夫親自為霍加耶夫的誠信擔保。然而，最終證明葉利欽的消息來源是正確的。兩年后，烏茲別克斯坦的領袖被解雇，經過審判后被宣判有罪。

1985年12月，戈爾巴喬夫覺得葉利欽的頑固和具有侵略性的方法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莫斯科需要一場徹底的清洗。這座由自視甚高卻非常無能的第一書記維克多·格里申治理的首都城市因玩忽職守和深陷腐敗而日益衰敗。食物供給在污穢的倉庫腐爛。貪污和欺詐無處不在，黑市上什么都買得到，不管是洋白菜還是魚子醬。問題不斷地堆積，戈爾巴喬夫認為需要一輛大推土機才能將這些問題清除。葉利欽符合所有的要求。盡管有些遲鈍和好斗，他顯然是一名真誠的共產黨員，與腐敗的莫斯科官員沒有任何關聯。這個新職位意味著葉利欽將被提升為政治局的候補成員，因此也滿足了他快速晉升的野心。

如果戈爾巴喬夫知道葉利欽私下里對一些共產黨官員的看法，他也許會猶豫給不給他這個職位。在一次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途中，葉利欽表達了對操縱一切的“老蠢貨們”的不屑，被嚇壞了的同伴們認為這個詞指的是政治局里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利加喬夫。但是，也正是利加喬夫對提升葉利欽保有極高的熱情。他認為，這個西伯利亞同伴優秀而誠實，是黨的支持者，擁有解決問題的人格力量，不管方式是威嚇還是猛攻。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純粹主義者，利加喬夫將干部們的辛勤工作看做完善這個工農國家的理想途徑。

但是，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一個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無趣的注重實際的管理者，警告戈爾巴喬夫說，盡管葉利欽在職業上是一個建造者，他在本質上卻是一個毀滅者。他說：“你跟他會有麻煩的，我了解他，我不推薦他。”[5](#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

戈爾巴喬夫壓住了他的疑慮。1985年12月23日，政治局任命葉利欽為這個國家的腐敗首都的第一書記，授權他整肅風氣，推動局勢發展。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79頁。](#1_3)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78—79頁。](#2_3)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235頁。](#3_3)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66頁。](#4_3)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235頁。](#5_3)

# 第4章 12月25日：早晨

1991年12月25日，臨近早上十點，戈爾巴喬夫的車比平時稍晚一點進入克里姆林宮。克里姆林宮是一座占地七十八英畝的城堡，有綿延1.5英里長的鋸齒形磚墻，從1918年起就是共產主義政府的所在地。這位最后的蘇聯領導人看見在參議院大樓樓頂的桅桿上，繪有錘子和鐮刀的紅旗在微風中輕輕擺動。他預期紅旗會一直飄揚到新年頭一天夜里十二點，那時，蘇聯也將不復存在了。然后，獨立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會取代它的位置，屆時將有盛大的煙火表演。至少，他是這樣被告知的。

在克里姆林宮墻內等待總統車駕的是美國廣播公司的泰德·科佩爾、他的監制里克·卡普蘭和一位攝影師。[1](#Ci_Chu_Yu_Ben_Zhang_Qi_Ta_Chu_Yi)他們正在跟蹤報道戈爾巴喬夫任期的最后幾天。這位著名的美國電視記者精致的銀發往下梳，蓋住額頭，穿著粗呢大衣，大衣上是棒形的紐扣，他沒有戴帽子，將頭部暴露在莫斯科寒冷的空氣中。

科佩爾和卡普蘭正在笑著說剛剛跟一位友好的克里姆林宮官員交談時的誤會。這位官員走向他們時，祝他們圣誕快樂。猶太教徒卡普蘭繃住笑臉，回答道：“你應該祝我光明節（Hanukkah）愉快。”這位官員疑惑地問：“我為什么要祝昂納克（Honecker）快樂呢？”這兩個美國人突然大笑起來，因為這位官員居然認為卡普蘭指的是在兩年前柏林墻倒后逃到莫斯科的埃里希·昂納克。

出現這個誤會是情有可原的。那位不怎么光彩的東德領導人今天早上又上新聞了。戈爾巴喬夫出于同情，為這位七十九歲的共產主義強硬派在莫斯科提供庇護，雖然私下里認為他是個“蠢貨”，卻又覺得自己應該保護一個老同志。昂納克害怕戈爾巴喬夫下臺后，葉利欽會把他送回柏林，于是向智利大使館申請政治庇難。就在科佩爾他們說笑的當口，俄羅斯司法部長正在城市另一端的記者招待會上聲明俄羅斯將不再對昂納克負責，他的命運現在是德國和智利之間的事情了。（六個月后，昂納克被引渡回德國，但他當時病重不能接受審判，遂被允許移民到智利，1994年在智利逝世。）

穿過克里姆林宮的博羅維茨基門后，戈爾巴喬夫的吉爾車繼續往前駛過大克里姆林宮和由玻璃和水泥建造的宏偉的國會大廈（由赫魯曉夫建造來舉行共產黨重要會議的地方），一直到克里姆林宮中央廣場。司機發現卡普蘭和攝影師后，把車停了下來，按照之前的安排，蘇聯總統走下車，整理好衣冠同這幾個美國人一起步行最后一段路去他的辦公室。

在面對西方媒體時，戈爾巴喬夫始終表現得引人注目又謙恭有禮，他同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工作者們打招呼時臉上掛著友好的笑。卡普蘭驚訝于他在如此情形下還能這般鎮定。“他從始至終很少情緒外露，做事有條不紊，顯得沉著冷靜而又莊重。”卡普蘭喜歡戈爾巴喬夫。“他讓我想起我的父親，一個生活在東半球的歐洲人。我的父親要做公證時會穿上西裝。我會告訴他，公證人就像是藥店里某個臉上長著粉刺的青少年，但他會說：‘不，公證人是很重要的職業，他希望受到有尊嚴的待遇。’我父親這點與戈爾巴喬夫類似。”

蘇聯領導人和科佩爾緩步走向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大樓，攝影師跟著記錄他們的對話，一個高大的俄羅斯女翻譯官緊跟在后面翻譯，她的頭發緊緊地扎成一個圓發髻。當科佩爾問他現在感覺怎么樣時，他強調：“今天也勉強算得上是一個終點。我感到無比的鎮定和自由。只是我的角色發生了變化。我既不會離開政治生活也不會離開公眾視野。這（一個和平的過渡）也許是第一次在這里發生。就算是從這個角度講，我也成了一個先驅。也就是說，我們是在遵循一個民主的進程。我辭去總統的職位并不意味著我政治生涯的終結。”[2](#1991Nian_12Yue_25Ri__ABCDian_Shi)

科佩爾問道，他能不能想起一則關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的寓言或格言可以告訴孩子們？戈爾巴喬夫回答：“這里有我幾年前聽過的一個。一個年輕的統治者想要在他的王國里以一種更仁愛的方式治理國家。于是，他去咨詢智者的意見。十年后，智者給他帶來二十卷建議。他說：‘我哪有時間看這些呢？我還要治理國家。’于是，十年后，他們只帶給他十卷建議。他說這些還是太多了。又過了五年，他只拿到了一卷建議。其中一個智者說道：‘這所有的建議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概括——人出生，受苦，然后死去。’”戈爾巴喬夫講述這則寓言想要表達的信息很明確：他這個改革者受盡了磨難，已經做了他所有能做的。

這個來自斯塔夫羅波爾的男人喜歡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添加類似這樣的格言或段子，尤其是在回答外國人的時候。他上次與喬治·布什總統會面是在八周前，當時，他通過講述一個路人的故事，試圖讓布什相信他嘗試創造一個新聯盟的崇高之處，這個路人問建筑工人在干什么，一個建筑工人回答：“我們在辛勤工作。”但另一個建筑工人反問道：“難道你看不出來我們是在這兒建一座寺廟嗎？”

當卡普蘭問蘇聯總統，像摩西一樣被引領到約旦河又不得而過的情形會不會讓他痛苦，戈爾巴喬夫回答道：“一個男人走在莫斯科河邊，掉進了河里。他不會游泳。他大喊：‘救命！’沒有人來救他。他想也許是過路的人不懂俄語。于是，他用德語大呼救命。同樣沒有效果。他接著用法語和西班牙語喊救命。就在他要沉下去時，有人扔給他一根救生索，對他說：‘如果你把時間多花點在游泳上面，也不會有這種麻煩了。’”

戈爾巴喬夫還喜歡將自己的政治軌跡和他所進行的改革的命運與蘇聯電影《機組人員》（The Crew）中英雄飛行員的際遇相比較，電影中的飛行員在地震中冒險起飛，他說：“飛行不安全，但是，我們不能待在這兒，所以，我們馬上就要起飛。”[3](#Ge_Er_Ba_Qiao_Fu_He_Mu_Li_Na_Er)

一行人來到參議院大樓，一座四層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蘇聯權力要塞，由凱瑟琳大帝建造，呈三角形，從紅場上就能看到它的屋頂。飄著紅旗的穹頂上曾經立著一座正義女神像，在1812年被拿破侖的軍隊破壞了。現在，大樓頂部是一個圍起來的環形平臺，上面有一根二十英尺高的旗桿。大樓入口處是多級臺階，在臺階上可以從很好的角度觀賞到圣·尼古拉斯塔樓。在斯大林時期，被“傳喚到臺階”的意思就是去他的辦公室，那是一件令人驚恐的事。戈爾巴喬夫在門前停了下來，引用溫斯頓·丘吉爾關于政客與政治家區別的評論，“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選舉，而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他這話要傳達的意思也很明確。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像某人（暗指葉利欽）一樣，只是個政客。

總統搭乘電梯到三層，他的辦公室在有著高高的天花板的昏暗走廊邊上。走廊中間鋪著長長的紅地毯，兩邊都是辦公室。走廊上古老的氣息和新鮮的油漆味混雜。[4](#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列寧住過的三個帶廚房的大房間也在這個走廊上。他使用的書房作為博物館保存下來，里面有一把柳條背的椅子，房間桌上的文件和記事簿都按照他工作最后一天的情形擺放著。蘇聯的建立者就是在這里發出命令，除去住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切夫別墅里的沙皇一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也有自己的住所和辦公場所，但他因赫魯曉夫對其恐怖統治進行譴責而名譽掃地，所以，沒有以他的名義設立博物館。斯大林留下來的是五個一系列的巨大紅星，由不銹鋼和紅寶石制成，安置在克里姆林宮塔群頂上，用來替代革命前放在上面的沙皇俄國的象征，銅制雙頭鷹。

在進辦公室之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把電視組工作人員留下，自己悄聲走進走廊邊上的一個小房間，他年輕的女發型師在那里等著替他做日常打理。[5](#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2)這是他每天早上的老規矩，尤其是有重要的事情發生時，以確保他看起來有總統的風范。發型師修剪了一下他的后頸和鬢角，再幫他梳理吹干頭發。今天，他外貌的重要性更甚于平常，因為幾個小時后，他將進行一個電視講話，屆時全世界會有數千萬觀眾觀看。

根據他與葉利欽在周一制定的過渡條約，他可以在辭職后繼續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四天，直到星期天。這樣，他就可以遵守之前安排的約會，接受最后一批采訪，再整理他的辦公桌。直到昨天，戈爾巴喬夫才召集他辦公室隔壁的核桃廳的工作人員，第一次通知這些聚集起來的四五十個男男女女——顧問、助手和部長們——他將在二十四小時內宣布辭職，而他們所有人最遲都要在12月29日離開克里姆林宮。

然而，有證據顯示，葉利欽的俄羅斯政府已經逐漸失去耐心，過渡時期也許不會那么平靜。總統發言人安德烈·格拉喬夫感覺應當給予“亡者”的葬禮儀式被省去了，新的占用者已經迫不及待要搬進來，并且已經“在給亡者的親人施壓，讓他們騰出房屋”。

葉利欽的警衛已經開始接手克里姆林宮的檢查關卡，并脅迫性地杵在走廊上陰暗的凹室里。幾天前，軍官瓦勒里·佩斯托夫還是戈爾巴喬夫的保鏢頭目，而在12月16日，他得知自己要接受葉利欽的指揮。直到一個秘書告訴戈爾巴喬夫，他才發現這件事。新的保鏢和迎賓員已經替代了常見的老面孔。即將上任的掌權者們命令戈爾巴喬夫的工作人員不得鎖上他們辦公室的門或抽屜，還要敞著走廊上巨大的紫紅色文件陳列柜。他們已經開始攔下官員們檢查他們的隨身物品，查看帶進帶出的物品。

蘇聯總統暢通無阻地通過了各道關卡，但他的一些助手和初級官員經常被拖住找麻煩。當一個工作熱情過頭的警衛要求檢查魯斯蘭·奧舍夫的公文包時，這位阿富汗事務委員會主席，蘇聯的英雄，以及后來的印古什共和國總統扇了他一巴掌。目瞪口呆的警衛讓他過去了。維塔利·古先科夫，戈爾巴喬夫的一個助手，被阻攔了一會兒，直到他大聲威脅要向總統直接抗議才被放行。

戈爾巴喬夫最資深的顧問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得以暢通無阻地拿著他的公文包經過這些新警衛；他認為是因為他們敬重他是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家。他就這樣成功從克里姆林宮帶走了一些敏感文件。但是，他對目前的事態了然于胸。他認為，俄羅斯總統想要通過一點一滴的羞辱來折磨他的前任。葉利欽的這些行事風格形似匪類，“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堅持文明的權力轉移”！[6](#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

克里姆林宮的接待人員按往常的時間上班，但基本上他們要做的事就是分類整理戈爾巴喬夫要帶走的個人書籍，并扔掉一些舊文件。戈爾巴喬夫的衣帽間也沒有服務人員了。電話也不再響個不停催人接了。葉利欽已經接管了整個政府通信系統，切斷了大多數線路。戈爾巴喬夫書桌上的五部白色電話只有一部還在用，但它也幾乎沒怎么響過。

切爾尼亞耶夫發現他在走廊邊上的辦公室里的專用電話已經被分配給別人了。他仍然可以用這部電話撥號，“但是，如果是打進來的，就不是找他的了”。但有一個電話確實是找他的。葉利欽的副總理根納季·布爾布利斯打來電話，聲音尖銳、清晰確切地通知他，他的工作必須逐漸收尾了。布爾布利斯似乎已經把切爾尼亞耶夫的辦公室指定給自己了，迫不及待地想要搬進來。

上午十點三十分剛過，在發型師打理后，戈爾巴喬夫仿佛煥然一新，身上散發著淡淡的香味。他經過秘書和保鏢所在的狹長接待區，進入總統辦公室，走過鋪著地毯的鑲木地板，來到桌子后面的專用高背皮椅上落座。這樣一個偌大的昏暗的房間，長四十英尺，寬二十英尺，裝著護墻板，天花板很高。白色的錦緞簾子掛在窗戶上，一個高六英尺的書架占去了連接墻的一半。一邊是一個工作臺和配有舒適椅子的矮咖啡桌，那是他與來訪者閑談時坐的地方。戈爾巴喬夫的深色櫻桃木桌子的桌面和基座都很牢固，桌子放在靠窗的角落里。桌后豎著一面高達天花板的蘇聯紅旗。桌前是兩把挨著的皮制扶手椅，高傲的到訪者都不想坐這兩把椅子，因為坐在它們上面就意味著要仰視桌后的總統。角落里是一個裝著高級機密文件和一些私人物品的保險箱，其中有1982—1988年間任克勃格頭目的維克多·切布里科夫送給他的禮物，一把有鑲金圖案的馬卡洛夫手槍。

離接待室不遠就是核桃廳，不久前戈爾巴喬夫和少數共產黨領導人精英還在此做出重大決策，這樣的場合通常沒有書記員在場，決策做出后，將在毗連的政治局會議室等待批準。政治局會議室曾是斯大林的辦公室。它通常被稱為“鞋廳”，因為里面的桌子形狀像鞋底。自從八月政變共產黨被非法化以及政治局被解散后，這里就沒有使用過了。桌上有一個控制臺，可以打開一個特殊的墻板，展現出一系列地圖，這些地圖現在也沒用了。許多城市和街道名，甚至是十五個蘇聯時期的共和國的名稱都在過去的一年里恢復到革命前的形式，并且，從今天開始，共和國之間幾乎不可見的虛線將會變成實實在在的國際邊界線，設有海關和移民檢查站。

兩個保護核提箱的上校像往常一樣跟隨總統進入辦公室的接待廳。他們將這個帶鋒利金屬角的黑色物體放在一張桌子上，讓它處于視線內。如果出現核警報，會出現一個閃光燈。自從1983年核提箱被發明到現在，還沒出現過這種情況。核提箱是在冷戰最后階段為蘇聯領導人提供的一個遠程通訊系統，以盡可能縮短偵察指向蘇聯的導彈所需的時間。自1985年，這個設備就沒有離開過戈爾巴喬夫左右。出現緊急情況時，高層領導人能夠相互對話，也能與位于莫斯科郊外契訶夫小鎮上的指揮中心的戰略部隊進行對話，這個小鎮通過一個秘密的克格勃地鐵通到克里姆林宮，被稱作莫斯科地鐵二號線。如果其中一個領導人因為核襲擊失去行動能力，另外兩人能夠授權反擊。

兩位上校偶爾會向戈爾巴喬夫演示操作程序，在緊急事態下，總統怎樣通過提箱內連接蘇聯指揮控制網Kazbek的屏幕來檢測可疑導彈的軌跡，怎樣通過衛星電話同國防部長和戰略指揮中心對話。這個系統是針對美國的潘興中程導彈設計的，這種導彈有七分鐘的彈道。通過按下提箱內的一排按鈕，總統可以授權不同類型的反擊，從受限制的暴力報復到核武器大決戰。

與大家所想的相反，不是三個核提箱都有解開核導彈的安全機制所必需的密碼。只有總統才有權接觸這些密碼。如果提箱所有者都在某次襲擊中身亡，總參謀部的官員們擁有主動發起反擊的密碼。

安德烈·格拉喬夫注意到，除了這兩個上校，平時熙熙攘攘的接待室說不出的空蕩。除了來自美國廣播公司的美國人，沒有任何其他的來訪者。記事簿上也是一片空白。

戈爾巴喬夫的英語翻譯帕維爾·帕拉茲琴科在到達克里姆林宮后，沿著走廊走向自己堆滿字典的小單間辦公室，他發現克里姆林宮的走道上“非常寂靜，比平時還要寂靜”。這位翻譯的禿頭和小胡須經常在國際場合上出現在戈爾巴喬夫的后面，他意識到現在克里姆林宮里發生的一切有著不可避免的意味，自從戈爾巴喬夫幾個月前將他的全體參謀人員從老廣場上的共產黨總部搬到克里姆林宮后，他就再也沒感到自在過。

帕拉茲琴科還感覺到，這棟大樓里有一種敵意。他覺得，就好像是“環境本身正在驅逐我們”。

1. [此處與本章其他處引用了2009年9月與科佩爾的訪談，以及2009年11月與卡普蘭的訪談。](#1_4)

1. [1991年12月25日，ABC電視臺未剪輯的鏡頭片段。](#2_4)

1. [戈爾巴喬夫和姆利納爾（Mlynár）《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第 92 頁。](#3_4)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5日的一則日記。](#4_4)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25頁。](#5_4)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0日的一則日記。](#6_1)

# 第5章 莫斯科的“暴風雨”

就任后不到一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召集全蘇共產黨領袖到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作為莫斯科的領袖，鮑里斯·葉利欽要確保首都的大街小巷都裝飾著這次代表大會的紅色標語。

1986年2月25日，大會召開的這一天天氣明朗，但溫度很低，在零度上下浮動。會議廳里，這位新總書記受到了五千名代表的熱情歡迎。在持續二十年的停滯不前后，他們對這位精力充沛的新領導人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啟動了他野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來使蘇聯經濟恢復元氣。他將這個改革計劃稱為經濟改革（perestroika）或結構調整。它的目標是通過更多的自主權來更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通過政治公開來解放社會。

戈爾巴喬夫在他的皮聰大度假別墅花了幾天時間準備這次代表大會的演講稿，期間他親密的合作者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提供了不少幫助。這個六十好幾的雙下巴禿頂男人帶著大大的塑料鑲邊眼鏡，他的左膝因為在戰爭中受過傷行動不便。他為經濟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智力驅動。1983年，戈爾巴喬夫訪問加拿大時，見到了雅科夫列夫，他因為曾公開表示反對俄國沙文主義而被委派為蘇聯駐加拿大大使，相當于被半驅逐。

實際上，經濟改革可以追溯到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利夫在安大略州阿默斯特堡的一個農場后院進行的一場漫長而坦率的談話。[1](#Shu_Er_Gen__Shulgan___Su_Lian_Da)這位大使告訴戈爾巴喬夫加拿大體制是如何通過公開和民主來遏制腐敗，因此比蘇聯體制優越。他給戈爾巴喬夫留下了一個自由又忠誠的共產黨理論家的深刻印象，于是，他被調回莫斯科，并被提拔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位前大使極力主張他的朋友考慮一些危險的想法，如將共產黨一分為二，進行選舉，并解除對新聞業的審查。

賴莎傾聽并參與了那天在皮聰大的討論，責備他們兩人忽視了蘇聯社會中女性和家庭的困境。

戈爾巴喬夫站在代表大會的講臺上，就與腐敗和懶惰作斗爭的必要性給代表們作演講。他承諾，實行經濟改革后，生活水平將會有所提升，生活消費品將更容易買到。他提到關于國際關系的“新思維”，即不干涉他國內政，他還說，莫斯科必須放棄與西方的軍事對抗政策。他清楚表示，只要法律未禁止的事情都是允許的，推翻了以前不成文的規定：只要不是明確允許的都是被禁止的。

他還號召停止黨內為總書記歌功頌德的傳統，并在接下來的會議中打斷了被他任命為外交部長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對他的溢美之詞，贏得了一陣歡快的掌聲，而共產黨的二流政客就只能在擴音器旁排隊為新領導人的智慧歡呼。

當鮑里斯·葉利欽走上講臺時，每個人都期待著又一首經濟改革的贊歌。然而，就像上學的孩子與老師較勁一樣，他批評了一個“不能批評的領域”——黨員暗地里享受的特權。在莫斯科的這幾個月里，他意識到公眾對這個奢侈的額外津貼體系有多么怨恨。他低沉地說：“讓一位領導人去一座普通的商店，在那里排隊，就像其他人一樣。這樣，也許所有人都厭倦了的排隊會在不久后消失。”

代表們震驚了。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許多代表確保自己在黨內的高位就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不用像其他人一樣去普通的商店排隊。

共產黨員的特殊權利是蘇聯社會長期以來的一項固定組成部分。根據被稱為官階表的嚴格體制，黨根據領導人對“人民的服務”給予他們慷慨的補償，這個官階表模仿的是沙皇俄國關于職位和級別的一個正式列表。

政治局委員和高層共產黨書記一共約二十五人，他們可隨意使用一個特殊飛行中隊中的伊爾62（Ilyushin-62）型遠程噴氣式飛機和圖134（Tupolev-134）型雙引擎客機，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他們每個人都配置四個私人保鏢，一輛裝有無線電電話的大型吉爾豪華車，一棟配有廚師、女仆和園丁的國有鄉間別墅，他們還能免費分時享用黑海度假勝地的豪華國有度假別墅。他們的妻子配有伏爾加小轎車，司機二十四小時待命，每輛車都有克里姆林宮的牌照，軍人見到需要迅速立正敬禮。[2](#Duo_Bo_Lei_Ning__Dobrynin___Xin)

這一切的費用都是由克格勃第九局支付，第九局是為領導人及其家人服務的一支身穿統一制服的保鏢隊伍，多達四萬人，還管理著一個單獨的黨政電話系統。領導人的配偶能夠命令保鏢去買禮物、接裁縫來試穿或購物。其他級別的黨員會收到從不對外開放的“特殊”商店運送過來的精選食物包裹。成千上萬的中低層官員能從秘密商店獲得不同層次的供應，還能到專用醫療診所進行治療。

這套體系確保了忠誠。一切事物都是國有且只要臨時通知就能收回，這樣一個事實會阻礙干部表達異議。

葉利欽本人也從黨的利益源泉中獲益。當他成為政治局候選委員時，黨分配給了他一棟宏偉的國有別墅，莫斯科河五號樓，位于莫斯科西北烏索沃村的河邊。當時，別墅剛由戈爾巴喬夫騰出來，他已經搬去一棟按照他個人具體要求建造的更加奢華的鄉村宅邸。葉利欽前往視察自己的新家時，接待他的是保鏢的負責人，負責人把他引薦給一群廚師、女仆、警衛和園丁。這位前農村黨領袖被鑲著大理石嵌板、鑲木地板和水晶燈的宮殿似的房間震驚了，巨大的玻璃頂游廊、家庭影院、臺球室和“大到足夠為一支軍隊提供食物的廚房”。高興得笑容滿面的負責人問葉利欽感覺怎么樣。這位莫斯科黨領袖后來說他當時只含糊不清地咕噥了一些話，但他的妻子和二十五歲的女兒坦妮亞、二十八歲的女兒葉蓮娜因為刺激過大導致情緒低沉，無法做出回答。“大體上，我們是對這些無意義的東西感到驚訝。”盡管這樣說，他還是馬上搬了進來，甚至沒等到把墻上戈爾巴喬夫懸掛畫像的釘子取下來。

這位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領導人滿懷熱情地快速投入莫斯科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角色中。他認為，戈爾巴喬夫“了解他的性格，并且無疑確信他能夠掃清過去遺留下來的殘渣，與黑手黨斗爭，并且相信他堅韌不拔，足以執行大規模的人員清洗”。在經濟改革的第一年，他和戈爾巴喬夫偶爾交談。他們相互之間有一條專線。作為克格勃分派去保護莫斯科第一書記的官員之一，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覺得葉利欽“崇拜”戈爾巴喬夫，因為他注意到，葉利欽會在專用電話響起時，跑著去拿起聽筒。

葉利欽發現，在這套不合格的指揮體系下，振興作為國家知識、文化、科學、商業和政治生活中心的莫斯科的任務是不可能實現的。此外，他還得出結論，他的前任維克多·格里申是一個敗壞了莫斯科黨組織的“空皮囊”。

這座城市所處的狀態極其惡劣。葉利欽觀察到，到處都是“灰塵、沒完沒了的排隊、擁擠不堪的公共交通”。蔬菜倉庫尤其不像話，滿是腐爛的農產品、老鼠和蟑螂。分類和打包都是由被強拉來服役而滿腹怨言的市民小隊進行的。

一開始，葉利欽還能使用政治公開作為莫斯科改革的工具。他召集了一千名莫斯科黨組織成員開會；會上，戈爾巴喬夫坐在一旁觀看，葉利欽嚴厲批評了黨員們的自鳴得意和夸夸其談，一邊做假賬，一邊浮夸風。在他的授意下，會議記錄被公開，公眾嘩然。人們在書報攤前排隊閱讀葉利欽的大膽言論。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批評過“黨內受賄、懶惰和狂妄自大的行為”，但葉利欽所做的是采取實際行動。他開除了犯有“諂媚、卑躬屈膝和拍馬屁”錯誤的莫斯科官員。其中包括一個叫普羅梅斯洛夫的官員，莫斯科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理由是他花了太多時間去公費旅游，甚至有一則關于他的笑話傳到葉利欽的耳朵里，說普羅梅斯洛夫在從華盛頓飛往紐約時在莫斯科中轉。葉利欽還開除了一個黨委書記，他家的豪華房子里，墻面上鋪滿了獸皮，葉利欽告訴他：“你只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不是一個王子。”他開始著手“清除”莫斯科許多冗余的科學研究機構，這些地方已經成為數萬閑散官員的保護區，因為這件事情，這些蘇聯假知識分子一直沒有原諒他。他嘗試阻止企業經營者通過廉價雇傭沒有莫斯科居住許可的鄉下人來壓榨工人。

這個健壯的噴火龍似的西伯利亞人還不事先通知就闖進工廠、醫院、建筑工地、學校、幼兒園、餐館和商店，就像他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做過的那樣。他對記數字很有天賦。在去這些地方的路上，他先在車上研讀文件，到了之后，就特意展示他不是無知的鄉下人，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們的商業內幕。他還搭乘莫斯科擁擠的地鐵和破破爛爛的公交車，特別是在高峰時段。他也去食品商店前面排隊，想親眼看看人們遭受的待遇。有一次在一個肉店前，他沒被人認出來，他知道有一批牛肉剛到位，于是問店員買一塊牛肉。結果，店員告訴他沒有了，他沖向柜臺后面，發現牛肉被從后面的窗口遞出去。毫無懸念，他把肉店的經營者解雇了。

葉利欽喜歡給達到他高標準的官員送手表以資鼓勵。他從手腕上脫下自己的手表送給能夠取悅他的人，幾分鐘后，又從口袋里拿出一塊一模一樣的手表送給另一個人。有一次，他讓他的助手把他的日本精工手表脫下來送給一名建筑工人。他的保鏢科爾扎科夫已經學會總是在口袋里揣上備用的手表了。[3](#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2)

起初，葉利欽對官僚制度的撼動符合戈爾巴喬夫推動事態發展的目的。戈爾巴喬夫不帶笑意地告訴他，他是黨內“一陣新鮮的強風”。總書記自己也在進行視察，接觸大眾，只不過他用的仍是老一套，在去之前會事先通知。戈爾巴喬夫當上總書記后第一次去往莫斯科醫院時，醫院外面路面上的瀝青都沒干，還有蒸汽冒上來，而且根據他的助手瓦列利·波爾金所言，他們被帶去的那個病房的床上躺著的都是健康而營養充足的保鏢，頂著細心剪短的頭發，熱心地推薦醫務人員和醫院的食物。[4](#Bo_Er_Jin___Zhen_Han_Jin_Jie_De)

更習慣專制而非對話的政治局委員們為葉利欽在莫斯科各處的平民主義式突襲感到苦惱。1986年年中，戈爾巴喬夫親自命令維克多·阿法納西耶夫，黨報《真理報》的編輯，減少報道賺取公眾關注的葉利欽。[5](#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131)也是在他的要求下，黨中央宣傳部叫來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莫斯科黨報《莫斯科真理報》的編輯，訓斥他過于關注葉利欽。[6](#Ma_Te_Luo_Ke__Matlock___Su_Lian)在那時候，黨可以開除編輯。盡管戈爾巴喬夫有時公開表態支持葉利欽，承認他正在清除首都的“污穢與罪犯”，但是，他還是與這位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猛攻者”保持距離。葉利欽的指導者葉戈爾·利加喬夫跟戈爾巴喬夫一樣，他不喜歡葉利欽擺布共產黨官員的方式。在葉利欽關閉了莫斯科的幾家特殊商店后，利加喬夫訓斥他沒能提高普通商店的效率。

同志們對葉利欽的怨恨在1987年1月19日的一次對抗中爆發了，那是在克里姆林宮舉辦的一次政治局星期四例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略述了他打算向黨中央委員會作的關于下一階段改革的重要講話。像往常一樣，講話的內容是提前私下想好了的。在他講話的時候，他不希望任何人開口。但是，葉利欽堅持發表挑釁性的評論，針對講話內容提出了約二十條意見。特別是，他質疑了戈爾巴喬夫認為目前的體制能夠產生革新的主張。

葉利欽說道：“將保證一條條列出來，無非就是社會主義體系、蘇聯人民和共產黨，它們已經存在了七十年了，所以，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保證我們不會回到過去。”他還催促戈爾巴喬夫公開指出造成國家停滯不前的是過去的蘇聯領導人，并且要求限定總書記的任期。

他后來聲稱，他當時已經變得不屑于戈爾巴喬夫的“自欺欺人”、他疑似對職位津貼的鐘愛，以及他對官員在經濟改革期間繼續過著奢華生活的容忍。

戈爾巴喬夫勃然大怒。他先前準備的對蘇聯統治缺點的批評都已經只能勉強算在黨員能夠忍受的范圍之內。暴怒中的他站起來，氣沖沖地走出了房間。在接下來長達半個小時的時間里，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沉默地坐著，避開葉利欽的目光。

共產黨總書記費了好大力氣才讓每個政治局委員都同意他講話中關于改革的各項提議。他認為這種主動性對于小心緩慢地將國家這艘大船轉向而不至觸礁的任務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他甚至跟強硬派冒險放松了黨的控制。他放松了對宗教的鎮壓，釋放了幾十名政治犯。就在一個月前，他解除了被流放到高爾基（現在的下諾夫哥羅德）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家和異見分子安德烈·薩哈羅夫的國內流放。編輯們被允許暗示斯大林時期恐怖統治的真相，填滿蘇聯歷史的“空白頁”。他逐步撤出在阿富汗的戰爭。他將要宣布對七十年的蘇聯共產主義最徹底的改革，即引進管理式民主的形式，可以直接選舉出一個人民代表大會。他是在直面黨內官員對經濟改革的普遍抵觸的情況下做這件事情的，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好差事受到了威脅。

現在倒好，這個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無禮之徒竟大言不慚指責他維護老一套的方法。

回到房間后，戈爾巴喬夫對著葉利欽一段狂轟濫炸，喋喋不休地勸說了半個多小時。他生氣地大喊，葉利欽的責難是“激烈又無用的”。葉利欽什么也沒做，只會提出破壞性的批評，莫斯科的許多人都在抱怨他的“粗魯、缺乏客觀性，甚至是殘酷”。而在葉利欽看來，戈爾巴喬夫“大篇的批評性發言與他所提意見的實質內容沒有半點聯系，而是針對我個人的”，總書記“幾乎像市場搬運工那樣”咒罵他。

這個堅韌的建筑工程師和莫斯科共產黨官員的災星因為戈爾巴喬夫的暴怒反應感到消沉。在戈爾巴喬夫結束說教后，葉利欽有點違心地道歉：“我已經得到了教訓，我認為還不算太晚。”

他后來回想道：“毫無疑問，在那個瞬間，戈爾巴喬夫簡直恨透了我。”

1. [舒爾根（Shulgan）《蘇聯大使》（The Soviet Ambassador），第 265—267 頁。](#1_5)

1. [多勃雷寧（Dobrynin）《信賴》（In Confidence），第 621—622 頁。](#2_5)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72—73頁。](#3_5)

1. [波爾金《震撼進界的十年》，第68頁。](#4_5)

1. [科爾頓《葉利欽》，第131頁。](#5_5)

1. [馬特洛克（Matlock）《蘇聯解體親歷記》（Autopsy on an Empire），第112頁。](#6_2)

# 第6章 12月25日：上午

與克里姆林宮不同，俄羅斯白宮從這天一大早就是一幅熱鬧景象。這幢十年前建造的雄偉大樓鑲著大理石和玻璃，形似一艘巨大的潛水艇，還有一個十四層的指揮塔。這是俄羅斯政府的總部。這幢樓自從八月政變失敗后，就成了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全國性反抗的象征。當時，葉利欽站在大樓外面的坦克上，公然反抗強硬派強制實行戒嚴統治并保持蘇聯的完整。大樓里有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還有去年自蘇聯成立以來在俄羅斯進行的第一次自由投票選舉出來的議會。在這之前，白宮被憤世嫉俗的莫斯科人貶為中看不中用的累贅，里面住著虛假的政府和議會，它們的成員由共產黨精心挑選，只會批準放在他們面前的任何東西。現在，這里是兩周前投票選出的一個充滿活力而急躁的代表大會的基地，投票是在葉利欽的推進下進行的，目的是讓俄羅斯在年前擺脫奄奄一息的蘇聯。

參觀者爬上梯田狀的臺階后，就會看到一幅宏偉的象征帝國主義沙皇俄國的雙頭紅舌鷹畫像，而以前大廳的凹室里豎著的巨大的列寧雕像現在還在那里，只是用幕布遮起來了。曾經強制在接待室里懸掛的蘇聯建立者的大幅畫像已經換成了白樺樹和白雪風景畫復制品。俄羅斯三色旗在屋頂上輕快地飄動，小號的仿制旗則裝點著部長們的辦公桌。在黨的特權體系崩潰之前，樓里的自助餐廳存貨相當豐富，現在也仍然能夠給代表們和議會工作人員提供面包和臘腸。然而，即使是在白宮里，物資的短缺也很明顯。五層貼著藍色瓷磚的華麗浴室里經常沒有廁紙；議會代表們被懷疑盜用了一大早就裝上的廁紙帶回家。[1](#Suo_Luo_Wei_Yue_Fu_He_Ke_Lie_Pi)

鮑里斯·葉利欽從地下車庫上來，搭乘專用電梯直達他在五層的寬敞辦公室。辦公室里，他的助手維克多·伊柳辛已經把12月 25日這一期的俄羅斯報紙都擺在他的辦公桌上了。伊柳辛是一個無趣的共產黨官員，四十出頭，他從葉利欽還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起就是他的助手了。這些年來，他已經學會耐心承受他的領導偶爾發發脾氣。他經常第一個到達辦公室準備好一天的安排，呈遞給葉利欽最重要的文件。

大幅報紙的相當一部分內容是關于一系列由葉利欽簽署的新出爐的總統政令，從已失效的蘇聯政府手中接管各個部門和所有財產。

蘇聯是在槍林彈雨中建立起來的，卻是通過政令解散的。在前兩個月，葉利欽純粹是通過簽署一道又一道政令來奪取蘇聯的資產。他首先通過扣留俄羅斯的稅收來削弱已經士氣低沉的蘇聯政府的基礎，然后，奪取蘇聯政府的各個部門和貨幣鑄造廠。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剩下的只有頭銜、一小撥工作人員和核提箱。

在戈爾巴喬夫實行政治公開前，報紙是枯燥無味的，它們捏造事實，還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主要的信息機構共產黨黨報Prawda和政府報lzvestia只出版經過共產黨允許的內容。Prawda和lzvestia被翻譯成《真理報》和《消息報》，憤世嫉俗者嘲弄道，“在《真理報》里沒有消息，而在《消息報》里沒有真理”。現在，這兩份報紙上滿是隨心所欲的報道。這個時期新聞業所享有的自由在俄羅斯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在葉利欽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看來，“1991年末俄羅斯的新聞業也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不受官方控制。不需要經過審查。不受讀者意見的影響。不接受報紙所有人的干涉。當然，這種情況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2](#2009Nian_10Yue_Zai_Mo_Si_Ke_Dui)《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因為它的調查性報道成為最受歡迎的日報之一，這種報道形式對于俄羅斯的讀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新聞創新。《生意人報》（Kommersant）自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后首次復刊，報刊名字的拼寫故意用革命前的風格，以顯示它比共產主義時代存活得更久。《真理報》曾是共產黨萬無一失的代言人——它總是被放在報紙堆的最上面出售，而現在它正進行著生死存亡的掙扎，發行量從接近一千萬直降到不足一百萬。《真理報》的青年版《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之前是已失效的共青團的機關報，現在已經轉型為一份趣味性的報紙。它肆無忌憚的對手《莫斯科共青團報》（Moskovsky Komsomolets）已經放肆到在一年前將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新聞放到第三版的程度，已經到了折疊線下面。葉利欽辦公桌上的報紙還有稍微可靠一點的《消息報》，前蘇聯政府的機關報，現在是最值得信賴的高發行量的俄羅斯日報；《俄羅斯報》（Roisiyskaya Gazeta），俄羅斯議會的機關報；《蘇維埃俄羅斯報》（Sovetskaya Roisiya），保守分子的使者；還有《勞動報》（Trud），蘇聯工會的報紙，發行量從去年創世界記錄的兩千一百萬下跌到不足一百萬份。

所有的報紙都報道了俄羅斯議會在前一天通過了于1月2日放開價格控制的決議。《消息報》在一個標題中發出警告：“面包、牛奶、糖、伏特加、藥品、燃料、電、房租、票價可能會上漲三到五倍。”這則報道稱：“用一個關于民主政治的有名的說法來表達就是，自由價格是買家與賣家之間最糟糕的關系——如果不考慮其他的話。”

《俄羅斯報》今天列出的葉利欽的政令之一是解散克格勃，克格勃目前正在轉變為聯邦安全部門（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或 FSB）的過程中，FSB的基地還將是在盧比揚卡。另一個政令則下令將共產主義時期蘇聯國有銀行的財產轉移到俄羅斯名下。《消息報》稱國有銀行的董事長已經遞交了辭呈。“辭呈還沒有通過，但也就是這幾天或幾個小時之內的事了。”蘇聯經濟的基石在未來將支撐一個新的俄羅斯金融體系。

報紙還報道，葉利欽已經下令將莫斯科的一些標志性國有地產立刻從蘇聯名下轉為俄羅斯所有。其中有波修瓦劇院（或稱莫斯科大劇院）、馬里劇院、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列寧圖書館、藝術學院、莫斯科國立大學、圣彼得堡州立大學、國家歷史博物館、艾米塔什博物館、普希金藝術博物館、特雷季亞科夫美術館、魯勃廖夫俄羅斯古老藝術與文化博物館、人類學與人種學博物館、蘇聯民族人種學國家博物館、東方藝術國家博物館和工藝技術博物館。到目前為止，其他蘇聯共和國對這些機構享有與俄羅斯同等的所有權。他們對于俄羅斯攫取這些機構無能為力，只能對在自己領土內的蘇聯財產提出所有權要求。在這個列表的最前端是整個蘇聯最受人尊敬的地產，那就是“克里姆林宮和它所有的附屬建筑，包括克里姆林宮全體建筑、莫斯科克里姆林國家歷史和文化博物館保護區，以及克里姆林國會大樓”。大半個世紀以來蘇聯權力的象征和核心現在已經屬于俄羅斯了。蘇聯總統也只是得到寬容才能待在那兒。

在國外，蘇聯的人事和財產也被轉移給俄羅斯。在紐約，尤里·沃龍佐夫今天早晨醒來時還是共產主義超級大國的駐美大使，晚上睡覺時就成了資本主義俄羅斯的駐美大使。只在莫斯科時間凌晨（紐約的前一天下午四點）從莫斯科俄羅斯總統辦公室發一封編號為2338的傳真給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德拉格拉，沃龍佐夫的身份就發生了轉變。傳真是通知秘書長，作為接替蘇聯的國家，俄羅斯將接管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成為擁有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從今以后，俄羅斯聯邦將取代蘇聯成為在聯合國使用的國家名稱”。傳真要求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將所有到當天為止仍是蘇聯代表的外交官統統視為俄羅斯聯邦的官方代理人。

就在三年前，戈爾巴喬夫讓聯合國大會驚嘆于他關于二十一世紀新的國際秩序的籠統看法，他認為，世界將由兩個超級大國來管理，蘇聯和美國，兩國將會一起促進對話而非對抗，并將合作清除核武器。

葉利欽的團隊早已奪取莫斯科的蘇聯外交部，沒收了它的銀行賬戶，依法驅逐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最后一任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并安插了葉利欽自己的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在這一天，世界不同時區的蘇聯大使館將會收到一份來自科濟列夫的公告，通知他們他將成為俄羅斯的駐外使節。非俄羅斯的蘇聯外交官將要建立屬于自己共和國的獨立大使館。公告通知外交官們，在12月31日之前蘇聯紅旗將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大使館最后一次降落，然后升起俄羅斯三色旗。一些外交官迫不及待地向新制度表忠心。在新德里、德黑蘭和喀布爾大使館，紅、白、藍三色旗早早地就飄起來了。

在華盛頓特區，圣誕節的早上，繪有錘子和鐮刀圖案的紅旗在第十六大道蘇聯大使館一層的桅桿上輕柔地飄動。這一天風平浪靜，氣候溫和，溫度是十二攝氏度。大使館內，三百個工作人員正忙著將自己分到不同的族群，在辦公室門上掛上各自共和國的名字來占領臨時的外交辦公空間。到處都是一片混亂，尤其是嚴重缺少現金。資深的外交家不得不舍棄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舒適房子，搬進大使館內的房間，因為莫斯科不提供硬通貨來支付他們的房租。大使維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在職還只有九個月，他知道，跟他在聯合國的同行沃龍佐夫不同，他當大使的日子屈指可數了。葉利欽不信任他，因為他沒有譴責八月政變。在蘇聯解體的前三天，他熱心地向美國媒體散布關于“暴動者”的新聞報道，向美國政府宣揚暴動者關于戈爾巴喬夫病重不能繼續履行職責的謊言。這位五十一歲的大使決定使用蘇聯時期的預算剩下來的錢來舉行大使館有史以來第一次圣誕聚會，作為蘇聯“最后的歡呼”。

擺上魚子醬、鱘肉、香檳和伏特加，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像泰坦尼克號一樣慢慢沉沒。科姆普列托夫告訴到場的四百名客人：“盡情享受吧，我們就該這樣慶祝重大的場合。”[3](#__Ai_Er_Lan_Shi_Bao_____Irish_Ti)聚會結束后，紅旗降了下來，俄羅斯國旗升到原來的位置，標志著這里現在已經是俄羅斯大使館了。科姆普列托夫在三個月內被召回。

像是故意作對似的，今天早上以色列新來了一個蘇聯駐外使團。就像莫斯科什么都沒發生一樣，三十四年來的第一任駐以色列大使向總統赫索格遞交了國書，然后，錘子和鐮刀紅旗飄揚在耶路撒冷古老的俄羅斯建筑物上方。出現這種異常現象是因為兩個月前戈爾巴喬夫給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的一個承諾，那時他還有一些實權，他承諾修復在1967年中東戰爭期間斷開的蘇以外交關系。外交官亞歷山大·鮑文所遞交的國書是蘇聯總統簽署的最后一封。鮑文的命運就是擔任一周的蘇聯駐以色列大使，然后成為俄羅斯在特拉維夫大使館的大使，任期六年。

在加納利群島最大的港口圣克魯斯–德特內里費，一艘蘇聯旅游船在這個圣誕節的早上靠岸。游客們上岸觀光一天。當他們返回時，發現在輪船煙囪側面的錘子和鐮刀被俄羅斯船員撬開，他們上船時是蘇聯公民，再次起航時卻成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了。

接近上午十一點，葉利欽總統離開他的白宮辦公室，搭乘電梯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擁擠的大廳。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上議院的252名成員被召集到這個會議室來創造歷史。他們在蛋殼青色的天花板和碩大的枝形圓吊燈下被擦得發亮的長木凳上就座，決定是否同意蘇聯的最后解體。

1. [索洛維約夫和克列皮科娃《鮑里斯·葉利欽》，第276頁。](#1_6)

1.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對葉戈爾·蓋達爾的訪談。](#2_6)

1. [《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1991年12月27日。](#3_6)

# 第7章 一身臟水

盡管葉利欽費力地嘗試，1986和1987整整兩年間莫斯科的境況也沒有明顯好轉。他所任命的高層職位的接替者往往同他解雇的那些人一樣腐敗又沒效率。他在與莫斯科貿易官員的一次談話中抱怨道：“我們一直在探究怎么擺脫這些道德敗壞行為，但我們仍沒有發現這個黑洞的盡頭。”研究機構忽視了他的裁員要求。食物還是堆在鐵路貨場里腐爛。他從早上七點工作到半夜，對現狀的不滿一直在堆積。車子到家后，他經常在車上靜坐幾分鐘，整個人筋疲力盡，“我連抬胳膊的力氣都沒有。[1](#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125)

葉利欽與政治局的同志們越來越疏遠。管理莫斯科快兩年了，他對于自己還沒有像他的前任一樣被提拔為政治局的正式委員而滿懷怨恨，對自己要向葉戈爾·利加喬夫做交代也感到不滿，利加喬夫認為黨的目標不是徹底變革，而應該是加強蘇聯的社會主義品牌。這位黨的純粹主義者現在將葉利欽視為一個危險的平民主義者。

在1987年1月一次失去控制的政治局會議后，戈爾巴喬夫開始明顯地回避這位棘手的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在每周四的政治局例會上，他極力回避同葉利欽握手或交談。葉利欽對共產黨特權的攻擊觸及了他的痛處。戈爾巴喬夫確實喜歡優渥的生活。除了下令建造了一棟宮殿似的房子，他還下令在黑海福羅斯建造一棟供他獨享的避暑別墅，龐大而沒有任何建筑品位。即使是他最忠誠的助手們都對他濫用國家基金感到不安。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擔心這樣做會授人以柄，讓人們有理由批判他喜好奢華。當第一次見到這個龐大的建筑群和它用玻璃封閉起來的直達海灘的自動扶梯時，他的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也開始嚴重懷疑他“獻身于偉大的歷史使命所能獲得的好處了”。[2](#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忠順的團隊格格不入。他開始發表與當時大多數人相左的意見。1987年5月，當黛安娜·索耶到莫斯科錄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節目時間他，俄羅斯人是否認為資本主義可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索耶又問：“你真這么想嗎？”他回答道：“當然！”[3](#A_Lun___Bao_Li_Si__Ye_Li_Qin)他那時對資本主義知之甚少，但他知道共產主義已經起不了作用了，他能感覺到大眾焦躁不安的情緒。

因為工作過度，灰心喪氣，又惱于沒有晉升，葉利欽在1987年9月10日決定退出政治局。促使他做這個決定的最后一擊是利加喬夫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對他的訓誡，因為他允許莫斯科街上兩個未經批準的小型示威活動。當天晚上，他告訴奈娜他不會再跟“這幫家伙”一起工作了。他坐下來給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辭職信，當時后者還在黑海度假。

在信中，葉利欽抱怨政治局的同志們對他在莫斯科遇到的問題漠不關心，對他也無比的冷淡。他無法再忍受為利加喬夫工作了，因為利加喬夫的方法“都是完全不成體系的粗糙法子”。他控訴他的同志們對經濟改革都是口惠而實不至。“這份工作適合他們，也適合您，請原諒我這么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他在信的末尾請求辭去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戈爾巴喬夫第二天早上在黑海的別墅里收到了這封信，他在那兒跟助手們一塊工作。這封信就像是晴天霹靂。蘇聯歷史上還沒有人自愿辭去政治局的職務。切爾尼亞耶夫發現戈爾巴喬夫很激動。這位共產黨領導人說道：“拿著，讀讀這個！”“這是什么東西？”“你看看，你看看。”切利耶夫接過信，仔細讀了讀。戈爾巴喬夫問道：“我要拿這個東西怎么辦？”切利耶夫只能建議他不要輕舉妄動。[4](#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1)波爾金讀過信后，覺得葉利欽有一點說對了，“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耍手段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他確實是前進兩步，走偏三步，倒退一步”。[5](#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3)

共產黨總書記處境尷尬。他不喜歡這個在莫斯科表現得精力充沛的人“對權利的過度野心和欲望”。另一方面，政治局的公開分裂可能會毀了共產黨。同時，如果保守派能看到像葉利欽這樣沒有耐心的同志制造的壓力，也許戈爾巴喬夫對保守派的影響能夠加強。兩天后，他打電話給這位莫斯科下屬，請求他：“冷靜，鮑里斯，不要太激動了，我們會想到解決的辦法。”[6](#Tong_Shang__Di_131Ye)他讓葉利欽推遲辭職時間，再繼續工作兩個月，直到十月革命（后來因為俄羅斯日歷的變動，這一天變成了11月7日）的七十周年紀念日，屆時莫斯科將會有慶祝活動，各國政要都會來參加。切利耶夫記得他的長官是這樣說的：“我說服了他。我們達成了一致，他不會在慶典結束前再神經過敏，到處亂跑了。”

葉利欽記得的卻是另外一個版本。他以為戈爾巴喬夫已經答應他在過幾天度假回來后就會對他的辭職信做出回應。結果，幾個星期過去了，辭職信卻像石沉大海，他覺得戈爾巴喬夫是秘密策劃在預定于1987年10月21日召開的黨中央全體會議上給他難堪。這次會議的召開是為了聽總書記做關于蘇聯歷史的開創性演講，這是他準備了很久的紀念十月革命的演講。

黨中央的三百名成員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早晨聚集在克里姆林宮，完全沒有意識到即將發生的爆炸性事件。他們鉆出自己的吉爾車或海鷗牌汽車，趕往建于十七世紀的參議院大樓。同志們在圣凱瑟琳廳集合（當時被稱為斯維爾德洛夫廳，以監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人處刑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名字命名）。大廳里高高的科林斯式圓柱和壁柱之間是十八位革命前詩人的浮雕，他們冷冰冰地注視著下面一排排裝飾華麗的椅子，落座的黨中央同志們在等著唯一一項會議進程：戈爾巴喬夫讀他準備好的講稿。十四位政治局委員在加高的講臺上的桌子后面一字排開，面對與會的同志。

葉利欽與其他六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不同崗位的共產黨高級官員一起坐在第一排。這次會議不對媒體開放。按照慣例，大家會鼓掌歡迎總書記的先進性講話，然后散場去享用美味的午餐。

利加喬夫主持會議。他請戈爾巴喬夫上臺講話。總書記進行簡單陳述。三十分鐘后，講話完畢，利加喬夫問道：“如果沒有問題的話……”葉利欽遲疑地舉起手，又放下去，仿佛內心在天人交戰。戈爾巴喬夫將利加喬夫的注意力引向葉利欽，于是，利加喬夫問大家是否想要針對講話開展辯論，大家大喊“不想”，而這位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大塊頭慢慢地站了起來，他想要坦言的本能戰勝了順從的壓力。利加喬夫示意他坐下，但戈爾巴喬夫打斷了他，他要讓葉利欽自取其辱。他冷冰冰地說道：“我覺得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似乎想說點什么。”[7](#Ye_Li_Qin_Bei_Ge_Er_Ba_Qiao_Fu_J)

葉利欽看起來很緊張，毫無準備。他雜亂無章地說了七分鐘，用的是他倉促之下記在表決卡上的只言片語。不過，他爭論的要點很明確：經濟改革的承諾正讓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最終可能導致幻滅和痛苦。他對于“他眼中某些政治局正式委員對總書記諂媚勢頭的明顯增長”深感憂慮：“我認為這是不允許的……這種溜須拍馬的趨勢絕對不能接受……對奉承的偏好可能會再次逐漸變成行為準則，最終演變成個人崇拜。我們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他說，利加喬夫同志對他的反對之甚讓他必須離開政治局，至于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份，“當然是由莫斯科黨中央全體會議來決定”。

這是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情。別說從來沒有人從政治局退出過，除了二十年代的列夫·托洛茨基，也從來沒有哪個共產黨員膽敢在黨中央全體成員面前這樣跟領導人說話。在利加喬夫看來，“這樣放肆地攻擊至神至圣——中央書記處、共產黨第一人、總書記本人——是可恥的”。葉利欽后來這樣解釋：“這個腐化的體制需要進行改變。”總書記又變成了以前的沙皇似的人物，人們的天父，即使表達出對其行為的一絲質疑也是無法想象的褻瀆。“人們只能表達對他的敬畏……或為能夠如此幸運地在他身邊工作感到歡欣。”

葉利欽落座后，大家因為過于驚訝而一片寂靜，他的心臟怦怦跳個不停，“像是馬上要從胸膛里面跳出來”。他知道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將會被有組織地、有條不紊地猛烈抨擊，而且他們在做這些的時候幾乎是帶著快意和享受的。”然而，他有沒有準備好就難說了。

波爾金看到戈爾巴喬夫的臉因為憤怒漲得發紫。葉利欽暗示總書記通過個人崇拜來追求偉大觸到了他的痛處。

戈爾巴喬夫對利加喬夫說：“也許現在讓我來主持比較好。”利加喬夫忙不迭道：“當然，請，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

戈爾巴喬夫冷淡地總結了葉利欽的陳詞，暗示這位同志想把莫斯科黨組織整個從共產黨分離出去。看到葉利欽想插話時，戈爾巴喬夫粗魯地叫他坐下，然后號召議員席發表評論。

戈爾巴喬夫的話是一場持續攻擊開始的信號。諂媚者和馬屁精都一個接一個拿起麥克風痛斥葉利欽這個異數，其中有些人是葉利欽肅清莫斯科的受害者。當層出不窮的打擊落在葉利欽身上時，戈爾巴喬夫冷眼旁觀他的報應。他想起葉利欽本人是如何卑鄙地、煞費苦心地、不適當地鎮壓別人。現在，他在葉利欽的臉上看出“一種痛苦、迷茫、悔恨的奇怪混合，換句話說，是所有典型的不穩定特征的混合”。

葉利欽發現來自某些人的批判特別傷人。他以前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導師雅科夫·里亞博夫，當時的蘇聯駐法大使潑了他一桶臟水（葉利欽后來這樣描述）。侮辱曾是一些西方議會混戰的一部分，但對于1987年紀律嚴明的共產黨黨中央全體會議來說，這會導致身敗名裂的。即使是最具進步性的政治局委員，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利夫也站在戈爾巴喬夫一邊，反對葉利欽，這是讓葉利欽覺得特別痛苦的一件事。一些人的譴責是可以預料的：維克多·切布里科夫，克格勃頭目，痛斥葉利欽向外國記者泄露秘密；其他一些人駁斥他無能，是一個歪曲事實、妄想偉大、犯有政治虛無主義錯誤的人。一些發言的人不經意間證實了葉利欽關于戈爾巴喬夫個人崇拜的說法。地區書記利昂尼德·博羅金聲稱：“至于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贊美，從我的立場來看，不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一位共產黨的領導，我都全心全意地尊敬他。”他的語氣中不帶諷刺的痕跡，是真心這樣認為的。

二十七個發言人花了整整四個小時痛斥他們的獵物之后，戈爾巴喬夫才宣告這場群體中傷的結束。葉利欽忍氣吞聲地讓議員們再次發言。像以前發生過的一樣，他被徹底壓垮了。他所有故作的勇敢都消失了。他努力表現出愿意和解的意愿。他結結巴巴地說，他對經濟改革沒有任何疑問。他接受大家對他的大多數批評。他只在心里記住了兩三個過分狂熱地贊頌總書記的同志。

戈爾巴喬夫突然插進來。“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你就那么沒有政治常識，需要我們在這里給你掃掃盲嗎？”葉利欽回答：“不，沒有必要。”戈爾巴喬夫繼續往他的傷口上撒鹽。他指責這個敢于挑戰他的人“過于自負傲慢”，甚至將自己的個人驕傲置于黨之上，并指責他幼稚地想看到整個國家圍著他一個人轉，而且是在這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

戈爾巴喬夫說完后，葉利欽含混不清地說：“今天我犯了一個錯誤，不該在這里口出狂言，讓黨中央和莫斯科黨組織失望。”

出乎意料的是，戈爾巴喬夫居然給了葉利欽將功補過的機會。他問：“你有足夠的能力繼續做你的工作嗎？”葉利欽在一片噓聲中回答：“我要說的已經說過了。我還是請求卸職。”戈爾巴喬夫提議，葉利欽應該為自己政治上不正確的批評性發言受到譴責。這個提議全票通過，連葉利欽自己也投了贊成票。幾天后，葉利欽寫信給總書記，表達出自己想繼續擔任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的意愿。切利耶夫勸告戈爾巴喬夫：“這個賭注還是很高的。所謂的公眾里支持經濟改革的人都站在葉利欽一邊。”但是，戈爾巴喬夫給葉利欽打電話，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行”！

政治局內部分裂的消息很快就走漏了。關于葉利欽在黨中央委員會上的“秘密發言”的謠言遍布整個莫斯科城，編造的版本也開始出現，其中一個版本是葉利欽的編輯朋友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捏造的。在這個版本里，葉利欽抱怨他不得不聽從戈爾巴喬夫的妻子賴莎的指示，盡管他從來沒說過這種話。波爾托拉寧分發了幾百份，它們成為地下出版物的一部分，這些地下印刷品上的內容官方媒體是不會出版的。[8](#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153)

198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日，戈爾巴喬夫和政治局的同伴在紅場熱情接待友好的世界領導人，他們前來參觀閱兵式，閱兵式上有走正步的士兵，以及燒柴油的坦克，冒著黑煙。

葉利欽的同志們在列寧陵墓上方一字排開，而他被忽視了，但是，外交官、記者和外國參觀者都無法把目光從他身上移開。令人畏懼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小小反叛是世界級的新聞。菲德爾·卡斯特羅大大地擁抱了他三次，波蘭的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將軍擁抱了他，用流利的俄語說道：“堅持下去，鮑里斯！”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外交招待會上，美國大使杰克·馬特洛克注意到他遠遠地站著，臉上掛著局促不安的笑，將站立的支點不停地在雙腳間轉換，“就像一個被老師責罵過的學校男孩”。莫斯科黨領袖沖他笑了笑，但這位外交官還是留在原地。此時葉利欽最不需要的就是被人看見同美國大使交談。

政治劇變成了難看的鬧劇。戈爾巴喬夫召集莫斯科黨支部于11月11日星期三開會，來確認葉利欽卸除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的職位。11月9日，會議召開前兩天，葉利欽似乎嘗試自殺，他在自己胸口上劃出的傷口大量出血。他立刻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米丘林斯基大街上的克里姆林宮專用醫院。據他自己描述：“我被送往醫院的途中感到劇烈的頭痛，胸口也疼痛不已……我的身體已經崩潰了。”在公寓里，奈娜將刀具、獵槍和玻璃制品，甚至是處方藥都收起來以防萬一，為他回家做準備。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是，這個西伯利亞反叛者在假裝自殺以吸引注意力，并逃避最后的決戰。據他推斷，“葉利欽用辦公室的剪刀假裝嘗試自殺”。“醫生說他的傷根本不致命；剪刀輕輕滑過他的肋骨，留下的傷口看上去血腥嚇人，但實際上并不深。”在擬定召開莫斯科會議的那天早上，他把電話打到葉利欽的病房，告訴他打理好來參加將決定他命運的莫斯科黨委會全體會議。葉利欽抗議道：“我做不到。醫生不會同意我從床上起來的。”戈爾巴喬夫回答：“這不是問題，醫生會幫你解決的。”

遵照黨的指示，四十一歲的克里姆林宮醫生德米特里·涅恰耶夫給葉利欽注射了大劑量的鎮痛劑和叫做安乃近的解痙劑。葉利欽回憶道：“他開始給我注射大量的鎮靜劑，我感覺腦袋在旋轉，雙腿無力，我幾乎都說不了話，因為舌頭不聽使喚。”葉利欽決定不再反抗。他希望在會議上能有人替他說兩句話。

奈娜向當時在醫院的保鏢負責人尤里·普列漢諾夫將軍憤怒地抗議道，讓一個病人離開醫院等于是施虐。但普列漢諾夫需要向他的上級做交代。

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扶著他頭暈眼花、渾身繃帶、臉部浮腫的上司上車，沿著列寧大街行駛六英里后穿過城市中心到達老廣場。這次不是在圣凱瑟琳的圓形大廳，而是在會議廳，黨中央委員會大樓里一個刷得雪白的狹長大廳。葉利欽被帶到毗鄰的房間時都意識不清了，政治局委員們聚集在這個房間里等著粉墨登場。

全體與會者落座后，他們像法庭的法官一樣嚴肅地走上講臺，葉利欽跟在他們后面。克格勃隔開了前面幾排座位，讓寫下名字要發言的人入座。葉利欽觀察到，他們大多數都是之前一年半時間里被解雇的莫斯科干部，像“等待著的獵犬，準備把我撕成碎片”。政治局委員在一條長桌后面的三排椅子上就座，面向整個大廳。

戈爾巴喬夫直奔主題。他們今天是來討論是否解除莫斯科黨領袖的職務的。他說：“葉利欽同志將自己的個人野心置于黨的利益之上。他在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表不負責任的、不道德的言論。”他只會惺惺作態地大呼口號，而當問題出現的時候，他又表現得“無能為力、吹毛求疵和驚慌失措”。

一個接一個，莫斯科黨組織的成員們站起來接下戈爾巴喬夫的話頭，控訴還處于麻醉狀態暈頭轉向的葉利欽曾做過的所有事情，從他的野心過盛、散布謠言、缺乏倫理道德和炫耀賣弄，到他的侮慢不敬、違反黨紀和假革命精神。二十三個發言人再一次轟炸了他四個小時。只有莫斯科黨組織第二書記尤里·別利亞科夫稱贊了葉利欽所鼓勵的共同掌權、公開批評和交流意見。一個黨員嘲笑道：“我們看到有人（指尤里·別利亞科夫）想把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奉為耶穌基督。”另一個人譴責葉利欽背叛了黨的統一大業。還有人譴責他既不熱愛莫斯科也不熱愛莫斯科人。他們抨擊的對象只在以前的同伴批判他時，才不時抬起頭，滿眼的不可置信，而當聽到譴責他不熱愛莫斯科的言論時，他只能不停地搖頭。

戈爾巴喬夫對他所釋放出的狂怒也感到不安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有些發言的動機顯然是出于報復或惡意。這一切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余波。然而，在全體會議上，葉利欽展示了他的自控能力，我不得不說，他表現得像個男人。”

在作秀審判會的傳統中，被指責的人在所有的毒液噴完、自身士氣被摧毀后，可以陳述痛悔之心。葉利欽跌跌撞撞地走向麥克風，戈爾巴喬夫撐著他的肘部，他的嘴唇因為審判儀式而泛烏。前排還有人大喊：“打倒他！”葉利欽說得斷斷續續，含糊不清，不時停下來喘氣。他經常一句話剛起了個頭就忘了自己想說什么。他努力想挽回一絲尊嚴，說他相信經濟改革，但它的進程是時好時壞的。他痛罵自己居然讓“自己最顯著的個人特征之一——野心”顯現出來。他嘗試過努力抑制它，但是，很遺憾沒有成功。他怯懦地總結道：“在莫斯科黨組織面前，我感到很愧疚……當然，我也非常愧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他在我們的黨組織、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享有如此高的聲望。”

但在內心深處，葉利欽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憤怒。他永遠不會原諒戈爾巴喬夫將他從病床上拽起來并將他不光彩地開除的“非人道的、不道德的”待遇。他多年后回想：“我被開除了，表面上是我自己的請求，但實際上，整個過程充滿了大喊大叫和咆哮尖叫，仿佛直到今日我的舌尖都能嘗到苦澀的滋味。”[9](#Ye_Li_Qin___Ge_Ge_Bu_Ru_____Di_1)

大家都拖著腳步走向出口，把他們受傷的獵物孤零零地留在房間里，渾身不適、筋疲力盡又心神錯亂的他將頭靠在主席臺的桌子上。戈爾巴喬夫是最后一個離開房間的，在跨過門檻時回頭看了一眼。他走了回來，用胳膊撐起葉利欽的胳膊，攙扶著他離開房間，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安德烈·格拉喬夫懷疑他這樣做是出于突然的良心發現。尊貴的勝利者幫助落敗者離場。科爾扎科夫扶著葉利欽上車，快速將病弱的他送回醫院病床上。

莫斯科黨領袖的職務給了列夫·扎伊科夫，掌管軍事工業的政治局委員，他向波爾托拉寧夸口道：“葉利欽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0](#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150)

戈爾巴喬夫跟葉利欽還沒完呢。他下令《真理報》發表一份關于這次莫斯科黨組織秘密會議的會議記錄。這篇政治公開的文章明顯是為了顯示共產黨容不下有不同意見的人，跟黨意見不合在以前完全足以毀掉一個人的政治生涯。但是，這次卻適得其反。葉利欽得到了莫斯科公民的莫大同情，他們相信他是真的想要改善他們的生活。幾百名學生在莫斯科大學示威，地鐵站出現簡陋的布告，呼吁公開葉利欽在10月份的秘密發言。

葉利欽在病床上等著戈爾巴喬夫的電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他以為自己會被驅逐出莫斯科。但是，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也許是不愿效仿勃列日涅夫的行事方式，或者是因為葉利欽這個頑固的猛攻者還有可用之處，抑或是因為他覺得應該這樣做，戈爾巴喬夫在一星期后給醫院打了電話，提供給葉利欽另一個職位。科爾扎科夫把電話拿到床邊，聽到葉利欽“用完全挫敗的聲音”答話。戈爾巴喬夫建議他接受國家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位。這是一份沒有任何政策投入的文職工作，但葉利欽仍是黨中央的一員。葉利欽接受了這個職位。什么事都比成為一個五十六歲就領養老金的人要好。

但是，戈爾巴喬夫還有一個警告給他的對手，他在撂電話前告訴葉利欽：“我絕不會再讓你踏入政壇。”[11](#A_Lun___Ye_Li_Qin_____Di_221Ye)

隨著時間的流逝，戈爾巴喬夫的一些效忠者開始抱怨，認為將譴責他的人留在政府是他最大的錯誤。總書記則反駁道，他對葉利欽沒有憎惡或報復心理，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著權力之爭，他從未將自己降格到像葉利欽一樣“碎嘴吵鬧”的檔次。

（幾年后，葉利欽成為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總統，他意外碰見了德米特里·涅恰耶夫，就是當時給他注射鎮痛劑讓他被拖到黨中央委員會的那個醫生。令他驚訝的是，涅恰耶夫當時居然是他的總理維克多·切諾梅爾金的私人醫生。科爾扎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葉利欽從未原諒過那個醫生。“奈娜無法克制自己，跑去找總理討說法。切諾梅爾金承認他不知道醫生給葉利欽注射安乃近的事情，但也沒有在這次不愉快的談話后解雇他。”[12](#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3)

1996年4月7日，文傳電訊社[Interfax]報道，凌晨兩點，涅恰耶夫在米丘林斯基大街的克里姆林醫院外被一名持槍歹徒槍殺。這是1996年莫斯科216起買兇殺人案中的一起。這起案件至今沒有找到犯罪人。）

1. [科爾頓《葉利欽》，第125頁。](#1_7)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167頁。](#2_7)

1. [阿倫《鮑里斯·葉利欽》，第191頁。](#3_7)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130頁。](#4_6)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34頁。](#5_6)

1. [同上，第131頁。](#6_3)

1. [葉利欽被戈爾巴喬夫解雇以及其他遭遇的描述來源于：科爾頓《葉利欽》，第138—150頁；葉利欽《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第144—155頁；阿倫《鮑里斯·葉利欽》，第202—220頁；以及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35—236頁。](#7_1)

1. [科爾頓《葉利欽》，第153頁。](#8_1)

1. [葉利欽《格格不入》，第155頁。](#9_1)

1. [科爾頓《葉利欽》，第150頁。](#10_1)

1. [阿倫《葉利欽》，第221頁。](#11_1)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86頁。](#12_1)

# 第8章 12月25日：臨近午時

臨近午時，鮑里斯·葉利欽走上白宮議會廳的講臺，通知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四天前協商的結果，即蘇聯將不復存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將在今天晚些時候宣布辭去總統職位。[1](#Guan_Yu_Yi_Hui_Jin_Cheng_De_Miao)辭職后，戈爾巴喬夫會立刻簽署一項政令，放棄他對蘇聯軍隊的控制權，俄羅斯將全權控制設置在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境內的27 000件核武器。

上個星期六，葉利欽和其他十個共和國的領導人最后商定在12月31日建立一個松散的聯盟——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來取代蘇聯。儀式是在位于莫斯科東南方向約兩千英里處的哈薩克斯坦古老的首都城市阿拉木圖進行的。

葉利欽現在想通過對代表們的講話告訴世界，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不會帶來任何核威脅。葉利欽說，四個核共和國分別簽署了條約《有關核武器的聯合措施》。蘇聯所有的戰術核武器——裝有限量彈頭的移動便捷的短程導彈——將被轉移到俄羅斯，并在六個月內儲存起來。戰略性彈頭——海、陸、空三棲洲際彈道導彈——將花費長一點的時間運輸到俄羅斯境內。同時，四個簽約國已宣誓不會率先使用核武器，也不會將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設備和技術移交給其他任何國家。

葉利欽宣布，“核按鈕只有一個，其他總統將不會擁有核按鈕”。并且，“按下核按鈕”需要征得俄羅斯總統和擁有核武器的其他三國總統的同意。“當然，我們認為這個按鈕永遠不會被按下去。”

在葉利欽心中，繼《阿拉木圖宣言》得到正式批準和戈爾巴喬夫辭職之后，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戈爾巴喬夫自愿移交核通訊設備。當然，這只是讓一個既成事實變得官方而已：俄羅斯聯邦總統是莫斯科擁有終極權力的人。同樣重要的是，這個舉動將會削弱戈爾巴喬夫的同伴散布的傳言，認為葉利欽分裂蘇聯的行為相當于發動對合法總統的政變。

盡管當時戈爾巴喬夫還是官方總統和蘇聯軍隊的首領，他卻沒有受到獨聯體組成國家的領導人邀請來發表意見——即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蘇聯瓦解后其他四個前共和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格魯吉亞——不想跟獨聯體有瓜葛，而是轉向西方尋求未來的聯盟）。這些總統也不理會戈爾巴喬夫送給他們的關于主動請求擔任職務的信。他們現在沒時間理會他們的前霸主或他的妄想和自負。

葉利欽對俄羅斯代表大會的發言贏得了掌聲。在這些代表中有許多反對他的人，一些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些是激昂的批評家，如他的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對生養他們的那個超級大國的終結感到深深的悔恨，但是，所有人都意識到，已經到了幾乎每個共和國都認為依靠自己的力量會讓情況好轉的階段了。

弗拉基米爾·伊薩科夫來自葉卡捷林堡，是少數公開支持失敗的八月暴動的俄羅斯議員之一，也是少數反對《宣言》的人之一。他就時間順序問題提出反對。伊薩科夫指出，葉利欽被選為俄羅斯總統時，是對著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宣誓的，而他現在嚴重地違反了憲法。葉利欽作為俄羅斯聯邦總統簽署阿拉木圖的文件，但是，伊薩科夫抗議道，當時俄羅斯聯邦在法律上還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因此，《宣言》是非法的。

伊薩科夫的言論引起了恐慌。葉利欽和同伴們在八月政變后停止使用蘇聯的名稱，卻無法正式更改名稱。他們似乎完全混亂了，大家陷入了短暫的沉默，直到議會發言人打破僵局。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建議，“與其讓總統回答這個問題，不如我們現在就把名字改了怎么樣”，哈斯布拉托夫是來自車臣的一位學者，因為在8月份的時候站在葉利欽一邊勇敢地保衛白宮而一舉成名。“代表大會將在之后確定《宣言》是否真的符合新憲法條文的規定。”

哈斯布拉托夫提出一個動議，建議將他們所在的代表大會的名稱從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更改為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措施以點名投票的方式實施。《消息報》的記者伊萬·葉利斯特拉托夫坐在旁聽席上觀看，發現只有兩張反對票。

1917年由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蘇聯中，面積最大也是最強大的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面積為6 592 800平方英里，占地球表面陸地面積的九分之一強。現在，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不再作為一個法律實體而存在，代表們為此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蘇聯的其他共和國早已在它們的名稱上做了類似的改動，俄羅斯聯邦是最后一個從國家名稱上拋棄共產主義的。稍后，一個興奮的莫斯科廣播電臺新聞廣播員報道，將“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從國家名稱中移除反映了蘇聯的正式終結。

葉利欽今天感到滿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房間外面，有些代表聽說一個來自議會委員會的專家調查過八月政變，正在召開一場“轟動”的記者招待會——據《蘇維埃俄羅斯報》的一名記者描述，都奔向會議室。這位專家亞歷山大·基齊欣證實了每個人心中所懷疑的：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小黨派自由民主黨的領袖，是克格勃的走狗。他經常在白宮的走廊上閑逛，咆哮關于俄羅斯的敵人的邪惡，從猶太人到中情局都逃不過，聽他說話的人常被噴一臉口水。[2](#Ya_Li_Shan_Da__Ji_Qi_Xin__Alexan)他的空頭黨派沒有分支，招募成員的唯一目的就是在6月舉行的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選舉中與鮑里斯·葉利欽對抗。讓葉利欽感到滿意的是，日里諾夫斯基只獲得了百分之八的選票，盡管他有官方媒體的大力支持。

俄羅斯總統回到他在五層的辦公室，狼吞虎咽地吃完午飯。午飯通常是從自助餐廳送來的肉餅和蘋果。他從窗戶可以看到寬闊的莫斯科河道轉彎形成一個馬蹄狀的彎道，而后向西南方延伸，流經基輔火車站，繞過盧日尼基體育場，又繞回西北流向，途經高爾基公園，繞過兩英里外的克里姆林防御墻。在克里姆林宮，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在快速地吃午飯，一邊準備標記著他從總統向平民轉變的辭職演講，一邊與疲勞和流感的發作做斗爭。

葉利欽將取代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高高的紅色磚墻后的位置，標志著從四年前開始就一直在準備的東山再起成功了，四年前，他不管是心理還是身體上都支離破碎，被剝奪了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的職務，貶為國家建設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

1. [關于議會進程的描述來源于1991年12月26日的《俄羅斯報》（Rossiyskaya Gazeta）。](#1_8)

1. [亞歷山大·基齊欣（Alexander Kichikhin）在1991年12月26日的《俄羅斯報》中引述。](#2_8)

# 第9章 東山再起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11月曾警告葉利欽不會再讓他踏入政壇，這讓這位前莫斯科共產黨領導人感到絕望。他覺得“我的心就像燒盡了的煤渣”。

不過，戈爾巴喬夫給了他一份在莫斯科的穩定工作，國家建設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允許他留在中央委員會，而戈爾巴喬夫大可以將他驅逐到鄉下，一勞永逸地擺脫他。

而葉利欽卻尖酸地猜測，哪怕戈爾巴喬夫沒有一個葉利欽，他也得發明一個。不論戈爾巴喬夫多不喜歡他，葉利欽對于總書記來說還是有用的，這樣，他就可以扮演一個睿智的無所不能的英雄形象，與之形成對比的一是“唱黑臉的利加喬夫”，二是“橫行霸道、輕率魯莽的激進分子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還要維護他作為一個改革者的名聲。如果他用老一套方法對付自己的政敵，對他在國外逐漸樹立起來的開明的改革論者形象有所損害。他不得不表現出，即使是對一個不負責任的破壞者，他也是寬宏大量的，但他有把握讓這個破壞者無法翻身。

葉利欽在醫院待了幾個星期之后才出院。回家后，他在忍受劇烈頭痛的同時又陷入深度抑郁之中。“我想撓墻，幾乎忍不住要大聲喊叫。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忍受地獄的折磨。”[1](#Ye_Li_Qin___Ge_Ge_Bu_Ru_____Di_1_1)他的睡眠很差，將憤怒的情緒宣泄在家人身上。

1988年1月8日，氣候適宜，天空飄著大片大片的雪花，葉利欽開始到普希金大街上的國家建設部上班，由四個克格勃保鏢陪同，乘坐的是吉爾車，因為他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2月17日，星期四，中央委員會正式解除他這個職位，當天晚上他回家的時候就只能乘坐一輛中型海鷗牌汽車，也沒有保鏢護航了。降級是必然的，但卻讓他無比痛苦。據他的助手列夫·蘇哈諾夫所言，這件事讓他陷入心理焦慮之中，而他性格的兩面——共產黨領袖和反叛者——之間的內部沖突也開始讓他陷入混亂。

盡管葉利欽可以保留他在特維爾–亞姆第二大街54號的公寓，卻要從烏索沃的莫斯科河5號樓搬到一個相對狹窄的鄉間住所。克格勃第九局派給他的安全特工也被撤走了。保鏢中的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自愿留下來擔任私人保鏢，最后被克格勃開除。不久后，他將獲得的是他以前所擁有的十倍。科爾扎科夫被三個同情他的商人聘用為影子員工（領工資但實際不存在的員工），這三個商人運營的都是在經濟改革下允許經營的合作企業。他需要做的只是每個月去領自己的“工資”。科爾扎科夫對葉利欽的忠誠標志著一段親密友情的開始，他們一起打網球，一起喝酒到深夜。他們的關系親密到兩次歃血為盟，發誓永遠對對方忠誠，視對方為“過命之交”。

葉利欽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輛牢固的莫斯科人牌汽車，車的顏色像鋁鍋。科爾扎科夫嘗試教他開車，他聲稱教葉利欽開車把他的頭發都愁白了，尤其是在葉利欽撞上并重傷了一名騎摩托車拖車的人之后。[2](#Su_Ha_Nuo_Fu___He_Ye_Li_Qin_Zai)

這個不安分的西伯利亞人在新職位上沒什么事可做，時刻處于密切監視之下，以防他在政治上進行搗亂。每天早晨，一班又一班幾乎不經偽裝的克格勃特工在他辦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觀察進出他辦公室的人。他的房間和電話都被監聽。列夫·蘇哈諾夫給彼爾姆的人打電話，抱怨他們的工作環境。一個克格勃的友好線報告訴他，這通打到彼爾姆的電話已經被注意到了，他可要小心了。

莫斯科的報紙仍受黨的擺布，不允許發表任何關于前莫斯科領導人的正面新聞。葉利欽還去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但常常被忽視。2月，巴黎《世界報》發表了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關于葉利欽那次秘密發言的描述，繪聲繪色，包括關于賴莎干涉戈爾巴喬夫工作的指控。戈爾巴喬夫命令外交部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在一次媒體介紹會上申斥《世界報》發布假新聞。他對于葉利欽本人不否認對賴莎的指控感到憤怒。

慢慢地，葉利欽的痛苦平息了。他開始一個人在街道上散步。認出他的人都停下來沖他微笑，跟他握手。這些跡象初步顯示，長期對政治無感的大眾開始關注政治，而葉利欽因為讓人們表達出不滿，從而在黨的機構外面獲得了群眾基礎。

接下來的一個月，輪到葉戈爾·利加喬夫不自量力了。在戈爾巴喬夫出國期間，這個黨內二把手讓報紙發表了一篇列寧格勒的學校老師妮娜·安德里雅芙娜寫的長信，內容是為斯大林主義價值觀辯護，要求停止民主改革。利加喬夫派一個團隊前往列寧格勒潤色這封信，他想將它推為一個黨的新方針的聲明。盡管這封信顯然是反經濟改革的，報紙編輯們也不敢拒絕發表。整個國家都屏息等待事態的發展。

當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后，他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對此給出了一個冗長的回復，譴責這封信是在攻擊他的改革，并命令《真理報》的編輯發表他的回復。改革政策又回到正確的方向上，激進分子又傾巢出動了。戈爾巴喬夫沒有辭掉利加喬夫，只是這位死腦筋的狂熱分子的影響力被削弱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報紙編輯變得更加大膽。挑戰共產主義正統性的書籍和戲劇開始出現。寂靜多年的教堂也被允許鳴鐘了。在莫斯科中心普希金雕塑前的非正式聚會也批準了，這樣不滿的平民就可以宣泄被壓抑的情緒了。在這些臨時的聚會上，人們逐漸開始反復有節奏地大喊：“葉利欽！葉利欽！”前莫斯科領袖成了不滿情緒的引雷針。

葉利欽不在的期間，如果說生活水平發生了任何變化的話，那也是變壞了。一個流行的段子描述一只狗贊揚經濟改革，“我的鎖鏈長了點，我的狗盆遠了點，但我現在想沖誰叫就沖誰叫”。政治局發動了一次動機良好的禁酒運動，但結果是災難性的，伏特加嚴重短缺，政府收入也急劇下降。糖的供應也滿足不了需求，因為糖都被買去非法制造一種叫samogon的烈性酒了。戈爾巴喬夫進一步推進這次改革，宣布共產主義不應該建立在伏特加稅的基礎上。利加喬夫則是到了荒謬的程度，竟然下令清除克里米亞的百年陳釀。另一則段子講的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俄國人在山頂上測試回聲。美國人大喊“波旁威士忌”，然后聽到幾次“波旁威士忌”的回聲。俄國人大喊“伏特加”，傳回來的回聲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葉利欽日益增長的親民形象和重新勃發的自信激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好奇心。4月，《莫斯科新聞報》的編輯葉戈爾·雅科夫列夫鼓起勇氣詢問葉利欽關于他如何被注射鎮靜劑拖到莫斯科黨員面前的經歷。他們的采訪是在克里姆林宮國會大廈里進行的。雅科夫列夫建議拍一張葉利欽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車里的照片，車現在就停在大廈外面。

抱著玩笑的心態，葉利欽靠在這輛四四方方的汽車的方向盤上，擺好姿勢，科爾扎科夫坐在他旁邊，蘇哈諾夫坐在后面，然后，葉利欽一時興起，打開了點火開關，并開始向出口處行駛。他的乘客們知道他車開得有多差，都嚇壞了。科爾扎科夫回憶道：“他把踏板弄混了，車子開得像袋鼠在跳。”蘇哈諾夫說：“我向上帝發誓我從沒這么害怕過。我們開過了馬涅日廣場，經過展覽館。我們試著讓他停下來。他說：‘害怕的人滾下去！’我們成了我們領導人古怪性情的人質。他一路開回了他的市區公寓。我們緊張極了，襯衫都濕透了。”[3](#Tong_Shang__Di_302__304Ye)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猶豫要不要發表這次與克里姆林宮的禁言令相違背的采訪。他最終只在《莫斯科新聞報》的德文版上發表了，但這依然在莫斯科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騷動。一個月后，葉利欽在與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采訪中要求將利加喬夫革職，但終于否認了他曾在他的“秘密發言”中批評賴莎。

1988年6月的一次特殊的共產黨大會上，葉利欽再次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來了。這次大會是第九次召開，也是1941年來的第一次，戈爾巴喬夫召開會議是為了推進更多新的改革政策。與常規的黨代會不同，這樣的會議只偶爾召開來解決緊急的政策問題。在政治公開的精神下，會議上出現了電視攝像機。被半驅逐的葉利欽沒有收到邀請，但是，卡累利阿的代表團偷偷給了他一張票，讓他作為代表團的一員進去。卡累利阿地區位于與芬蘭交界地帶，那里的人欽佩葉利欽。在到達國會大廈后，他發現，在5000名代表中，他儼然成了一個聚集好奇目光的人物，讓他感覺自己就像是動物園里的大象。他向講臺上遞交了在會上發言的書面申請，但他被限制在樓座后面的座位上，坐在這里的人從沒被叫上去發言。

到了大會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確信自己一直被忽視之后，葉利欽沿著大廳的臺階走向前排座位，說服克格勃的警衛讓他通過，然后高舉著他的紅色與會代表證，毅然走向講臺。一位塔吉克斯坦代表的講話被中斷了，當葉利欽笨重地走向演講臺時，大廳里一片寂靜，在這整個過程中，葉利欽都直視著戈爾巴喬夫的眼睛。到達主席臺后，他要求發言。臺上的政治局委員們低聲商議，商議過后，戈爾巴喬夫讓瓦列利·波爾金下去悄悄地叫葉利欽去接待廳——到時候會輪到他發言的。

葉利欽開始沿著過道往回走時，一些有同情心的代表和記者用能引起人注意的聲音低聲讓他別走。他意識到也許不會被重新接納，就停下了，又走回第一排，在一個空座上坐下。戈爾巴喬夫沒有其他選擇，只好把他叫到麥克風旁邊。

在代表們的高度期待下，葉利欽開始講話了。他先聲稱自己為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必須分析現在存在于整個社會的停滯問題的原因。不應該有禁止談論的話題。領導人的工資和津貼應該公開。如果出現短缺，那就大家一同感受。最后一條評論獲得了稀稀落落的掌聲；大廳里還是有人跟他感受一樣的。最后，他要求恢復他的官職。這句話引起了一片噓聲和叫喊聲。戈爾巴喬夫出面壓了下來。他說：“說吧，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他們想要你發言。我想我們不應該繼續隱瞞葉利欽問題了。”葉利欽回答道，他唯一的政治錯誤是在錯誤的時間，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前夕，發表引起爭議的言論，但是，黨應該像列寧一樣允許反對者的存在。他離開了講臺一臺下一半掌聲，一半噓聲，他走出房間，被一群等在外面的你推我擠的記者和攝像人員包圍起來。

房間里面，一些代表再次站起來嘲笑他們這位沖動的同志。葉戈爾·利加喬夫憤憤不平地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將讓他不得安寧：“鮑里斯，你錯了！”幾天后，莫斯科人民開始佩戴上面寫著“葉戈爾，你錯了！”的領扣。

大會接近尾聲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他到目前為止意義最深遠的民主改革。[4](#Bu_Lang__Brown___Gong_Chan_Zhu_Y)在致閉幕詞時，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張紙。紙上寫著修改憲法的決議。這樣一來，就允許產生一個新的包含2250個成員的人民代表大會，其中三分之二將直接從全蘇聯范圍內選取，另外三分之一由經過黨批準的公共機構來選取。這個代表大會將會替代形同虛設、一年只見面八天、從不聽取不同聲音的蘇聯議會。這是邁向民主的一大步。

許多衷心的代表已經在看表，準備去趕火車和飛機了，他們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在干什么就舉起手中的卡來投票。

這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耍手段達成的。他已經在蘇聯統治的七十年里進行的第一次多候選人選舉中得到了執政黨共產黨的支持。他的計劃是將民主和管理巧妙地結合。共產黨將自動擁有一百個席位。這就意味著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們能夠安全無虞地將他們自己包括在這“一百個紅色席位中”，而不用冒著被人民抵制的危險。戈爾巴喬夫不敢尋求某個選區內群眾的支持。葉利欽的聲望越來越大，他可能與戈爾巴喬夫競爭并最終獲勝。

當有關選舉的法律擬出來后，戈爾巴喬夫加快步伐將蘇聯社會與過去分離。政治公開空前繁榮。禁止銷售國外報紙的禁令被解除。安德烈·蘇哈諾夫被允許出國旅游。報紙編輯們發表關于管理不當和物資短缺的尖刻報道。11月，戈爾巴喬夫宣稱，“只有整個生活的民主化才能保證克服停滯”。這是政治公開的春天。前沿雜志《星火》的主編維塔利·科羅季奇興奮地說，“再也沒有第二個戈爾巴喬夫了”。這份雜志緊俏到在每周上市后幾個小時就被搶購一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官僚們還是那些‘大人物’，他們是沒有理想也沒有任何信仰的人。”[5](#1988Nian_6Yue_Dui_Wei_Ta_Li__Ke)

戈爾巴喬夫在國際上越來越受尊重。1989年2月，最后一批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美蘇關于解除核武裝的談話帶來了和平。他為東歐國家的獨立創造了條件，這些國家從二戰起就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他清楚表示，那些教條式的共產主義政體不能再指望蘇聯的坦克給予支援了。在一個外交部的介紹會上，格拉斯莫夫將這個原則稱為弗蘭克·辛納屈原則——他們可以自行其是了。蘇聯的這項舉措導致1989年間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動。東歐的共產主義政體被一個接一個地罷黜，從波蘭開始，擴展到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11月，柏林墻倒塌，一年后，德國再度統一。

戈爾巴喬夫意識到如果葉利欽在新的人民代表大會中獲得一個通過競選得來的席位，他將會獲得民意基礎（popular mandate），于是，他給他最尖銳的批評者設了一個陷阱。他規定，如果政府部長要參加選舉，就必須先辭職。這樣一來，如果他的眼中釘參加競選，又競選失敗的話，就失業了。

當選舉確定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葉利欽確實決定參加競選。他將自己提名為莫斯科第一區的候選人，第一區是覆蓋整個城市的選區。政治局通過一項新提議，召開一千名黨員的“選擇會議”來從三個可能的候選人中選出兩人來代表首都。葉利欽認為，被允許參與的黨員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順從的、被洗腦的正式黨員，他們被授意支持吉爾工廠的總經理尤里·布拉科夫。在這場持續到下午三點的會議結束后，葉利欽以超過半數的支持率被提名，布拉科夫排第二。看來這些正式黨員也不怎么順從。

葉利欽的活力回來了，他跑到莫斯科各處擁擠的選舉集會，利用自己的弱勢地位來贏取支持。他倡導停止黨的特權，允許人民通過公投來決定事務。共產黨命令編輯們忽視葉利欽的競選活動，這在無意中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一個更有效率的電報機構在為葉利欽工作：流言回路（rumor circuit），該機構幾十年來都是莫斯科重要新聞的渠道。當焦慮的戈爾巴喬夫同意一個政治局委員譴責葉利欽的反共活動時，數萬義憤填膺的選民涌進街道，這是自十月革命以來在莫斯科發生的最大的未經批準的集會，于是，認為葉利欽反共的想法很快也擱淺了。

既然已經啟動了民主進程和政治公開，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同意讓葉利欽和布拉科夫在國家電視臺上進行辯論，分別代表共產黨的左翼和右翼。辯論播出的當晚，數百萬群眾在電視機前觀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擺在明面上的。聲稱給播放室打電話向候選人提問的“普通公民”都是安排好的。一個據稱給葉利欽提最尖銳的問題的人第二天告訴記者，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到了。他說：“告訴葉利欽別擔心，我無論如何都會投他一票的。”[6](#Ye_Li_Qin___Ge_Ge_Bu_Ru_____Di_1_2)

在選舉當天，候選人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民心所向，拿到六百萬張選票，也就是幾乎十分之九的人都選了他。在新選出來的國會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黨員，但也不完全是黨的勝利。有相當一群人都是像葉利欽一樣不再對黨抱有幻想的激進分子，不能指望他們像過去一樣聽從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在分組表決中投票。戈爾巴喬夫承認，“從這次選舉可以看出喪鐘為誰而鳴”。[7](#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2)但是，令人感到無禮的是，直到選舉后三天，他都沒有祝賀葉利欽，他的對手的勝利也幾乎沒有在《真理報》中提到。

葉利欽得承認他的政治復生要謝謝戈爾巴喬夫。斯大林槍殺難以對付的黨員；赫魯曉夫則是給他們發養老金讓他們退休；勃列日涅夫將他們派往偏遠國家擔任大使。葉利欽后來承認：“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開了一個先例。一個被解雇的政治家還有機會重返政壇。不可預測的、陌生的新時代已經快來臨了，我需要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8](#Ye_Li_Qin___Ge_Ge_Bu_Ru_____Di_1_3)

四年來，戈爾巴喬夫一直負責蘇聯社會非凡的自由化進程。人們可以游行、示威、投票選舉、批評共產黨，新聞業也更加自由。然而，他的這些做法釋放了一些力量，會危及他所領導的共產黨。被選上的代表們自然會向著投票給他們的人民，而非越來越不受歡迎的共產黨組織的成員。保守派想要阻止他，但除了回到過去的老方法，他們又沒有其他的代替政策，而回到過去意味著壓迫和停滯。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的國會大廈召開。在戈爾巴喬夫的指示下，為期十天的辯論在電視上實況轉播。他被傾瀉而出的憤怒和尖刻的抨擊震驚了。第一天，觀眾聽到了對克格勃的攻擊、對賴莎的批評和將列寧遺體紅場陵寢移出的要求。西伯利亞作家瓦連金·拉斯普京建議俄羅斯在將來應該離開蘇聯，這讓所有人都震驚不已。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蘇聯人民哪怕只聽到這樣的批評都要冒著被逮捕的危險，現在，蘇聯十一個時區的人們無法將自己從收音機或電視前挪開。安德烈·薩哈羅夫之前因持不同政見而被驅逐，現在已擺脫流放狀態三年的他被選為科學學會的一名代表，得以向全國觀眾廣播呼吁他主張，用一個聯邦體制來代替蘇聯，從而結束斯大林模式下人民所受的壓迫。當薩哈羅夫正在呼吁廢除蘇聯憲法的第六條時（這個條款保證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戈爾巴喬夫切斷了麥克風，這引起了全國范圍的激憤。盡管薩哈羅夫在職期間沒出什么意外，許多人卻從未原諒過戈爾巴喬夫切斷麥克風的審查行為，他仍然想消除已經被消聲多年的公道之聲。

不管怎樣，在針對一個國民被禁言大半個世紀的國家的未來展開辯論這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放寬了限制，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蘇聯政治生活的所有反對分子和異類頭一回都聚集到了一個地方，暢所欲言：強硬派共產黨員、前政見不同者、軍事官員、工人、科學家、學者和知識分子，更別提一小部分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法學家。

巨大的通風休息室里懸掛著蕨類植物，無比寬敞的自助餐廳里容納了一百四十張擺滿美味佳肴的桌子，還有兩百八十名身穿統一白色西裝和蝴蝶結領結的侍者、代表和記者們混雜在一起。茫然的政治局委員們發現他們一出現在人群中就被包圍了。神秘的蘇聯領導班子突然出現在夠得著的范圍內，他們的神秘感也因為能夠親眼所見而降低了。

然而，代表大會還是從屬于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數以百計的老派共產主義者裝成民主主義者好讓自己當選。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從代表大會的整體構成來看，將它看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而葉利欽更愿意將它看做“戈爾巴喬夫式的，忠實反映了我們領導人的前后不一、畏首畏尾和熱衷于半吊子措施和決策”。[9](#Tong_Shang__Di_203Ye)

當輪到代表大會成員們選舉一個最高蘇維埃（一個規模精小的機構，定期開會來討論立法）時，葉利欽隨之被忽視了。人群自發涌向莫斯科街頭進行抗議。來自西伯利亞的代表阿列克謝·卡扎尼克主動放棄他在最高蘇維埃的席位來為葉利欽讓路。最后，戈爾巴喬夫意識到否定一個擁有最大的單一選舉授權的政治家會讓代表大會顯得可笑，于是，他最終同意通融一次，用葉利欽所稱的“王車易位”的方法，讓他獲得在上議院的席位。

經過這段時間克里姆林宮召開會議的“狂飆運動”后，對于蘇聯公民來說，一切都不一樣了。葉利欽觀察到，“大會開始的那一天，他們是一種人。大會結束的那一天，他們變成了另外一群人。不管我們對最終結果的評價有多消極……最重要的事情已經達成了。幾乎所有人都從昏睡狀態中醒來了”。[10](#Tong_Shang__Di_190Ye)

與在克里姆林宮休息室時聚集在他周圍的激進改革者接觸之后，葉利欽自己也變成了另一個人。安德烈·薩哈羅夫對他的印象尤為深刻。薩哈羅夫不喜歡葉利欽，但從他身上看到了作為逐漸露頭的民主主義者的潛質，他所擁有的無產階級的支持率是知識分子無法企及的。這次代表大會標志著葉利欽開始從共產主義“猛攻者”演變為反共產主義民主人士。

戈爾巴喬夫注意到政治局委員對整個情況有多不滿。“沒有其他辦法，幾乎每個人都很清楚，共產黨專政的日子已經結束了！”[11](#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3)

古拉格集中營的編年史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從流放地佛蒙特看到了自己祖國的一線生機。他注意到，“俄羅斯處于千瘡百孔、中毒已深的狀態；它的人民處于前所未有的羞辱之中，已經到了身體崩潰甚至是生物毀滅的邊緣”。然而，現在，“在共產主義的鐵幕之下生活了七十個要命的年頭之后，雖然已經半死不活，但我們正在爬出來”。[12](#Suo_Er_Ren_Ni_Qin__Silzhenitsyn)

在去黑海福羅斯避暑時，戈爾巴喬夫對著賴莎自言自語他的將來，不知道他是否應該退下來。他的意思是，既然人們現在已經享有這么大的自由了，就讓別人去教他們怎么用吧。他說這話不是認真的，但賴莎是當真的，也許她是意識到了前路是什么。她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該過自己的生活了，退下來，寫寫回憶錄。你已經做了你能做的了。”[13](#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2)

1. [葉利欽《格格不入》，第156—158頁。](#1_9)

1. [蘇哈諾夫《和葉利欽在一起的三年》，第302頁。](#2_9)

1. [同上，第302—304頁。](#3_8)

1. [布朗（Brown）《共產主義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第515頁。](#4_7)

1. [1988年6月對維塔利·科羅季奇的訪談。](#5_7)

1. [葉利欽《格格不入》，第142頁。](#6_4)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365頁。](#7_2)

1. [葉利欽《格格不入》，第162頁。](#8_2)

1. [同上，第203頁。](#9_2)

1. [同上，第190頁。](#10_2)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378頁。](#11_2)

1. [索爾仁尼琴（Silzhenitsyn），“論對新奇事物的持續狂熱以及它摧毀共產主義體系的方式”（The Relentless Cult of Novelty and How It Wrecked the System）。](#12_2)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245頁。](#13_1)

# 第10章 12月25日：正午

在克里姆林宮里，戈爾巴喬夫吃完了午飯、單片色拉米三明治和抹上酸奶的松軟奶酪，他被疲憊和幾個小時后要做的事情的嚴重性壓倒了。[1](#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在他辦公室后面，工作臺的后面，有一扇門通往一個小房間。房間里有一張床和洗漱設施。戈爾巴喬夫走進去，關上門，躺下來休息。

不一會兒，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和安德烈·格拉喬夫拿著一捆告別信進來讓總統署名，結果發現辦公室里沒人。這些信都是由戈爾巴喬夫口述的，要寄給國外總統、總理和王室。收信人都是現任或前任最高級別的世界領導人，他們都是在戈爾巴喬夫任期內與他有過會面并成了朋友的人：喬治·布什、赫爾穆特·科爾、弗朗索瓦·密特朗、約翰·梅杰、朱利奧·安德萊奧蒂、布萊恩·馬爾羅尼、胡安·卡洛斯國王、西班牙索菲亞女王、萊赫·瓦文薩、瓦克拉夫·哈維爾、羅納德·里根、瑪格麗特·撒切爾，以及朝鮮、芬蘭、埃及、敘利亞、以色列、伊朗和挪威的政府首腦。戈爾巴喬夫費盡心思讓這些信的語氣和內容表現得恰當。他與國外領導人之間的友好關系是對這位蘇聯總統最重要的東西。這是衡量他的國際地位的標準，是對他在蘇聯的改革的認可，是達成緩和世界緊張局勢、停止核軍備競賽、推倒柏林墻讓東歐國家享有自由的全球一致的保證。

切爾尼亞耶夫敲響了休息室的門。戈爾巴喬夫花了五分鐘時間打理自己才走了出來。他看起來很有精神，但是，眼睛像是哭過的。格拉喬夫注意到他的眼睛有點紅，要么是因為睡眠不足，也許是因為最近幾天的緊張態勢而掉了幾滴眼淚。總統坐到他的高背皮椅上，一封一封地仔細閱讀這些信后，再用氈尖筆署名。切爾尼亞耶夫拿著這些信出去寄往世界各地。

格拉喬夫抓緊機會給戈爾巴喬夫看《莫斯科共青團報》的頭版。上面有一個標題，源自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在1836年的詩作《紀念碑》：“我不會真正死去”。戈爾巴喬夫的眼睛亮了。他歡喜地引述完整的版本：“在我神圣的抒情詩里，我的靈魂將比我的軀體存活得更久，永不會腐敗。”[2](#Tong_Shang)與其他俄羅斯人一樣，戈爾巴喬夫能完整地吟誦普希金和其他一些民族詩人的詩歌。幾天前，他給幾位美國客人背誦了革命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敘事詩，詩中的一個角色不喜歡美國，想將它封鎖。戈爾巴喬夫的意思是蘇聯諸共和國無權聲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經不存在了。[3](#Bei_Shi_Luo_Si__Beschloss_He_Ta)晚飯后，當他心情愉快時，一個保留節目就是輕聲朗誦馬雅科夫斯基的詩行——盡管他很久沒有這樣做過了，之前是從詩人所作挽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中引用著名的說法，“列寧活在過去，活在現在，也活在永遠的將來”。

像許多世界領導人一樣，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親自閱讀報紙的習慣了，更愿意讓下屬提供給他需要知道的內容，因此避免看到負面的報道。在政治公開政策下，審查被解除，報紙變得更加放肆。現在，它們敢于發表隨心所欲的新聞和評論，其中許多都是攻擊這位即將卸任的總統的。

戈爾巴喬夫還沒看到當天的報紙，切爾尼亞耶夫決定隱瞞這些報紙以羞辱性的細節揭露總統的隱私，以免總統心煩意亂。《俄羅斯報》披露，四天前，在阿拉木圖，葉利欽和其他共和國的總統一起商討戈爾巴喬夫卸任后的物質和財政津貼。

這篇報道的作者寫道：“關于戈爾巴喬夫退休后的情況，葉利欽的宣布如下：他將擁有一份與現在工資相當的養老金，與通貨膨脹掛鉤；他將擁有一棟國有別墅，只是不是現在這棟；他將擁有兩輛國有汽車和二十名職員，包括保鏢、司機和服務人員。在享受完度假后，他將開始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活動。”

這份報紙中不斷提到一條評論：“戈爾巴喬夫引起的混亂摧毀了這個注定消亡的帝國……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被收回總統的職位，還得不到政治家同行和蘇聯人民的憐憫或悲痛。”

葉利欽泄露并歪曲他與戈爾巴喬夫私下交易的細節讓切爾尼亞耶夫感到憤怒。俄羅斯總統對著編輯們一通亂講，好讓全世界知道他對自己擊敗的對手有多么的慷慨周到，而他與戈爾巴喬夫的上一次會面是多么的“文明”——在星期一進行的一場持續九小時的會議，敲定戈爾巴喬夫離開政治生涯的條件。記者們報道，戈爾巴喬夫的要求太過了，葉利欽不得不將他要求的工作人員的數目降為“十分之一”，從兩百到二十。切爾尼亞耶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是一個謊言，因為戈爾巴喬夫沒有要求保留兩百名工作人員。”“類似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還有一些。[4](#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2)他覺得，更糟糕的是，戈爾巴喬夫養老金的數額在共和國領導人之間顯然是公開的秘密，這些曾敬重戈爾巴喬夫的前盟友現在對他只有鄙夷。有些人甚至想什么都不給戈爾巴喬夫。

而戈爾巴喬夫也將星期一與葉利欽的談話描述成“文明的”，這讓切爾尼亞耶夫私下里驚詫不已。切爾尼亞耶夫認為，實際上是葉利欽帶著必勝的信念屈尊進行的一場儀式般的會議，戈爾巴喬夫將會面描述得似乎是正常進行，似乎是秉著同志情誼進行，“似乎沒有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這是一種假象。“戈爾巴喬夫在遭遇有預謀的羞辱和對他的成就和名聲不尊重的情況下，在紛至沓來、經過偽裝的謊言和嘲弄之下，表現出的無比的勇氣和自控力”讓切爾尼亞耶夫欽佩。但同時，他也有點怨恨總統只顧著自己。他幫戈爾巴喬夫起草了引退條款。“那我呢？他甚至都不關心我的養老金。明天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就要發表他的告別演說，我們也將失去工作。我應該上哪兒申請養老金呢，去哪個地區辦公室呢？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直在說他的‘蘭德式公司’（RAND corporation），告訴我們不用擔心，每個人都會有相應的職位。他非常愉快和樂觀。他說，屆時資金流通不會是問題。我不信，我也不想要。我寧愿自在點，但我拿什么生活呢？我沒有什么積蓄。”[5](#Tong_Shang__1991Nian_12Yue_27Ri)

所謂的“蘭德式公司”就是戈爾巴喬夫打算在退休后設立的基金會，實際上會為切爾尼亞耶夫和其他資深工作人員在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后提供工作崗位。

克里姆林宮的工作人員知道戈爾巴喬夫現在已經是個富人。上個星期的一天，他向切爾尼亞耶夫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吐露，他已經收到一位德國出版商為他的自傳《回憶錄》支付的800 000美元預付款，兩人對此震驚不已。戈爾巴喬夫曾說：“你知道嗎？阿納托利，我想自己留200 000美元，給你30 000到40 000美元。”切爾尼亞耶夫當時的回答是“您不必這樣做，我用不著的”。雅科夫列夫建議戈爾巴喬夫存起來600 000美元，建立戈爾巴喬夫基金，來吸引其他捐贈者進行相當的捐贈。他和切爾尼亞耶夫“一致”建議他不要給各個醫院任何東西，因為給了也是白費，而是要堅持保留一定的數目，認為“你以后也得在不向葉利欽伸手要錢的前提下過得體面有尊嚴”。[6](#Tong_Shang__1991Nian_12Yue_18Ri)

戈爾巴喬夫非常了解自己的籌款能力。在4月去韓國的一次訪問中，韓國總統盧泰愚奉上一個裝著100 000美元的信封，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對于第一次會面而言，兩人的行為都是不同尋常的。戈爾巴喬夫把錢給了他的參謀長瓦列利·波爾金，讓他轉到一家兒童醫院。[7](#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4)他知道在他退休后，來自世界各地的收入理想的出場和講座邀請會絡繹不絕。

切爾尼亞耶夫是一名退伍老兵，胖胖的塌鼻子下長著密密的胡子，他感受到的被迫辭職帶來的侮辱不比戈爾巴喬夫少。他認為自己也會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失業。作為一個最忠誠的心腹，他每天都能見到戈爾巴喬夫，向他提供關于人事和政策問題的備忘錄，在他與國外領導人會面的時候出席并記筆記，能自由發表意見并進行評判。他總是讓人感到愉快、從不易被激怒，是唯一被極其注重隱私的戈爾巴喬夫一家慣例性地帶往黑海福羅斯度假別墅的官員，在那里，他代寫了戈爾巴喬夫推崇改革的書和文章的許多內容。總統的英語翻譯帕維爾·帕拉茲琴科將切爾尼亞耶夫看做經濟改革的無名英雄。切爾尼亞耶夫支持改革的觀點形成于他在捷克工作的三年，1968年，他親眼目睹了蘇聯坦克推翻了改革的浪潮。

對于七十歲的切爾尼亞耶夫來說，離開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崗位意味著他失去的遠不止收人。他再也沒有機會到城郊莫斯科大學附近維斯尼娜大街上的家中居家生活，也無法看望他為圖方便養在克里姆林宮臨近的馬拉亞–格魯林大街上的情婦柳德米拉·帕夫洛夫娜了。深夜，“在家里喝完牛奶，隱瞞自己要去的地方后”，切爾尼亞耶夫往往會急匆匆地趕去看他親愛的柳達。他在日記中強調道，他想要的不過是好好生活。

俄羅斯政治自由的到來意味著他將失去與情人共度時光的個人自由，這讓他覺得有點諷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得習慣這種‘自由’。但是，當你有一個家庭的時候，你就無法自由……要是我有足夠的力量不顧一切奔向我愛的女人就好了，但那個女人想要我在她面前一直是開心而自信的，她想讓我有一份好工作，她不想看到我作為一個依賴她的人或是窮人去尋求慰藉。”他還得防著他情人的其他追求者。亞歷山大·鮑文，剛被戈爾巴喬夫派去以色列的最后一任蘇聯大使，也追求過柳達，切爾尼亞耶夫滿意地寫道，但“不怎么成功”。

戈爾巴喬夫有多拘謹，切爾尼亞耶夫就有多放蕩。1972年，在陪當時還是共產黨地委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前往阿姆斯特丹時，他將戈爾巴喬夫拽進情趣商店，然后去成人影院看X級的電影。戈爾巴喬夫“對他所看到的感到尷尬不已，甚至是厭惡”。這位未來的共產黨領導人不停地拽他助手的袖子，堅持討論怎么解決斯塔夫羅波爾的問題。[8](#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3)

柳達是這個與戈爾巴喬夫一起工作的浪蕩子的最后激情了，用他的話說，柳達是最后一個能寬厚地容許他一夜情的女人。在離開克里姆林宮幾年后，這個年邁的高級官員睪丸素含量水平變高，他寫了一本關于他對異性癡迷的專著，題為《不朽的女性》。書中，切爾尼亞耶夫著重的內容之一是若有所思地寫到他的勃起問題。他琢磨著：“在77歲的年紀，人隨時可能‘不行’啊。就這樣了。我這老頭已經完蛋了！柳達已經離開我了！愛情、幸福、生活的意義都消失了。就這樣了！結束了！”這本出版物給他扣上了“克里姆林宮的花花公子”的帽子，這頂帽子是根納季·格拉斯莫夫在《蘇維埃白俄羅斯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里給他扣上的。[9](#__Su_Wei_Ai_Bai_E_Luo_Si_Bao)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與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沒有關聯）也來到參議院大樓協助監督戈爾巴喬夫辭職演說的媒體報道工作。這位《莫斯科新聞報》周報的前編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蘇聯廣播的現任領導人是一個臭脾氣的人，但是，最后這天能出現在戈爾巴喬夫左右，哪怕是他長著拱眉、白發，戴著大號眼鏡的臉也是令人寬慰的存在，

意識到記錄戈爾巴喬夫作為總統的最后幾小時的歷史意義，雅科夫列夫把俄羅斯資深作家和電影制片人伊戈爾·別利亞耶夫帶進克里姆林宮與ABC的小電視團隊同時制作他自己的紀錄片。

別利亞耶夫和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時就認識了。這個紀錄片制片人非常欣賞他的校友在帶給共產主義國家自由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他與戈爾巴喬夫很相似，感覺“就像是盟友一樣在幫他”。他想到他們都是迷失的一代，出生太晚趕不上成為退役軍人，出生太早沒法成為宇航員，對于別利亞耶夫來說，戈爾巴喬夫就是“首腦式的人物，是我們這一代人觀點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也是我們本質的代表”。他告訴戈爾巴喬夫他還記得后者在大學里簡直就是一個大唱反調的人，但是，總統認為這樣說有點夸張了。他反駁道：“顯然，我絕不是一個唱反調的人，盡管我當時已經感覺到對現實的批判正在迅速增加。”

戈爾巴喬夫告訴他的老朋友：“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不見血的前提下度過這一時刻，避免擁護和反對共產主義的人之間發生沖突。社會正醞釀著一場爆炸。如果在人們正遭受痛苦的時候還出現政治瘋狂和利益爭奪（但愿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后果將不堪設想。”[10](#Ge_Er_Ba_Qiao_Fu___1991Nian_9Yue)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擔心別利亞耶夫制作的紀錄片沒法在俄羅斯電視臺播放，因為蘇聯廣播內部支持葉利欽的管理者們都對關注戈爾巴喬夫可能帶來的危害高度敏感。雅科夫列夫無助地向戈爾巴喬夫抱怨道：“電視已經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了。我不再是那里的老板。現在是葉利欽的人當家。”[11](#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3)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正是建議在最后的日子將ABC帶進克里姆林宮中心的人。他建議總統“從所有請求記錄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時刻的國外廣播中挑選一家”。他們最后選定了美國電視新聞節目中最受尊重也最有影響力的ABC《晚間報道》。ABC還有將蘇聯領導人與美國觀眾聯系起來的經驗，并且會講俄語的泰德·科佩爾與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助手相處得都很好。

而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他知道他在美國有多么受關注，他知道通過美國電視攝像機的鏡頭向世界傳達這個過渡是怎樣進行的是多么有幫助。誰知道朝三暮四的葉利欽會不會食言。

從各自的角度來看，不管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都將美國視為蘇聯最后的日子里的同盟。戈爾巴喬夫得到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支持，因為比起一群混亂的、有些國內設有核武器的新國家，布什更愿意與他熟悉的家伙打交道——一個完整的、懇求姿態的蘇聯。葉利欽則急于向美國展現新俄羅斯負責人的一面，他需要美國協助他完成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歷史轉變。兩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為達到自己的目的爭相影響美國和世界的看法。

對于獲準進入克里姆林宮的中心，在這個記者很少能夠接近的權力圣地隨意四處走動和拍攝，沒有人比科佩爾本人更驚訝了。ABC新聞的董事長魯恩·阿利奇在12月中旬將科佩爾送到莫斯科，試圖在戈爾巴喬夫辭職前抓住機會采訪他，如果他最終避免不了辭職的話。結果現在，科佩爾獲得了記錄蘇聯總統在位最后幾天的獨家權利。

切爾尼亞耶夫在戈爾巴喬夫的外間辦公室碰到了ABC工作人員。他想：“這是一件多么丟臉的事啊，只有國外電視記者在我們身邊跑前跑后來向全世界表現戈爾巴喬夫的重要性，西方群眾公平地賦予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在最后幾天把ABC帶進來，讓他們幾乎就住在走廊上見什么拍什么，那么，到戈爾巴喬夫發表辭職演說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前的信息將全部缺失。”[12](#Tong_Shang__1991Nian_12Yue_27Ri_1)

格拉喬夫認為總統也意識到，待在克里姆林宮的最后幾天是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這也是他接受將這幾天作為歷史記錄下來的原因。格拉喬夫這位五十歲的共產黨對外聯絡部的銀發資深官員自從1985年就伴隨在戈爾巴喬夫左右，起初是作為外交政策顧問，自從八月政變之后，就成了他的新聞秘書。他將科佩爾與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中記錄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美國共產主義作家約翰·里德作比較。據格拉喬夫所言：“進行比較是為了說明科佩爾應該就是今天的約翰·里德。大約七十年前，里德從內部見證了蘇俄的誕生，而科佩爾是來見證那場革命的最后時刻。”[13](#2009Nian_Qiu_Tian_Dui_Ge_La_Qiao)

格拉喬夫發現，幾天后，卡普蘭和科佩爾是“完全融入克里姆林宮墻之內，就連警衛都不再注意他們了”。這兩個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俄羅斯的記者對戈爾巴喬夫的離任都不怎么關注。卡普蘭回憶道：“他們在戈爾巴喬夫周圍的時候很緊張。他們知道蘇聯結束了。蘇聯官員正在離開克里姆林宮，而俄羅斯的官員正準備搬進來，他們想要對下一屆政府展示他們的忠誠。”

他們也同樣驚訝于在最后的幾天，戈爾巴喬夫的公務之少。有一次，卡普蘭和ABC的助理制片霍利·彼得森一起在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跟卡普蘭說：“進來吧，見見我的內閣。”他們被帶進一個大房間，發現里面坐著戈爾巴喬夫的部長們，在部長們在場的情況下，他們進行了一次長達兩小時的采訪。這段采訪的所有內容都沒有在電視上播出。

這兩個美國人一開始指望能回美國過圣誕節，但是，在獲準無條件進入克里姆林宮之后，他們就受歷史進程的驅使了。《晚間報道》的主持人科佩爾跟家人發誓他會在圣誕節之前回家，而當他委婉地把他們被莫斯科事務困住的消息告訴家人時，“我妻子一整天沒跟我說話”。[14](#2009Nian_9Yue_Dui_Ke_Pei_Er_De_F)卡普蘭也發現自己上了家人的黑名單。有一次，他手里拎著一個盛滿食物還沒打開的小手提箱，邊用衛星電話給家里打電話。“我妻子沖我大喊大叫，這是圣誕節啊，是假期，孩子們都放假在家呢。”戈爾巴喬夫在旁邊聽到了他妻子的大喊，主動要求接聽電話，他用英語說道：“讓我來說吧。”卡普蘭回答道：“你不會想接的！”戈爾巴喬夫問：“她為什么生氣呢？”卡普蘭解釋道：“我已經在這里待了一個星期了，還要繼續待下去。”戈爾巴喬夫笑著說：“如果是我的話，賴莎會殺了我的！”[15](#2009Nian_11Yue_Dui_Qia_Pu_Lan_De)

后來，戈爾巴喬夫借了衛星電話打給自己的妻子。卡普蘭認為，戈爾巴喬夫用衛星電話打是因為對克里姆林宮里自己的電話不放心。蘇聯總統現在誰也不相信。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86頁。](#1_10)

1. [同上。](#2_10)

1. [貝施洛斯（Beschloss）和塔爾博特（Talbott）《最高級別》（At the Highest Levels）,第452頁。](#3_9)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4_8)

1. [同上，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5_8)

1. [同上，1991年12月18日的一則日記。](#6_5)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83頁。](#7_3)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4頁。](#8_3)

1. [《蘇維埃白俄羅斯報》（Sovetskaya Belorussiya）, 2003年1月11日。](#9_3)

1. [戈爾巴喬夫《1991年9月》（\*Dekabr-91\*），第96頁。](#10_3)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日的一則日記。](#11_3)

1. [同上，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10_3)

1. [2009年秋天對格拉喬夫的訪談。](#11_3)

1. [2009年9月對科佩爾的訪談。](#12_3)

1. [2009年11月對卡普蘭的訪談。](#13_2)

# 第11章 “煤油過膝”

在鮑里斯·葉利欽被選入蘇聯代表大會后，他的名字占據了世界新聞的頭條。1989年夏末，他覺得該去看看世界，觀察其他的體制是怎么運行的。他接受了由神秘的加州非營利機構伊莎蘭學院贊助的巡回演講的邀請。該機構“致力于挖掘人類的潛能”，機構的領導人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

葉利欽的第一次美國之旅卻成了改變他一生的經歷，向他揭示了人類的潛能和另一種理念的活力。

紐約帶給他震驚。作為一個建筑專家，他對宏偉的摩天大樓，對餐館便宜、優質、快速的服務感到驚訝。他發現美國人“非常地開放、真誠友好、勤奮和聰明”。他被蘭德爾商店（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的一家超市）里品種豐富的食物吸引住了。他當時參觀完詹遜太空中心正在趕去機場的路上，跟助手列夫·蘇哈諾夫毫無準備地走進了商店。他們從沒見過這樣的商店，里面有30 000種商品，數不清種類的臘腸，不用排隊，一個女人站在結賬處拿著一個像吹風機一樣的設備讀取商品的價格。就是在那兒，他頓悟了。他得出結論，“鐵幕”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蘇聯公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因為這可能是他們無法承受的。

葉利欽因自己的所見而感到深深的沮喪，他在飛往邁阿密的飛機上跟蘇哈諾夫抱怨道：“看看我們都在我們的人民身上加了怎樣的枷鎖。我們知道的都是寓言童話！”蘇哈諾夫觀察到，“在離開休斯敦后，坐在一架由百萬富翁提供的飛機上，葉利欽的布爾什維克信仰終于崩潰了。在那幾分鐘里，他決定要退黨，開始爭奪俄羅斯的最高權力”。[1](#Su_Ha_Nuo_Fu___He_Ye_Li_Qin_Zai_1)

葉利欽在美國的公共演講效果都不錯，只除了9月12日在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那一場。9月11日，這位俄羅斯人乘著由洛克菲勒提供的一架私人飛機姍姍來遲，整個人是醉醺醺的。吉姆·加里森，葉利欽的東道主，涉及蘇美非政府外交的伊莎蘭蘇美交流項目的執行負責人，回憶道：“這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驚悚的一幕。當時，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在那兒迎接葉利欽，還有一位女士捧著一束玫瑰。葉利欽從登機梯上下來后，就在飛機的后輪胎上撒尿了。”葉利欽被匆匆送往酒店，他在酒店里又喝了一夜的杰克丹尼威士忌酒。加里森說，他醉得太厲害，導致第二天早上站都站不穩。加里森是戈爾巴喬夫的崇拜者，他開始不喜歡戈爾巴喬夫這位“強大的、原始的、極度飄忽不定”的競爭對手，認為他“完全是被推翻蘇聯領導人的黑暗執念魘住了”。葉利欽強撐著做完了演講，但“臺下的學生都在笑他，而不是在聽他演講”。[2](#2010Nian_7Yue_Dui_Jia_Li_Sen__Ga)

葉利欽強撐著在霍普金斯大學做演講時，白宮打來電話，說俄羅斯總統要求與布什總統會面的請求被接受了，會面將于上午十一點半在白宮舉行，與會者是國防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布什總統有可能會“順便過來”。布什不想給戈爾巴喬夫最猛烈的批評者一個類似于在華盛頓的峰會而冒犯到戈爾巴喬夫，尤其是在他和蘇聯領導人正在共同致力于完成一些美國目標的關鍵時刻，比如從東歐撤回蘇聯軍隊等。葉利欽一行人快速趕往華盛頓，于午后十二點十五分到達。布什的特助康多莉扎·賴斯說：“吉姆，你遲到了。”加里森回答道：“康迪，你都想象不到是什么情況。”

葉利欽一開始拒絕進入白宮，除非布什保證會見他。他抗議道：“我在我的國家是一個重要人物。”但是，當他得知斯考克羅夫特不會等他時，還是跨過了白宮的門檻。這位國防部顧問見面就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您這趟華盛頓之行的意義是什么？”葉利欽反駁道：“你想知道人生的意義嗎？”這位白宮官員和他的副手羅伯特·蓋茨“享受”了一場來自這個粗魯來訪者的“極其單調的演說”，蓋茨之后這樣說道。斯考克羅夫特一度閉上了眼睛，就像睡著了。[3](#Gai_Ci__Gates___Bei_Hou_De_Zhen)當副總統奎爾過來時，葉利欽一直狠狠地瞪著他不說話，直到奎爾受不了離開。布什最后出現了。這個俄羅斯人瞬間變得清醒無比，走上前去熱切地陳述蘇聯的近況。之后，白宮方面告訴記者，訪問者是一個無足輕重、沒有政治前途的人，他“瘋狂地”預言蘇聯將要崩潰。

接到關于這個俄羅斯人行為的消息，《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關于“葉利欽轟動的一天”的多姿多彩的文章。這篇報道被意大利記者維托里奧·祖科尼挖出來，經過潤色之后寫成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意大利小報《共和國報》9月14日這一期。祖科尼這樣寫道，對葉利欽而言，美國就是一個長5000公里的酒吧，他在美國喝了六瓶烈酒，一堆雞尾酒，產生了巨大的購物花費。祖科尼的報道部分是編造的，其基礎就是《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對一個純俄羅斯人在第一次訪美的時候可能做出的行為的猜想。《共和國報》上的文章引起了戈爾巴喬夫的注意，他鼓勵《真理報》將文章再版。9月18日，黨的機關報按時發表了這篇文章，包括其中每個聳人聽聞的細節。

這次破壞人民英雄的嘗試結果還是事與愿違。《真理報》被盛怒的莫斯科人在紅場焚毀，他們將它視為損毀他們覺得唯一能夠信任的政治家的又一次骯臟把戲。三天后，《真理報》的編輯人員親自檢查文章后，發現有一部分是捏造的，《真理報》不得不道歉——這是這面共產主義旗幟史無前例地撤回自己的報道。

但是，后來在葉利欽回到莫斯科后，蘇聯電視臺得到了葉利欽在巴爾的摩演講上含混講話的視頻片段。在戈爾巴喬夫助手的命令下，國家電視臺的進步領導人，米哈伊爾·涅納謝夫只好將這個電影片段在黃金時段向全國播放，但是他本人是反對這樣做的，他還經過小心處理將葉利欽回國時攜帶了十萬個一次性注射器作為給醫院的禮物的鏡頭包括進去了。[4](#Mi_Ci_Ji_Wei_Zi__Mickiewicz___Qi)葉利欽聲稱這個片段被克格勃故意放慢，使他看起來像是喝醉了酒，盡管連他在蘇聯電視臺內部的支持者都懷疑它是真的。不論如何，這個插曲加深了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的憎恨以及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的不屑。

在《真理報》事件后一星期，葉利欽發現自己又陷入另一件令人尷尬的爭論中心。[5](#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4)9月28日晚上，天氣又冷又干，晚上十點過后，渾身濕透的葉利欽出現在Uspenskoye政府公寓樓群警衛崗哨。他告訴那里的民兵，他讓司機下班了，自己走最后約三百米的路程去看一個老朋友，手里拿著一束花，這時一個不明人士把他從橋上扔下莫斯科河。一個民兵報警后，葉利欽的女兒坦妮亞打電話給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科爾扎科夫抓了幾件厚衣服，一瓶酒和幾個蘋果，開著他的尼瓦車趕到那個哨崗。這位葉利欽的保安負責人發現他的上司一動不動地躺在一個電爐旁，身體都已經開始泛藍了，“就像被潑了墨水一樣”，身上也只穿了濕內衣。他的西服掛在一顆釘子上，衣服上都是血跡和草屑。

葉利欽告訴科爾扎科夫，在他的專用車離開后，四個高大的男人把他推進一輛紅色日古麗車的后座，在他頭上系上袋子，把他從橋上扔下去。要不是他自己解開，早就淹死了。

警衛提交了一份報告，內政部長瓦季姆·巴卡金記錄了葉利欽的陳述。兩周后，巴卡金將事情向最高蘇維埃復述，戈爾巴喬夫擔任主席。這起事件引起報紙好一陣關注，他們的猜測千奇百怪，有人說葉利欽是去看望情婦——一位住在戶主不在的別墅里的廚師，她潑了他一桶水（那位廚師否認了這段緋聞）；也有人說，這是克格勃的一個陰謀，想要除去葉利欽或是讓他難堪；甚至有人說，他沒被邀請就出現在尼古拉·雷日科夫的生日聚會上，而戈爾巴喬夫也在場，克格勃警衛接到指示要教訓教訓他。多年后回想起這件事情，科爾扎科夫對發生的事情仍是一頭霧水。據他回憶，河水只有一米深。“想想他說自己可能會被淹死有點好笑，葉利欽卻告訴我河水淹過了他的頭。”[6](#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5)

在一次電視播放的最高蘇維埃的交流中，戈爾巴喬夫嘲笑了葉利欽的這件回事。但是，莫斯科的大多數人傾向于再相信葉利欽一次。他也不過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俄羅斯人而已，是會酗酒、掉進河里、直言直語并最后自食其果的俄羅斯人之一。他越被共產主義的機構攻擊，普通的莫斯科人就越堅信他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1989年12月14日晚上，填補了葉利欽粗糙政治力量的安德烈·薩哈羅夫，俄羅斯改革的政治后盾，死于心臟病。這位前異見分子受到了一個感覺愧疚的國家的贊揚，它意識到它失去了自己的道德標桿。他的遺體被擺放在科學協會大樓里，成千上萬的哀悼者在大雪中默默走過他的棺材。[7](#Bi_Zhe_Can_Jia_Le_Zhe_Ci_Zang_Li)戈爾巴喬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員來到現場短暫地待了一會兒，對這位被他們一直流放國內的不同政見者表達尊重。鮑里斯·葉利欽在他的遺體旁靜立了一段時間，似乎是在吸取薩哈羅夫的精神，又好像是在承認自己作為快速變化的俄羅斯的反對派毫無爭議的領導人這個新角色。葉利欽現在是一個被稱為跨區代表團最重要的成員，這個代表團是選舉出來的激進分子的松散團體。自夏天在莫斯科一家賓館的休息室形成后，這個團體已經舉行了幾次混亂而隨意的會議，以期給政府施壓，加速改革。

薩哈羅夫在沃斯特里亞科夫公墓入殮前，超過十萬群眾參加了在一個泥濘的停車場舉行的葬禮集會，集會上最主要的呼聲是要求結束蘇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駛過的一輛火車上，乘客打開窗戶，一邊喊叫一邊揮手以資鼓勵。群眾的態度變得更加蔑視權威。對一個依靠控制麻木群眾來掌握政權的政黨來說，這樣的表現是不利的。

戈爾巴喬夫堅持改革進程，他鼓勵蘇聯十五個共和國進行各自的民主選舉，選取對民眾更加負責任的領導人。每個共和國都已經有了自己的議會，但是，投票的結果往往是由共產黨領導人安排好的，立法機關也沒有多少立法權。

所有共和國的個人選舉定在1990年3月4日。俄羅斯競選活動的顯著特征是支持民主的大規模集會，推舉葉利欽為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候選人。革命前的俄羅斯旗幟和反共產主義標語第一次出現在游行示威者中。對克格勃和警察的恐懼很快就無影無蹤了。事情的發展已經超過鎮壓政治觀點的范疇了，尤其是選舉是在黨的允許下進行的。

超過8000位候選者競爭俄羅斯代表大會的1068個席位。戈爾巴喬夫和賴莎投下自己的選票時開玩笑說，他已經在家里設置了一個黨委會來決定支持誰。他還警告記者選舉進程也有限制，想要分裂蘇聯就會有導致伴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一樣混亂的危險。

葉利欽的競選號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區74號。他倡導選舉總統、多黨制、俄羅斯自己的中央銀行和軍隊。至于其他的共和國，如立陶宛，正在迫切要求脫離，葉利欽表明，就如它所愿讓它脫離蘇聯吧。這將會削弱中央，讓俄羅斯人民更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也會削弱控制中央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發現，這個結果就算不比前一個結果更吸引人，也有跟它一樣的吸引力。

葉利欽所到之處必會受到民眾無比熱情的歡迎，他獲得了他的選區84%的選票，打敗了其他十一個候選人。他利用了民眾對共產主義不能讓人民吃飽穿暖的深度不滿情緒，也利用了一個觀念，即俄羅斯被其他十四個共和國剝削，那里的人們都過著更好的生活。

戈爾巴喬夫的應對是下決心加強和確保自己的權力。他說服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秘密選票來選舉一位任期五年的蘇聯總統——當然，就是他自己，然后在全國范圍內直接選舉以后的總統。1990年 3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宮國會大樓舉行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讓自己當上了總統，但只有59%的支持率——主要是由于部分人的聯合抵制。這次險勝讓很多人都驚訝得倒吸一口冷氣。維塔利·科羅季奇猜測在秘密選票中，有很多對經濟改革空口應酬的共產黨官員與激進分子合伙反對戈爾巴喬夫。前者將戈爾巴喬夫看做阿連德，后者將他看做皮諾切特。

在選舉的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回到國會，在一張側面豎著十英尺高的紅旗的桌子旁，對著蘇聯憲法宣誓，旗幟上繪有金色的錘子和鐮刀，在旗幟上方還有一顆繪著金邊的紅星，這是蘇聯的官方徽章。他獲得了時間最短的站立鼓掌，然后回到樓上與賴莎和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一起安靜地喝了一杯香檳。他現在已經是總統戈爾巴喬夫了，國家的首腦，一位仍是一黨專政國家的唯一政黨的領導人，軍隊的總指揮，以及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總執行官。他命令克格勃的安全部門確保將來紅旗放置在一個特殊的落地托上，無論他在什么地方，紅旗都要在他左右，就像美國總統的做法一樣。他讓人在總統的專機側面噴上“Sovetsky Soyuz”（蘇聯）字樣。他還設立了一個總統委員會，指派跟隨他很長時間的助手為委員，包括被他提拔為參謀長的瓦列利·波爾金。[8](#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5)

而矛盾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權威不比從前。他的名聲已經因為繼續擔任失信的共產黨的領導人而被敗壞，而共產黨的斯大林主義機構顯示出對改革的厭惡，這就讓他更不受歡迎了。他被孤立在越來越小的中間立場上。他甚至被他自己的秘密警察監視，這是科羅季奇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奇怪事件后得出的結論。戈爾巴喬夫將這位編輯召集到自己的辦公室，因《星火》對利加喬夫的“不公正”報道對他發脾氣，“但是他在喊叫的時候，眼神是鎮靜而溫和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坐在旁邊，咧著嘴笑”。這一切都是作秀。科羅蒂奇說：“我敢肯定他被竊聽了，而且他自己也知道。”[9](#Ji_Mo_Fei_Ye_Fu__Timofeyev___E_L)

4月9日之后，戈爾巴喬夫的受歡迎度再次受創，蘇聯的軍隊使用工兵的鐵鏟和瓦斯來攻擊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的和平民主主義示威游行，造成二十人死亡。戈爾巴喬夫聲稱動用武力是格魯吉亞的領導人在未與他商榷的情況下擅自做出的決定，幾年后，他又怪蘇聯的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給一個地方將軍下命令。許多人不相信他，尤其是當月晚些時候，戈爾巴喬夫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堅定了反對民族主義的立場，發誓他絕不會讓波羅的海諸國脫離蘇聯。他還在同一個演講中怒氣沖沖地說葉利欽的政治生涯結束了。

但是，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在走下坡路。這位新蘇聯總統在1990年5月1日遭受了羞辱，因為支持改革的莫斯科選舉人俱樂部加入了法定五一紅場游行的尾巴。在老一套、心懷感激的工人高喊官方口號、經過訓練的游行之后，成千上萬喧鬧的、憤怒的、無禮的莫斯科人舉著標語出現，上面寫著“戈爾巴喬夫，辭職”和“打倒列寧派”。拿著立陶宛和烏克蘭國旗的示威者停在戈爾巴喬夫面前吹口哨、嘲弄。站在列寧陵墓上的政治局委員臉上仁慈的面部表情也變得冷酷無情了。

國家電視臺一般會在領導人還在陵墓上的時候繼續直播紅場游行。現在，這些令人窘迫的畫面正在向全蘇聯1.5億觀眾播放。在一個電視主管跑進演播室尖叫著關閉的時候，播放才被切斷。在經過了幾分鐘的混亂后，戈爾巴喬夫帶著他的同志們離開了講臺，他的肩膀前傾，把淺頂軟呢帽往下壓，下令調查幕后的“政治無賴”。他對民主主義者的逗弄也結束了。

賴莎·戈爾巴喬夫不僅感受到了民主主義者的怒火，也感受到了共產黨保守派的憤怒，后者認為她丈夫正在毀掉他們的事業。當她去地區黨委交黨費時，被地方共產黨書記對她懷有的惡意震驚了。她向帕維爾·帕拉茲琴科透漏：“我真的感覺他恨我們。他們永遠也不會原諒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10](#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

而在這個時候，葉利欽正乘著支持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浪頭前進。1990年5月17日，在晚春潮濕多云的一天，自從革命前到現在，第一次自由選舉出來的俄羅斯代表大會在大克里姆林宮會面。大克里姆林宮內部最顯眼的位置擺放著鮑里斯·約干松大幅的、壯觀的巨畫《列寧在第三次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亞歷山大·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白、藍、紅三色旗被搬進了辯論廳，代表們起立鼓掌幾分鐘。這個三色旗最初是在十七世紀末模仿荷蘭三色旗而來的海軍和陸軍旗，1896年首次被承認為俄羅斯國旗，十月革命之后被取消。它再次出現的最重要的意義，是標志著建立在馬克思工人階級國家理念基礎上的長達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工程嘗試結束了。要是在幾年前，展示三色旗是會被逮捕的。

大多數代表都是黨員，他們的觀點有的是新斯大林主義，有的是激進的民主主義，但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一致的愿望：努力為俄羅斯在蘇聯內爭取更多的獨立自主。

葉利欽自告奮勇參加常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也就是俄羅斯實際上的國家首腦。戈爾巴喬夫放出話，他屬意的是亞歷山大·弗拉索夫，一個沒有指望的政府官員，作為一個政治競爭對手來說不具有威脅性。盡管戈爾巴喬夫不是被選上的代表，他還是來到俄羅斯辯論廳，當著葉利欽的面威脅代表們。他堅持把十英尺高的桿子上的總統聯邦旗放在旁邊，來彰顯自己的新身份。旗幟能被安放的唯一位置是房間外面伸出去的高高的陽臺，就像一個主席臺。戈爾巴喬夫在會議間隙從陽臺上走下來，勸導代表們給葉利欽投票的危險性。他在講臺上控訴葉利欽放棄共產主義原則是想毀滅蘇聯。

在代表中，有40%堅定支持葉利欽，有40%反對。剩下的 20%——被稱為“沼澤”的一群人——因為痛恨戈爾巴喬夫的干預而傾向葉利欽。5月29日，這個西伯利亞人贏得了秘密選票中的535票，比絕對多數所要求的還要多4票。這是戈爾巴喬夫第一次無法讓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在蘇聯贏得領導職位。

戈爾巴喬夫得知這個結果的時候，正倚在一架藍白色蘇聯專機的皮椅上，飛機正飛越大西洋，去往渥太華，然后去華盛頓與布什總統參加一個峰會。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調解性的祝賀電報，承認“你證實了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斗士”。戈爾巴喬夫否決了，說葉利欽不需要這樣假惺惺的稱贊。[11](#Tong_Shang__Di_189Ye)盡管他承認他們現在不得不與葉利欽協商，但直到一星期后才祝賀。

在美國，布什總統在白宮接待了戈爾巴喬夫，他們一起乘坐直升機飛行五十英里到達戴維營。他們周圍是兩個便衣軍官：一個是美國空軍少校，拿著一個金屬的Zero Halliburton手提箱，用皮套系在手腕上；另外一個是俄羅斯上校，前臂上也系著一個黑色小手提箱——分別是兩個總統向對方發動核戰爭的世界末日設備。

在戴維營，戈爾巴喬夫開著高爾夫車載著布什到處轉悠。他開車的技術跟葉利欽是半斤八兩：他為了避開一棵樹差點翻車了，跟在后面的兩名軍官也差點翻車。午飯間，喝了一碗紅褐色的熱湯后，布什向戈爾巴喬夫問起葉利欽在蘇聯政治中的新角色。蘇聯總統反駁道，葉利欽不是一個“重要的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毀滅者”。[12](#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

戈爾巴喬夫說這話的同時，這個毀滅者正在享用他的戰利品。在被選為俄羅斯議會的主席后，葉利欽和他忠誠的助手列夫·蘇哈諾夫搭電梯到達俄羅斯白宮的五層去占領他前任的辦公室。他們驚訝地發現，辦公室大得就像舞廳。葉利欽敘述道：“我一生見過很多辦公室，但是，這間辦公室柔和的現代光澤雖然刺痛了我的眼睛，但又讓我感到愉快，一切是那么的光亮和舒適。”蘇哈諾夫驚嘆道：“看，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我們占了一間多棒的辦公室啊！”葉利欽有一個顛覆性的想法，他自己都有點嚇到了。“我們不止占領了一間辦公室，我們是占領了整個俄羅斯！”盡管競選時反對黨員的額外津貼，但他很快接管了一座人員配備完整的莊園為己所用，莊園之前是用作俄羅斯部長委員會在阿爾汗金斯科的度假靜養地。

工作慢慢上正軌之后，葉利欽解雇了配給辦公室的克格勃警衛，并將他的前克格勃伙伴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安插為一個新保安組織的帶頭人。在最初的幾天，他偌大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安靜得詭異。舊政府的員工都躲起來，希望葉利欽把他們也開除了，安排他自己的人。葉利欽將雇員們都叫到一起，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愿意，他會將他們留下來。大多數人留下來了。

隨著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對抗的升級，空氣中都是濃濃的火藥味。葉利欽和他的人員要求獲得武器來保護個人安全，這個要求得到了他們在國防部和內政部的支持者的幫助。他后來估計，在一年內，他的保安指揮部搜集了六十支突擊步槍，一百支手槍，兩件防彈背心和五部奧地利無線電話。

盡管是一個占地面積兩倍于美國的國家的領導人，葉利欽的權力卻很小：他不能收稅；他沒有軍隊；他不能責備國家電視臺的人，因為那里現在仍受克里姆林宮的控制。政治公開還沒發展到蘇聯領導人的政敵能夠指揮電視播放的程度。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還是維持原樣——完全是擺設，是蘇聯時期虛構的共和國自治謊言的一部分，而實際上不論是本國人民或是資源，他們都無法控制。

葉利欽和他的代表們決定改變這一切。他們希望從中央得到一些權力，確立足夠的自主權來讓俄羅斯擺脫經濟危機。他提議俄羅斯法律應高于蘇聯法律，并且在俄羅斯境內應優先采用俄羅斯法律。這個舉動甚至受到了俄羅斯保守代表們的歡迎。葉利欽這樣描述道：“選擇有很多個，但我們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贏！”

1990年6月12日，議會以907票通過、13票反對、9票棄權的結果采納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自主宣言》。投票結果受到了大家的鼓掌歡迎。這個日期將來會被作為俄羅斯國慶日慶祝。葉利欽在經過一段時間后這樣表達：“只要獨立自主這個詞在空中回響，歷史的鐘就會再次走動，所有阻止它的嘗試最終都會失敗。蘇聯帝國最后時刻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蘇聯全境內，其他共和國在俄羅斯的暗示下，借著民族主義的浪潮宣告了自己的獨立自主。在許多共和國，正在進行爭取更大的獨立性競選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也得到了共產主義要職人員中強硬派的支持，因為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感到不滿，想要為自己爭奪權力。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只有在一個新的聯邦條約下或通過武裝力量才能將蘇聯維持下去。

事情的規模之大讓葉利欽“感到緊張不安”。他相信，這個體制再也無法公開鎮壓他了，但是，“它能夠一點一點悄無聲息地吞掉我們”。它可以暗中破壞他的行動，也能夠妨礙他。戈爾巴喬夫仍然掌握著克格勃、內政部、外交部、中央銀行、國家電視臺和其他一些控制手段。他仍是軍隊的指揮，在權力的實際爭斗中，他是最終的裁定者。

但是，戈爾巴喬夫正在失去群眾。到1990年仲夏，大多數俄羅斯人都不再關注他的講話。生活狀況沒有改善。在等了五年永遠不會來到的“關鍵的轉折點”之后，人們不再理會他的演講，將之稱為mnogo slov（啰里啰唆，空話連篇）。在他背后，共產黨書記們將他稱為“水仙”，顧影自憐的自戀者（戈爾巴喬夫的書記們稱葉利欽為“莽夫”或“木頭”，也就是俄語中所說的“笨得像木頭”）。[13](#Bu_Er_La_Ci_Ji__Burlatsky___Mi_H)商店和售酒商店仍是空的。

1990年7月2日，當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國會大廈舉行的第二十八屆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一如既往地做著冗長的演講時，幾乎沒人在聽。他說，“有人說經濟改革要為我們所有的失敗負責，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說這話時，他的雙眼透過鑲著不銹鋼邊的眼鏡，逡巡俯視著坐在代表間的一排排坐立不安的共產黨官員和下頜線條硬朗的將軍們。“我們那被廢棄的農場……巨大的生態問題……民族和種族問題……都不是昨天才出現的，都有其歷史根源……我們必須繼續進行經濟改革。”他的講話只贏得了大約五秒鐘稀稀落落的掌聲。

現在，在葉戈爾·利加喬夫、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和克格勃頭領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戈爾巴喬夫任命他是因為相信他是一個改革者）一個接一個譴責黨內“反社會主義分子”并贏得雷鳴般的掌聲之后，輪到戈爾巴喬夫面無表情地坐在那兒了。他們真正的目標是戈爾巴喬夫本人，他在不久前私下跟夏哈納扎羅夫承認他“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14](#Bu_Lang__Brown___Ge_Er_Ba_Qiao_F)而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沒有比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更糟糕的了。

最“反社會主義的分子”，鮑里斯·葉利欽，本能地感知到權力正在從執政黨那里流失。但他籌劃了另一個戲劇性的行動方針。他走上講臺，宣布作為俄羅斯議會的主席，他更愿意“聽從所有群眾的意志”而不是聽從黨的指示。因此，他決定暫停他的黨員身份。他炫耀般上交了自己紅色的硬紙板黨證，號碼是03823301，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黨委會于1961年3月17日頒發。在“不要臉”的喊聲中，他大步走出了大廳。他堅信自己已經讓戈爾巴喬夫承受了沉重的打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從講臺上“華麗退場”。

幾個激進分子跟在俄羅斯領導人后面走了出去，其中有即將成為列寧格勒市長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他的手下有俄羅斯未來的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普京時任克格勃官員，一年半后才上交自己的黨證。

戈爾巴喬夫對在退席抗議后留下來的黨員的能力不抱什么幻想，也知道他們憎恨他。在一次與地方共產黨書記的會面后，他私底下咒罵這些“自私自利的敗類，心里想的就只有食槽和權力”。但是，他反對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提出的建議，即辭去總書記職務、跟隨葉利欽退黨，他擔心這會分裂社會，引發內戰。切爾尼亞耶夫后來這樣說：“只有葉利欽在他動物般的直覺下，聽到了遠處歷史車輪的轟隆聲。”

戈爾巴喬夫跟切爾尼亞耶夫解釋道：“你必須理解我。我不能松了這條討厭的、狂暴的狗的狗鏈，否則，整個龐大的體系都會轉而攻擊我。”[15](#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4)他得讓保守主義處于控制之下，否則經濟改革將被推翻。另外的選擇是要么與熱衷權力的葉利欽合作，對經濟執行休克療法，包括給予共和國更多的自由，這可能引起帝國效忠者的政變；要么讓保守主義者加入他的團隊，像斯大林所做的一樣，嘗試逼迫蘇聯共和國屈服。不管他的選擇是什么，很明顯的一點是，蘇聯正面臨巨大的危機。

蘇聯總統還痛苦地意識到另一個問題，他要管理的民族實在太多了。他曾向瑪格麗特·撒切爾引用戴高樂的俏皮話，關于管理一個擁有超過一百二十種奶酪的國家之難。戈爾巴喬夫說，可以想象要管理一個超過一百二十個民族的國家有多難。他的一個助手隨口說道：“是啊，有時還是在沒有奶酪的情況下。”[16](#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1)

戈爾巴喬夫想要緩步前進，讓強硬派跟他一起。他召集報紙編輯私下開了一個會，會上他猛烈攻擊了國會的激進分子，特別點名葉利欽，并語帶鄙視地談到他們的“多黨制、脫離蘇聯的權力、市場經濟、新聞自由、每個人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計劃。這些出現不到兩年的概念對于普通黨員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甚至是無法容忍的。戈爾巴喬夫警告編輯們：“我們現在正站在齊膝深的煤油中，一些人正在劃火柴。”[17](#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5)

1. [蘇哈諾夫《和葉利欽在一起的三年》，第143—150頁。](#1_11)

1. [2010年7月對加里森（Garrison）的訪談。](#2_11)

1. [蓋茨（Gates）《背后的真相》（From the Shadows），第479頁。](#3_10)

1. [密茨機維茲（Mickiewicz）《切換頻道》（Changing Channels），第93頁。](#4_9)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92—98頁，以及索洛維約夫和克列皮科娃《鮑里斯·葉利欽》，第178—181頁中包含這個事件的詳細描述。](#5_9)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98頁。](#6_6)

1. [筆者參加了這次葬禮。](#7_4)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51—252頁。](#8_4)

1. [季莫費耶夫（Timofeyev）《俄羅斯的秘密統治者》（Russia’s Secret Rulers），第78頁。](#9_4)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289頁。](#10_4)

1. [同上，第189頁。](#11_4)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224—226頁。](#12_4)

1. [布爾拉茨基（Burlatsky）《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鮑里斯·葉利欽》，第41頁。](#13_3)

1. [布朗（Brown）《戈爾巴喬夫因子》（The Gorbachev Factor），第102頁。](#14)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280頁。](#15)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108頁。](#16)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241頁。](#17)

# 第12章 12月25日：正午過后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安德烈·格拉喬夫單獨待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離發表辭職演說只有四個小時多一點了，他拿著一支筆，開始大聲演練。[1](#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6)在這期間，他詢問助手的意見，在對精確的拼寫還有最后疑問的地方做標記。自從9月份被任命為總統代言人之后，格拉喬夫就成為戈爾巴喬夫周圍核心小圈子中的一員。總統越來越欣賞他可靠的潤色，以及對公共關系圓滑老道的處理。

戈爾巴喬夫無法讓自己說出他要“辭職”的話。于是，他決定插入這樣的話，“我特此停止我作為蘇聯共產主義共和國聯盟總統的活動”。

在重寫了幾遍后，這個演講成了為戈爾巴喬夫所追求的政策辯解和陳述歷史的演繹如何讓他氣餒之間平衡的結果。它還是稍稍泄露出過去幾周的政治游戲中被葉利欽和共和國總統打敗所帶來的苦楚。但是，他曾向葉利欽表示，他不會利用這個場合對葉氏及其所作所為進行直接攻擊。不論如何，這么做都是有損尊嚴的。

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還是做了一個實質性改動來刺傷對手。在講稿中，他指出保留過去幾年的民主成果是至關重要的，“不論在什么情況或借口下，這些成果都不應該被拋棄”。這句話可以看做一個警告，葉利欽和他的繼任者們可能尋求非民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最后的版本還包括一小節從戈爾巴喬夫之前棄用的草稿中摘取的內容，后來他又決定放回來。這小節內容表明葉利欽及其共謀者所做的決定“應該建立在群眾意愿的基礎上”。這段內容也有可能觸怒葉利欽。

這篇1200字的講稿大部分內容是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呈給戈爾巴喬夫的最后版本，蘇聯總統在任期內發表的幾乎每一個重要講話都是他起草的。自從戈爾巴喬夫兩周前讓他開始起草演講稿起，他就一直致力于這篇告別辭。這也是總統第一次承認蘇聯即將結束了。其他助手也提供了草稿，但大多被拒絕了。四天前，切爾尼亞耶夫覺得他完成了任務，但戈爾巴喬夫兩次回到最初的文本，兩次讓他的顧問重寫。即使到了現在，總統還在修修補補。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也提交了自己的草稿，其中的內容對葉利欽有安撫性，且坦率承認了一些錯誤。戈爾巴喬夫想要采取雅科夫列夫的辯護書的大部分內容，但切爾尼亞耶夫明確把它否定為有條件的投降以及訴怨，最終，總統也同意了他的說辭。

一周前，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被叫往克里姆林宮提意見，他也反對雅科夫列夫的版本。這個格魯尼亞人到的時候脾氣很不好，也沒有心情做出任何掉價的舉動或向葉利欽低頭。他剛從蘇莫倫–森納亞大街外交部大樓的一名職員那兒突然得知，葉利欽清理了蘇聯外交部，提出外交部的人員和資產歸俄羅斯所有。謝瓦爾德納澤要馬上搬出他在十七層的部長辦公室，因為俄羅斯外長安德烈·科濟列夫想要搬進來。

他用厚重的格魯吉亞口音抱怨道，葉利欽的人都是冷嘲熱諷，粗魯無禮。“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那把交椅；他們互相望著對方，吹噓自己在蘇莫倫–森納亞大街的辦公室。”[2](#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4)他對科濟列夫從無好感，這個難以形容但心懷野心的俄羅斯外長因為柔和的嗓音在背后被人稱為“耳語者”。謝瓦爾德納澤感到憤怒的是，不論葉利欽還是科濟列夫，起碼應該當面告訴他，他的外交部被從他的腳下迅速撤走了。他和最親近的助手謝爾蓋·塔拉申科既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擔心戈爾巴喬夫和克里姆林宮官員的人身安全。塔拉申科跟前伊莎蘭學院執行官，現在的國際外交政策協會會長吉姆·加里森透露，“我們不知道誰會射殺誰”，國際外交政策協會是由前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謝瓦爾德納澤共同贊助的一個組織，以動員對蘇聯兒童的援助，在謝瓦爾德納澤從自己的辦公室被趕出來的第二天，喬治·舒爾茨正好去拜訪他。

謝瓦爾德納澤向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悶悶不樂地預測道，葉利欽解散蘇聯的行動會帶來新的暴動，引起暴力和壓迫的驟增。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也附和了他的悲觀想法。他預言：“dai Bog（上帝保佑），葉利欽不會撐過這個春天。”[3](#Tong_Shang__1991Nian_12Yue_22Ri)

切爾尼亞耶夫注意到，告別辭的最后版本“與戈爾巴喬夫在這個折磨人的12月所受的痛苦有關”。沒有用雅科夫列夫的“訴怨”，相反，戈爾巴喬夫確保講稿包括了一定的挑釁和自我辯白，并譴責葉利欽曾暗示蘇聯的終結。這最后的草稿將戈爾巴喬夫描述成正在發生的政治劇中一個有原則的扮演者，盡管他現在已經無法控制急速發展的態勢了。它宣稱戈爾巴喬夫完成了將這個國家帶向民主的任務。講稿中還一筆帶過戈爾巴喬夫對自己錯誤的承認，盡管承認的方式不是自我譴責，而是公式化地使用特定的代詞“我們”，如“當然，我們本可以避免一些錯誤”。

最終的講稿正在打印時，帕維爾·帕拉茲琴科進入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外間。他提醒切爾尼亞耶夫，喬治·布什還等著戈爾巴喬夫總統的最后一個電話。切爾尼亞耶夫告訴他：“好吧，我猜今天該打這個電話了。”

但是，在西方，今天是圣誕節，所有人都放假。當帕拉茲琴科撥打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電話要求接通華盛頓時，沒人接電話。大使館是關閉的。電話應答機上的聲音只提示了當值的海軍陸戰隊員的電話號碼，以防出現事關美國公民的緊急狀況。帕拉茲琴科可以找莫斯科外交部幫忙，外交部有能力通過華盛頓的大使館給美國總統撥打電話，但是，現在這些外交資產都握在葉利欽的人手中，而他們不可信。

帕拉茲琴科翻著記事本，找到了美國代表團副團長吉姆·科林斯在莫斯科家中的電話號碼，向他解釋了自己遇到的困難。科林斯給了他華盛頓國務院控制臺的一個號碼，帕拉茲琴科通過莫斯科的操作員在外線上撥打這個號碼。在國務院值班的官員告訴他布什總統正在戴維營過圣誕，他幫帕拉茲琴科接通了這個森林靜養地的當值人員。美國總統還在睡覺，美國這時候還是凌晨，但國務院的官員說總統在起床后會接電話的。他們約好了打電話的時間：莫斯科時間下午五點，也就是華盛頓時間早上九點。[4](#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_1)

戈爾巴喬夫已經完全從午飯后的萎靡不振中恢復過來，他邀請科佩爾和卡普蘭到他的辦公室繼續拍攝ABC電視臺的歷史紀錄片。他著重強調這次過渡的和平本質，強調這是俄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歸根結底，這個過程是民主的。”

科佩爾問，考慮到他仍是蘇聯軍隊的指揮官，如果他想的話，他能不能保留權力。戈爾巴喬夫忸怩地回答道：“有些人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會改變自己的立場，但這對于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如果現在發生的一切對我不重要，如果我不擇手段地想留在政府，這也不是那么難實現的。”[5](#1991Nian_12Yue_25Ri__ABCDian_Shi_1)

這是徒勞的自負。戈爾巴喬夫能夠做到這些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盡管他從不承認這一點。多年后，為了粉飾他被驅逐的事實，他聲稱，有時他手癢得想使用武力，但是他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可能會導致內戰，甚至是全球范圍內的核沖突。

戈爾巴喬夫跟科佩爾強調，他想傳達給美國人最重要的信息是不會出現核武器引發的混亂。他提到在他的演講稿中，包含了他對世界的保證，即在過渡期，他已經做了他職權范圍內所有能做的事情，以確保對核武器的安全控制。

這兩位美國記者又一次被這位總統的鎮定所打動。戈爾巴喬夫告訴他們，他比幾天前更放松了，“因為直到做這個決定為止，心理壓力都是巨大的”。卡普蘭也對他驕傲的態度感到驚訝。他回憶道：“我唯一想到的詞是‘高貴’。很明顯他想要給人一種掌控者的印象，不是控制蘇聯或俄羅斯，而是控制自己。”[6](#2009Nian_11Yue_Dui_Qia_Pu_Lan_De_1)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99頁；以及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和12月20日的兩則日記。](#1_12)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的一則日記。](#2_12)

1. [同上，1991年12月22日。](#3_11)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364—365頁。](#4_10)

1. [1991年12月25日，ABC電視臺未剪輯的鏡頭片段。](#5_10)

1. [2009年11月對卡普蘭的訪談。](#6_7)

# 第13章 專政采取攻勢

在1990年6月俄羅斯議會宣布獨立自主之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可以選擇摧毀對方或進行政治聯盟。需要采取一些極端的措施。蘇聯的經濟正處于崩潰的邊緣，俄羅斯首都處于長期性的物資匱乏狀態，現在連香煙都短缺了，幾個城市爆發了小型的煙草騷動。那個夏天排得最長的隊伍出現在照相館門前，因為莫斯科人必須申請身份證去城市商店買東西，以防農村人把貨架掃蕩一空。衣服、鞋子和家電都發放了配給券。糖每個人每個月限買兩公斤。黃油幾乎見不到了。面粉和鹽從商店消失了，面包每天銷售一空。肉類只在高價市場上才能買到。消費者都在囤積食物，使得物資短缺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群眾中流傳著關于糟糕情況的心酸趣聞。有一位健忘的老人站在超市外面，手里拎著一個空的購物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購完物了。還有很多玩笑是針對共產黨特權的。在國會，一個代表向主席團抱怨，“我想在社會主義下工作，在資本主義下生活”，他得到的答復是，“沒問題！成為我們的一員吧”。一個俄羅斯人搬到拉脫維亞，希望他醒來時就身處國外了（這個希望很快就實現了）。另一則流傳的段子是：“一個聰明的俄羅斯猶太人怎么跟一個愚蠢的俄羅斯猶太人說話？從紐約打電話。”

俄羅斯的每況愈下帶給俄羅斯人的恥辱因為來自德國的食物包裹而加劇，尤其是這個國家在二戰中還被蘇聯打敗過。78歲的普拉斯科維亞·費奧多羅芙娜曾作為無線電操作員在戰爭中服役，在收到杜塞爾多夫的一個家庭送來的一個普通紙板箱時，她哭了。里面是一聽可可，三窄條牛奶巧克力，兩大片埃德爾杏仁糖，一包華夫餅干，一公斤鉆石牌面粉，還有幾袋糖和大米。她嗚咽著說：“現在，他們在幫助戰勝國。”[1](#Bi_Zhe_Zai_1990Nian_Yue_14Ri_De)

1990年10月15日，戈爾巴喬夫因緩和東西方緊張局勢和推進東歐自由化進程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在莫斯科排隊的人們表現得漠不關心，有的甚至很憤怒。他們關注的是，在他們的領導人忙著在喧鬧的國際圈里滿足自己的自負時，他們的境況在惡化。蘇聯外交部發言人根納季·格拉斯莫夫告訴記者一個關于總統的尖刻評論，“我們要記住，這個和平獎肯定不是對我們經濟的獎勵”。[2](#Ao_Ke_Lai_Li__O_Clery___Nuo_Bei)

一開始，這兩個對手聯合起來應對危機。蘇聯的指揮系統已經徹底無法發揮作用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同意合作采取緊急方案來弄出一個市場經濟。草擬計劃大綱的任務落在了一個聯合工作組頭上，組里有激進經濟學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他是戈爾巴喬夫的顧問，正在脫發，幽默感十足，常說自己是經濟學上的迭戈·馬拉多納；還有葉利欽的副總理格里戈里·亞夫林斯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終于能進行文明的會面了。8月末，克里姆林宮外連綿不斷地下著雨，他們談了整整五個小時，最終同意一起執行即將出爐的經濟計劃。俄羅斯領導人覺得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平等對待他。他安撫蘇聯總統，宣稱俄羅斯完全單干將意味著蘇聯的毀滅，他已經拋掉了這個想法。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協調沒有持續多久。當沙塔林和亞夫林斯基制定出一個與同年早些時候在波蘭施行的休克治療類似的五百天計劃時，戈爾巴喬夫猶豫了。這個計劃包括一步步放松價格和貨幣控制、撤銷國家津貼和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從1990年10月 1日開始實施。蘇聯領導人在軍隊和工業部門施加的壓力下撤退了，他們擔心失去豐厚的補助金，另外還有來自共產黨強硬分子的壓力，他們覺得如果中央失去向共和國下達命令的權力，這個計劃就等于是在分裂蘇聯。10月中旬，戈爾巴喬夫無法放棄老布爾什維克式的想法，即領導人是最重要的社會策劃者，他是明智的設計者，于是，他將沙塔林的計劃與先前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擬出的改革計劃進行調和。雷日科夫是一個自命不凡的黨組織官員，因經常情緒爆發被稱為“哭泣的布爾什維克”，他提議將大部分的舊系統保持完整，保持克里姆林宮對指定給共和國的所有權利的控制。戈爾巴喬夫考慮了一下，然后決定不對自己的折中解決辦法進行全民公投。[3](#1990Nian_5Yue_30Ri_Zai_Wo_Tai_Hu)

激進改革者們憤怒了。葉利欽感覺被背叛了，他將戈爾巴喬夫的折中辦法稱為混亂計劃，說：“你不能讓刺猬和蛇雜交。”[4](#A_Lun___Bao_Li_Si__Ye_Li_Qin_1)在一次講話中，他威脅道，俄羅斯會自己單獨開展五百天計劃。憤怒的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一個總統委員會緊急會議。葉利欽的威脅和其他共和國效仿他挑釁中央的可能性讓這些人都快歇斯底里了。切爾尼亞耶夫覺得房間里充滿了恐慌和憎恨的情緒。[5](#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7)雷日科夫大喊道，他們都有可能被槍殺或勒死，事情全失控了。戈爾巴喬夫一度離開房間去接見由迪克·切尼帶領的一個美國使團，他馬上轉變成了一個迷人的東道主政治家角色，侃侃而談，而等他們一走，他又開始繼續在走廊里爆發他對葉利欽等人的不滿，“他們都應該被兜頭一頓胖揍”。

葉利欽現在還沒有辦法實施他要單干的威脅。他的各個部門都只有很少的或沒有資源實施任何經濟計劃。他的工業部長維克多·基辛抱怨眼下部里只有一個人，就是部長本人，沒有辦公室，沒有座椅，沒有電話。當葉利欽的官員10月份找莫斯科的高爾基工廠訂購兩輛裝甲豪華轎車時，他的無能為力被暴露無遺。這個訂單被拒了，因為克里姆林宮下達的指示。

這兩個對頭又在克里姆林宮碰面了，但是，這次五個小時的討論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在會面過程中，葉利欽問道：“你為什么右傾得如此嚴重？”戈爾巴喬夫回答道：“因為社會正在右傾。”葉利欽反駁道：“你這樣說就表明你根本不了解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第二天，葉利欽用切爾尼亞耶夫所形容的一貫粗魯無禮的風格將這次談話報告給俄羅斯議會。戈爾巴喬夫跟他的助手們抱怨道，他可能會被迫同葉利欽開戰。

但是，戈爾巴喬夫與蘇聯社會脫節了，葉利欽才是人們支持的對象。11月7日，在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志們在紅場檢閱完紀念十月革命的年度軍事游行后，葉利欽帶著一群反共產主義的人出現，這些人是由激進組織“民主俄羅斯”組織的。他們舉著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畫像，拿著帶有黑色幽默的標語，如“1917年犯下的罪——1990年來受罰”。

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對社會的了解主要來自助手瓦列利·波爾金，他正在密謀推翻他的上司。波爾金是官員中最溫和的，長著國字臉，帶著角質架大框眼鏡，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日記和日程的影響很大。任何想見總統的人都要通過這個獨斷的共產黨官員，他是1981年戈爾巴喬夫從《真理報》的編輯團隊里招募過來的。除了充當戈爾巴喬夫的守門人，他還是共產黨總務處（General Department）處長，這個職位讓他能夠控制在黨中央委員會流通的檔案和文件。甚至戈爾巴喬夫的親密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都到很晚才知道波爾金有一個秘密的情報部門，用切爾尼亞耶夫的話說，這個情報部門就是向戈爾巴喬夫提供“有偏見的假的”負面材料，對戈爾巴喬夫產生不利影響，讓他針對支持改革的朋友們。[6](#Tong_Shang__Di_339Ye)

波爾金后來承認他鄙視戈爾巴喬夫“傲慢的態度和對下屬的輕視”。他從沒有忘記六年前職位被確認時所受的屈辱，當時，他被傳召到米哈伊爾和賴莎·戈爾巴喬夫面前，得知自己達到了他們的期望。作為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官員，波爾金覺得自己被像侍者一樣對待。然而，他成功地把怨恨深深埋起，以致他覺得賴莎都上當了，覺得他是她忠誠的同盟。不久后她就會發現她錯得有多離譜。波爾金在總統的工作人員中間不是很受歡迎，因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巴結奉承。切爾尼亞耶夫從沒有跟波爾金親切地說過話，書記處資深成員奧爾佳·拉尼納也忍受不了他。格拉喬夫認為他癡迷于自己所能運用的權力。波爾金的怪癖之一就是收集裝有皮封面的精裝書，這些都是揭露共濟會復雜陰謀的書，右翼極端分子挺喜歡這些陰謀的。但是，波爾金實踐了他的布爾什維克理念。他拒絕職位附加的額外津貼，如一輛海鷗牌汽車、去專門的診所看病和一棟更大的別墅，因此他鄙視戈爾巴喬夫一家對職位所附加的豐厚福利的偏好。

波爾金向他的上司提供的危言聳聽的情報來源于克格勃首領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一個六十七歲的斯大林崇拜者，一個冒牌的改革者。克留奇科夫個子不高、娃娃臉，被工作人員取了一個昵稱，“小天使”，他是一個陰謀論者，喜歡皇家芝華士酒。在夾克下面穿著羊毛衫的他看起來更像一位大學教授，而不是蘇聯間諜組織的頭腦。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大樓四層一個鑲著橡木的寬敞辦公室里工作，墻上掛著戈爾巴喬夫的肖像，就在那間辦公室里，他制作出一系列聲稱西方情報機構急于破壞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的報告。克留奇科夫的特工們竊聽了主要改革者們的電話，包括葉利欽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而對話記錄通過波爾金到達它們最熱切的讀者戈爾巴喬夫手中。每天，蘇聯總統都會閱讀幾百頁這種關于他最親近同事的秘密匯編的報告。

1990年12月11日，克格勃首領出現在主要的晚間電視新聞上“應總統要求”發出警告，共和國內支持民主的運動是外國貨幣和情報的產物，“我們安全部門已經做出了選擇：我們擁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仿佛又回到過去令人膽寒的黑暗時期。

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震驚了，他覺得克留奇科夫的措辭帶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味道。對帕拉茲琴科而言，似乎主戰分子想要歡迎曾經行差踏錯現在改邪歸正的回頭浪子戈爾巴喬夫回歸。切爾尼亞耶夫很明白他的上司已經到達了改革能力的極限，在面對保守派的攻擊時后退、迷茫。他發現戈爾巴喬夫的傲慢和表現得高人一等讓人覺得悲哀。一天，他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一起在聽戈爾巴喬夫給最高蘇維埃做一個“災難性的”演講的廣播。雅科夫列夫帶些悲痛地自語：“他已經注定要完蛋了，現在我非常確定這一點。”而用俄羅斯記者利昂尼德·尼基京斯基的話說，戈爾巴喬夫因為回首望向黨中央委員會而躊躇，于是，變成了一根鹽柱，無法往前邁進了。

蘇聯領導人突然解散了他的總統委員會，也沒有留住其中相對進步的委員。作為對老同志的一種姿態，他將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留下來作為特別顧問，盡管不讓他參與決策。克留奇科夫和波爾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讓戈爾巴喬夫與雅科夫列夫反目了。他們一起來到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警告這位多疑的總統，那位前加拿大大使實際上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

隨著戈爾巴喬夫變得立場強硬，他解雇了國家電視臺的進步臺長米哈伊爾·涅納謝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跟隨者，然后安插了更加恭順的蘇聯官方新聞機構塔斯通訊社的總負責人利昂尼德·克拉夫琴科來接替。在經歷了四年的政治公開后，電視已經變得大膽而尖銳，戈爾巴喬夫現在將這樣的電視看作對體制的威脅，而不是改革的工具。

克拉夫琴科長著一張娃娃臉，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強硬派，他告訴國家電視臺的編輯人員：“我是總統的人，我來是為了貫徹總統的意志。”戈爾巴喬夫此后每天打好幾次電話指示他什么樣的政治材料適合大眾觀看。他命令克拉夫琴科消除反對派的聲音，尤其是葉利欽的聲音。受歡迎的廣播員弗拉基米爾·波茨納不得不辭職，因為他在美國電視節目《瓊·里弗斯的深夜脫口秀》上說葉利欽比戈爾巴喬夫受歡迎而遭到克拉夫琴科的反對。[7](#Mi_Ci_Kai_Wei_Zi___Qie_Huan_Pin)

下一個走人的是五十二歲的瓦季姆·巴卡金，受尊重的警察局局長。巴卡金既是一位進步改革家，又是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他致力于讓蘇聯內政部警察遵從法律而不是遵從共產黨。他被一個自稱為“聯盟”的共產主義團體憎恨不已。這個團體的領袖是上校助理維克多·阿爾克斯尼斯，在大熱天也穿著黑色的皮夾克趾高氣揚地走來走去，他要求解雇巴卡金，理由是后者對分裂分子的態度不夠強硬。戈爾巴喬夫順從地照辦了，這讓他已經逐漸減少的改革者團隊震驚不已。12月2日，鮑里斯·普戈頂替巴卡金的位置，他是一個說話溫和的拉脫維亞人，正在脫發，只剩下兩側豎著一小簇頭發，看著像小丑一樣。作為克格勃在里加的負責人，普戈無情地限制了拉脫維亞的獨立運動。

12月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始召開，戈爾巴喬夫被大多數保守代表圍困。另一個聯盟領導人尼古拉·彼得盧申科上校的長相肖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的電視喜劇里的比爾科中士，他在休息室里夸口，下一步他們就要擺脫謝瓦爾德納澤，因為是他讓蘇聯失去了東歐。而實際上，對戈爾巴喬夫大失所望的謝瓦爾德納澤已經決定辭職了。

這位白發外交部長在講臺上宣布辭去自己的職務，讓代表們和戈爾巴喬夫感到震驚。他說：“民主主義戰友們，你們太分散了。改革者們都躲起來了。專制正在采取攻勢。”說完這些話，他走出了大廳。

第二天，戈爾巴喬夫提名最沒有效率的政治局委員根納季·亞納耶夫擔任副總統這個新職位，進一步試圖拉攏保守派。頂著大眼袋和一頭不真實的假發，亞納耶夫站在演講臺上以一個特權官員所有的真誠聲明，“我一直到靈魂深處都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即使是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保守派都不想要這個沉迷煙酒的人來當宣傳者。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他們拒絕選他。戈爾巴喬夫生氣地確認了信任投票，在第二輪投票的時候讓他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通過了。

三周后，戈爾巴喬夫任命另一個陰險之人為總理。瓦連金·帕夫洛夫是一個又矮又胖的經濟學家，喜歡戴招搖的絲綢領帶，總是咯咯笑，隱藏起自己對戈爾巴喬夫的憎惡，他將戈爾巴喬夫看做一個兩面人。戈爾巴喬夫后來聲稱，他當時不知道這個被蔑稱為“豪豬”的留著平頭的仇外者是一個酒鬼和死硬派共產主義者。帕夫洛夫幾乎立刻就觸怒了全體人民，他在一夜之間將所有大面額鈔票收回，毀掉了數百萬人的積蓄。他引用克留奇科夫散播的一個古怪陰謀論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即奧地利、瑞典和加拿大的私有銀行打算向蘇聯市場拋售大量鈔票，目的是制造政治混亂。

最后讓戈爾巴喬夫周圍的團隊變得完整的是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陸軍元帥亞佐夫是二戰老兵，身材肥胖，說話潑辣，膚色紅潤，手指胖得像火腿，喜歡英國和俄羅斯詩歌，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過著普通的生活，相信私有財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蘇聯不能繁榮的原因只是官員的能力不足和腐敗。

這群龍蛇混雜、用心險惡的強硬派想要的東西已經萬事俱備了——他們想要血腥鎮壓正在分裂蘇聯的獨立運動。最堅定的獨立運動是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它們是在半個世紀前被斯大林吞并進來的，它們渴望擁有戰前的自由。戈爾巴喬夫永遠理解不了波羅的海諸國的民族主義。他用手做出一個砍頭的動作，表達對這些在蘇聯西側制造麻煩的“分離論者和政治冒險家”的蔑視。

九個月前，在立陶宛的反莫斯科民族前線薩尤迪斯贏得州選后，這個與波蘭接壤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宣布獨立的蘇聯共和國。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議會大樓上的蘇聯國徽被鑿了下來，換上去的是一幅油畫，上面畫著一個執劍的騎士，這就是立陶宛獨立后的國徽。新政府接管了公共建筑，停止將俄語作為一門官方語言。

莫斯科的保守分子震驚了。戈爾巴喬夫本人從來沒想要讓他的改革走到這一步。他警告立陶宛議會服從蘇聯統治，并對其實行經濟封鎖。軍隊在維爾紐斯進行挑釁游行，軍用飛機在整個首都投放傳單，催促俄羅斯和波蘭的少數民族團結起來，支持蘇聯。這些威脅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1991年1月12日，一個神秘的支持蘇聯的“民族拯救委員會”在維爾紐斯宣布它正在取得政權。這個委員會“請求”蘇聯軍隊占領維爾紐斯的電視塔，當時那里正在播放支持獨立的材料。手無寸鐵的立陶宛人民聚集在電視塔外面，害怕它被支持莫斯科的勢力奪取。1月13日早晨，經過反恐訓練的克格勃阿爾法小組抵達這里，并用實彈掃射人群。十三個平民死亡，幾百人受傷。一個克格勃官員被自己人意外射死。戈爾巴喬夫一開始聲援了這個信息不詳的“民族拯救委員會”。他沒有否認克格勃對電視塔外面平民的襲擊，但將一切事情都歸咎到立陶宛宣布獨立上，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發生在夜間的、憲法上所稱的政變”。

在莫斯科，政治公開被暫停了，關于這次屠殺的新聞被禁止發表。中央電視臺只播放了關于維爾紐斯事件的軍方版本。生動的深夜節目《透視》（Vzglyad）被停播了，獨立新聞機構文傳電訊社也噤聲了。塔斯通訊社將電視塔外面的民族主義捍衛者描述成“一群喝醉酒的青年……唱著支持法西斯的歌曲”。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仿佛回到了過去的社會。

葉利欽知道，如果波羅的海諸國的獨立自主可以被鎮壓，俄羅斯的獨立自主也可以被鎮壓，他快速采取行動。他飛到波羅的海三國最北部的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去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那幾個藐視中央的民選總統。在那里，議會被封鎖起來，外面由拿著獵槍的愛沙尼亞青年保衛，葉利欽的威望堅定了這些民族主義者反抗的決心，這讓戈爾巴喬夫大為光火。一個克格勃內線建議葉利欽不要乘飛機返回莫斯科，可能會有陰謀。于是，他先從塔林乘車經過217英里到達列寧格勒（現在的圣彼得堡），再從那兒乘飛機返回莫斯科。

精力充沛的葉利欽告訴擠在白宮一間委員會室的代表們，波羅的海諸國進行的軍事鎮壓只是“反對蘇聯民主政治的有力攻勢的開始，早晚會輪到俄羅斯”。他受到了崇拜他的俄羅斯記者們的稱贊。葉利欽表現得威嚴而有自信，撐著因疲憊而泛紅的雙眼，強烈要求俄羅斯士兵不要向沒有武裝的平民開火，說這樣做在新的俄羅斯憲法下是違法的。他告訴他們，“你們是一場骯臟游戲里的爪牙”。隨后，駐扎在白俄羅斯維帖布斯克的一支傘兵部隊拒絕執行調集到拉脫維亞的命令。葉利欽還宣布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已經決定重新擬定一份新的條約來代替舊蘇聯。葉利欽狡猾地說：“我想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簽訂條約的地點——明斯克，但是還不能告訴你們時間。”

戈爾巴喬夫拿到一份關于葉利欽言論的報告，沖他的顧問們大喊：“這個狗娘養的！我要拿他怎么辦？”他們沉默地聽著，已經被事態的發展驚呆了。切爾尼亞耶夫之后痛苦地寫了一封長達兩千字的辭職信，說他因為發生在立陶宛的事件引起的強烈羞愧而倍感煎熬。他這樣寫道：“你多次告訴我和其他一些人，俄羅斯人民永遠不會放任對帝國的破壞。但現在，葉利欽正在肆無忌憚地做著你說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是以俄羅斯的名義！而且，幾乎沒有俄羅斯人對他的所作所為進行抗議。結果，你將自己束縛在只有依靠武力才能繼續的政策上。”[8](#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8)然而，他沒有將辭職信遞交上去，而是繼續留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因為他沒有看到他的上司有進行血洗的謀劃。他跟外交官們透露，蘇聯的陸軍指揮官瓦連金·瓦連尼科夫是斯大林的崇拜者，是他自主下令軍隊行動的。切爾尼亞耶夫還得出結論，戈爾巴喬夫是真的相信了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提供的誤導性報告，報告稱波羅的海諸國人民被一小撮分裂分子脅迫了。但是，私底下，這位忠誠的助手痛罵戈爾巴喬夫居然允許軍隊派坦克前往，他說：“這是你偉大事業的終結！”戈爾巴喬夫反駁道：“我不能簡簡單單地把自己跟軍隊撇開，士兵和官員們屢屢遭遇攻擊，甚至他們的家人都叫他們占有者和沙文豬之后，我不能只是口頭上反對。”在克里姆林宮外，俄羅斯首都城市里一片騷亂。莫斯科人走上街頭游行抗議他們受夠了。一些人舉著標語牌攻擊總統，上面寫著“駝子戈爾巴喬夫”（Gorbaty, the Hunchback）。非國有媒體對維爾紐斯的殺人事件進行了形象生動的報道。

編輯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服從的是《莫斯科新聞報》中的戈爾巴喬夫方針，在與葉利欽的權力之爭中站在戈爾巴喬夫一邊，他感到深深的失望。這本期刊的三十位主管是自由派的俄羅斯知識界名人，他們表示痛失對總統的信任，宣布他們決定退黨。他們所有人在一篇驚人的社論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篇社論是控訴“這個垂死掙扎在犯罪邊緣的政治制度”。“在維爾紐斯血腥的星期天之后，我們的總統最喜愛的‘人性社會主義’話題還剩下什么呢，‘新思維’和‘我們的歐洲家庭’嗎？——全都是扯淡！”

這個來自他曾經鼓勵和支持過的知識分子的指控在多年后還能激起他的憤慨。盛怒之下，他命令最高蘇維埃延緩實施新近通過的關于新聞自由的法律——這個法律是他推進的，向每個媒體機構派遣一名審查官。即使是保守的代表們，在面對眾怒的情形下也覺得這樣太過火了。

1月20日，星期天，葉利欽給十萬人的抗議集會作演講。他警告道，專制的威脅已經成為一個事實。國際領導人們也心懷類似的恐慌。七天后，蘇聯的黑色貝雷帽軍隊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射殺兩名民兵、一位電視臺攝影師和兩個平民之后，布什總統推遲了原定在2月中旬與戈爾巴喬夫一起舉行的首腦會議。美國、加拿大和歐洲議會都推遲了援助項目的實施。

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也因為自己對血腥的本質反感，戈爾巴喬夫讓步了。他對波羅的海諸國采取了一種更具調解性的語調。1月 22日，他在電視上說道，他被流血事件深深觸動了，宣稱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并否認軍事活動是直接支配的前奏。再遲些時候，戈爾巴喬夫聲稱強硬派的計劃是“跟我建立血債聯系，要我屈從于一個類似于幫派性質的相互保護的社會”。[9](#Ge_Er_Ba_Qiao_Fu_He_Mu_Li_Na_Er_1)

但是，錯已鑄成。更糟糕的是，沒有人因為維爾紐斯的流血事件受到懲罰。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的首席檢察官，尼古拉·特魯賓，宣布蘇聯軍隊無罪，荒誕地裁決所有的傷亡都是立陶宛民族主義者自己造成的。

克里姆林宮內，戈爾巴喬夫還在因為葉利欽“沒有邏輯的”的行為而大動肝火，認為他“癡迷于獨立自主”。他打電話給他在電視臺的手下利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指示他關閉俄羅斯電臺，也就是葉利欽議會的喉舌，它在12月份的時候獲準頻繁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它播出了來自立陶宛的真實報告，據葉利欽的電臺管理者奧列格·波普佐夫所言，這讓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個人感到憤怒。克拉夫琴科抗議道，關閉電臺會引起流言飛語。戈爾巴喬夫堅持至少應該大量限制電臺播放的頻率，讓它被“擱置在無人問津的地方”。

在維爾紐斯之后的幾個星期，克拉夫琴科多次拒絕了葉利欽占用國家電視臺播放時間的請求。他回憶道，葉利欽的每次亮相都讓戈爾巴喬夫瘋狂。“這看起來很幼稚，就像爭奪控制權的小男孩，當然，這都建立在一種本能的害怕上，害怕葉利欽正在群眾中建立會威脅到戈爾巴喬夫的存在的民意。”

戈爾巴喬夫最終屈服于巨大的群眾壓力，同意在2月19日直播一次與葉利欽的訪談。戈爾巴喬夫堅持采訪者之一必須是謝爾蓋·洛馬金，他是賴莎最喜歡的記者，年輕英俊。戈爾巴喬夫讓洛馬金問一系列充滿敵意的問題，結果洛馬金問出的問題更加尖銳。但是，葉利欽成功地在全蘇聯調到這個臺的數百萬觀眾中引起轟動。他要求戈爾巴喬夫立刻辭職，說他“跟群眾撒謊，身上背負著種族紛爭的血債”，并要求將所有權力移交給十五個共和國的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回憶起葉利欽的行為時充滿了反感。他抱怨道：“他的演講充滿了針對我的粗魯的攻擊性言論。他的雙手在顫抖。他明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是在費力讀已經準備好的稿子。”在華盛頓，布什看了關于俄羅斯領導人表現的新聞報告，他跟總統辦公室的助手們說：“這個葉利欽真是個粗野的家伙，不是嗎！”[10](#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2)

不論如何，布什總統和其他西方領導人都希望蘇聯在當前領導人的領導下保持完整。比起變化莫測的葉利欽，他們更愿意與圓滑而容易控制的戈爾巴喬夫打交道。羅伯特·蓋茨，國家安全部代理顧問，也是未來的中情局負責人，以前因為戈爾巴喬夫行事脫離常規而不把他當回事，現在發現他正“一件一件做著我們想要其發生的重要事情”。[11](#Gai_Ci___Bei_Hou_De_Zhen_Xiang)為了辯解，葉利欽抱怨道，美國人無法理解。他們只能看到莫斯科的一個人，而這個人周邊圍繞著太多對外表現出的歡欣，導致他們都無法看到事實。

這年春天，葉利欽第二次去往美國，因為這次他作為俄羅斯共和國領導人的聲望變高了，于是要求白宮出具官方邀請。布什猶豫了，他跟布倫特談論道，這樣的舉措會“把戈爾巴喬夫逼瘋的”。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猜測，也許這正是葉利欽想要這樣做的原因。布什回答道：“那么，這也正是我不想這樣做的原因。”他們同意跟葉利欽見面，但是，是國會而不是白宮官方邀請葉利欽來華盛頓。[12](#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3)

葉利欽呼吁蘇聯總統辭職的要求讓戈爾巴喬夫3月2日的生日宴會氣氛低迷。他在克里姆林宮同亞佐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等人一起慶祝生日。亞佐夫送他一把有嵌套的軍刀，普戈送他有雕刻花紋的馬卡洛夫手槍，而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是直接將貴重的禮物送到他的別墅。克拉夫琴科則安排蘇聯電視臺播放一部吹捧戈爾巴喬夫的紀錄片，叫做《我們的第一位總統》。

戈爾巴喬夫收到的最好的禮物來自葉利欽議會里六名支持他的共產主義代表。他們確保了足夠的票數來要求在3月28日召開一次俄羅斯代表大會的特殊會議，彈劾葉利欽在電視上的行為。戈爾巴喬夫抓住這根救命稻草。他告訴切爾尼亞耶夫，“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完蛋了，他要開始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了，他害怕為他對俄羅斯做過的和沒做過的事情負責任”。

葉利欽加大了賭注，他在3月9日一個大型戶外集會上宣稱要爭奪克里姆林宮的領導權，一周后，他收回這個過激的言論。

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強硬派決定通過展示軍事力量來威脅不安分的平民。當俄羅斯代表大會在3月28日召開會議決定葉利欽的未來時，示威游行被禁止，裝甲車、坦克和幾百輛載滿應征入伍的士兵的運兵車被部署在克里姆林宮外的街道上，首尾相連。克留奇科夫和普戈向戈爾巴喬夫提供荒謬的警告，稱激進民主主義者準備用繩索和鉤錨來攻擊克里姆林宮這座古老的城堡。這些部署只會讓外面街道上親葉利欽的集會變成反戈爾巴喬夫的示威。在克里姆林宮內部，代表們拒絕在被包圍的狀態下進行辯論，經過投票決定休會。當大雪飄飄揚揚落下來將每個人都裹白的時候，數以萬計的示威者正在街上的軍事路障旁橫沖直撞。這次對抗將這個國家帶往內戰的邊緣。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要戈爾巴喬夫想想，只要有一個示威者被殺，整個莫斯科都會出席葬禮，戈爾巴喬夫驚呆了。當葉利欽的合作者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在一次氣氛緊張的克里姆林宮會議上說服戈爾巴喬夫后，這種緊張局勢才有所緩和，他說人們會攀爬克里姆林宮墻的想法簡直是不著邊際。（助手們還相互開玩笑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商店里沒有繩子出售。）總統下令亞佐夫把軍隊撤出莫斯科。

哈斯布拉托夫后來將國家權力出現故障的這一天看做保守派力量開始落敗的日子。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告訴一位前來訪問的美國參議員大衛·博倫，調動武力來對付群眾是戈爾巴喬夫犯的最大的錯誤。

之后三天，俄羅斯代表大會陷入了是否譴責葉利欽的僵局。最終，未被公開稱為“沼澤”的代表們拒絕譴責葉利欽，沒有跟不得民心的戈爾巴喬夫同流。支持葉利欽的煤礦工人的罷工聲勢越來越浩大，他們也被驚嚇到了，這次罷工是因為在一個礦井換班的礦工發現沒有肥皂洗澡引起的。即使是伊萬·波洛茲科夫，共產主義派系的領導人，也在演講臺上發言說，摧毀葉利欽的時機還沒到，因為現在這樣做會引起極度激烈的反應。

戈爾巴喬夫擔心這種集會的勢頭會發展成分裂蘇聯，他在蘇聯全境組織了一次全民公投，來恢復民眾對社會穩定的支持和一個新的聯盟條約。投票針對以下問題來回答“是”或“不是”：你認為有必要將蘇聯作為一個全新的平等自主的共和國聯邦保留下來嗎，在這個聯邦里，任何國籍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保證？（強調的部分同原文）這次公投在3月16日舉行。十五個共和國中有六個已經變得獨立思考到抵制投票的程度，但在剩下的九個共和國中，76%的投票者回答了“是”。戈爾巴喬夫將這個大多數看做一個協商新的聯盟條約的授權，這個條約將會給予共和國一定程度上的獨立自主，但要保持蘇聯的完整，而且他要擔任總統。

葉利欽聰明地將這次全民公投導向了對他有利的方向。他在俄羅斯分發的投票單上添加了一個問題：你是否支持直接選舉俄羅斯總統？投票人給出了肯定的答復。俄羅斯代表大會同意在1991年 6月12日舉行俄羅斯第一次自由總統選舉。

盡管葉利欽在國內的聲勢如日中天，讓他郁悶的是，他發現自己在莫斯科的高調表現并沒有給世界上的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前來俄羅斯調查實情的政要們心中的葉利欽都是一個反復無常、好喝伏特加的暴徒形象。另一方面，從個人來講，他們更喜歡戈爾巴喬夫，因此感覺對他有一種保護欲。當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3月中旬前來拜訪蘇聯總統并調查實情時，葉利欽邀請他前往拜訪，貝克將此行為看作想把“戈爾巴喬夫氣得跳墻”。貝克在與戈爾巴喬夫商議后拒絕了這個邀請，毫無懸念，戈爾巴喬夫又大聲喧鬧了一番，憤怒地抱怨葉利欽有多反復無常，以及他怎樣利用平民主義說詞變成一個獨裁者。戈爾巴喬夫再次展示出幼稚的舉動，他禁止自己的隨從出席貝克在大使館主辦的晚宴，以抗議葉利欽的出席。

缺乏活力的英國外交部長道格拉斯·赫德在莫斯科與葉利欽見面時，討厭這個呆板的、直來直去的叛逆者。他在會議結束后暗示大使布雷斯韋特，這個俄羅斯人是一個幾乎不受控制的危險人物。但布雷斯韋特仍然認為葉利欽的分析是正確的，戈爾巴喬夫到目前為止“幾乎都生活在脫離現實的幻境中”。[13](#Bu_Lei_Si_Wei_Te__Braithwaite)理查德·尼克松在作為一個非正式白宮使節訪問莫斯科時，咒罵媒體留給他關于葉利欽的形象是一個“沒有能力又缺乏忠心的笨蛋”。他在回到美國時這樣跟布什報告：“葉利欽也許沒有戈爾巴喬夫的魅力和他象牙塔式的優雅，盡管如此，他卻能鼓舞民心。”

葉利欽去了法國，他相信在那里他至少能受到歐洲民主的國會議員的尊重。事實卻不盡如人意。《世界報》教訓他，在歐洲，“人們只認識一個俄羅斯人——那就是戈爾巴喬夫”。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受到了冷遇，讓-皮埃爾·科特，這群社會主義者的主席，公開責備葉利欽，認為他反對戈爾巴喬夫就是蠱惑民心、不負責任的政客行為，科特覺得戈爾巴喬夫讓他們更有安全感。這些評論點燃了普通俄羅斯民眾的怒火——甚至《真理報》都覺得這些評論構成了侮辱，只會適得其反地讓葉利欽更得民心。

這個俄羅斯平民主義者回國后，因為西方的反應帶來的“嚴重打擊”而有所節制。但是，有一個驚喜在等著他。戈爾巴喬夫邀請他參加，在所有蘇聯共和國的首腦會議，在蘇聯領導人在那里對他說的話“超出了葉利欽的預期”。

1. [筆者在1990年月14日的筆記。](#1_13)

1. [奧克萊里（O’Clery），“諾貝爾沒有消除戈爾巴喬夫的怒火”（Nobel Doesn’t Dispel Anger with Gorbachev）。](#2_13)

1. [1990年5月30日在渥太華對戈爾巴喬夫的訪談。](#3_12)

1. [阿倫《鮑里斯·葉利欽》，第404頁。](#4_11)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299—300頁。](#5_11)

1. [同上，第339頁。](#6_8)

1. [密茨凱維茲《切換頻道》，第50頁；波茨納（Pozner）《見證人》（Eyewitness），第67頁。](#7_5)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23—324頁。](#8_5)

1. [戈爾巴喬夫和姆利納爾《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132頁。](#9_5)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349頁。](#10_5)

1. [蓋茨《背后的真相》，第528頁。](#11_5)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350頁。](#12_5)

1. [布雷斯韋特（Braithwaite）《莫斯科河對岸》（Across tfie Moscow River），第180頁。](#13_4)

# 第14章 12月25日：晌午

到了1991年12月25日下午三點，戈爾巴喬夫終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一切都塵埃落定。關于他的告別演說也沒什么好準備的了。泰德·科佩爾和里克·卡普蘭被帶進辦公室為他們的ABC紀錄片拍攝更多總統的想法。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和安德烈·格拉喬夫也在那里。

桌上的白色電話響了，戈爾巴喬夫拿起話筒，是他的妻子從總統別墅給他打的電話。這不是什么稀奇事。賴莎一直就有打電話給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官員來參與事件的習慣。但是，這次另有原因。她現在正痛苦不堪。

總統給這兩位美國人一個暗示，示意這是私事。里克·卡普蘭這樣回憶道：“他接到賴莎的電話，然后我們奉命離開房間。”

賴莎正在哭。她無比痛苦地告訴丈夫，葉利欽的一些保安人員已經到了他們的別墅，給他們送了一份通知。他們還命令戈爾巴喬夫一家在兩個小時內騰出他們在列寧山柯西金大街上的總統公寓。這些人說他們的行動是由一道將公寓私有化的政令授權的，政令由俄羅斯總統在當天早上簽署。他們奉命“來將她的個人物品清除出‘政府代表的房屋’”——對總統官方住所的官方說法。這些不速之客已經開始將戈爾巴喬夫家的一些物品從房子里扔出去了。[1](#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1)

戈爾巴喬夫因為葉利欽的保安人員對他妻子的放肆無禮氣得臉色發青。他今晚卸去總統職務是兩天前才決定的事，根本沒有時間準備搬家事宜。更何況，葉利欽已經明確表示在他辭職后再給他寬限三天來騰出鄉村別墅和總統公寓。他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讓克格勃第九局派人來幫忙打包和運送。這個機構已經改名了，現在受葉利欽控制。

之前他還可以依靠弗拉基米爾·雷德科博羅迪上校來保護家人免受打擾，但是，這位上個星期還對兩位總統的安全負責的前克格勃情報官現在只需要對葉利欽負責了。

這種針對賴莎的“懷有極度惡意的行為”讓切爾尼亞耶夫覺得，這是葉利欽想讓戈爾巴喬夫夫婦在這最后一天不好過的粗笨辦法。格拉喬夫也感到很憤怒。“你能想象嗎？他現在仍然是總統啊！”[2](#2009Nian_Qiu_Tian_Dui_Ge_La_Qiao_1)

戈爾巴喬夫先試圖讓賴莎冷靜下來，跟她保證馬上就會把事情解決。隨著戈爾巴喬夫怒火的堆積，他的臉上開始出現一塊塊紅斑。他開始打電話發飆，一邊要求跟負責的保安官員說話，一邊破口大罵。最終，雷德科博羅迪上校接電話了。戈爾巴喬夫沖著電話大喊，滿口臟話：“你做得實在太過分了，你最好馬上給我清理干凈。你現在討論的是別人的家。要我把這些都告訴報社嗎？瞧瞧你們都在干些什么？趕緊給我住手。”

雷德科博羅迪氣勢洶洶地說他保證跟保安人員談談。他一邊責罵下面的人做得太過火，一邊又提到這是上面的命令。葉利欽的保鏢總負責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后來透露這個命令是他的上司直接下達的，讓他每天找戈爾巴喬夫別墅人員的茬，這樣葉利欽就可以馬上搬進去了。科爾扎科夫于是將這項任務視為讓戈爾巴喬夫一家不好過，但發現他們并不急著搬走。

戈爾巴喬夫的發飆有一定的效果。在他與雷德科博羅迪激烈的討論后，獲得了更多時間來騰出別墅。但是，葉利欽的保安人員也到了戈爾巴喬夫一家在列寧山的國有公寓，現在正在翻箱倒柜，亂扔他們的私人財物。戈爾巴喬夫在第二天發現那里一團亂糟，抱怨道：“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我們被迫在24小時內搬到別的住處。我在第二天早上看到那一番凌亂的場景——一堆一堆的衣服、書、盤子、文件夾、報紙、信件，天知道地上還散著什么東西。”

葉利欽既不在乎賴莎的感受，也不在乎戈爾巴喬夫的感受。他認為，賴莎打從一開始就對他不友善，而這也影響了她丈夫對他的態度。葉利欽是最早批評賴莎作為戈爾巴喬夫妻子的高調姿態的一批人之一，他抱怨的是，“很遺憾，她沒有意識到數百萬蘇聯人民是怎樣尖銳而忌妒地看待她在媒體上露面的”。當葉利欽開始將注意力引向戈爾巴喬夫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享有的特權時，他將戈爾巴喬夫對奢侈的偏好怪到賴莎的頭上。他指出，“他喜歡優渥的生活，舒適而奢靡。在這方面，他受到了妻子的影響”。葉利欽曾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面針對賴莎的“干涉”與戈爾巴喬夫對抗。[3](#Ye_Li_Qin___Ge_Ge_Bu_Ru_____Di_1_4)這次莽撞的舉動加深了他們之間的不和。

身材嬌小的賴莎總是穿著精致優雅。作為能向世界展示一副高雅而富有人性化的面貌的蘇聯領導人妻子，賴莎既受到俄羅斯知識界人士和許多普通俄羅斯人的稱贊，也遭到他們的嫉妒。[4](#Fei_Er_Shi_Man__Felshman___Ge_Er)她顛覆了政治局委員妻子的刻板印象——結結巴巴，不善言辭，據說唯一的素質體現在體重超過她們的丈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認為在她像一個學校老師一樣給人們長篇大論的時候，賴莎是“第一個敢于打破妻子必須一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亞洲傳統的女人”。[5](#Jin_Ke_Wei_Qi___Bao_Li_Si__Ye_Li)切爾尼亞耶夫認為她使戈爾巴喬夫一家看上去像是西方的“普通人”。戈爾巴喬夫多年后這樣說，在行程中帶上他受過教育、精力充沛的妻子是經濟改革之外的另一場變革。

在以前，領導人的配偶不是蘇聯生活中的公眾人物，除了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她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政治局成員。葉利欽在助手中間大力鼓吹，賴莎無權同戈爾巴喬夫一起出國訪問，也不應該在國際舞臺上呈現出一副高姿態。當美國大使杰克·馬特洛克問起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是否會攜帶奈娜去美國訪問時，他否認道：“不，絕對不可能！我不會讓她表現得像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一樣！”也許這在一個富有、繁榮、人人心滿意足的社會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們的國家不行，至少現在不行”。多年前，戈爾巴喬夫告訴國家廣播電視臺的湯姆·布羅考，他跟賴莎會談論一切事務，甚至包括最高級別的國事，這在當時引起一片嘩然。葉利欽關注的是，賴莎的影響給戈爾巴喬夫對人民的態度、對人員的任命和對政治整體上造成了負面效果，而且她“待人冷漠，又愛擺架子”。

賴莎對國家事務感興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批評都是在私下里傳播的，但是，在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一位來自哈爾科夫的代表曾在講臺上告訴盛怒的戈爾巴喬夫他無法擺脫妻子的“報復心和影響”。有一次，她自己負責向《文學報》的編輯費德羅·布爾拉茨基解釋，她認為人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市場。戈爾巴喬夫的妻子在蘇聯的最后幾個月還涉足政治事務。國會發言人伊萬·拉布季耶夫向羅德里克·布雷斯韋特抱怨道，他接到賴莎的電話，她一直說了四十五分鐘才掛電話，讓這位英國大使覺得戈爾巴喬夫在家里根本說不上話。[6](#Bu_Lei_Si_Wei_Te___Mo_Si_Ke_He_D)

在那些被傳統束縛的克里姆林宮官員的妻子們看來，賴莎是相當冷漠的，而在賴莎看來，她們“都傲慢、多疑、諂媚而笨拙”。科爾扎科夫在他和盤托出的回憶錄中聲稱，賴莎曾在普列漢諾夫將軍的下屬面前命令這位克格勃保安部門的負責人，也是后來八月政變參與者之一，給她搬一根很沉的青銅燈桿。“當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我就想，也許這就是他為什么背叛戈爾巴喬夫的原因。”

而形成對比的是，葉利欽夸口他從不與家人談論工作。如果妻子和女兒們在他工作回家后狂轟濫炸地問他這一天發生的事情，他會讓她們噤聲，說“我在家里不需要政治”。奈娜在一次給國際新聞通訊社的評論中也回應了葉利欽的說法：“他不喜歡有人在家里談論政治或經濟話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忍住不給他提建議的原因，雖然我們也確實很關心這個國家的局勢，也希望事情能快速好轉。”如果她說了他不喜歡的觀點，葉利欽就會取笑他作為合格的環境衛生工程師的妻子說：“你只要管好你的抽水馬桶什么的就行了！”她則會反駁道：“沒有抽水馬桶，你要去哪兒解決？”[7](#Jin_Ke_Wei_Qi___Bao_Li_Si__Ye_Li_1)

跟賴莎相關的新奇新聞給蘇聯媒體制造了一個麻煩。1989年至 1990年擔任蘇聯電視臺負責人的自由派米哈伊爾·涅納謝夫說，她在參加一個節目的時候會破壞所有人的心情。他覺得她有病態的野心，對不得不播出她的演講心懷不滿，她的演講跟大多數領導人配偶的演講一樣空陳乏味。如果他把演講縮短了，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就會讓他不好過。賴莎最喜歡的記者謝爾蓋·洛馬金認為她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將她在國外遇到的音樂家和醫生招募到俄羅斯。但是，從一開始，葉戈爾·利加喬夫就提醒戈爾巴喬夫，她在電視上的過分曝光可能帶來負面效果；甚至連唯命是從、接任涅納謝夫的克拉夫琴科都告訴戈爾巴喬夫，她在電視上出現得越少越好。當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抗議道，別的世界領導人都帶著妻子隨行，克留奇科夫的回答是，他們的妻子可不會在電視上發表聲明。[8](#Mi_Ci_Kai_Wei_Zi___Qie_Huan_Pin_1)

戈爾巴喬夫從一開始就清楚，一些人看到賴莎出現在他身邊時有一些不好的評價，例如，“她以為她是誰，政治局委員嗎？”但不論如何，他既將她作為一個親密伴侶來珍惜，也將她珍視為國際訪問中相當大的一筆政治財富。在他最初的幾次出國訪問中，有一次是給巴黎的法國立法委員們作演講，他的視線時不時掠過待在觀眾中間的賴莎，《巴黎競賽》將之描述成“一眼溫柔”。1984年，賴莎在倫敦出盡風頭，她穿著一條時髦的白色綢緞禮裙和一雙帶鏈帶的金色薄片涼鞋出席一次晚宴，并跟英國部長們滔滔不絕地談論英國文學。在華盛頓，她與華盛頓社會名流聚集的帕米拉·哈里森的杰出女性們討論世界大事。英國的《婦女界》雜志將她評選為1987年的“年度女性之星”。

大眾難免對她的知名度感到憤怒。忍受著艱苦生活、無法得到高級女裝的俄羅斯女性和在《治家格言》（Domostroi）的國內傳統下培養出來的俄羅斯男性都不喜歡她，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統治時期，規定男人占支配地位，而女人處于服從地位。她的優雅提醒人們特殊商店的存在，那里的時髦衣服都是普通公民無法得到的。她成了層出不窮的流言飛語的主角。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抱怨道，在他們還不知道什么是美國運通卡（American Expresscard）的時候，有人傳言賴莎拿著一張美國運通卡購物；她的衣服全都是由莫斯科的女裁縫塔瑪拉·瑪吉娃制作的，但傳言她在時尚上花費大量的金錢來跟南希·里根攀比。尤其讓他憤怒的是葉利欽到處傳播的“謊言”，說他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他和賴莎可以享用一張金卡。“讀這些胡言亂語都覺得丟臉。”[9](#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4)

上面提到的關于賴莎用美國運通卡的故事起源于西方媒體。1988年6月6日，《時代》雜志報道，在四年前去倫敦時，賴莎稱贊過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鉆石耳環，于是，她“走進新邦德街上的一家卡地亞店，給自己也買了一副（1780美元），付賬用的是美國運通卡”。《時代》雜志還聲稱她有四件皮毛大衣，在華盛頓一天就換了三件；雜志還做了一個不太可能的陳述，說戈爾巴喬夫曾被人聽見在抱怨，“那個女人不僅花了我一堆錢，還給我帶來一堆麻煩”。

賴莎對俄羅斯和國外關于她的許多文章深有反感，在文章中，“根本沒有準確性可言，編造、虛構甚至是誹謗中傷成了文章的主要內容……如果不是我的名字在文章中出現，我絕不會相信他們是在寫我”。戈爾巴喬夫責備這些所謂的西方“心理福利中心”想要動搖他的地位，并指責俄羅斯的這幫“政治烏合之眾”想要通過開展對賴莎的含沙射影來動搖他的改革。

賴莎和里根總統的妻子南希·里根之間的冷戰也是美國媒體炒作的熱點。南希這位前女演員發現賴莎這位馬列主義女士難以相處。“她停不住嘴，動輒長篇大論，為的是更加準確無誤。”當賴莎“打個響指招來她的克格勃警衛”給她搬一把特殊的椅子時，南希驚呆了。“我不敢相信。我見過很多第一夫人、公主和女王，但我從沒見過像她這么夸張的。”[10](#Kai_Li__Kelly___Nan_Xi__Li_Gen)

賴莎跟芭芭拉·布什的關系要緩和得多，雖然布什難以欣賞她那一板一眼的幽默。在華盛頓蘇聯大使館的一次晚宴上，他們在觀看一個超重又不漂亮的俄羅斯歌劇演唱家表演時，布什總統跟賴莎開玩笑說：“我覺得我愛上她了。”賴莎責備他：“你最好不要。不要忘了蓋里·哈特！”布什推測她知道關于前任參議員兼總統候選人的丑聞，并且她說這話不是在開玩笑。[11](#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從蘇聯大使館方面得知賴莎想要跟演藝界的明星見面，布什邀請了簡·方達、范·克萊本、小道格拉斯·費爾班克、迪茲·吉萊斯皮等名人到白宮參加午宴。

賴莎成為第一個參與慈善事業的蘇聯領導人的妻子，這又是一個突破。特別是，她在1990年從丈夫的版稅里拿出十萬美元來改善俄羅斯兒童白血病的治療，她還是莫斯科一家兒童醫院的積極贊助人。但是，對她的私人生活，她總是閉口不談，對負面新聞報道也莊重地保持沉默。她告訴自己的家庭好友格奧爾吉·普里亞欣：“為什么我要談我自己呢？”格奧爾吉參與錄制了一系列與賴莎的對話，來完成一本叫做《我希望》的短篇情感書籍。“我不是電影明星、作家、藝術家、音樂家或時尚設計師。我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只是蘇聯國家元首的妻子，盡我所能支持我的丈夫，幫助他，就像我們自年輕時將彼此的人生緊密聯系到一起之后就一直所做的一樣。”[12](#Ge_Er_Ba_Qiao_Wa___Wo_Xi_Wang_1)

這本書剛出版不久，也毫無疑問引起了俄羅斯總統的注意，這就從某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在賴莎的丈夫即將辭職的時候葉利欽會對她采取惡劣的行動。在書中，賴莎雖然沒有說出葉利欽的名字，但她挑出葉利欽和他的隨從們，特別表示對他們不屑一顧。這群三十年來詮釋了“軍營式共產主義”價值、負責建設社會的黨員宣布，“他們將會愉快地毀掉整個社會，并且馬上就要開始行動”。她是在痛斥一些同志太過輕易就改變自己的立場，“昨天精力旺盛宣揚無神論的人今天就對著基督教教義宣誓了”。[13](#Tong_Shang__Di_180Ye)

瓦列利·波爾金后來將賴莎描述成一個堅強、嚴厲、習慣支配別人、難以取悅的專橫女人，會對為她工作的人話中帶刺，進行羞辱性的訓誡。據波爾金看來，賴莎無權通過電話來給總書記的助手們或一些政府官員下命令。然而，波爾金有時又似乎很享受賴莎的陪伴，他講述道，在禁酒活動的高潮階段，他們在一趟國際航班上分享偷偷摸摸品嘗紅酒的樂趣。但他又寫道，在同一趟航班上，在賴莎試圖命令戈爾巴喬夫的本該對黨忠誠的助手向她們夫婦宣誓效忠時，他退避開了。

在幫助賴莎編輯英文版《我希望》的總統翻譯官帕維爾·帕拉茲琴科看來，她絕不是她經常在電視上所展示出的冷淡、說教型的女性，她是一個可靠的人。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能夠更經常地聽取賴莎的意見，會獲益更多；他覺得賴莎體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為將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配偶樹立了先例。

在戈爾巴喬夫和賴莎作為蘇聯第一夫婦的最后一天，葉利欽對待賴莎的方式讓戈爾巴喬夫感到悲痛，而這份悲痛在知道一個他們向外界隱瞞的事實——賴莎已經到崩潰邊緣了——之后更加深切了。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戲劇性情節“根本不是她能夠承受的”。他最后承認她是一個容易受傷的人。“她很堅強，但她不得不承受許多。”[14](#Dao_Ge_Li__Dougary___Mi_Ha_Yi_Er)直到二十年后，戈爾巴喬夫才透露當時賴莎病得有多厲害。他告訴《新報》，在八月政變后，“她發生大面積痙攣，更確切地說是微中風。然后，她的雙眼大出血，視力急劇下降。但令人難以置信的壓力仍持續著”。[15](#Mu_La_Tuo_Fu__Muratov___Mi_Ha_Yi)

戈爾巴喬夫給賴莎撥回去，向她保證今天沒人會再闖進他們的別墅了。在放下話筒后，他的臉還在因為憤怒而漲紅著，他跟同事悲嘆道：“多丟人啊！你能想象嗎，這是一個家庭住了七年的生活空間啊。我們的書哪怕沒有幾千本也有幾百本。我們得花時間來整理啊。”他對葉利欽周圍的人除了鄙視沒什么其他看法了，他對那些譴責共產主義者特權體系而現在自己又“像在豬槽爭食的豬”一樣推推搡搡的人也盡是鄙夷。

在他下臺之前就下達的房屋收回命令讓戈爾巴喬夫看清了，他也不能指望葉利欽會履行他們兩天前協商的過渡條款里的承諾。在今天結束前，他還得準備好迎接更多的羞辱。

從“那些混蛋”的行為引起的憤怒中平靜下來，并將注意力轉移到他在三個半小時后的告別演說上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平靜下來后，戈爾巴喬夫轉向格拉喬夫說道：“安德烈，你知道嗎，他們這樣行事讓我確定自己是正確的。”[16](#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2)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86—187頁。](#1_14)

1. [2009年秋天對格拉喬夫的訪談。](#2_14)

1. [葉利欽《格格不入》，第134頁。](#3_13)

1. [費爾什曼（Felshman）《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蘇聯帝國最后的時光》（Gorbachev, Yeltin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第 189—206 頁中分析了賴莎所扮演的角色。](#4_12)

1. [津科維奇《鮑里斯·葉利欽》，第294頁。](#5_12)

1. [布雷斯韋特《莫斯科河對岸》，第254頁。](#6_9)

1. [津科維奇《鮑里斯·葉利欽》，第58頁。](#7_6)

1. [密茨凱維茲《切換頻道》，第44頁。](#8_6)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208頁。](#9_6)

1. [凱利（Kelly）《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第400—403、443—446頁。](#10_6)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6頁。](#11_6)

1. [戈爾巴喬娃《我希望》，第7頁9](#12_6)

1. [同上，第180頁。](#13_5)

1. [道格利（Dougary），“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4_1)

1. [穆拉托夫（Muratov），“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5_1)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87頁。](#16_1)

# 第15章 “劫持”芭芭拉·布什

在1991年1月波羅的海諸國的混亂之后，戈爾巴喬夫意識到如果他還想有任何拯救蘇聯的可能性的話，就不得不跟共和國妥協。武力是起不了作用的。它只會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也違背他的本性，并威脅到他作為一個民主改革家的傳統——更不用說這會將他正嘗試獲取用來重建經濟的幾十億美元國際貸款拒之門外。

因此，他邀請葉利欽和其他十四個共和國的領導人于4月23日與他在新奧加列沃別墅碰面，新奧加列沃是一座建在莫斯科河岸高地上松樹林里的莊園，包括好幾棟精致的建筑。會面的目的是討論成立一個將更多權力移交給共和國的未來聯盟。九個共和國領導人接受了他的邀請，其中包括葉利欽。

這個“九加一”組合——九個共和國領導人加上戈爾巴喬夫——聚集在一棟具有十九世紀建筑風格的會賓樓的一個二層房間里。戈爾巴喬夫坐在長桌的一端，前面放著四個細長的麥克風來擴音。在戈爾巴喬夫后面是懸掛在十二英尺高的平臺上的蘇聯國旗，他背后墻上齊肩高的地方掛著的畫像中，滿面胡須的卡爾·馬克思觀察著會議的進程。蘇聯總統是帶著調解的心態來開會的。他說他已經準備好簽署一份給予共和國真正獨立自主的聯邦協議草案，然后，在新的蘇聯憲法被采納后，他將解散人民代表大會，并針對蘇聯總統的職位進行直接選舉。

現在處于做出讓步而不是請求讓步的位置，葉利欽以同樣的方法做出回應，放棄了他堅持俄羅斯完全獨立自主的想法——不管怎樣，這個想法目前也是無法實現的。在經過一天的討論后，戈爾巴喬夫口述了一份聲明，在座的九位共和國總統注意到他們都準備好一起合作達成一份新的聯邦協議，便簽署了這份聲明。他們散會后一起共進晚餐，為一個新的開始干杯。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出現了一線希望”。在這次漫長的會議之后，葉利欽感覺“既熱情又興奮”。

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重新出現的客氣并沒有延伸到新奧加列沃別墅的休息室和草坪之外。葉利欽的政治野心猛增。不出所料，葉利欽宣布他將參加俄羅斯共和國具有突破性的總統競選，在戈爾巴喬夫發動的全民公投之后，他馬上就獲得了總統選舉的授權。戈爾巴喬夫宣稱保持中立，但又采取措施破壞他成功的機會。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奧列格·謝寧聲稱，經常認為葉利欽“精神失常”的戈爾巴喬夫多次給他一項任務，要他查找關于葉利欽健康狀況的文件。在競選期間，克格勃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葉利欽與他的保安負責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在莫斯科一家網球俱樂部的談話記錄。俱樂部里可愛的女服務員堅持請他們到自己的辦公室享用賽后點心，確保他們逗留在那里安裝的克格勃竊聽器范圍之內。

葉利欽意識到如果無法接觸到電視的話，相對于擁有戈爾巴喬夫的克里姆林宮支持的一位候選人，他就處于劣勢。在所有的共和國中，俄羅斯是唯一擁有自己的電視頻道的共和國。在那個年代，蘇聯電視有兩個臺，1臺播放新聞和重大事件，2臺播放運動、文化和教育節目。兩個臺都是在蘇聯全境播出的。競選開始后，俄羅斯議會給克留奇科夫施加壓力，讓他將2臺的控制權移交給俄羅斯。這位電視臺負責人第一次在沒有與戈爾巴喬夫協商的情況下讓步了。蘇聯總統暴怒，沖克留奇科夫大發了一頓脾氣：“你怎么敢這樣幫我的對手！”[1](#Mi_Ci_Kai_Wei_Zi___Qie_Huan_Pin_2)

戈爾巴喬夫正確地認識到，一個俄羅斯頻道不僅會幫到葉利欽，還會成為反對他自己的宣傳工具。1991年5月13日，俄羅斯頻道在新主人手下開始播放快節奏的新聞和諷刺幽默短劇，其中有一個老女人唱的歌詞里有“戈爾巴喬夫先禁了伏特加。現在，他正在禁食物”。[2](#Xiang_En__Shane___Jie_San_De_Wu)

在6月選舉之前，葉利欽選擇亞歷山大·魯茨科伊作為競選搭檔，他是一個前戰斗機飛行員，也是阿富汗戰爭中的英雄，在葉利欽眼中，他是一個真正的虎狼之徒，他的大男子氣概能讓中年主婦神魂顛倒。葉利欽對這位副手唯一不滿意的地方是他無時無刻不在說臟話，這點讓他感到很厭惡。這位愛喝純酒的粗鄙之人受不了別人的壞習慣。葉利欽還嫌惡抽煙，他會將煙從坐在他旁邊抽煙的人手上抽走掐滅——有一次他掐的是德國總理科爾的妻子漢內洛蕾·科爾的煙。[3](#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298)

他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尼古拉·雷日科夫，但這位毫無幽默感的官僚主義者只有一堆失敗的經濟改革記錄。葉利欽競選活動的沸騰氣氛體現在一則關于一個軍用飛機飛行員的段子中，飛行員說：“請上飛機，未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回答：“謝謝，未來的將軍！”

憑借關于在一個更加獨立自主的俄羅斯進行徹底的經濟變革和私有化的立場，葉利欽毫不費力地贏得了選舉。他獲得了4600萬張選票，而雷日科夫只獲得了1300萬張，另外還有一名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獲得了600萬選票。而戈爾巴喬夫屬意的競選者瓦季姆·巴卡金只獲得了不到300萬的選票。葉利欽認為，他之所以獲勝是因為其他候選人代表的都是失敗的舊秩序，而他體現的是一個還未誕生但每個人迫不及待想見到的國家。他還表明，支持其他共和國擁有更大自由的同時，也成為一個俄羅斯愛國主義者，是有可能的。他們共同的敵人是代表著蘇聯帝國主義的中央。而在這個中央的中心，就是戈爾巴喬夫。

千年俄羅斯的第一任自由選舉上任的領導人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總統的就職典禮于1991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宮國會大廈一個巨大的雙頭鷹復制品下面舉行。這個盛大的儀式是為了引起人們對革命前俄羅斯的特色和壯觀的回憶，也是為了增加人們對葉利欽的信任和他的政治正統性。當繪有錘子、鐮刀和藍色條紋的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紅色國旗飄揚在大樓上面蔚藍的天空時，戈爾巴喬夫總統正在現場。葉利欽一現身，嘹亮的喇叭聲響起，斯巴斯克塔的鐘聲奏響的是國歌。葉利欽原來想要一個二十四管槍的鳴槍致敬，以及一塊在紅場上的巨大屏幕來向大眾直播現場情況，但仍是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戈爾巴喬夫反駁說這是不得當的。莫斯科和全俄羅斯的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穿戴綴著珠寶的華麗披風和頭冠在葉利欽身上畫了一個十字符，這是自從沙皇俄國以來第一個東正教教堂為俄羅斯領導人祈禱的場合。全體合唱隊演奏格林卡《為沙皇獻身》（A Life for the Tsar）中的“榮耀”副歌部分。

葉利欽發表宣言：“偉大的俄羅斯正在站起來。我們應該確實將她改變成一個繁榮、法治、民主、和平的獨立自主的國家。”在電視臺的鏡頭前，戈爾巴喬夫伸出手與葉利欽握手。這位新俄羅斯總統故意往回退，逼得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走向他。

在儀式之后，戈爾巴喬夫為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指定了一個象征性的辦公室，位于14號樓。這棟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建立的，原址是一座女修道院和一座小宮殿。這里離高級得多的擁有兩百年歷史的一號樓參議院大樓，也就是戈爾巴喬夫自己的總統辦公室套房所在地，只有投擲一顆卵石的距離，中間穿過一個窄院就到了。戈爾巴喬夫開玩笑說，有兩頭熊住在一個洞穴里。[4](#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3)他說這話的時候以為他們的協議會持續下去。

十天后，葉利欽利用當選總統的權力采取了一個大膽的舉動。他剝奪了所有政黨——其實也只有一個——在俄羅斯領土內的農場、工廠、大學、軍事單位和國家機構中的基層組織內的權利。莫斯科共產黨的第一書記尤里·普羅科菲耶夫慌慌忙忙地沖進戈爾巴喬夫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要求他發布一道政令撤銷葉利欽的命令。戈爾巴喬夫拒絕了，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避免出現沖突，破壞關于新聯盟協議的談判結果。葉利欽的這一手筆讓支配了俄羅斯工作場所大半個世紀的共產黨不再發揮作用。隨后，莫斯科選舉出一個激進的國會代表加夫里爾·波波夫作為市長，像葉利欽以前那樣由一個共產黨官員管理一座城市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注意到所發生的事情，戈爾巴喬夫的教條主義助手瓦列利·波爾金總結道，戈爾巴喬夫讓葉利欽得手的行為就是像懦夫一樣放棄和背叛他仍擔任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事實上，由列寧創建的這個單一而龐大的體系是一股正在急劇衰落的政治力量。前一年因為辭職造成的黨員流失有四分之一，政治局委員幾周才見一次面，自從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總統并選擇從克里姆林宮辦公室通過總統令來管理國家起，政治局就不再是一個統治機構了。

出現一個削弱蘇聯的新聯盟協議，這種可能性讓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復仇者們陷入了恐慌。他們正在失去權力的邊緣。有人擔心戈爾巴喬夫會在1991年秋天計劃召開共產黨代表大會，創造一個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6月17日，戈爾巴喬夫在新奧加列沃別墅，葉利欽因為身在華盛頓而缺席，一小群不忠于戈爾巴喬夫的部長開始采取行動扭轉趨勢。總理瓦連金·帕夫洛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提出一項決議，將戈爾巴喬夫的許多權力轉移到自己手中，據說是為了應對危急的經濟狀況。他要求獲得強行限制罷工、節約食物和停止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權限。

議會震驚于他的膽大妄為，召開了一次簡短的秘密會議。在緊閉的門后，克格勃首領克留奇科夫警告代表們，安插在克里姆林宮內部并得到哈佛經濟學家幫助的西方情報特工們正在密謀破壞蘇聯的穩定。于是，在這樣的憂慮中，代表們繼續在接下來四天的公開會議中進行辯論，氣氛越來越危急。戈爾巴喬夫始終沒露面，也沒有指派任何人來抵制這個對他權威的威脅。

在6月20日，也就是第三天辯論的中午，波波夫市長出現在美國大使館，要求與大使杰克·馬特洛克進行緊急會談。在大使館圖書館內，這位留著一頭有特色的亂蓬蓬的白發和粗硬胡須的前經濟學教授把手指豎在嘴唇前，用俄語在馬特洛克的螺旋筆記本上亂涂了一句話：“有人正在組織政變免除戈爾巴喬夫的職務。我們必須將這個消息傳達給在華盛頓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馬特洛克將筆記本拿過來，也用俄語潦草地寫道：“誰是幕后主使？”波波夫寫道：“帕甫洛夫、克留奇科夫、亞佐夫、盧基揚諾夫。”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是最高蘇維埃狡猾的發言人，也是戈爾巴喬夫從大學到現在的朋友。[5](#Ma_Te_Luo_Ke___Su_Lian_Jie_Ti_Qi)

馬特洛克將波波夫的消息傳遞給華盛頓，用的是一個叫做STU-3的安全電話系統。布什總統下達指示，讓他私下警告戈爾巴喬夫，但不要提到信息來源。晚上八點，這位大使來到克里姆林宮。他發現戈爾巴喬夫單獨和切爾尼亞耶夫在一起，心情不錯。他們坐在他辦公室的長桌邊上。當馬特洛克給戈爾巴喬夫預警時，他輕笑出聲。他說：“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們明天就見分曉了。”馬特洛克離開后，戈爾巴喬夫甚至還取笑這位容易上當受騙的美國人，但聽到切爾尼亞耶夫貌似隨意地提到他得到傳言說莫斯科外面的軍隊有異動時，戈爾巴喬夫笑不出來了。

波波夫的消息送達時，在美國訪問的葉利欽作為當選的俄羅斯總統正在玫瑰園接受款待，盡管有些美國人仍然對他嗤之以鼻。布什在致歡迎詞時，贊賞地提到戈爾巴喬夫的次數比提到他的客人的次數還要多。在白宮總統辦公室，布什告訴葉利欽關于波波夫的預警。他欣然接受葉利欽提出的想法，應該致電戈爾巴喬夫以加強事件緊急性。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茨被這樣一幅場景驚到了：“美國和俄羅斯的總統從美國白宮致電蘇聯總統，提醒他可能有一場政變發生”。[6](#Gai_Ci___Bei_Hou_De_Zhen_Xiang_1)

布什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時，一不小心就說出了波波夫是信息來源——更糟糕的是，他打電話用的是一條已經知道被克格勃監控的線路。馬特洛克在聽到布什的話后暴怒。他將這種粗心的親近看做衡量布什對戈爾巴喬夫著迷程度的標尺。[7](#Ma_Te_Luo_Ke___Su_Lian_Jie_Ti_Qi_1)

離開白宮后，葉利欽刻薄地評論布什多么熱切地想要跟戈爾巴喬夫通電話，就像他中了名為戈爾巴喬夫的咒，就像是受歡迎的俄羅斯信仰療法治療師阿納托利·卡什皮羅夫斯基的一個擁護者。

戈爾巴喬夫沒有感謝波波夫提供信息，也沒有問他來源和情報的可靠性，這位蘇聯領導人在與莫斯科市長接下來的會面中，憤怒地用手指著他問：“你為什么要跟美國人搬弄是非？”

戈爾巴喬夫在第二天以一場持久而猛烈的抨擊再次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最高蘇維埃，要求結束他稱之為總理帕甫洛夫不負責任的行為引起的“重大丑聞”。戈爾巴喬夫慷慨激昂地鼓動畏畏縮縮的代表們之后，帕甫洛夫的決議被擱置了。蘇聯總統咧著嘴告訴記者：“暴動結束了！”令人驚訝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解雇這位喜歌劇般的總理，正如在手染鮮血的克格勃首領和內政部、國防部部長們欺騙他關于維爾紐斯事件后，他沒有將他們解雇一樣，盡管他在私下里將他們痛斥為“惡棍和混蛋”。

在之后的一次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強硬派共產主義者因為戈爾巴喬夫不能充分處理共產黨權力危機對其大發脾氣。戈爾巴喬夫說：“那好，我退出。”他說完走了出去。三百名成員中有七十二位，其中包括安德烈·格拉喬夫，簽署了一份聲明，宣稱他們也會離開黨的行列。這是戈爾巴喬夫的一個策略，并且起作用了。強硬派挑釁者們撤銷了控訴。戈爾巴喬夫回來了。切爾尼亞耶夫高興地發現，希望回到共產主義的、最犀利地批評戈爾巴喬夫的人中，那些沒膽的小白兔“嚇得尿了褲子”，求戈爾巴喬夫留下來繼續擔任共產黨領導人。斯大林主義者受到了限制。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他們就失去了對總統的任何控制，而作為總統的戈爾巴喬夫可以要求國家機構的忠誠。然而，想要緊密牽制敵人的戈爾巴喬夫錯過了一次機會，將自己從一個徹底失信的思想體系中回轉。這讓他更加不受改革者們的歡迎。[8](#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9)

今年夏天，在一次對波修瓦劇院的視察中，安德烈·薩哈羅夫的遺孀葉琳娜·波納站在舞臺上批評戈爾巴喬夫在鎮壓波羅的海諸國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后，總統憤怒地對切爾尼亞耶夫說道：“他們慶祝薩哈羅夫留下的傳統，但他們又對我表現出厭惡、憤怒和報復。誰能跟這些人打交道？他們已經忘了是誰釋放了薩哈羅夫。”[9](#Tong_Shang__Di_365__366Ye)

同時，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與共和國領導人就一個新的聯盟協議在新奧加列沃莊園開了幾次會進行協商。葉利欽通常都會最后一個出現，彰顯自己的重要性，他的保鏢特工兼司機會確保豪華車停在入口處一排車的排頭——有一次，為了停在那個位置還從草坪上軋了過去，把園丁惹急了。一般是戈爾巴喬夫在每次會議開始時致開場白，邀請發言，然后，共和國領導人像小學生一樣將視線移開，等著看葉利欽怎么反應。戈爾巴喬夫懇切得令人尷尬，而葉利欽則越來越蠻橫。有一次，這位俄羅斯總統毫不客氣地告訴戈爾巴喬夫可以繼續講話了。波爾金是這樣描述的，戈爾巴喬夫“用他那雙大大的濕漉漉的棕色眼睛滿含歉意地望著這個反抗者”。另外一次，戈爾巴喬夫說，如果中央的征稅權不能得到保持，“我還是回家好了”。葉利欽的回答是，“別逼我們在撇開你的情況下做決定”。[10](#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6)在漫長的沉默之后，戈爾巴喬夫提出中場休息，這件事情就被擱置了。

一個新的蘇聯體系產生了。中央將保留外交政策、國防和大多數財政權力，各共和國則自行管理，控制自己的資源和國家安全。共和國的名稱里也不再有“蘇維埃”或“社會主義”。但是，戈爾巴喬夫堅持聯邦稅收。沒有了這個，也就談不上什么國家了。

在經過一次長達12個小時，持續到7月29日凌晨兩點的會議后，意見最終達成一致。在8月20日簽署的新聯盟協議即將取代 1922年創建了蘇聯的協議。在新協議下，共和國在將來能夠獨立控制自己的政治體系，并有權經過談判脫離聯邦。

但在新協議的核心有一個可能摧毀蘇聯的病毒。戈爾巴喬夫在稅收問題上做出了讓步。他同意為中央機構提供資金的稅收的水準“將通過與共和國協商”來確定。這就意味著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對聯邦稅收有否決權。西方領導人警告過戈爾巴喬夫不要在稅收上妥協。歐洲經濟共同體主席雅克·戴洛對他直言，他只有堅持聯邦稅收來支撐一支單一武裝力量才有可能贏得斗爭。[11](#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_2)

在經濟學家葉戈爾·蓋達爾看來，戈爾巴喬夫在這方面的妥協就預示著蘇聯開始分裂。“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個分解帝國的決定，雖然初衷是將蘇聯轉變成一個松散聯盟……它結束了蘇聯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歷史。”[12](#Gai_Da_Er___Di_Guo_De_Beng_Kui)

凌晨三點三十分，其他共和國總統離開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蘇聯第二大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一起留下來，哈薩克斯坦總統對聯盟的延續表示強烈支持。三人開始討論在新協議開始生效后，他們會做些什么。葉利欽突然停下不說話了。戈爾巴喬夫問：“怎么了，鮑里斯？”葉利欽給了個手勢，示意他們應該退到陽臺上去。他有種被克格勃監聽的感覺。

坐在藤條椅上，他們在冷得異常的空氣中繼續討論。葉利欽說他將提名戈爾巴喬夫擔任這個由獨立國家構成的新聯盟的選舉總統。但是，戈爾巴喬夫必須在共和國簽署成立新中央前擺脫他在內閣中“令人討厭的隨從”——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政部長普戈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強硬派。戈爾巴喬夫的答復是，“我們將剔除克留奇科夫和普戈”。他會放棄不受歡迎的首相帕甫洛夫，納扎爾巴耶夫可以頂替他的位置。他還會擺脫平庸的副總統亞納耶夫。

直到很久后，他們才從波爾金保險箱里的克格勃電話記錄中發現，戈爾巴喬夫的克格勃保安負責人梅德韋杰夫將軍安放在陽臺上的竊聽器將談話的每個字都記錄了下來。克留奇科夫——盡管他后來否認——將戈爾巴喬夫本人都置于嚴密監視之下。關于蘇聯總統最私人的對話記錄復本被保存在編號為110的克格勃卷宗里。賴莎也是被監控的，她的卷宗編號是111。甚至連賴莎經常去的美發沙龍都裝了一個竊聽器。[13](#An_De_Lu__Andrew_He_Mi_Te_Luo_Xi)

盡管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協商相當文明，但他們仍然相互較量，在世界面前搶對方的風頭。當喬治·布什7月30日到達莫斯科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高層會議時，葉利欽要求與布什進行單獨會面。[14](#Bu_Shi_Fang_Wen_Mo_Si_Ke_De_Xi_J)美國總統答應給他十分鐘的時間，但明確要求會面后不會一起參加記者招待會。

不管如何，現在是葉利欽的主場。他迫使美國人給他的注意越多，他在俄羅斯人眼中就越有威信。他讓布什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在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外面等了七分鐘，將他們在他的辦公室里留了四十分鐘，期間他一直強調俄羅斯的援助問題，并允許記者聚集在辦公室門外，方便他們突襲美國總統。布什在離開的時候跟斯考克羅夫特抱怨道：“葉利欽還真能嘩眾取寵，不是嗎？”隨后，在戈爾巴喬夫主持的一次由布什和蘇聯共和國領導人參與的單獨會議中，葉利欽拒絕出席，原因是不想被看做他的競爭對手的“隨從”之一。

后來，在為喬治·布什和芭芭拉·布什準備的蘇聯國宴之前，葉利欽致電戈爾巴喬夫，要求與他一起陪同布什夫婦走到座位上，以彰顯俄羅斯總統和蘇聯總統之間新的權力平衡。戈爾巴喬夫氣憤地拒絕了，說這是他作為主人應該做的事。葉利欽于是另辟蹊徑。當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陪著布什夫婦站在克里姆林宮鉆石館（Chamber of Facets）的餐廳入口處時，他們吃驚地看到葉利欽的妻子奈娜挽著加夫里爾·波波夫的胳膊現身。在最后時刻，葉利欽一個人單獨現身，像主人一樣彬彬有禮地提出陪同芭芭拉·布什走向餐桌。芭芭拉冷著臉問：“這樣真的可以嗎？”這位美國第一夫人讓賴莎走在她和那位笨重的俄羅斯人中間。戈爾巴喬夫嘲諷地問葉利欽，為什么將自己的妻子托付給莫斯科市長，葉利欽則歡快地回答：“哦，他已經構不成威脅了！”

喬治·布什后來因為葉利欽“劫持”芭芭拉將他形容成一個討厭鬼，馬特洛克認為葉利欽的行為既粗魯又幼稚。戈爾巴喬夫解釋道：“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震驚了。我太了解鮑里斯了。”

第二天，由美國人在美國大使館舉辦的晚宴上，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發現他們的座位離主桌有點遠。他們直接站起來，走向布什，拽著他不停地聊。沒有人敢告訴他們這樣的舉止是不當的。戈爾巴喬夫被惡心到了，他評論道：“我們的英雄們絲毫不覺得尷尬。當然，這樣的行為超過了任何禮儀的界限。”[15](#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5)

所有人都看出晚宴座位的安排反映了布什對他的朋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偏愛和他對戈爾巴喬夫嘗試保持蘇聯完整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但這樣的作秀正中葉利欽的下懷。因為它向美國人暴露出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他們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正逐漸失去對以前順從的共和國的控制，尤其是俄羅斯。

7月31日，戈爾巴喬夫夫婦在莫斯科西郊一棟國有別墅里款待布什夫婦和詹姆斯·貝克，他們悠閑地躺在灑滿陽光的游廊上的柳條椅上，戈爾巴喬夫穿著灰色的襯衣、毛衣和寬松的褲子，布什穿著polo衫。這是處于悠閑自在狀態，與國際朋友一起打開世界新局面的戈爾巴喬夫。但他們被粗魯地打擾到了。

一個美國官員約翰·蘇努努闖進來給了貝克一張便條：美聯社正在報道有武裝分子襲擊了立陶宛的一個邊哨。七名海關官員被以處決的方式殺害。布什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得知便條的內容時，臉色刷地就白了。戈爾巴喬夫對于最先被美國同志通知這種事情倍感尷尬，他派切爾尼亞耶夫打電話給克留奇科夫。這位克格勃負責人認為這次事件不是有組織的犯罪行為，或者是“立陶宛內務”。后來經過查證，這是蘇聯特警部隊聯邦警察突擊隊（OMON）的一次秘密行動，想給分裂分子一點教訓，更有可能的是，讓戈爾巴喬夫在高級會議期間做出妥協。

在他們的談話中，布什告訴戈爾巴喬夫，他不認為蘇聯的崩塌對美國有利。他認為他自己的共和黨中想讓蘇聯分裂的人都是極端分子，對他們的意見不予理會，盡管其中最顯著的是他的國防秘書迪克·切尼。他承諾會在第二天訪問烏克蘭的時候表示反對分裂主義傾向。

8月1日，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布什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發出警告，美國人不會幫助那些“助長建立在種族仇恨之上的自殺式民族主義”的人。布什的這次演講被美國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戲稱為“基輔雞”演講，戈爾巴喬夫聽之欣喜，正在快速脫離莫斯科的烏克蘭人則聞之憤怒。這個演講也被廣泛視為布什同瑪格麗特·撒切爾一樣，完全不了解蘇聯最新情況的證據，撒切爾在一年以前曾說她既不能在舊金山也不能在基輔開設大使館。

在美國人回國后，戈爾巴喬夫準備前往黑海福羅斯角的總統別墅度假。他叫著切爾尼亞耶夫的昵稱告訴他：“托利亞，我都快累死了。你目所能及的地方都是一片糟糕的景象……一切都變得那么小題大做、庸俗、粗鄙。你看著這一切，然后你想，都去死吧！但是我又能把這堆事扔給誰呢？我實在是太累了。”[16](#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10)

他現在把一切都堵在新聯盟協議上了。度假前，蘇聯總統親自監督了8月20日安排在克里姆林宮圣喬治廳的盛大簽約儀式的準備工作，他將在儀式前一天從福羅斯回到俄羅斯。他花了幾個小時與工作人員討論旗幟的擺放，共和國總統和外交官座位的安排，擺在他們各自身后的國旗、食物和香檳，甚至是協議文件所用的字體。

在8月4日出發飛行三個小時去往克里米亞之前，對戈爾巴喬夫感到失望的老朋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前來拜訪他，通知他將不再擔任他的顧問。他警告戈爾巴喬夫如果他不擺脫身邊的“卑鄙之流”，他們早晚會篡權的。戈爾巴喬夫不以為然地回答：“你太夸張了。”

幾天后，一個克格勃內線暗示雅科夫列夫，強硬派正在陰謀奪權，并警告他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都在死亡名單上。[17](#Qia_Lu_Jin__Kalugin_Yu_Meng_Tian)雅科夫列夫找到一個激進的前克格勃官員奧列格·卡盧金尋求意見。他們約在一條繁華的街道見面來防止竊聽。他問，保安部門是真的要殺他們嗎？卡盧金回答道：“克留奇科夫是個瘋子，他可能會不擇手段。”克格勃檔案文件后來揭露，他們在馬路上的這次談話被不下于十二個特工監視。

8月16日，雅科夫列夫退出共產黨，并在《消息報》上解釋了他的行為。顯然，他對波波夫得到的情報也有所耳聞。他在文章中發出警告，“一個有影響力的斯大林主義團伙正在策劃一場即將來臨的政變”。

1. [密茨凱維茲《切換頻道》，第96—97頁。](#1_15)

1. [向恩（Shane）《解散的烏托邦》（Dismantling Utopia），第180頁。](#2_15)

1. [科爾頓《葉利欽》，第298頁。](#3_14)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6頁。](#4_13)

1.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540—544頁。](#5_13)

1. [蓋茨《背后的真相》，第504頁。](#6_10)

1.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545頁。](#7_7)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46頁。](#8_7)

1. [同上，第365—366頁。](#9_7)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55頁。](#10_7)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298頁。](#11_7)

1. [蓋達爾《帝國的崩潰》（Collapse of an Empire），第219頁。](#12_7)

1. [安德魯（Andrew）和米特羅欣（Mitrokhin）《米特羅欣檔案》（The Mitrokhin Archive），第513頁。](#13_6)

1. [布什訪問莫斯科的細節來源于：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60頁；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563—564頁；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299—306頁；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11—413頁；以及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10—513頁。](#14_2)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06—807頁。](#15_2)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69頁。](#16_2)

1. [卡盧金（Kalugin）與蒙田（Montaigne）《第一屆政治委員會》（The First Directorate），第347—348頁。](#17_1)

# 第16章 12月25日：臨近黃昏

戈爾巴喬夫大聲說道：“Dorogoi（親愛的）布什，祝你和芭芭拉圣誕快樂！”[1](#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_1)這時，在克里姆林宮是臨近傍晚的時候，而在戴維營是一大早。戈爾巴喬夫的翻譯官帕維爾·帕拉茲琴科終于成功接通了這兩位總統。戈爾巴喬夫是在辦公桌旁接電話的，帕拉茲琴科在另一個電話聽筒上接聽。泰德·科佩爾和他的ABC工作人員坐在戈爾巴喬夫前面，他們靈敏的麥克風能夠捕捉到電話兩端的聲音。總統的新聞秘書安德烈·格拉喬夫將他們帶進辦公室來見證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談話。

戈爾巴喬夫說著俄語，用ty——稱呼家人或親密朋友的后綴——稱呼美國總統：“喬治，讓我告訴你一些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的桌子上，有一道我以蘇聯總統身份簽署的我辭職的政令。我還會卸去總指揮的職務，將使用核武器的權力轉交給俄羅斯聯邦的總統。所以，我現在一直在處理這些事情，直到完成憲法規定的過程。我可以跟你保證所有事情都在控制之中。一旦我宣布去職，這些政令都會生效。中間不會出現斷層。你能安安靜靜地享受一個圣誕夜。”

帕拉茲琴科痛苦地意識到，他正在翻譯的是兩位總統之間最后的正式磋商，這樣的事他已做過很多次。他忍不住想他們心里現在正在想什么。“戈爾巴喬夫有沒有可能在想，布什其實可以為他做更多？布什會不會嘗試解釋他的一些決定？”美國總統是不是得出結論他已經“盡其所能”而俄羅斯的事情是他“力不能及”的呢？[2](#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_3)

戈爾巴喬夫以一副還能影響事態的語氣告訴美國總統：“關于我們的（新）聯邦（協議）的討論、關于將要產生的國家類型的辯論，與我認為正確的思路方向有所偏離。但是，我敢說我會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和地位確保這個新的聯邦產生預期的效果。”

戈爾巴喬夫補充道，重要的是要提升合作而非分裂或毀滅。“那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想強調這一點。”

他知道布什關注蘇聯的核軍火庫的安全問題，他向布什承諾，他會在今晚離職后馬上將核提箱安全移交給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

“我很高興獨聯體的領導人在阿拉木圖就想出了重要的戰略協議……我覺得這個方面在有效的控制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經簽署了一道關于這個問題的政令，將在我發表完最后的聲明之后立刻生效。你可以放心地去慶祝圣誕節了，今晚也可以睡個安穩覺了。”戈爾巴喬夫無法開口提到葉利欽的名字，只表示會支持莫斯科的新政府。他說，“看著吧，俄羅斯會走彎路的。前面不會是一片坦途”。而關于他自己，“我沒打算避世。我還會活躍在政治生活中的。我的主要意圖是在這里所有由經濟改革和世界事務的新思路肇端的進程中發揮作用”。

瞄到ABC工作人員后，戈爾巴喬夫補充道：“你們的媒體一直問我關于我們之間的私交。我想要你知道，在這個歷史時刻，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合作、我們之間的伙伴關系和友誼。我們的角色可能發生改變，但我想要你了解的是，我們一起培養起來的感情是不會改變的。賴莎和我祝你和芭芭拉好。”

布什跟戈爾巴喬夫保證他們的友誼仍固若金湯，“關于這點是沒有疑問的”。他毫不吝于稱贊這位克里姆林宮跟他處于相同職位的人。“你所做的會被記錄在歷史中，將來的歷史學家將完全認可你的功績。”

布什很高興聽到他的朋友不打算“退避隱世”，而會參與到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我完全相信這會對新聯邦有好處。”

美國總統想起戈爾巴喬夫去年去戴維營的經歷，在布什玩最喜歡的游戲之一“釘馬掌”（horseshoe）的場地，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嘗試玩套環游戲，所有人都感到很驚訝。布什送給戈爾巴喬夫一個馬掌作為紀念品，戈爾巴喬夫回贈的是克格勃繪制的美國軍事基地地圖。

他說：“現在我們又來戴維營了。我、芭芭拉和三個孩子的家人都在這兒……你扔套環的那個釘馬掌場地還保存得很好……我希望我們很快就可以見面。這里一直歡迎你。在你有時間將事情都處理好之后，我真的很想和你談談。也許我們可以在戴維營聊。”

出于對戈爾巴喬夫的尊重，布什也避免提到俄羅斯總統的名字。他表示，白宮與葉利欽的關系將會是謹慎有余，親密不足。“當然，我會懷著尊重直率地、有效地以有望進步的方式與俄羅斯共和國領導人和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交流……但是這些都不會阻撓我想要跟你保持聯絡的愿望，不論你的新職務是什么，我都想聽取你的建議，而且，我想將芭芭拉和我都非常珍視的這份友誼保持完整。”

“因此，在今天的這個特殊時刻和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我向你致敬，感謝你一直以來為世界和平做出的貢獻。謝謝。”

戈爾巴喬夫淡褐色的眼睛有些濕潤，他回答道：“謝謝你，喬治。我今天非常高興聽到你說這些話。我得說再見了，向你致敬。”

布什對這段談話和兩人之間親密友誼的表達深有觸動。他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精力都流失了，對他所熱愛的這個國家的未來感到迷茫。他在第二天看到ABC播出的關于前一天的新聞時感到震驚，這才知道自己和戈爾巴喬夫的對話被攝制人員錄下來了。一般來說，他們之間的對話都是保密的，只有翻譯官和速記員能夠旁聽。科佩爾回憶道：“我能清楚地聽見布什的聲音。那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時刻。布什不知道我也在聽并在錄音。”

美國總統在戴維營掛斷電話，結束與莫斯科的通話后，打開一個小的磁帶錄音機。有時在與世界領導人溝通之后，他會把一些自己的個人想法吐露出來。他對著錄音機低聲道，戈爾巴喬夫的聲音“是一個真朋友的聲音。這個男人的聲音將被歷史銘記。這通電話有些地方非常感人……我不想弄得太傷感或多愁善感，但我確實感覺到這樣一通電話把我卷入了真正的歷史之中。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某個重大的轉折點”。在關掉錄音機前，他補充道：“上帝啊，生在我們這個國家真是太幸運了！我們太幸福了！”

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覺得戈爾巴喬夫和布什強強聯合的結束是世界的一大損失，俄羅斯忽視戈爾巴喬夫所做的貢獻實在是“可笑、可鄙又可惡的”。在這通電話之后，他想知道其他共和國是不是也會像俄羅斯人一樣，無法了解戈爾巴喬夫對文明進步做出的貢獻。“在國外，戈爾巴喬夫因為他所做的事情受到堅定而真正的尊重以及感激。這就是簡單的歷史事實而已，他統治的時期算得上幾個世紀以來最成就斐然的時代之一。”

安德烈·格拉喬夫也是百感交集。他認為喬治·布什和詹姆斯·貝克在1988年上任以后到跟戈爾巴喬夫相交密切之前的珍貴時間都給浪費了，而且他堅信他們應該為所發生的事情承擔一定的責任。“對戈爾巴喬夫來說這個歷史時刻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氣球正在散氣，快要降到地面上了。雖然蘇聯的政治劇像一幕莎士比亞劇般高潮迭起，貝克的應對卻是有條不紊，處處為美國的利益算計。”

戈爾巴喬夫接到了另一個來自德國外交部長兼副總理漢斯–迪特里希·根舍的國際電話——也是他作為總統的最后一個國際電話。根舍打電話來問好，這個舉動取悅了戈爾巴喬夫，雖然他們的關系因為戈爾巴喬夫認為根舍在秋天來訪莫斯科時不公正地對待他而變得冷淡。

當科佩爾開始為他的紀錄片進行另一次與戈爾巴喬夫的錄音采訪時，葉戈爾·雅科夫列夫輕聲問帕拉茲琴科，既然戈爾巴喬夫馬上就要辭職，他要找一個什么樣的工作。帕拉茲琴科告訴雅科夫列夫自己還沒有任何想法。他之前接到了俄羅斯外交部的雇用邀請，但當切爾尼亞耶夫問他有沒有接受時，他憤憤不平地回答：“你不會認為我為了不離開政府什么都干得出來吧。”他跟雅科夫列夫咕噥道：“我知道我只是不能像克里姆林宮自助餐廳的員工一樣轉而替新上司工作。”

俄羅斯電視臺負責人葉戈爾承認，“這也是我的問題”，在帕拉茲琴科看來，他都快哭了。[3](#Tong_Shang__Di_358Ye)

這時，戈爾巴喬夫看過來了，注意到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有多消沉。在對著ABC鏡頭做完評論后，他走過來安慰他的老朋友，就像一個失去希望的人通過安慰為他悲傷的人找到了力量一樣。這位馬上要成為前總統的男人說道：“好了，葉戈爾，抬起頭來。一切還只是個開頭呢。”

微弱的冬日陽光逐漸暗淡，城市中心另一端的俄羅斯白宮的燈光開始亮起，鮑里斯·葉利欽決定現在應該是他在戈爾巴喬夫發表辭職演說之前與全世界對話的時候了，向世界展示他的責任和政治家風度。他讓他的信息部長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通知CNN，時間到了。

CNN的工作人員匆匆忙忙從他們在庫圖佐夫大街7/4大樓的辦公室趕來，與白宮中間隔著新阿爾巴茨基橋（Novo-Arbatsky Bridge）相望。[4](#2009Nian_Qiu_Tian_Yu_Cha_Li__Kao)他們在入口處馬上通過了安檢，獲準進入一個裝飾華麗的大理石墻面的宴會廳。

葉利欽選擇這個有巨大枝形吊燈和描述田園風光的大幅掛毯的華麗禮堂，作為一個重大場合的宏偉背景。工作人員布置好攝影機、燈光和椅子。他們得知葉利欽已經在來的路上，他們還有兩分鐘。

對于CNN來說，這是一次顯而易見的勝利，在蘇聯的最后一天能夠獲得俄羅斯總統的獨家報道。蘇聯權力的轉移是從十個月前的海灣戰爭至今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在海灣戰爭時，CNN因為報道了巴格達的轟炸而獲得巨大成功。這個總部設在亞特蘭大的新聞組織，不僅在鮑里斯·葉利欽的勝利之日獲得了他的獨家電視采訪，還獲得了此后在克里姆林宮向全球獨家播放戈爾巴喬夫辭職演說的授權。ABC的泰德·科佩爾和里克·卡普蘭已經在克里姆林宮了，但他們沒有這樣一個重大的電視活動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CNN于1980年由泰德·特納在亞特蘭大成立，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提供全天候電視新聞的公司，在公司發展的前十年，大量資金被用在蘇聯上。它將第一批國外辦公室的其中一個定在俄羅斯首都。美國1980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拒絕參加奧運會之后，特納于1986年將友好運動會（Goodwill Games）引入莫斯科，鼓勵蘇美運動員之間的競爭。這位CNN創始人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前期來到莫斯科時，對這位新共產黨總書記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向一位不知所措的蘇聯官員建議他應該成為共產黨的一名榮譽黨員。這位官員禮貌地拒絕了，提議讓他加入蘇聯記者協會，特納婉拒了，說他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工會。

1989年，CNN成為第一個獲準在莫斯科播送自己的新聞節目的非蘇聯廣播公司。起初，CNN新聞只在沙威酒店播放，僅供外國客人觀看，但業余俄羅斯工程師發現，他們可以裝配一根天線在自己家里的電視機屏幕上接收CNN的信號。在沒有網絡和手機的時代，這樣的情況對俄羅斯人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發生的事件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并使得新聞審查幾乎不可能實現。

CNN幾乎錯過了蘇聯最后一天這個戲劇性事件。直到CNN的管理人員得到風聲，ABC的泰德·科佩爾已經獲得了獨家授權，進入克里姆林宮拍攝戈爾巴喬夫在任最后幾天的紀錄片他們才采取行動。在亞特蘭大，CNN總裁湯姆·約翰遜決定將電視臺的所有資源都投入與對手的競爭中。約翰遜之前是《洛杉磯時報》的一個出版商，他在去年接手CNN總裁的職位，獲得了競爭狂的名聲。 12月18日，他出發前往莫斯科，隨行的是會說俄語的斯圖爾特（斯圖）·盧里，CNN莫斯科辦公室的一位前負責人，讓他通過游說獲得葉利欽成為俄國新領導人后的第一次采訪，以及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領導人的最后一次采訪，盡管當時他們都無法確定權力的轉移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約翰遜致電俄羅斯信息部長，強調他對葉利欽采訪的重要性。他給波爾托拉寧引用了他們對巴格達的獨家報道，并向他展示最近的彩色全球衛星分布圖，強調全世界沒有第二家新聞機構能夠向同樣多的國家播放。波爾托拉寧惡聲惡氣地說：“我知道這些！”約翰遜被嚇到了，但他馬上提議他們可以將這次采訪連接到俄羅斯電視臺，確保全國的觀眾能夠收看。他回憶道：“之后的談話氣氛就變得格外友好了。”約翰遜被帶去見葉利欽，葉利欽同意讓他在事發當天進行獨家采訪，但葉利欽不能告訴他具體的時間。他給了俄羅斯總統一本《震撼世界的七天》，CNN出版的一本關于失敗的八月政變的書。

莫斯科辦公室負責人斯蒂夫·赫斯特認為，CNN在莫斯科的高知名度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們不分白天黑夜地待在重量級人物的辦公室里。”

CNN公司開始從世界各地召集人員來到莫斯科。CNN負責現場報道的資深制片人查理·考迪爾從亞特蘭大飛往莫斯科，去帶領有史以來為了一個單獨的國外電視活動所召集的最大的團隊。這個75人的團隊包括管理人員、制片人、導演、采訪者、攝影機操作員、音效操作員、干事和翻譯。部門經理弗麗達·吉蒂斯到了莫斯科發現，辦公室的員工已經花了幾個星期“懇求采訪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并戰略性地往他們的助手們手中塞了一堆巧克力和威士忌。她回憶道：“贏得這場競爭的壓力很大，科佩爾的名字被頻繁地提及。”

然后，龐大的CNN團隊等待戈爾巴喬夫卸任的那一天。盧里說道：“我們很緊張，擔心戈爾巴喬夫會提前辭職，擔心其他的廣播網會把我們擠掉。”在12月24日下午還拉了一個假警報。每個人都迅速行動。考迪爾回憶道：“我們開始前往克里姆林宮，帶著五六車攝像機和設備。克里姆林宮的燈都是熄的。湯姆將他的名片給門口的警衛檢查。警衛完全莫名其妙。”事實上，什么事也沒發生，CNN的車隊和34名工作人員只好掉頭原路返回。考慮到每個人都遠離家鄉，約翰遜決定在酒店舉辦一個圣誕前夜聚會。他讓弗麗達·吉蒂斯給他找一頂圣誕老人的帽子。一個俄羅斯助手在商店找不到他想要的東西，即使是波修瓦劇院和莫斯科馬戲團的女裁縫也幫不了忙。吉蒂斯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一張挪威圣誕老人給俄羅斯孤兒院的孩子們分發禮物的照片。她說：“最后我們從這個挪威圣誕老人先生的手上買下了帽子。盡管有約翰遜可愛的帽子和配套的白胡須，聚會還是泡湯了。聚會剛開始進行，我們就了解到所有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于是每個人都忙著準備這兩個采訪了。”

既然現在已經確定對葉利欽的采訪馬上要開始了，查理·考迪爾正在跟俄羅斯官員確認白宮里的安排已經就位，同聲傳譯能夠順暢工作。他問葉利欽的助手葉利欽更喜歡哪只耳朵戴耳機。助手回答道：“他有一只耳朵聽不見”。“哪只？”“我不知道”。“問他！”“不，我才不會問俄羅斯總統哪只耳朵是聾的！”考迪爾只好讓能講俄語的CNN技術人員幫忙，“葉利欽坐下時，在他耳邊輕聲說，‘很高興見到你’，如果他笑了，這只耳朵就是能聽見的”。

重要的時刻終于來臨了。在約翰遜的陪伴下，葉利欽莊重出場，從鋪著地毯的寬闊樓梯上緩步而下，穿著一塵不染的西裝和擦得閃閃發光的皮鞋，他濃密的長頭發一絲不亂，完全看不出他在上電視之前緊張得“流了幾桶汗”。[5](#Ye_Li_Qin___Wei_E_Luo_Si_Fen_Dou_2)他沿著擦亮的鑲木地板上鋪的長條紅地毯往前走，一直到放著三把帶金色花紋軟墊的休息室椅子旁，斯蒂夫·赫斯特和克萊爾·席普曼被安排在這里進行采訪。葉利欽坐下時，那個技術人員輕聲跟他打招呼，將耳機放在他左耳旁。葉利欽笑了。他們猜對了。俄羅斯總統因為年輕時的內耳炎不治而喪失了右耳的聽力。

約翰遜曾經為美國總統林頓·貝恩斯·約翰遜工作過，他驚訝地發現，葉利欽在很多方面跟他的前上司很像，例如他們都很“堅強、強大、有效，都是真正的卓越人物”。席普曼發現俄羅斯總統精力充沛：“他的狀態很好，處于全盛時期，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力，無比自信，但又不是明顯的自鳴得意。他的眼睛中散發著光芒，臉上帶著惡作劇般的表情。我覺得他已經迫不及待想要攫取最后的勝利果實了。”赫斯特回憶中的葉利欽“非常興奮，緊張不安，完全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葉利欽利用這次采訪再次向國外的觀眾保證，蘇聯的解體并不意味著核武器落入了黑手。他力勸世界不用為此擔憂。他說，戈爾巴喬夫發表辭職宣言后，核密碼一秒也不會出問題。“我們將竭盡所能避免用到核按鈕——任何時候。”

他對被自己擊敗的競爭對手表示同情。在有人問到戈爾巴喬夫犯過什么錯誤時，他寬厚地說道：“今天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來說不容易。因為我個人對他抱有很大的尊重，我們一直嘗試文明地溝通，一直嘗試將蘇聯變成像今天這樣的文明國家，我不想糾纏于那些錯誤。”

他真正責罵的是國際社會在俄羅斯危難之時不能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說，“空話倒是一大堆，卻不見具體的行動”。也許這是因為想要幫忙的國家不知道將人道主義援助寄到哪個地址。“現在好了，他們知道地址了。”他發出警告，生活水平至少在接下來的一年會繼續下降，世界必須幫助俄羅斯擺脫“夢魘般的傳統”。

葉利欽指責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一次調查實情的訪問結束離開莫斯科后，表達出對即將取代蘇聯的獨聯體存活幾率的悲觀態度，盡管每個人，包括俄羅斯總統自己，都知道獨聯體不過是解體的一塊遮羞布。

“貝克先生和我在莫斯科進行的四個半小時的會晤中，他沒有表現出那種悲觀，那些懷疑獨聯體能否成功的人也要注意不要悲觀。這里的人們已經對悲觀厭煩了，悲觀的分量已經是人們不能承受之重了。現在他們需要一些信念，在這最后的時刻。”

在采訪結束時，他笑容滿面地祝所有人“圣誕快樂”。

整個過程由一個方臉短發的男人一邊扛著笨重的攝像機一邊小心地保持著距離拍攝。葉利欽的私人攝影師亞歷山大·庫茲涅佐夫的任務是記錄俄羅斯總統的日常活動。他將自己的任務解讀成提供比葉利欽本人好看的鏡頭，這樣“奈娜就會滿意了，他的女兒也不會在電視前面扮鬼臉了”。他背地里是戈爾巴喬夫的崇拜者，在接到葉利欽提供的更有誘惑力的工作前，一直在與安德烈·格拉喬夫商量為蘇聯總統工作的事。他在被雇用時沒有提這些，因為“葉利欽受不了戈爾巴喬夫”。

他反映，這份工作記錄多姿多彩的俄羅斯總統的生活和時代，將他放在“這個時代的政治戰場前線，欣賞著頂尖演員在第二個羊禧年末期的演出”。然而，在庫茲涅佐夫看來，“戈爾巴喬夫的名字會用金色字體寫在歷史中——葉利欽的最多也就是大寫字母”。[6](#Ku_Zi_Nie_Zuo_Fu__Kuznetsov___Zo)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59—561頁。](#1_16)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364—366頁。](#2_16)

1. [同上，第358頁。](#3_15)

1. [2009年秋天與查理·考迪爾（Charlie Caudill）、弗麗達·吉蒂斯（Frida Ghitis）、斯蒂夫·赫斯特（Steve Hurst）、湯姆·約翰遜（Tom Johnson）、斯圖爾特·盧里（Stuart Loory）和克萊爾·席普曼（Claire Shipman）的訪談。](#4_14)

1. [葉利欽《為俄羅斯奮斗》，第21頁。](#5_14)

1. [庫茲涅佐夫（Kuznetsov）《總統的房間》（Kamera dlya Prezidenta），第12頁。](#6_11)

# 第17章 不忠、不法、行為不端之徒

1991年8月17日，星期六，克格勃負責人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邀請了幾個身處高位的黨員跟他一起，在位于莫斯科列寧大街街尾的一個克格勃秘密客房洗蒸氣浴。他們有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總理瓦連金·帕夫洛夫、戈爾巴喬夫總統的辦公廳主任（chief of staff）瓦列利·波爾金，還有另外兩個老資歷的共產黨官員奧列格·巴克拉諾夫和奧列格·謝寧。[1](#Bi_Zhe_Zong_He_Le_Duo_Fang_Xu_Sh)

他們裹著毛巾在一起閑聊。克留奇科夫告訴他們一份情報報告，顯示戈爾巴喬夫疑似向美國卑躬屈膝。直到他們穿好衣服，到花園里的一個擱板桌旁喝起伏特加和蘇格蘭威士忌，克留奇科夫才告訴他們被邀請到一起的原因。

他說，這個國家正面臨著一片混亂。戈爾巴喬夫的表現不夠合格。他得到情報，稱戈爾巴喬夫打算在下個星期二新聯盟協議的簽署儀式后開除總理和其他一些政府成員，包括他自己。這個協議意味著蘇聯的終結，而這是不能忍受的。如果戈爾巴喬夫不領導他們，如果他們不能控制他，那么，他就不得不被強迫離開舞臺了。

他接著說道，現在是時候行動了。戈爾巴喬夫星期一就要從黑海度完假回來了。他們會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派一個代表到福羅斯要求總統跟他們一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如果他拒絕，他們就會請他辭職。他們會成立一個應急委員會，親自做應該做的事情。

所有人都同意了這個計劃。亞佐夫主動提供一架軍用飛機飛往福羅斯。同時，他會帶軍隊進入莫斯科，向平民宣示權力掌握在誰手中。這位國防部長沖著波爾金假笑。他開玩笑說，如果戈爾巴喬夫看到他的辦公廳主任也參與進來了，他會說，“你也有份，布魯圖？”（Et tu Brute？）但波爾金沒心情跟他開玩笑。他因為肝疼導致身體不舒服，在醫院做了一周的靜脈輸液，但他還是出院了，因為國家在分崩離析，而“我只不過是需要將自己的個人考慮先放到一邊”。

克留奇科夫告訴這些密謀者，內政部長鮑里斯·普戈是這個計劃的發起者，而且他相信只要通知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他也會合作的。他還確信他們能夠處理來自大眾的任何反抗。普斯科夫州的一家工廠奉命生產二十五萬副手銬，雷夫托夫監獄也做好了接收大批被拘留者的準備。

第二天，8月18日，星期天，政變開始了，戈爾巴喬夫被軟禁。由亞佐夫提供的一架軍用飛機從莫斯科飛行兩個小時，于下午五點到達福羅斯附近的別利別克軍事基地。飛機上是巴克拉諾夫、謝寧、波爾金和另一個狂熱的反叛者瓦連金·瓦連尼科夫將軍。這四個人代表了蘇聯反對改革的保守當權派的支柱。巴克拉諾夫長著方方的臉，總是神情嚴肅，眉頭緊鎖，他是蘇聯軍工集團的負責人。謝寧頭發早謝，額頭又大又突出，是負責共產黨組織的政治局委員。波爾金除了是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廳主任，還是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資深成員。瓦連尼科夫帶著大大的無框眼鏡，留著一小撇胡須，稀疏的頭發梳成希特勒的發型，他是蘇聯陸軍的指揮官。

克格勃官員開著兩輛吉爾豪華車將這個代表團送往有著大理石墻壁和橙色瓦片屋頂的國有別墅，戈爾巴喬夫一家正在度過他們為期兩周假期的最后一天。建筑物內部的尤里·普列漢諾夫將軍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位不茍言笑的克格勃第九局頭目代表的是蘇聯權力的第五大支柱——安全機構。普列漢諾夫在別墅周圍部署了新的警衛，下令戈爾巴喬夫的防衛人員回到莫斯科，然后將持有自動武器的人員布置在車庫外面，這樣一來，戈爾巴喬夫一行就無法靠近車，也沒法使用車里的無線電話。

總統穿著短褲和套頭衫，坐在二樓的辦公室讀關于啟動一個新聯邦的演講文稿，他兩天后將在莫斯科發表。在演講稿中，他寫下了一個警告：“如果我們現在后退，我們的孩子將永遠不會原諒我們的無知和不負責任。”

在別墅綜合大樓的一個會客廳，負責核提箱的兩個便衣軍官之一弗拉基米爾·基里洛夫上校正在看電視，這時電視屏幕突然一片空白。核提箱上的應急燈開始閃爍。來了——核警報！他拿起跟政府通訊系統直接相連的無線電話。他得到的答復是出了點意外，不用擔心。下午四點三十二分，他和他在莫斯科的上司，克格勃的維克多·博爾德列夫將軍失去聯絡。瓦連尼科夫將軍出現在門邊，問：“你聯絡得怎么樣了？”上校回答：“聯絡不上。”瓦連尼科夫說：“這就對了。”他向上校保證二十四小時內聯絡會恢復。[2](#Duo_Bu_Si___Da_Dao__Lao_Da_Ge)

下午四點五十分，戈爾巴喬夫的保鏢首領打斷總統，告訴他有一群人來了，想跟他談談。戈爾巴喬夫沒約任何人。他有些警覺，拿起話筒打電話給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線路不能用了。他桌上的四臺電話和內線都沒用了。在外面的一間辦公室里，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也突然意識到他的政府線路、衛星連接和內線都癱瘓了。

他馬上就猜到發生了什么。

戈爾巴喬夫走到游廊，賴莎在那里讀報紙，他們34歲的女兒艾麗娜和女婿外科醫生阿納托利·維爾干斯基陪在一旁。他警告他們道，他們可能被逮捕了。他向賴莎保證，“他不會屈服于任何形式的脅迫”。

他回去后發現，巴克拉諾夫、謝寧、波爾金、瓦連尼科夫和普列漢諾夫粗魯地占領了他的辦公室。巴克拉諾夫說明情況。他說，這個國家正面臨著災難。一個應急委員會已經成立了。葉利欽被逮捕了或至少馬上就會被逮捕。總統必須馬上簽署宣布進入應急狀態的政令，否則就馬上辭職，將權力轉交給副總統亞納耶夫。然后，他將在“他們行動的時候”留在福羅斯。

戈爾巴喬夫要求知道委員會的成員，在聽到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是委員會領導人時震驚了。他嘗試跟這些不速之客理論。他說，他們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討論和解決問題，但戒嚴令和使用武力則萬萬不可。本著用計和妥協的本能，他建議密謀者們走另外一條路：“既然我們之間出現意見沖突，那我們馬上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讓他們去做決定。如果他們完全同意你們的提議，那就照你們說的做，但對我來說，我不同意，也不會支持。”

密謀者們說他們不允許任何耽擱。巴克拉諾夫建議：“你先休息一段時間，你不在的這段時間，我們會把苦活累活全干了，然后你再回到莫斯科。”聽到這些，戈爾巴喬夫爆發了。他把他們稱為罪犯。他大喊：“去死吧，你們這群混蛋！”戴著眼鏡的瓦連尼科夫比戈爾巴喬夫高一頭，他幾乎掩飾不住自己的鄙夷。他沖總統粗魯地厲聲說道：“交出你的辭呈！”波爾金插話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不了解情況……”戈爾巴喬夫打斷他：“你這個混蛋。你給我閉嘴！”

蘇聯總統拒絕批準宣布戒嚴令。冷靜下來后，他在代表團離開時和他們握了手。

戈爾巴喬夫一家，包括兩個孫女謝妮亞和納斯特婭發現，他們被別墅周圍不認識的克格勃警衛隔離起來了。戈爾巴喬夫跟切爾尼亞耶夫透露：“這事可能不會善了，但你知道，在這件事上，我對葉利欽有信心，他不會向他們屈服的。”切爾尼亞耶夫忍不住脫口而出：“他們是你的人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一手培養、提拔、給予了信任的人啊。”戈爾巴喬夫咒罵自己居然在一年前給了謝寧共產黨組織者這個高級職位。他以為他是一個改革者。

賴莎在他們被軟禁的第一天無法入睡。她被“這些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并肩工作的人的背叛所帶來的苦澀所折磨”。波爾金的背叛對她傷害最大。“我們成為能夠交心的朋友已經十五年了。他就像我們一個家里人，我們什么事都跟他說——包括我們最私密的秘密。”她害怕他們被下毒，堅持讓一家人只吃在政變之前送來的食物。[3](#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11)

茫然失措的密謀者們回到莫斯科。他們去之前希望能威脅搖擺不定的戈爾巴喬夫簽署政令，好讓他們的政變名正言順，要么在他們對付他棘手的對手鮑里斯·葉利欽的時候暫時退位。波爾金現在意識到他們失算了。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允許，他們就沒有授權。他后來回憶道，“所有的事情從一開始就亂套了”。

星期天晚上，他們聚集在帕甫洛夫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亞納耶夫也被叫來與他們見面。他到的時候已經醉得七倒八歪了。但他也不是好說話的。他抽著煙，顫著手大口喝下伏特加，必須被說服簽署一份文件，宣布在戈爾巴喬夫總統“生病期間”暫代蘇聯總統一職。克里姆林宮救世主塔上的鐘敲響十一點的鐘聲時，他才簽字。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密謀者簽署了一道政令，確定為期六個月的戒嚴令。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與戈爾巴喬夫的親密騙得人民相信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也到了帕甫洛夫的辦公室。他不需要費力說服就同意以國會發言人的身份給予政變一個合法的虛偽假象。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別斯梅爾特內赫在莫斯科西南數百英里的地方度假，也被召集回來，后半夜才到。他發現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上，于是把它劃掉了。他回到家，直到事情都完結了才再次露面。但是，他沒有阻止蘇聯各大使館接受委員會的命令，擴大它的宣傳。波爾金回到了醫院，被注射了大量鎮靜劑。

同時，亞佐夫發布加密電報8825，下令上層軍事領導人往莫斯科調動軍隊。克留奇科夫則分派一個特殊的克格勃部門來監督鮑里斯·葉利欽，為逮捕他做準備。

這個星期天晚上，葉利欽在阿拉木圖會見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離莫斯科大約兩千英里。他推遲了返回的時間，參加一個奢華晚宴，有哈薩克民樂表演和衣著鮮艷的姑娘在身邊旋轉舞蹈，在晚宴上，他調皮地用木勺在一個助手尤里·日加諾夫的頭上敲打表演，逗樂了所有人。盡興后，葉利欽于當地時間晚上八點啟程，搭長途飛機回莫斯科。當他到達莫斯科時，車直接將他送到了他在阿爾汗金斯科的別墅。沒有人攔他。

第二天早上六點剛過，他被女兒坦妮亞搖醒，她跑進房間大叫：“爸爸！快起床！發生政變了！”

俄羅斯的數百萬人永遠也不會忘記，在1991年8月19日那個周一聽到廣播和電視上的晨間公告時，他們正在做什么，這個公告突然又讓他們的生活處于恐慌之中。葉利欽穿著內衣坐在那兒看國家電視臺的明星播音員尤里·彼得羅夫播報一則應急委員會的聲明：戈爾巴喬夫病重，副總統亞納耶夫暫代總統職務，蘇聯實行戒嚴令。播音員說，政治運動行為將被中止，非法持有的武器要上繳，集會和示威被禁止，大眾媒體要受到應急控制。公告播完后，一直重復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

大多數俄羅斯領導人與葉利欽住得很近，他們一個個驚慌失措地跑到他的別墅。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言人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從隔壁的別墅跑過來時，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也出現了。他們發現葉利欽跌坐在扶手椅上，一副宿醉未醒驚呆了的模樣。他的高層助手根納季·布爾布利斯、伊萬·西拉耶夫、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和維克多·亞羅申科都跑進來圍在他身邊。頗受人們歡迎的莫斯科副市長尤里·魯日科夫也現身了，承諾組織反抗之后就離開了。列寧格勒（兩個月前名稱恢復為圣彼得堡）的前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那天碰巧在莫斯科，也到了葉利欽的別墅，發誓要在俄羅斯的第二大城市召集抵抗。然后，他也離開了，走的時候說道：“愿上帝保佑我們！”

葉利欽打電話給傘兵部隊的指揮官帕維爾·格拉喬夫，問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最近他們兩人的關系很友好。這位四十三歲的將軍正奉命調動部隊，但他許諾派一個班去別墅確保葉利欽的安全。也許密謀者們也沒有獲得軍隊的完全忠誠。

上午九點，葉利欽已經恢復了足夠的體力來口述一份訴請，呼吁俄羅斯人民抵抗這次“憤世嫉俗的右傾政變嘗試”。別墅里的傳真機還能用，一個小時內，這份訴請以傳單的形式傳播到了莫斯科的每一個角落，還通過無線電臺的廣播傳達給全世界。被隔離在福羅斯的戈爾巴喬夫在一臺袖珍索尼收音機上聽到了這個初期抵抗的消息，他經常在刮胡子的時候聽這臺收音機。

俄羅斯總統決定趕到俄羅斯白宮。奈娜不同意：“聽著，外面有坦克。你去那兒有什么用？”他回答道：“他們不會攔我的。”像往常一樣，家里的女人確保葉利欽在出門的時候著裝整齊。坦妮亞抻平他的夾克，讓他的防彈背心不那么顯眼。奈娜哭喊道：“你的腦袋還露在外面呢，它才是最重要的。”

葉利欽和科爾扎科夫決定直接去白宮，他們由一個官方車輛組成的車隊護送，俄羅斯總統坐的是黑色海鷗牌汽車，引擎蓋上飄著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他們離開時被指揮官卡爾普欣下面的克格勃監控小組看到了，這些監控的人早就接到命令在周圍的樹林里就位。卡爾普欣后來證實，他接到了逮捕葉利欽的命令，但他讓葉利欽的車開走了。但克留奇科夫推遲了下達命令的時間，對名單上挑選出來的八十位民主主義者進行拘留，其中就有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因為他傾向于先試著恐嚇反抗者而不是直接就用粗暴的手法。這是導致政變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許多失誤判斷之一。

葉利欽擠在后座上的保鏢中間，海鷗汽車沒有受到阻攔，高速駛過把庫圖佐夫大街攪得天翻地覆的坦克，然后駛過新阿爾巴茨基橋，進入白宮的地下車庫，到達時間是十點左右。在他的辦公室，他發現所有的電話線路都被切斷了，只有一臺還能用：這臺電話是在政變前一天安裝的，還沒來得及登記，葉利欽才得以打電話給莫斯科和蘇聯的盟友。

在白宮外面，來自塔曼斯卡亞摩托化步兵師的裝甲車已經就位，但沒有接到任何命令。因為對葉利欽可能被逮捕而感到憤怒，年輕人和中年婦女開始在白宮外面亂哄哄地吵嚷，步兵師參謀長葉夫多基莫夫少校說他沒有任何傷害他們的意思。

中午剛過，葉利欽出來了，左右兩邊站著端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的保鏢，爬上了一輛T-72坦克。他向大約兩百名支持者大聲朗讀他的聲明，朗讀的時候不得不提高音量，以蓋過駛過的重型軍事車輛的轟隆聲。他號召進行全面罷工，反抗這次“右傾、保守的違反憲法的政變”。

在他匆匆返回白宮后，外面的人群開始堆起水泥板和金屬桿進行防御。到大半下午，人數已經激增到幾千人。

政變已經開始停步不前了。在整個城市，開坦克的人與行人關系友好。帕甫洛夫的勇氣在衰減，他開始灌大量的威士忌。亞佐夫在克里姆林宮里看到他時，他已經成了“一攤爛泥”，被人抬上車送回家。下午五點在外交部新聞中心召開的應急委員會的電視直播記者招待會，他也無法參加了。

這個星期一的晚上，電視機前的觀眾第一次見到了委員會的成員——穿著灰藍色西裝坐在臺上桌子后面的六個男人，臉色蒼白的亞納耶夫坐在中間。亞納耶夫那被尼古丁熏黃的手指在顫抖，他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依據是正常的生活已經不可能了。他撒謊說戈爾巴喬夫正在生病，“接受治療”。當一個意大利記者問他們是不是咨詢了皮諾切特將軍如何發動政變時，大家都發出嘲諷的笑聲。在場的俄羅斯和國外記者們通過詢問關于葉利欽的罷工訴請和白宮外建立的防御工事的問題，來告訴數百萬觀眾國家電視臺所隱瞞的事實。

當天晚上，俄羅斯總統睡在白宮三層醫生的手術室里，那里的窗戶是朝向內院的。為了保證安全，他的家人坐著一輛沒有標志的掛著簾子的車，迅速而隱秘地去往他的一個保鏢在孔策沃郊區的一套兩居公寓。

8月20日星期二早上，喬治·布什一開始差點就譴責了政變委員會，但在斯考克羅夫特的建議下，將他們的行為稱為不符合憲法規定，而不是非法的，這樣避免與政變領導人之間的關系破裂。他這時候對發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設法接通了葉利欽。美國總統大聲說：“鮑里斯，我的朋友。”葉利欽被感動了，他大喊著回答：“能夠接到你的電話我無法形容自己的喜悅之情。我們等的是一場襲擊，但等來你的電話對我們有幫助。”布什說：“我們在為你祈禱。”[4](#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4)

站在白宮的一個陽臺上，在科爾扎科夫和另一個保鏢舉著鉛盾的保護之下，葉利欽宣讀了他的第二份聲明。在這份聲明中，他號召士兵和警察不要聽從亞佐夫和普戈的命令，但也不要進行對抗。

在圣彼得堡，索布恰克市長與軍隊指揮官面對面談話，勸阻他們不要進入市里。跟他一起并肩反對政變的是他的特別助理，克格勃官員弗拉基米爾·普京。普京多年后回憶道：“索布恰克和我幾乎住進了市政廳。我們開車前往基洛夫等工廠對工人們講話。但我們的神經高度緊張。我們甚至分發了手槍，不過我把我的專用左輪留在了保險箱里。我們所到之處獲得了所有人的支持。”[5](#Pu_Jing__Putin___Ge_Wo_Er_Ji_Yan)

普京擔心，如果密謀者們成功了，他作為一名克格勃官員的所作所為會被視為職務犯罪。他跟他的上司表達了這種擔憂，于是，索布恰克代表他給克留奇科夫打了電話。令人驚奇的是，這位市長居然可以讓這次政變的主要組織者接起電話，來討論一件相對于所有事件的規模來說無足輕重的事情——那就是普京即刻從克格勃辭職。

到現在，克留奇科夫似乎意識到他在沒有落實逮捕葉利欽上犯的錯誤。俄羅斯總統身邊的公眾防御正逐步加固。應急委員會也名存實亡。帕甫洛夫和別斯梅爾特內赫消失了。亞納耶夫將自己灌得不省人事。現在，白宮的保衛者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有政治局元老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詩人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和薩哈羅夫的遺孀葉琳娜·波納。謝瓦爾德納澤也在那里，大聲質問戈爾巴喬夫本人是不是也牽涉在這次政變中。早上五點的時候，葉利欽記起今天是他女兒莉娜的生日，于是打電話祝她生日快樂。后來，他送給她一個用過的彈藥筒作為生日禮物。

當天下午，部隊里最年輕的將領之一、四十一歲的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來到白宮，偷偷告訴葉利欽的保衛者們，第二天凌晨兩點會有一次襲擊。葉利欽在今年夏天去圖拉的第106空降師總部訪問時，給列別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他與軍人們交朋友，摘下自己的手表送給一個中尉，然后又從口袋里拿出一塊一模一樣的手表送給一個中士。

所有女人都被通知離開白宮，保衛者們準備好應對攻擊，已經做好準備將葉利欽偷運到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避難。

而與此同時，亞佐夫發現自己居然找不到一個軍隊指揮官來指揮對白宮的襲擊。四十九歲的空軍總指揮葉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元帥悄悄地勸亞佐夫退出政變委員會。當亞佐夫反而要他準備直升機將克格勃阿爾法小組空降到白宮屋頂時，他威脅要派兩架飛機轟炸在克里姆林宮的軍用車輛。在斯大林時期，沙波什尼科夫說這樣的話早就被槍斃了。但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不和的軍方儼然成了一個辯論社。

阿爾法部隊在接到襲擊白宮的指示時違命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后來推測，“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想為了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這樣的蠢貨讓自己雙手沾染鮮血”。

危險過去了。星期三早上凌晨，亞佐夫命令所有的部隊從莫斯科撤離。這場像小歌劇一樣的政變失敗了。克留奇科夫在凌晨三點的時候給白宮里的布爾布利斯打電話，告訴他們可以安心睡覺了。第二天早上，這位克格勃頭目征用了一架飛機，他和其他政變成員乘飛機飛往福羅斯跟戈爾巴喬夫進行商妥。

戈爾巴喬夫不可思議地在電視上觀看了密謀者們的新聞發布會。賴莎在日記中寫道：“多么不忠、不法、行為不端之徒啊！不用說，我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她被嚇到了，關于她丈夫病重的謊言說明他們曾想著除掉他。[6](#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6)

戈爾巴喬夫最終總算從葉利欽頑固的個性中看到了一點長處。他告訴切爾尼亞耶夫他堅信葉利欽展示出了自己真正的本性，沒有任何事可以摧毀他。

政變第二天，核提箱和兩個保護它的上校被護送到機場，一架飛機正等在那里將他們帶回莫斯科。夜幕降臨之前，三個提箱都會落到國防部長亞佐夫和總參謀長米哈伊爾·莫伊塞耶夫的手上。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后來證實，保護戈爾巴喬夫核提箱的上校破壞了與戰略指揮部通訊的密碼，但蘇聯龐大的核軍火庫確實一度全部掌握在強硬派手中。[7](#Duo_Bu_Si___Da_Dao__Lao_Da_Ge_1)

政變逐步垮臺的時候，賴莎遭受了一次輕微中風。戈爾巴喬夫的妻子回憶道：“我感到手臂一陣麻木和疲軟，接著就說不了話了。”政變開始的時候正好跟他們在一起的家庭醫生伊戈爾·鮑里索夫把她放到床上。賴莎的話語能力很快就恢復了，但她永遠也不能痊愈了。

星期三下午三點左右，他們從BBC新聞上聽到克留奇科夫帶著一個代表團坐著總統專機前來福羅斯。這在別墅里引起了一陣恐慌。戈爾巴喬夫擔心在政變瀕臨失敗的這個時候，他們會來加害于他。他命令仍忠于他私人保鏢小分隊的五名成員堵住車道，并在樓梯上部署機關槍。賴莎想：“一定是這樣，他們是來讓亞納耶夫的公告（戈爾巴喬夫身體不適）名副其實的。”

五點剛過，從機場接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諾夫、盧基揚諾夫和另外兩個人的兩輛吉爾車就到了，這些人想請求戈爾巴喬夫保證他們的安全，商量一條出路。用克留奇科夫的話說，他們是希望勸服戈爾巴喬夫壓制俄羅斯政府，阻止他們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以保持蘇聯的完整。但是，被軟禁的總統拒絕見克留奇科夫這個克格勃頭目或是亞佐夫。

六點半剛過，戈爾巴喬夫的電話線路全部恢復使用，但是只能往外撥電話。他馬上給葉利欽打電話，葉利欽用迄今為止最有感情的話回答：“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我親愛的朋友，你還活著吧？”三十分鐘后，他給喬治·布什打了一個電話。布什在電話那頭說道：“我的上帝呀，聽見你的聲音我太高興了。”戈爾巴喬夫大聲說道：“親愛的喬治，我也很高興再次聽見你的聲音。他們想讓我辭職，但是我拒絕了。”布什回答道：“聽起來還是原來那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充滿活力和自信！”美國總統接著致電最近被他稱為“野蠻人”的葉利欽，告訴他：“我的朋友，現在你的威望在這里都高上天了。”[8](#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_2)

不久，第二架飛機在福羅斯降落，上面乘坐的是俄羅斯政府的武裝軍人，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和伊萬·西拉耶夫帶領，來護送戈爾巴喬夫一家安全返回莫斯科。當部長們到達別墅時，賴莎看見他們拿著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她大喊：“什么，你們是來逮捕我們的嗎？”得知真相后，她不禁流下了眼淚。

大家都抱在一起哭，過往的爭吵都被拋到一邊。戈爾巴喬夫因為激動幾乎語無倫次，一遍又一遍地強調“我沒有跟他們做任何交易”。魯茨科伊覺得，搖搖晃晃著去親吻每一個到訪者的賴莎看起來就像快死于“心力衰竭”了。

俄羅斯副總統擔心會有人搗亂，在空中炸毀總統飛機，于是使用了聲東擊西的辦法將戈爾巴喬夫一家送往莫斯科，作為誘餌的飛機后座上坐著痛苦的克留奇科夫，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被逮捕的命運。

8月22日星期四凌晨兩點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身穿一件防風夾克和一件臟兮兮的套頭衫，從飛機舷梯上走下來。賴莎由十歲的孫女謝妮亞扶著，走在戈爾巴喬夫后面，謝妮亞的全身用一塊毯子包裹著。戈爾巴喬夫說：“我從福羅斯回到了另一個國家，我自己現在也變成另一個人了。”在回總統別墅的車上，他們的女兒艾麗娜失控地輕聲啜泣。賴莎的情況很不好：她在返程途中都躺在飛機的地板上。[9](#Mu_La_Tuo_Fu___Mi_Ha_Yi_Er__Ge_E)戈爾巴喬夫多年后解釋，他們一家人糟糕的狀況，使他沒有馬不停蹄趕去俄羅斯白宮，去感謝現在還大量聚集在那里的擁護者。盡管如此，這卻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人群中爆發的對以前不受歡迎的戈爾巴喬夫的情感開始迅速地衰退。

因為這次事件，戈爾巴喬夫的權勢被削弱了，而葉利欽的聲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在政變期間，葉利欽不僅在蘇聯內部集結起進步的力量擊退了政變者，還讓他的對手戈爾巴喬夫總統恢復職務，繼續和平的改革進程。這次失敗的政變表明，來自烏拉爾地區的這位身材高大、笨拙而嗜酒的農民是最有能力的領導人，也最有可能為俄羅斯人民提供注定失敗的共產主義試驗之外的選擇。

許多國際觀察家都沒有發現，在過去的一年里，相信民主理念的、受過教育的、有野心的年輕男女堅定地偏向了葉利欽的陣營。這些人在大城市里的群眾基礎很狹窄，他們受到葉利欽吸引是因為他很受人民（narod）的歡迎，他對軍方有影響力，并且能將他們帶往自己的目標。

盡管如此，政變發生幾天后，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仍將葉利欽描述成一個煽動民心、好賣弄愛出風頭的機會主義者。當斯考克羅夫特的想法被泄露給《華盛頓郵報》后，新的美國大使羅伯特·施特勞斯給華盛頓遞了一個消息，聲稱這樣抨擊葉利欽是愚蠢的，這又給了葉利欽一個借口來討厭深受西方喜愛的戈爾巴喬夫。[10](#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5)

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其他政變領導人都被逮捕了。克格勃首領給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信，說他感到很抱歉，總而言之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羞愧”。有人看見在被拘留前，流著淚的亞佐夫一邊吸煙一邊咕噥，“我是一個該死的老蠢蛋”。他將坦克調進莫斯科的決定現在看來是一個戰略性錯誤。這樣就迫使軍方做出選擇，而他們更傾向受歡迎的俄羅斯民選總統葉利欽，而不是酗酒過度的、非選舉出來的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他請求得到戈爾巴喬夫的原諒。帕甫洛夫也懇求總統能原諒他。

普戈和妻子舉槍自殺了。趕來莫斯科參加政變但沒起到作用的陸軍元帥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被發現在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上吊自盡，就是戈爾巴喬夫內閣的樓下。這位六十八歲的戰爭老兵給總統留了一封信，是在兩次試圖自殺之間寫的，信中說道：“我的祖國正在死亡，而我不能茍活。”

共產黨的財政總主管尼古拉·克魯奇納負責管理號稱有價值九十億美元的黨的資產，他從自己家七層樓高的公寓直接墜下。這也被看做是自殺。他的繼任者格奧爾基·帕甫洛夫六周后死于同樣的方式。他們將許多關于黨的巨大財富去向的秘密一起帶走了。

在戈爾巴喬夫總統回來的第一天，他又出差錯了。星期四早上，白宮外面有一個浩大的示威活動，慶祝政變失利，戈爾巴喬夫受到了邀請，但他最終決定不露面。謝瓦爾德納澤因為這又一個錯誤而感到絕望。切爾尼亞耶夫幾次提醒戈爾巴喬夫，白宮外面的人民在等他，但這位被釋放的人質“輕蔑地拒絕參加這個歡樂的、受歡迎的慶祝活動”。結果當戈爾巴喬夫的名字在示威活動上被提到的時候，出現一大片喝倒彩聲和大喊“下臺”的呼聲。

相反，戈爾巴喬夫決定在外交部新聞中心舉行一場新聞發布會，到場的八百名國內外記者以及官員站起來長時間鼓掌。這樣的形式更合他的心意。令人驚訝的是，他認為蘇聯共產黨還有復興的能力，盡管已經出現了黨的高層干部在未遂政變中的合謀現象。對切爾尼亞耶夫來說，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錯誤，“這個錯誤沖走了你在普通人中間、在街道上、在政變的前幾天看到的一波波同情和人道關懷”。為戈爾巴喬夫做翻譯的帕維爾·帕拉茲琴科心想，“這下戈爾巴喬夫要損失慘重了”。他對一個說英語的同事說道：“蘇聯共產黨完了。”之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直接告訴戈爾巴喬夫：“蘇聯共產黨已經完了。你為什么看不清事實呢？談它的什么復興沒有任何意義。就像是在對著一具尸體急救。”[11](#Lei_Mu_Ni_Ke___Lie_Ning_Ling_Mu)

8月23日，星期五，戈爾巴喬夫試圖就沒有感謝白宮代表們在保衛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作出補償。上午十一點，他給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言人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打電話，說他想給俄羅斯議會講話。他會在十二點到達。

大會堂和陽臺馬上就擠滿了人。戈爾巴喬夫走上講臺的時候受到了鼓掌歡迎，但當他試圖為支持政變小團體的政府成員辯護時，底下出現憤怒的吼聲。[12](#Ha_Si_Bu_La_Tuo_Fu__Khasbulatov)比戈爾巴喬夫足足高出六英寸的葉利欽以威脅的姿態突然出現在他身邊，夸張地拿出一份政變第一天由總理帕甫洛夫主持、六十名資歷有深有淺的部長參加的戈爾巴喬夫內閣會議的會議記錄。

戈爾巴喬夫抗議道，他還沒有看過這份記錄。葉利欽俯視著漲紅臉的蘇聯總統，命令道：“現在讀。”戈爾巴喬夫沒有反駁。報告顯示，幾乎整個內閣都背叛了他，要么出于信念，要么出于懦弱。他們一個接一個表示對應急委員會的支持。葉利欽出示了第79號政令，暫停俄羅斯共產黨的一切活動，他故意在整個代表大會面前簽署了這份政令。當戈爾巴喬夫結結巴巴地說：“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我不知道你在這兒簽什么……”葉利欽直接打斷他：“我已經簽完了。”

葉利欽這副蠻橫表現被播放到全世界，說明戈爾巴喬夫已經不再是他回到的“另一個國家”的主人了。當喬治·布什在電視上看到葉利欽“讓戈爾巴喬夫碰了一鼻子灰時”，他評價道，“我想他已經過時了”。

蘇聯總統受到了興奮的代表們一個多小時的盤問，他覺得葉利欽在一旁帶著“虐待狂似的快感”幸災樂禍地注視著。一個代表沖到話筒前歇斯底里地宣告，所有的共產主義者都必須從這個國家掃地出門。戈爾巴喬夫反駁道：“哪怕是斯大林變態的大腦也不會生出這樣的念頭！”他在他們眼里看不到任何憐憫，只有濃濃的憎恨。

下午一點半，哈斯布拉托夫跟葉利欽輕聲道：“該結束了。”

俄羅斯總統問道：“為什么？”毫無疑問，他是想起了自己在共產黨會議上受到的由戈爾巴喬夫策劃的羞辱。

哈斯布拉托夫回答道：“我忍不住替他感到難過。”

葉利欽笑了笑，站起來宣布會議結束。他邀請戈爾巴喬夫到他的辦公室去，跟他和哈斯布拉托夫一起共進午餐。盡管戈爾巴喬夫怒火騰騰，他還是不得不向他的對手表示感激，因為他擊敗了政變并讓他安全返回莫斯科。他帶著一點點激動向他們講述，他在BBC上聽見哈斯布拉托夫稱密謀者們為“罪犯”，他告訴賴莎如果俄羅斯站起來反抗，他們肯定會重獲自由。

哈斯布拉托夫馬上問道：“那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是怎么回答的呢？”戈爾巴喬夫說：“她說她從沒想過自己會被葉利欽和他的同伴所救。”

在戈爾巴喬夫離開時，他的車被成百上千個葉利欽的支持者堵在路上半個小時，他們發出噓聲和嘲笑聲。這群人后來包圍了共產黨在老廣場的總部，在那里，共產黨官員們正在瘋狂地搶紙、電視、傳真機、復印機和電話聽筒。人群又移動到盧比揚卡，在波波夫市長提供的吊車的幫助下，將布爾什維克秘密警察的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雕像從基座處推倒。

葉利欽接受了一個廣播采訪，采訪中，他批評了戈爾巴喬夫在政變的醞釀階段讓自己身邊圍著一群強硬派分子。他說：“你不能廓清他在這個陰謀中的所有責任。誰挑的這些官員？他挑的。誰給的他們信任？他給的。他被自己最親近的人背叛。”通過指示戈爾巴喬夫應該用誰來填補那些被逮捕的同志，他堅稱自己凌駕于戈爾巴喬夫之上。長著濃眉、黑發和花白胡須的空軍元帥沙波什尼科夫，曾威脅要轟炸密謀者，又好交際，取代了亞佐夫的位置。前內政部長瓦季姆·巴卡金搬進了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總部的辦公室，他給了美國人一份設計圖，是克格勃安裝在莫斯科新美國大使館內的竊聽設備，這使高層人物感到驚懼不已。

戈爾巴喬夫后來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解釋道，如果政變在一年前發生，可能就成功了，但他一直在誤導強硬派來掩飾自己做出的讓步，直到木已成舟。然而，這樣一來，蘇聯總統發現更難擺脫另一項指控，指責他在1月份的行為縱容了密謀者，當時，他聲稱對維爾紐斯的軍事流血事件一無所知，又未嘗試懲罰相關責任人。應急委員會于是有理由相信戈爾巴喬夫會在他們干完臟活把他接回莫斯科之后，同樣對他們網開一面。

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最終正視“共產黨完了”這個事實，辭去蘇聯共產黨（由列寧創建，由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帶領的至高無上的組織）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總書記職務。雖然他還是蘇聯的總統，但他承認，將他提攜到現在位置上的黨已經無法改良了。他將黨的巨大財產簽字移交給蘇聯最高蘇維埃，后者通過投票決定禁止黨的一切活動。在整個蘇聯，共產主義官員們瘋狂地焚燒和撕毀可能對他們不利的文件。

政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所發生的事情的情報傳播速度太快。政變領導人在星期一凌晨召集電視臺負責人列奧尼德·克拉夫琴科準備廣播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對新聞實行嚴密控制。但在國家電視臺和廣播公司，蘇聯廣播，總部的每個編輯和高層官員都可以在他們的辦公室收看CNN。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從美國廣播公司和他們自己在白宮外街道上采訪愈演愈烈的抵抗的記者那里了解了事態。

國內豎起了天線的群眾也知道了政變正在遭遇反抗。外國文學圖書館的負責人葉卡捷琳娜·吉涅娃利用她在塔甘廣場附近樓房里的設備，出版了一份反政變的小報，她承認從一開始“我們就是從西方媒體那里得知我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當時的CNN國際編輯伊森·喬丹說：“這對于CNN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和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CNN是確保蘇聯政變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CNN的辦公室幾乎就在俄羅斯白宮的街對面，當葉利欽做出站在坦克上的戲劇性舉動時，相關照片通過衛星發送到亞特蘭大，又傳送回奧斯坦金諾蘇聯電視臺，然后通過微波發送給克里姆林宮、外交部和幾個酒店里的廣播用戶。莫斯科市中心附近的電視都可以接受到微波轉播。

政變當天早上，媒體分析師莉迪亞·波爾斯卡婭按下按鈕轉到四臺，她通常聽這個臺的CNN新聞，結果驚訝地發現，美國人居然像往常一樣在播放新聞。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在阿拉木圖的辦公室二十四小時收看CNN新聞，得以迅速判斷出政變團體不值得他支持。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承認，美國白宮把CNN看做能將對葉利欽的支持最快傳達到莫斯科的有效消息途徑。政變失敗后，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寫道：“感謝信息科技！感謝CNN！擁有拋物線面天線的所有人都可以接收到這個廣播公司的播送，也因此得知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全貌。”[13](#Xie_Wa_Er_De_Na_Ze___Ge_Er_Ba_Qi)政變密謀者面對的是來自奧斯坦金諾內部的反抗。新聞主任埃琳娜·波茲尼亞克拒絕按照命令將亞納耶夫顫抖的手指和記者們嘲弄的笑聲從新聞發布會的播放中消除。[14](#Mi_Ci_Kai_Wei_Zi___Qie_Huan_Pin_3)

戈爾巴喬夫解除了克拉夫琴科作為國家電視臺負責人的職務，無視他的借口：在克格勃的槍口下，奧斯坦金諾除了聽從應急委員會的命令別無他法。總統要求他曾經的朋友葉戈爾·雅科夫列夫來代替克拉夫琴科，他們已經將近一年沒有說過話了。這位進步的前《莫斯科新聞報》編輯在接受之前，先敏銳地獲得葉利欽的準許。雅科夫列夫恢復了被禁止的節目，重新雇用曾因拒絕接受審查制度而被解雇的記者，并開始擺脫在俄羅斯和全世界廣播機構里假裝成記者的克格勃特務。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讓戈爾巴喬夫上國際新聞廣播，顯示他仍然作為蘇聯領導人在工作。他在CNN和ABC找到樂意合作的盟友，他們兩家公司正在競爭政變后接觸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機會。兩位總統都同意接受ABC的請求，二人出席由彼得·詹寧斯主持的莫斯科“市政廳”會議，于9月2日星期一進行聯合電視直播，面向俄羅斯和美國播出。

在ABC新聞總裁魯恩·阿利奇公開夸耀“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直播將為美國各地的人們提供一個平臺，在這關鍵的歷史時期向兩位領導人提問”，之后他們的競爭對手CNN總裁湯姆·約翰遜和伊森·喬丹馬上乘坐8月29日從亞特蘭大飛往莫斯科的航班來“阻礙采訪”。讓他們感到高興的是，葉戈爾·雅科夫列夫讓戈爾巴喬夫在原定錄制ABC節目的前一天接受他們長達半個小時的獨家采訪，采訪由斯蒂夫·赫斯特主持，也在蘇聯電視臺播放。

這次采訪是戈爾巴喬夫夸耀他恢復政治運氣的一次機會。當天，他召集十五個原蘇聯共和國中十國的總統開會，其中包括葉利欽，他們同意組成一個國家委員會，由戈爾巴喬夫擔任領導，再度啟動關于一個新聯盟協議的談判。

他堅持認為自己再次掌握了控制權。他告訴CNN的赫斯特，他與葉利欽的新結盟是“堅不可摧的”。

1. [筆者綜合了多方敘述來描述1991年的八月政變，主要來源于：阿倫的《鮑里斯·葉利欽》；波爾金的《震撼世界的十年》；切爾尼亞耶夫的《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科爾頓的《葉利欽》；多布斯（Dobbs）的《打倒“老大哥”》（Down with Big Brother）；鄧洛普（Dunlop）的《俄羅斯的崛起與蘇聯的落幕》（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雷姆尼克（Remnick）的《列寧陵墓》（Lenin’s Tomb）；斯蒂爾（Steele）的《不朽的俄羅斯》（Eternal Russia）；葉利欽的《為俄羅斯奮斗》；科爾扎科夫的《鮑里斯·葉利欽》與沙波什尼科夫的《選擇》（Vybor）。](#1_17)

1.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74—375頁。](#2_17)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408頁。](#3_16)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34頁。](#4_15)

1. [普京（Putin）、格沃爾基揚（Gevorkyan）、季馬科娃（Timakova）和科列斯尼科夫（Kolesnikov）《第一人稱》（First Person），第93頁。](#5_15)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17—824頁，其中包含了賴莎在日記中對政變的記述。](#6_12)

1.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91頁。](#7_8)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32頁。](#8_8)

1. [穆拉托夫，“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9_8)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44—445頁。](#10_8)

1. [雷姆尼克《列寧陵墓》，第495頁。](#11_8)

1. [哈斯布拉托夫（Khasbulatov）《為俄羅斯奮斗》（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170—184頁。](#12_8)

1. [謝瓦爾德納澤，“戈爾巴喬夫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orbachev）。](#13_7)

1. [密茨凱維茲《切換頻道》，第105頁。](#14_3)

# 第18章 12月25日：黃昏

在離辭職演講開始不到一個小時的時候，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終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準備好了，他的演講稿用大號字體打印出來，供他在播放時朗讀。他很滿意自己找到了適當的語調來莊嚴地表達他的失望和被葉利欽背叛的感覺。

在等待的這段時間，他允許泰德·科佩爾再多問幾個問題。然后，ABC的團隊走到克里姆林宮的走廊上時，他示意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和安德烈·格拉喬夫留下來，說：“我們喝杯咖啡吧。”

他們三人坐在那個橢圓桌子旁，戈爾巴喬夫喜歡與來訪者在那里聊天。侍者葉妮亞端來一個托盤，上面有咖啡、糕點和單片小三明治。

格拉喬夫覺得，戈爾巴喬夫是不想自己一個人留下來和“他的混雜思緒、沒發表的演講和馬上要放手的核提箱待在一起”。[1](#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4)

他們討論戈爾巴喬夫應在電視直播演講之前還是之后簽署辭去總統職務的政令。雅科夫列夫的建議是演講后。他認為，如果看電視的人都能看到他簽字的一幕會更好，這會添加一種戲劇效果和終結感。這個事件的形式主義越多，就越會被視為一次有尊嚴的退場。

即將上任的政府沒有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權力轉移安排儀式，他們都為此感到非常沮喪。

他們喝著咖啡，談話自然就轉到他們對自己未來的擔憂上了。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命運他們還記得。兩年前的這一天，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領導人和他的妻子埃琳娜在一次反抗極權統治的暴動之后被行刑隊執行槍決。戈爾巴喬夫輕蔑地將齊奧塞斯庫看做“羅馬尼亞獨裁者”，但他們二人保持著高調的關系。在行刑前二十天，戈爾巴喬夫還告訴當時正在訪問莫斯科的齊奧塞斯庫，沒有理由擔心共產主義的崩潰或終結，他們還同意在1月9日開一次總理會議。戈爾巴喬夫在齊奧塞斯庫走時還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1月 9日的時候你應該還活著”[2](#__Kai_Chuang_1989Nian_De_Li_Shi)。但實際上齊奧塞斯庫沒活到那天。

格拉喬夫提出一個更加現實的擔憂，葉利欽的人會采取行動，讓戈爾巴喬夫成為過去錯誤的替死鬼，就像德國人對埃里希·昂納克做過的那樣。這個擔憂在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的腦子里盤桓了整整一個星期。他在最后一刻臨近時在日記中寫到，也許什么都不會發生。畢竟他們是俄羅斯人，不是德國人，況且人們已經在為戈爾巴喬夫感到難過了。但這里也不是法國。戈爾巴喬夫永遠不可能像戴高樂那樣被允許重返政壇。到目前為止，一切事情都遵循著文明的標準，但他們誰也不能保證將來的某個時刻葉利欽不會敗壞他們所有人的名聲，來為自己摧毀蘇聯找正當理由。格拉喬夫問戈爾巴喬夫，是否會擔心有人通過翻他的舊賬來想著報復他。

戈爾巴喬夫回答道，“我不擔心”，盡管他知道，以前有人曾試圖從他1970—1978年在斯塔夫羅波爾擔任共產黨第一書記時的生活方式上來找茬。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1984年曾告訴他，契爾年科去世前，在政治局的權力爭奪中，戈爾巴喬夫的一個競爭對手曾指示內政部官員從他的斯塔夫羅波爾經歷中挖出一些讓他難堪的材料。[3](#Ji_Mo_Fei_Ye_Fu___E_Luo_Si_De_Mi)

兩年前，當安德烈·薩哈羅夫把戈爾巴喬夫叫到一邊，警告他有人陰謀抹黑他的時候，他感到很震驚。在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結束后，他們擠在昏暗的舞臺角落里的椅子上坐著，這位前異見分子向戈爾巴喬夫透露，他有證據表明掌權派（蘇聯高級官員）想找他的茬。這位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的消息非常確切。“你很容易被控制信息渠道的人施壓和脅迫。他們會威脅發布某些信息，除非你照他們的話去做……即使是現在，他們還一直說你在斯塔夫羅波爾的時候收受賄賂；其中提到了160 000盧布的賄賂。”[4](#Sa_Ha_Luo_Fu__Sakharov___Mo_Si_K)戈爾巴喬夫懷疑葉利欽是這些謠言的幕后黑手，但薩哈羅夫指的可能是強硬派在陰謀抹黑總統來奪權。

盡然這件事情現在又被格拉喬夫重提，戈爾巴喬夫還是堅持自己沒什么好擔心的。“我的良心是干凈的。你真的認為在斯塔夫羅波爾能有什么不得了的特權嗎？那里沒有特殊公寓，連一個特殊商店都沒有。我們在地區黨委會的餐廳買食物。直到最近，賴莎·馬克西莫夫娜還保存著我們的所有收據。”

格拉喬夫問道：“那么，克拉斯諾達爾呢？克拉斯諾達爾跟你們挨著，那里的梅杜諾夫的管轄區里發生了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在毗鄰斯塔夫羅波爾的克拉斯諾達爾地區，曾有一件臭名昭著的腐敗案件，涉及第一書記謝爾蓋·梅杜諾夫，勃列日涅夫最青睞的人之一。戈爾巴喬夫大聲說道：“梅杜諾夫，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自己也看過一些反對他的抱怨，尤其是來自當地猶太居民的，是關于賄賂、敲詐和在官方別墅里的狂歡聚會！他什么都不怕，而他肆無忌憚是有后臺的。他能夠直接接觸勃列日涅夫。”

作為1964—1982年的共產黨總書記，列奧尼德·勃列日涅夫喜歡昂貴禮物，并且不去調查那些針對他最慷慨的孝敬者的指控，因而臭名遠揚。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當時擔任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在解雇梅杜諾夫和腐敗的蘇聯內政部長尼古拉·謝洛科夫上發揮了作用。戈爾巴喬夫跟在座的同伴回憶道，謝洛科夫曾下令毀掉他來達到報復的目的，但最終自己被摧毀了。謝洛科夫在失去職位后不久被發現死亡，死因顯然是自己造成的槍傷。

但據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所言，戈爾巴喬夫夫婦也是給勃列日涅夫送禮之流。兩年前，她告訴莫斯科電視節目“透視”，賴莎·戈爾巴喬夫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家貴重禮品來為她的丈夫贏得好感，其中包括一條項鏈。[5](#Lei_Mu_Ni_Ke___Lie_Ning_Ling_Mu_1)這集包含加林娜指控的節目被克里姆林宮官員禁播，因為“審美方面的原因”。加林娜是一個將在精神病院里結束一生的酗酒者，她是一個有嫌疑的證人，并且也有抹黑戈爾巴喬夫一家的政治動機。她的丈夫尤里·丘爾巴諾夫因為受賄被捕，被判六年徒刑，這次審判被普遍解釋為戈爾巴喬夫在暗示絕不能縱容政治腐敗。

作為黨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會收到禮物，像幾年前時任哈薩克第一書記的金姆哈梅塔·庫納耶夫強塞給他的天鵝絨晨衣和紫貂皮帽，庫納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實擁護者，后來被戈爾巴喬夫指控腐敗。有些最奢華的禮物會存放在老廣場三層的一個倉庫里，那里被戲稱為阿拉丁的洞穴，高層黨員都被要求將貴重禮物存放在此，雖然按照瓦列利·波爾金的說法，很少有人真正照做。這位背叛戈爾巴喬夫的人后來在回憶錄中做出無法證實的斷言，說戈爾巴喬夫將貴重的金、銀和白金禮品留給自己。[6](#Bo_Er_Jin___Zhen_Han_Shi_Jie_De_7)

盡管格拉喬夫知道戈爾巴喬夫在斯塔夫羅波爾沒有什么嚴重的問題，但葉利欽經常針對他的平民主義控訴可能會引起尷尬，即指責他作為一個據稱是平等社會的首腦卻喜好奢華。即使是對戈爾巴喬夫忠貞不渝的夏哈納扎羅夫也覺得，戈爾巴喬夫下令用國家資金在福羅斯建造供他獨享的豪華別墅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與戈爾巴喬夫下臺、葉利欽接管權力進行直接對比的話，他們懷疑這件事情的敏感度會逐漸降低。這樣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更擔心的是，即將落入新政府手中的文件和檔案中會不會找出什么來。在最后的幾天，他們雇了切爾尼亞耶夫日記中記載的三個人，韋伯、葉爾蒙斯基和庫瓦爾金，將一袋袋的文件搬到他們在拉津大街上租的房間里，在里面細細查找任何可能的定時炸彈。戈爾巴喬夫擔心他們隨時可能進不了克里姆林宮，便將一箱箱的政治局文件轉移到總參謀部的總部，切爾尼亞耶夫也為了安全起見把一些敏感的文件帶回家，盡管格拉喬夫警告他，“如果他們向戈爾巴喬夫提起訴訟，你無法排除你家被搜查的可能性”。切爾尼亞耶夫不相信事情會到那個地步，但還是擔心如果葉利欽諸事不順，他就得找別人的茬了。他在日記中強調：“我將會是證人的第一人選，但我的檔案中沒有任何違法或妥協的事情。不過，要找到一些不利于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東西還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他在私人談話中那么坦率。”[7](#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5)

在政變失敗后，共產黨官員被趕出黨中央委員會大樓的時候就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一個心急如焚的高級共產黨官員瓦連金·法林打電話給戈爾巴喬夫，問他是否同意強加在共產黨身上的禁令。當他說他同意時，法林指出，在黨中央的保險箱里存放著極其微妙的文件，會影響他。戈爾巴喬夫回答道，他的處境也很尷尬，什么也做不了。

然而，蘇聯傾覆的唯一積極后果，是再也沒有任何蘇聯機構來指控戈爾巴喬夫違反蘇聯憲法了。

戈爾巴喬夫的其他工作人員有著不同的擔憂，他們擔心準備奪取克里姆林宮的一伙人會有所報復。帕維爾·帕拉茲琴科擔心他曾在鏡頭前給泰德·科佩爾說過的一個評論。他告訴這位ABC采訪者，盡管他可能不會將葉利欽今天的奪權稱為一場政變，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經過民主選舉的人做出的不那么民主或公平的事”。當這個評論在ABC電視節目上播出時，一個朋友“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也許帕拉茲琴科應該向美國人尋求某種保護，讓他不受葉利欽的報復。

在最后一任蘇聯總統回憶過往的時候，警車護送著六輛從Intercar租車公司租來的廂式貨車，鳴著笛亮著閃光燈疾駛向克里姆林宮。

CNN工作人員在白宮結束與鮑里斯·葉利欽的電視直播采訪后，需要穿過城市，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準備好設備，播出戈爾巴喬夫作為正在瓦解的超級大國總統的最后一項公共行為，來完成他們對兩位領導人的獨家報道的第二棒。

CNN資深制片人查理·考迪爾記起在葉利欽采訪結束后一片混亂的景象。“我們在三十分鐘內將所有設備拆開，抬到六輛貨車上。時間太緊了。我們不得不‘孝敬’警察，讓他們一路閃著紅色警燈護航，從莫斯科街道呼嘯而過。湯姆和我坐在頭車里。人們可能會認為我們是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8](#2009Nian_Qiu_Tian_Dui_Qia_Di_Er)

采訪者斯蒂夫·赫斯特和克萊爾·席普曼發現他們被推進車隊尾部的一輛警車里，警車的燈在黑暗的街道上一路閃著。席普曼說道，“我一輩子也沒想過像我這樣的美國人會坐在那樣的車隊中”，因為她經常看見政府車輛在高速路中間的“吉爾車專用車道”上減速，“任何攔在路上的人都可能被撞死”。

CNN的車隊在克里姆林宮的博諾維特斯基門前停下。葉利欽的新警衛對他們接到的指示還不清楚，幾次三番與上頭打電話確認，CNN工作人員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待放行。最終，一輛官員用車出現了，帶領貨車隊伍進入克里姆林宮，經過軍械庫和大克里姆林宮，穿過克里姆林宮廣場到達參議院大樓。

到了下午五點三十五分，技術人員才到達三層的走廊。他們被帶往四號會議室，戈爾巴喬夫將在那里發表講話。這是一個模擬的總統辦公室，裝修得像走廊上離這個房間六英尺遠的真總統辦公室，只用來進行電視采訪。它有時被稱為“綠廳”，因為在有毛邊的楓木嵌板墻面上蓋著一層微綠的牡蠣色綢緞。

CNN與蘇聯廣播達成一致，他們將聯合直播辭職演講。這個獨特的安排是幾天前湯姆·約翰遜、斯圖·盧里與戈爾巴喬夫商談的結果，他們當時呈給戈爾巴喬夫的書，就是那本送給葉利欽的

CNN出版的關于政變的書。他們向總統提議，他們會向全世界直播他的辭職演講，并在結束后馬上進行采訪。戈爾巴喬夫禮貌地聽完，詢問約翰遜CNN的全球覆蓋率。他開玩笑地問，這個廣告公司的“帝國是否運轉良好——它不會被解散的，是不是？”約翰遜回答道：“目前看來它不會的，總統先生。”戈爾巴喬夫笑道：“好吧，這意味著你將自己的帝國構建得很好，但一定要給你的共和國足夠的權力！”他們知道他們的競爭對手ABC已經搶先一步，便請求道，雖然ABC的美國觀眾數目要多得多，但在重大新聞事件上，他們的觀眾數目也會劇增。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后來打電話給CNN的主管們，說戈爾巴喬夫已經同意讓他們直播他的最后演講，并在演講結束后進行采訪。

考迪爾驚恐地發現，俄羅斯電視技術人員搬進來三架“像是五十年代的”巨大攝影機，用來將畫面轉播給俄羅斯和全世界的觀眾。他需要更高清的圖片。他說，“我們絕不會用這些設備的”。他的技術人員準備好一架最先進的攝像機來向他們的卡車傳輸圖片，再從卡車傳送到俄羅斯電視臺，然后由CNN來播放，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操作”。考迪爾還有緊跟在他后面的公司總裁給的額外壓力。約翰遜在他們瘋狂工作的時候對他說：“考迪爾，你知道你要是搞砸了就死定了！”

七點差十分的時候，房間被改裝成一個燈光明亮的電視節目工作室。里面有三架中央電視攝像機，一架CNN攝像機，和提供同聲翻譯的音響設備。沒有ABC的人出沒。來自亞特蘭大的CNN工作人員沒有意識到，科佩爾和卡普蘭正在走廊下邊的真總統辦公室與戈爾巴喬夫待在一起，為他們關于蘇聯最后幾天的紀錄片錄制材料。

帕維爾·帕拉茲琴科發現這個場景有點不真實。當總統準備辭職，并將核武器的控制權移交給鮑里斯·葉利欽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內的美國人要比俄羅斯人多——西裝革履的電視臺主管、刷著厚厚的粉的采訪者、制片人、導演、編輯、革履、攝影師、攝像人員、舉話筒的人、拿著帶夾寫字板的助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所有人都在忙前忙后，到處指揮，檢查電線和麥克風。這位戈爾巴喬夫的翻譯官聽著其中混雜的美國口音時在想：“誰會在哪怕一年前認為這幅場景——這所有的一切——可能出現呢？”[9](#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_4)

幾百碼外的紅場上，幾十個莫斯科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他們對見證歷史的創造興趣索然。他們是顧客，擠向克里姆林宮對面的浩大廣場邊上的大古姆百貨商店，想在商店關門前買他們能買到的所有東西。有消息稱一些稀缺商品上架了。他們排著推推搡搡的隊，搶購他們認為有用的所有商品。

他們忽視了貨架上大多數華而不實的商品，尤其是一堆塑料的護照封面。上面蓋著“蘇聯”的章。這些也只有以后的旅游者才會購買了。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88頁。](#1_18)

1. [《開創1989年的歷史》（Making the History of 1989）第692條。](#2_18)

1. [季莫費耶夫《俄羅斯的秘密統治者》，第37頁。](#3_17)

1. [薩哈羅夫（Sakharov）《莫斯科與莫斯科之外》（Moscow and Beyond），第133頁。](#4_16)

1. [雷姆尼克《列寧陵墓》，第495頁，引自蘇聯法律作家阿卡迪·瓦克斯貝格（Arkady Vaksberg）。](#5_16)

1. [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129頁。](#6_13)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的一則日記。](#7_9)

1. [2009年秋天對卡迪爾、赫斯特、約翰遜和席普曼的訪談。](#8_9)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365頁。](#9_9)

# 第19章 分崩離析

1991年8月那令人恐慌的幾天雖然短暫，共產主義卻似乎有回到蘇聯的架勢，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宣布他們要建立獨立國家的意圖。8月24日，星期六，甚至連烏克蘭都宣布將尋求獨立。

葉利欽震驚了。一個新聯邦下的獨立自主是一回事。但是，即使是他也發現難以預料，幾個世紀以來與俄羅斯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五千兩百萬烏克蘭人，要與蘇聯徹底背離。

不論如何，這位俄羅斯總統正式承認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共和國的獨立，這些國家似乎一直都處于與蘇聯半脫離的狀態。其他國家也跟風，不再害怕違背戈爾巴喬夫。但不管是葉利欽還是戈爾巴喬夫，都面對一個窘境：如果其他蘇聯共和國都脫離的話，用什么來代替蘇聯呢？

8月末的時候，解決這個危機的第一個機會來了。葉利欽的國務卿根納季·布爾布利斯致電克里姆林宮，跟戈爾巴喬夫的顧問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建議，他們應該在白宮見面，一起商討關于蘇聯這片土地的未來的新想法。[1](#Xia_Ha_Na_Zha_Luo_Fu___Jie_Nuo)

夏哈納扎羅夫是一位政治科學家，禿頭，眉毛濃黑，他還用格奧爾基·夏哈的名字寫詩和科幻小說。但他現存的許多手稿都是他寫給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備忘錄，總是催促他進行更加大膽的民主改革。

布爾布利斯是一個令人厭煩的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來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他有著被轉變者的狂熱，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演化成一個無情的反共產主義者。他的演變太過劇烈，以至于在一個電視臺的智力競賽節目中，參賽者聽到一段他激動發狂地宣布對列寧主義思想效忠的錄音時，以為自己聽到的是舊斯大林時期的護教論者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布爾布利斯長著一張瘦削的臉，說話聲調高，被稱為葉利欽的“灰衣主教”，盡管他的品位無疑是世俗的。他是政變后第一個訂購吉爾車的俄羅斯政府官員，葉利欽注意到，布爾布利斯在護航車跑到他閃燈鳴笛的新吉爾車前面時有多激動。

夏哈納扎羅夫和布爾布利斯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想要維持蘇聯，后者想要摧毀它。

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同意去白宮，“也許有人會認為我作為蘇聯總統助手級別更高，他應該來我的辦公室”。但他意識到，這種小細節上的讓步象征著權力的轉移。

他到達白宮的時候還有一個同伴，戈爾巴喬夫的法律顧問尤里·巴圖林，他們被安排在一間接待室里等了半個小時。接下來在布爾布利斯寬敞的辦公室里進行了長達一天的協商，過程中伴隨著更多的細小羞辱。期間，葉利欽的國務卿幾次離席去與他的助手聊天，有兩次他跑到旁邊單獨的桌子上處理與別的來訪者的事務。夏哈納扎羅夫推測，布爾布利斯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不是第一位的了。

爭論的焦點是，到底應該像戈爾巴喬夫想要的那樣成立一個單獨的聯邦國家，各國有一些被下放的獨立自主權，還是應該像俄羅斯所堅持的那樣，成立一個中央集權被削弱的聯邦國家。如果后者占上風的話，蘇聯就的確完了。布爾布利斯說得很清楚，他想到的是俄羅斯在世界上單干。但當夏哈納扎羅夫問他是否準備讓一個獨立的烏克蘭留下克里米亞時，這位葉利欽的顧問回答道：“當然不行！”這個俄羅斯人居住的半島位于黑海，1954年被赫魯曉夫從俄羅斯讓給烏克蘭，當時想的是蘇聯被看做一個永久的統一體，這樣做沒什么關系。現在可就有關系了。

兩方都休息了一會，各自向自己的上司報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各自在電話上與自己的下屬商議。葉利欽沒有堅持布爾布利斯的強硬立場，他說會同意一個統一的軍隊和外交部。戈爾巴喬夫多少受到了鼓舞。他也許可以挽回一個聯邦和一個類似于甚至強于歐盟的共同市場。

葉利欽很快不得不在克里米亞問題上讓步。俄羅斯總統在同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告訴納扎爾巴耶夫，一個獨立的俄羅斯可能不得不與其他共和國重劃邊界，指的便是克里米亞和北哈薩克斯坦講俄語的地區。納扎爾巴耶夫說道：“好吧，那就只有開戰了。”葉利欽的經濟顧問葉戈爾·蓋達爾也強調其中的危險。他說：“那是內戰。如果你開始討論關于邊界的問題，那你就會引起內戰。”葉利欽很快關上了這個潘多拉之盒。他以前每天都能在電視上看到邊界糾紛在前南斯拉夫導致的流血事件。

俄羅斯和蘇聯總統最終能再次以同一張面孔面對世界了。葉利欽在一次電話采訪中牛氣地說：“在政變之后，俄羅斯發生了改變，蘇聯總統也發生了變化。他發現自己有勇氣改變自己的觀點了。比起三個星期前，也就是政變之前的總統，我更相信現在的戈爾巴喬夫。”這兩個競爭對手公開在蘇聯的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相互請教。他們唯一一次爭吵是在葉利欽批評戈爾巴喬夫為政變營造了氛圍的時候，蘇聯總統反駁道：“不要往我身上潑臟水！”

9月5日，戈爾巴喬夫說服代表大會基本上同意將一個新的聯邦稱為獨立國家聯盟，相關的細節將會由共和國領導人自愿組成的新國務院來協商。但是，這也是他有名的口才最后一次對一個議會會議起作用。

有一則軼聞口耳相傳。“獨立國家聯盟”的意思是“拯救戈爾巴喬夫的聯盟”。（這兩個短語的首字母縮寫在俄語中是一樣的。）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9月6日的ABC晨間新聞上一起出鏡。這個頗具先驅性的節目因為這兩位參與者繁忙的日程而被兩度推遲。他們二人挨著坐在克里姆林宮的圣喬治廳里，告訴電視觀眾他們相處得很好。

葉利欽說：“戈爾巴喬夫總統一度認為我是一具‘政治僵尸’，而我認為他不應該當總統。現在我們致力于共同合作，來渡過難關。”戈爾巴喬夫表示贊同：“我們現在不得不合作了。”

之后葉利欽就躲起來了。較量的緊張和興奮之后，隨之而來的是身體的疲憊和悲傷。他在波羅的海海岸的尤爾馬拉海灘待了接近兩個星期；然后在9月18日，他宣稱有一次輕微的心臟病發作，又到黑海的索契休養。他大多數時候都處于半麻痹狀態，或是為他的回憶錄第二卷口述筆記。

每個人似乎都在忙著出書。10月4日，戈爾巴喬夫以50萬美元的價錢將一篇題為《八月政變》的小書出售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主要內容是他與微笑的喬治·布什在一起的七張彩色照片。書寫得太匆忙了，以至于提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在戈爾巴喬夫被困福羅斯期間并未致電問候，這讓人產生誤解，幾乎引起了與巴黎外交關系的破裂。[2](#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5)

在索契時，葉利欽迎來了布爾布利斯，與他討論戰略。他們坐在濕暖海邊的折疊躺椅上，葉利欽的銀發灰衣主教呈給他一份“絕密”回憶錄，“過渡時期俄羅斯的戰略”。這是一份關于完全獨立的俄羅斯的藍圖。通過同意新聯邦談判直到談判破裂以維持合法的表象，來達到這個目的。葉利欽之后應該做好與其他共和國的安排，把蘇聯當做歷史。

葉利欽面臨的是一個將產生巨大影響的決定。他可能獲得對俄羅斯的完全掌控，但代價是很高的。俄羅斯將失去南西伯利亞的草原和哈爾科夫和敖德薩那種“俄羅斯”城市，還將失去自葉卡捷琳娜二世起就作為俄羅斯艦隊基地的克里米亞半島和塞瓦斯托波爾。

在莫斯科，戈爾巴喬夫也嘗試把福羅斯的緊張情緒放松放松。他帶著妻子去看了一場桑頓·懷爾德的戲劇《總統殺局》，他和賴莎發現這部戲劇關于背叛的主題太應時應景了，表示“非常喜歡”。政治顯要一個接一個前來探求他對目前形勢的評價。他向他們保證脫離中央的趨勢已經被逆轉了。他向其中一位來訪者發出警告：“如果我們不能維持一個單一的國家，我們將會面臨另一個南斯拉夫問題。我以生命擔保。”然后，不像努力保持在南斯拉夫省份霸權的塞爾維亞人，生活在各共和國的俄羅斯人在蘇聯土崩瓦解的時候是漠然的。如果中央繼續占上風，他們很多人看到的只有更多的痛苦，以及向一個新的共產主義時期的回歸，而且他們受到了這個時代最可靠的俄羅斯人鮑里斯·葉利欽的鼓勵，去支持蘇聯的分解進程。

葉利欽最終于10月10日，星期三，回到莫斯科，他發現俄羅斯的政治一片混亂，他的議會變成了政治陰謀的巢穴。不論是他還是代表們，都做好了長期對抗的準備，他們不是很確定要怎樣使用現在手中的權力工具。俄羅斯部長們爭論不休，魯茨科伊就是政治混亂的前車之鑒。整座城市充斥著謠言，防止蘇聯分解的第二次政變即將發生。[3](#Suo_Luo_Wei_Yue_Fu_He_Ke_Lie_Pi_1)

同時，戈爾巴喬夫正忙于通過聯合共和國領導人進行一項新聯邦條約的事業，來嘗試奪回主動權。他在葉利欽現身后的第二天召開了一次國務院會議。俄羅斯總統出席很晚，全程保持沉默。不管怎樣，共和國的領導人同意組成一個新的經濟聯盟，關于政治聯盟的討論將在稍后進行。10月18日，下個星期四，將在圣喬治廳象征性地簽署一個胡亂拼湊出來的經濟條約。戈爾巴喬夫對座位的安排、是否應該將香檳土司電視直播（最后直播了）諸多挑剔，他還要確保紅旗比其他共和國的國旗大。他個人決定了最適合簽約后在圣葉卡捷琳娜廳的正式晚宴要坐的椅子。他自己堅信擁有共同國防和外交政策的一個單一聯邦國家的契機再次出現。他將這個想法表達給來訪的德國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后者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德國會支持蘇聯的繼續存在，但又因訪問與莫斯科沒有聯系的獨立共和國而引起戈爾巴喬夫的不滿。在根舍離開后，戈爾巴喬夫將他稱為一頭“大象”，抱怨他的行為不夠得體。[4](#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6)

葉利欽看似支持經濟聯盟，卻已經在計算著他的下一個重大舉措了。10月28日，星期天，他做出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他坐在大克里姆林宮給俄羅斯立法機構作了一次激情演講，他宣告讓這個國家擺脫危機的唯一方法是采用極端而猛烈的行動。因此，他打算放松物價，結束補貼，加速俄羅斯境內的私有化進程。

他聲稱，“是時候毫不猶豫地采取決斷而嚴厲的措施了”。前路也許會遇到艱難，但如果不這樣做，就只有毀滅。“緩慢行動的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需要一個重大的經濟突破……如果我們不抓住打破不利事件進程的真正機會，將會讓自己陷入赤貧的困境，我們存活了數個世紀的國家也會遭遇災難。”議會被葉利欽強有力的言辭影響，授予他通過政令實施他那“大爆炸”式經濟改革的權力。即使是戈爾巴喬夫忠誠的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也深受震動，將葉利欽的推動視為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突破性進展。

戈爾巴喬夫得知關于這個大膽舉動的最早消息，是在辦公室瞄到電視上葉利欽在演講。俄羅斯總統的動作沒有驚動戈爾巴喬夫，哪怕他們在前一天晚上還通過電話。戈爾巴喬夫要來了演講稿，在第二天去馬德里的總統飛機上讀了好幾遍，他是去馬德里與喬治·布什總統共同主持一場中東會議的。他認為，現在的經濟體制沒什么問題。但這歸根結底是一次俄羅斯的舉措。中央沒有權利干涉。葉戈爾·雅科夫列夫當時也在飛機上，他警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明顯是打算毀了蘇聯。

在馬德里，戈爾巴喬夫發現他的國際同僚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擔心他是否有能力幸存下來。他夸口道，葉利欽“太容易受隨從的影響”，不用太把他當回事。但是，他自己的行為舉止卻露了底。詹姆斯·貝克發現戈爾巴喬夫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就像一個尋找救生圈的溺水者。西班牙總理菲利佩·岡薩雷斯力勸戈爾巴喬夫堅持下來，因為歐洲需要兩個保障支柱，西邊的歐共體和東邊的蘇聯。

在一個蘇聯和美國總統聯合出場的場合，翻譯帕拉茲琴科發現，曾經將戈爾巴喬夫看做一位頂級世界領導人的美國人臉上帶著懷疑、冷淡和漠然的表情，他們現在已經將他視為“過去式”了。在會議結束后，布什跟戈爾巴喬夫說再見的時候，傲慢地拍了拍他的背說道：“你還是主宰者！”[5](#Pa_La_Zi_Qin_Ke___Wo_Yu_Ge_Er_Ba_5)

與戈爾巴喬夫同行的新蘇聯外交部長鮑里斯·潘金認為美國的影響力不言而喻，他悄悄地請求詹姆斯·貝克鼓動美國總統勸葉利欽保留蘇聯外交部。[6](#Pan_Jin__Pankin___Zui_Hou_De_Yi)

在飛回莫斯科的飛機上，戈爾巴喬夫告訴切爾尼亞耶夫、帕拉茲琴科和格拉喬夫，他非常確定能夠成功打造一個新聯邦。帕拉茲琴科發現飛機上最消極的人是賴莎，她對未來有著“沉重的憂慮”。

她完全有理由替她的丈夫擔憂。一切都是不確定的。葉利欽演講后，成立了一個新的俄羅斯政府，他自己擔任總理，另外兩個極端激進的改革者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和葉戈爾·蓋達爾擔任副總理。這個新政府采取了膽大到令人窒息的行為，開始接管中央機構，并將蘇聯的工業部門轉變成隸屬于俄羅斯的股份公司，而墮落的蘇聯政府無力阻止這個過程。

烏克蘭將這個憲法危機推到了關鍵時刻。烏克蘭領導人組織了一次關于獨立的全民表決，將在1991年12月1日舉行。戈爾巴喬夫向還愿意聽他說話的每個人保證，俄羅斯和烏克蘭不會也不能分離出去，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同一棵樹上的枝干。但是，如果烏克蘭想要獨立，而且看起來似乎烏克蘭很有可能這么做，那么，它要么得到莫斯科的同意獲得自由，要么被勸服加入一個重新設計的聯邦。否則的話就只有開戰了。

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受到了重視，尤其是在基輔，媒體上也出現了危言聳聽的謠言。烏克蘭副總理康斯坦丁·馬西克告訴《獨立報》，“葉利欽與軍事領導人討論了對烏克蘭采取核攻擊的可能性”，以防止烏克蘭成為俄羅斯的核威脅。俄羅斯情報部向報紙強烈抗議，認為這是煽動戰爭的言論，但編輯維塔利·特雷季亞科夫指出，馬西克或他的上司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都沒有否認對葉利欽的指控。俄羅斯政府派法律顧問謝爾蓋·斯坦科維奇去告訴特雷季亞科夫，這個指控是瘋狂的、荒謬的。葉利欽的軍事顧問康斯坦丁·科別茨將軍也斥責這個說法胡說八道。[7](#Pu_Lai__Pry___Zhan_Zheng_Kong_Hu)

葉戈爾·蓋達爾回憶道，領導人沒有討論倘若出現領土糾紛時使用核手段的實際計劃，但他承認想和做一樣會產生重要影響。

盡管八月政變失敗了，還是有傳言認為軍方參與了一個新聯邦的形成。這樣一種極端手段的可能性和可取性正是戈爾巴喬夫本人在11月中旬與沙波什尼科夫的談話中提出的。[8](#Sha_Bo_Shi_Ni_Ke_Fu___Xuan_Ze)根據這位元帥的描述，他是在大半夜被邀請到克里姆林宮的。戈爾巴喬夫透露，他擔心不論他多么努力，蘇聯都快要分崩離析了，“需要做點什么”。蘇聯總統列出可能的選項，其中一個就是，“你，軍方，將權力拿在手里，把能為你行方便的政府落實到位，穩定局勢，然后功成身退”。

元帥反駁道：“然后就直接哼著歌進巴特羅斯卡亞–蒂什納監獄了。”他指的是莫斯科的一所監獄，其名字意為“水手的沉默”，一些陰謀政變者就被關在那里。“我們已經在8月份做過類似的事情了。”

戈爾巴喬夫語無倫次地說：“你在說什么呢，葉妮亞。我什么也沒暗示，我只是在捋這些可能的做法，自言自語罷了。[14](#Yi_An__Gen_Ju_Shang_Xia_Wen__Ge)”

這段對話就這樣戛然而止了。沙波什尼科夫在日記中寫道，軍事干預的想法可能導致悲劇的后果。“葉利欽的權威是不可挑戰的，面對軍方干預這樣一個決定，他一定會組織激烈反抗。到時候內戰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想象我的同胞堆成的尸山血海，而我在其中扮演的是劊子手的角色，我自然不會支持戈爾巴喬夫所暗示的想法。”

在多年后被問到這次碰面時，安德烈·格拉喬夫表明，“也不能排除戈爾巴喬夫是在試探沙波什尼科夫這個可能性。他同時在考慮幾種想法。觀察他所能用到的工具是他的責任。拯救蘇聯是憲法賦予他的職責”。但社會已經分裂了，蘇聯總統清楚地知道，任何處于他位置上的領導人都會嘗試采取這些措施，人們卻會認為他是在試圖挽救自己。格拉喬夫說：“戈爾巴喬夫最大的野心之一是引進權力分割的概念；否則的話，他的所作所為就像是一個典型的蘇聯領導人，比如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這樣就是對他六年來所做的一切的否定。”他補充道，戈爾巴喬夫曾經反對任何暴力的想法，說：“我應該怎么辦——向我建立的議會開火嗎？”[9](#2009Nian_Qiu_Tian_Dui_Ge_La_Qiao_2)

戈爾巴喬夫決定不要軍方參與，他后來把部分原因歸結于他閱讀了瑪格麗特·米歇爾的小說《飄》，小說中生動形象地描述了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和犧牲。[10](#Ge_Er_Ba_Qiao_Fu_He_Mu_Li_Na_Er_2)

11月，在蘇聯總統召開的由共和國領導人參與的另外三次會議期間，保持蘇聯完整的可能性再次降低。

11月4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給戈爾巴喬夫留下了希望。他召開會議的方式是，在持續四十分鐘的電視直播中，觀眾看到的是他警告十個共和國的代表，如果他們分裂出去，就會“掉進惡魔的深淵”。攝像機開著的時候，代表們畢恭畢敬地聽著，但之后就一片沉默，每個人都看著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格拉喬夫認為這就像《叢林之書》（The Jungle Book）中的場景，狼群等著最強壯的兩頭狼對峙，看誰會成為領導者。而這場會議的結果是，葉利欽抱著和解的心態。他同意保持統一的聯邦外交政策和武裝力量。戈爾巴喬夫欣喜若狂。這在本質上是一次勝利。

然而，11月14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證實了戈爾巴喬夫的懷疑，由布爾布利斯掌舵的葉利欽團伙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一步一步地顛覆和摧毀保持蘇聯統一的進程。這次會議只有七個共和國參加。烏克蘭不在參加者之列。

葉利欽到得很晚。這是俄羅斯總統經常采取的一個策略，好讓戈爾巴喬夫感到不安。葉利欽原來是非常注重準時的人，他總是能不用手表就令人驚訝地說出精確到分鐘的時間。

他走向二樓的會議廳，假裝因為戈爾巴喬夫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因車臣——已經宣布獨立的一個叛逆省份——發生的事件批評了俄羅斯而生氣。葉利欽怒喝道：“既然你批評俄羅斯，那現在輪到我做出回應了。我們的新關系維持了整整三個月。現在我們的關系結束了。”

戈爾巴喬夫目瞪口呆。其他領導人也都找借口去洗手間。葉利欽慢慢冷靜下來，會議開始了。他們一整天都在辯論，討論像瑞士和加拿大那樣的聯邦模式。戈爾巴喬夫仍想要一個聯邦，而葉利欽想要的是邦聯。這不僅僅是字面上的區別：前者保留了蘇聯，而后者則意味著將蘇聯分成多個獨立的實體。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以局外人的眼光來看，俄羅斯領導人只是在拖時間，控制整個會議進程。

在政變之前，共和國的領導人都相當敬佩戈爾巴喬夫。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科爾扎科夫注意到“戈爾巴喬夫知道他的權力在衰退，變得非常順從”。協議草案大打折扣，直到它規定在這個新聯邦里，每個共和國有權進行外交行為，并建立軍事單位。

戈爾巴喬夫一邊圍著桌子走動，一邊做手勢強調自己的觀點時，不小心碰倒了裝著核密碼的新秀麗箱子。它被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似乎在提醒這群人他仍是蘇聯軍隊的總指揮。

他們最終決定在11月25日簽署一份“聯邦制聯盟國家”的協議初稿。當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出現在樓下的大廳會見媒體時，他們相互打趣。葉利欽看著他的對手說道：“我們并不是總能理解你。”戈爾巴喬夫回答道：“沒關系，你到最后能理解就行。”[11](#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7)

第三次會議于11月25日在新奧加列沃舉行，在這深秋的一天，天氣非常溫和，完全沒有下冬天第一場雪的預兆。一張圓桌被搬到別墅，共和國的國旗也各就各位，等待著一個嚴肅的簽字儀式的開始。這次還是只有七個共和國出席，烏克蘭再次缺席。但葉利欽看起來，似乎還是同意一個聯邦的存在，只是中央要被削弱。他事先就告訴蘇聯電視臺，這個聯邦可以有自己的國防、原子能和公路。會議上，有兩個熟悉的身影站在戈爾巴喬夫的兩側。蘇聯總統找回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擔任他的總統顧問，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擔任外交部長。他們的出現是為了表明老一輩領導集體又回來工作了。

在媒體進來前，葉利欽扔下了一枚炸彈。他宣布他不會簽署這份協議，因為俄羅斯議會可能無法接受上面的措辭。他再次要求“聯邦”的方案由“邦聯”代替。白俄羅斯——在9月份進行獨立表決前被稱為Byelorussia——的國家元首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說他也需要兩周的時間來考慮。

戈爾巴喬夫被這種“背信棄義的舉動”惹火了，他憤怒地作出反應。他氣沖沖地說：“你們的小把戲不只是一種拖延；你們是在拒絕履行之前我們達成一致的東西。”葉利欽反駁道，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該等到烏克蘭六天后的全民公投之后。如果烏克蘭的表決結果支持獨立，將改變一切。

戈爾巴喬夫徒勞地逆向而行：他主張他們必須現在就簽署協議，讓烏克蘭沒有選擇，只有加人。他用粗俗的語言喋喋不休地勸說他們。他大聲說道：“我們已經焦頭爛額了。如果你們拒絕接受聯邦的概念，你們就自己干吧，不關我的事了。”說完這話，他收起自己的文件，帶著隨從們闊步走出房間，在離開時說：“會議暫停！”戈爾巴喬夫在樓下的壁爐廳盡力讓自己鎮定下來。總是靈機應變的戈爾巴喬夫在倍感絕望之下想出了一個主意：總統們應該集體向各國議會請求通過協議初稿。他寫下了一個新版本的協議，派人送到樓上的會議廳。沒過一會，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下來了。在他們走進房間的時候，葉利欽哼著鼻子說：“好了，我們來了。我們作為代表來給沙皇陛下、偉大的汗磕頭了。”戈爾巴喬夫息事寧人地回答道：“是是是，沙皇鮑里斯。”[12](#Tong_Shang__Di_122__123Ye)

盡管如此，格拉喬夫注意到，很明顯，協議的簽署就像不斷后退的地平線一樣，再次變得遙遙無期。他們最終達成一致的文件更像是蘇聯的墓志銘，而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宣言。葉利欽認為戈爾巴喬夫的角色將變得“像英國女王一樣”的預言要成真了。

總統們在深夜離開新奧加列沃，含糊地答應在12月20日簽署協議。他們再也沒回來過。

戈爾巴喬夫不知道的是，在會議暫停期間，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悄悄地討論了這個僵局，同意在烏克蘭的全民公投之后在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見面，討論共同的經濟問題。他們將邀請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參加，在一個偏僻的靜養地度過周末，并可能探討出一個不同的聯合形式。

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后來都宣稱，他們曾真心實意地與戈爾巴喬夫協商過，但這位蘇聯總統堅持一些條件，而他們知道烏克蘭不會接受這些條件，因此，他們不得不想對策。

戈爾巴喬夫知道的是另一回事。有人向他泄露了一份布爾布利斯關于俄羅斯戰略的秘密備忘錄的復印件。他確信葉利欽是在設一個陷阱，拖延時間，直到烏克蘭進行關于獨立的全民表決，然后利用投票結果來催化蘇聯的消亡。

在11月30日的莫斯科電視上，葉利欽說他不能想象沒有烏克蘭的聯邦，如果烏克蘭不簽字的話，俄羅斯也不會簽署聯邦協議。事情已成定局，無法回頭了。

蘇聯總統無法讓自己相信烏克蘭竟然會投票爭取獨立。大多數俄羅斯人感覺他們和烏克蘭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屬于同一個分支——都是源自曾經統一的羅斯族（Rus people）的斯拉夫人。安東·契訶夫和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等經典俄羅斯作家寫作的故事背景就是烏克蘭。果戈理和舍甫琴科出生在烏克蘭。勃列日涅夫也出生在烏克蘭。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都有烏克蘭血統。他們認為烏克蘭對于俄羅斯來說就是德國的巴伐利亞。俄羅斯和波蘭之間自三個世紀以前出現“永久和平”以來，烏克蘭就一直是大俄羅斯的一部分，當時，第聶伯河東邊的基輔和哥薩克處在俄羅斯統治之下。

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呼吁烏克蘭“正常、明智”的人們聽他一言，不僅僅是用腦袋聽，而是要用心聽，不要去聽那些“狡詐政客”的言辭。他說，為什么就在幾天前，他的烏克蘭人司機從一個葬禮上回來，告訴他在自己的家鄉盧甘斯克，人們無意脫離蘇聯。這個例子不具有說服力，因為位于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有大量的俄羅斯人口。

當得知90%的烏克蘭人都在12月1日這天投票支持獨立時，蘇聯總統真的被震驚到了。即使是占了烏克蘭五分之一人口的俄羅斯人中，大多數人都因為害怕在莫斯科會出現另一場政變和厭倦了無休止的物資短缺，而投票支持與“祖國”分開。在他司機的家鄉盧甘斯克，有84%的人支持獨立。

俄羅斯政府馬上承認烏克蘭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美國政府也不甘落后，正式承認了烏克蘭的獨立，惹得戈爾巴喬夫悲嘆：“布什怎么能做這樣的事呢！”

12月2日，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葉利欽討論出路。俄羅斯總統接起電話的時候正在車上，像往常一樣靠坐在后面靠右的座位上，他的保鏢首領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坐在前面司機旁邊的副駕駛座上。葉利欽之前醉得很嚴重。

葉利欽對著無線電話幸災樂禍地說：“現在蘇聯已經沒有出路了——烏克蘭已經獨立了。”

戈爾巴喬夫問道：“那你呢，俄羅斯呢？”

“那又怎么樣！我就是俄羅斯！我們沒有烏克蘭也可以繼續存活。也許我們會回歸四國聯盟的想法：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

戈爾巴喬夫反駁道：“那我的位置在哪兒呢？如果這樣的話，我辭職。我不會像無根浮萍一樣飄著。我不是為了我自己。但你們應該了解，沒有蘇聯，你們都無處可去……你們會毀了所有的改革。你必須做出決定。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我們二人。”

葉利欽嘲諷地說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沒有你我們怎么能行呢？”

戈爾巴喬夫問道：“那么，如果沒有蘇聯，我何去何從呢？”

葉利欽說：“不要擔心，你可以留下來。”[13](#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6)

切爾尼亞耶夫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站在他們暴怒的總統身后，互相使了個眼色。他們二人都很清楚，葉利欽不打算讓戈爾巴喬夫在現在的位置上待很久了。

1. [夏哈納扎羅夫《杰娜·斯沃博德》，第284頁。](#1_19)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80—82頁。](#2_19)

1. [索洛維約夫和克列皮科娃《鮑里斯·葉利欽》，第273—274頁。](#3_18)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51—55頁。](#4_17)

1. [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339頁；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47頁。](#5_17)

1. [潘金（Pankin）《最后的一百天》（The Last Hundred Days）,第236頁。](#6_14)

1. [普萊（Pry）《戰爭恐慌》（War Scare），第110頁。](#7_10)

1. [沙波什尼科夫《選擇》, 1991年12月24日的一則日記。](#8_10)

1. [2009年秋天對格拉喬夫的訪談。](#9_10)

1. [戈爾巴喬夫和姆利納爾《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第129頁。](#10_9)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12頁。](#11_9)

1. [同上，第122—123頁。](#12_9)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3日的一則日記。](#13_8)

1. [譯按：根據上下文，戈爾巴喬夫這句話是對沙波什尼科夫說的，不是侍者葉妮亞。](#14_4)

# 第20章 12月25日：日暮

最后一天的傍晚來臨了，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無可爭議的統治者，接管所有權力之前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必須去克里姆林宮，在戈爾巴喬夫辭職后立刻從他手中正式接過核提箱。但是他現在還不能離開白宮。他面前已經擺著新時代的第一個難題。葉利欽跟CNN的員工道別后，在他五層的辦公室里，有一個來自莫斯科蘇維埃的擺著冷臉的代表團。他們的帶頭人是莫斯科五十五歲的副市長尤里·魯日科夫，一個頭發粗短的固執男人，穿著一件帶毛領的短黑外套。

魯日科夫是來請求葉利欽勸阻莫斯科的民主市長加夫里爾·波波夫辭職的。波波夫曾是俄羅斯總統的盟友。這位頭發蓬亂的市長有著希臘血統，在政變之前是葉利欽陣營中的熟面孔，在8月份的時候，他幫忙守衛白宮。后來，他希望在葉利欽的政府中謀得一職——他想要的是外交部，但被忽視了。于是，他就加入了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委員會，他和葉利欽幾乎不說話了。

波波夫與莫斯科蘇維埃的關系也不和，蘇維埃里都是些保守分子，阻礙他進行經濟過渡的應急計劃。他擔心在葉利欽下周將休克療法引進俄羅斯經濟后，如果一切都分崩離析的話，他要承擔過失。

莫斯科正站在刀口上。葉利欽簽署的一道政令在今天所有的報紙上都有報道，從1月2日起，放松全國的物價。這將結束長達七十年的針對食物和基本物資的補貼，在這七十年間，政治局決定人們應該為一片面包支付多少。這也將不可避免地抬升物價。在一個醒目的標題“我們怎么活？”下，《真理報》發出警告，從1月2日開始，“面包、牛奶和肉類的價格將會三倍于現在的價格，鹽和火柴的價格翻四倍，燃氣和水的價格將會是現在的六倍”。《消息報》的一幅漫畫也表達出了這種絕望感。漫畫畫的是一個嬰兒舉槍對著他的媽媽，搶劫他的嬰兒車，說道：“帶我去瑞典，趕快。”

波波夫曾經向詹姆斯·貝克求助。他在美國國務卿最近來訪的時候告訴他，莫斯科面臨著饑荒和混亂。它撐不過這個冬天，馬上需要15 000噸雞蛋、200 000噸牛奶和10 000噸土豆泥配料。

波波夫溫和地責備這位美國來訪者：“這些物資中，有一些被你們的軍隊囤積三年后就扔掉了。但是，三年的保存期對我們來說完全沒問題。”[1](#Bei_Ke_He_De_Fu_Lan_Ke___Wai_Jia)

一些美國的補給現在已經到達莫斯科了。三天前，兩架美國軍用飛機在謝列梅捷沃機場著陸，裝載著價值200 000美元的軍隊配給，是海灣戰爭剩下的，已經存放一年了，還有有限的糖、面粉和大米被配送到莫斯科的孤兒院和養老院。

莫斯科人永遠都不會忘記1991年12月令人煩躁不安的氛圍和物資短缺。大學生奧爾佳·佩羅娃回憶起自己早上六點就要去排隊為新生的妹妹買牛奶。“到處都是空空的柜臺，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一切事物的情況都很糟糕。”安娜·普魯日娜是地鐵建造公司Metrostroi的專家，五十二歲，每天早晨奶制品店開門的時候她都排在隊伍的第一個，“人群擁擠得厲害，我費盡力氣才避免被踩踏在地”。三十二歲的蒂娜·卡塔耶娃在一個藝術展覽中心工作，她買不到“橡皮奶頭、兒童食品、紙尿布或任何類似的東西”，她的丈夫當演員，從國外演出回來時，被多疑的德國海關官員盤問為什么會帶這么多罐嬰兒食品。五十五歲的葉夫根尼婭·卡塔耶娃是一位翻譯，住在動物園街上，她在莫斯科郊外開車時，看見一個沿著街道走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掛著一捆廁紙，像項鏈一樣。她停下車向他跑去，問他從哪里弄到的廁紙。“當然，我就開車到他說的那個地方，能買多少就買多少。每次你遇到這樣的事，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你會感覺很偉大，在電話上跟朋友們和家人討論。”[2](#2012Nian_2Yue_Dui_Mo_Si_Ke_Ren_D)

事情壞到就連葉利欽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這樣的政治精英都要去搶購食物的程度。他的妻子馬夏和他們十歲的兒子在尼基特街的一個商店前排隊買面包，他講述道，當他的兒子買到最后一塊面包時，“一個女人想從他的手里搶走這塊面包”。他記憶中的是一個接近恐慌的城市。“令人討厭的買食物的隊伍甚至都不像往常一樣推搡吵嚷。一塵不染的空商店。女人到處奔走尋找一些食物，任何在出售的食物。在空寂無人的蒂申斯基市場，東西都是美元價。空氣中彌漫的都是認為這樣的日子沒有盡頭的絕望……日日夜夜，最大的焦慮就是面包。”[3](#2009Nian_10Yue_Zai_Mo_Si_Ke_Dui_1)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跟一個來訪的美國人透露，他的妻子納努莉囤積任何她能在幾乎搶空了的超市里找到的食物。葉利欽最親近的助手列夫·蘇哈諾夫的妻子也要排兩天隊才能買到糖。整個城市陷入徹底的蕭條。不禮貌的行為普遍到讓維克多·洛沙克在《莫斯科新聞報》上這樣寫道：“柜臺就像是一個屏障，兩邊是對壘的敵人。”

因為國家的錢用完了，貿易官員無法再支付運輸費用往俄羅斯的港口運送食物。往常給俄羅斯首都運送供給的載貨飛機也停飛了，因為燃料不足。莫斯科的謝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烏努科沃機場就像難民營一樣，地板睡著滯留的乘客。蘇聯全境的九十個機場都因為缺少燃料被關閉了。高速路旁的加油站也沒油了，甚至美國大使館都要費心替大使的公車找燃料。隨著蘇聯的支離破碎，莫斯科無法再從臨近的共和國征集供給了，在那些國家饑餓也同樣是現實。

這個國家因為不得不接受國際施舍而感受羞辱。《俄羅斯報》報道，位于莫斯科東北的沃洛戈茨基省的居民正收到由瑞典最富裕的商人的妻子們搜集起來的援助物資。蓋達爾回憶道：“美國人幫一點點，法國人幫一點點，加拿大人幫一點點。但是，所有的援助比起實際需求來都只是杯水車薪。”幾乎沒人買得起莫斯科農貨市場的食物，它們大多數是受黑手黨控制的。一只雞可能就要花掉一個月的薪水。讓這場徹底的經濟風暴雪上加霜的是，油價——資金的主要來源——在世界市場上驟降，而且維持蘇聯經濟的石油資金的流動也變成了涓涓細流。外幣銀行停止了所有支出，除從加拿大進口谷物、從英國進口動物飼料和進口其他外國食物和藥物的運輸費用。

然而，為外幣持有者準備的幾個商店，沒有短缺一說。這些商店里塞滿了能在西方超市里找到的任何東西，但幾乎都是由瀕臨滅亡的蘇聯的真正精英——僑民——贊助。有一些外交官、商人和記者住在專門的公寓樓，他們的孩子在這個圣誕節的早晨醒來后在襪子里找到了糖果和玩具。他們從隱藏在紅場上古姆國營百貨商店內一個封閉區域的商店里，如“芬蘭牧人店”，買來火雞、梅子布丁和其他美食準備圣誕晚餐。九百萬莫斯科人被有效地阻攔在這些硬通貨商店之外，因為盧布不可以自由兌換。這些商店小心翼翼地將它們的貨物——葡萄、香蕉、各種面粉、意大利面、法國酒——隱藏在刷了油漆的玻璃窗后，以免引起人們對這片消費者止步區域的注意，也避免激怒拿著空空的網線袋匆匆而過的莫斯科人。

市長在一個星期前要求葉利欽給他特殊權利來支配莫斯科蘇維埃，這樣他就能采取管理行動，防止癱瘓狀態。否則他就辭職。俄羅斯總統不愿意割讓他通過政令進行統治的任何權力，所以拒絕了。波波夫卻沒有辭職，而是讓魯日科夫去打破僵局。作為副市長和城市管理者，魯日科夫是莫斯科真正的行政長官。這位矮壯的前工程師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中，為第一批私有企業，也就是合作社，在莫斯科的開辦提供了方便，8月的時候，他也幫助集結普通民眾來抵抗政變。他試圖說服葉利欽，市長辦公室必須有自己采取行動的自由才能預防混亂出現。莫斯科需要對燃料供給、電力和燃氣網進行控制，也需要對食物庫存進行獨立管理。

在持續了一個小時的時而激烈的協商后，葉利欽簽署了一系列十道政令，賦予波波夫更多權力。魯日科夫帶著他的人回到市政廳。波波夫決定繼續擔任市長。市長注意到總統給出了一個保證，莫斯科將得到“全面援助”來實施過渡。更重要的是，波波夫鞏固了市長的統治。《真理報》以“辭職鬧劇落幕”的標題宣布這個消息，指責波波夫充當想破壞民選代表大會的民主主義者和企業家的工具。

葉利欽如今用在弊病百出的俄羅斯經濟上的休克療法，在一年多以前已經提出來辯論過，當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還在擺弄后來無疾而終的五百天計劃，想將陷入困境的指令體系（command system）轉變成市場經濟。休克療法的原創者之一格里戈里·亞夫林斯基是在哈佛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羅伯特·布萊克威爾的幫助下制作這個改革計劃的。他們還向哈佛經濟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征求意見，他曾幫助波蘭政府實施休克療法。[4](#Wei_De_Er__Wedel___Chong_Tu_Yu_G)據切爾尼亞耶夫所言，薩克斯的態度是“如果你不變得和我們一樣，你們就拿不到錢”。戈爾巴喬夫否決了休克療法，因此也就沒有錢流進來了。

葉利欽說服了俄羅斯議會給他特權，他已經準備好跳躍到資本主義。他將這個任務交給了由蓋達爾領導的一小群激進的年輕經濟學家，蓋達爾是貨幣主義經濟學芝加哥派的信徒。

三十五歲的蓋達爾身材矮小，長得又圓又胖，很有智力天賦，因為他說話時嘴唇開合的方式得了一個昵稱“香腸嘴”（Guboshlyop）。1991年12月25日晚上，他出現在長長的、刷白的會議廳里，四年前，消沉的葉利欽被注射了鎮靜劑，從病床上帶到這個會議廳，因為他膽敢挑戰戈爾巴喬夫的領導能力和特權，從而被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羞辱。蓋達爾出現在這里是要跟瓊·弗科利佐談事情，瓊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剛到莫斯科。

蓋達爾回憶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經濟的狀況糟糕透了。”從其他共和國進口的糖、茶葉、谷物和肥皂已經下降了四分之三。機器制造業和建造業已經停止。蘇聯政府已經有幾個月沒有收稅了。蘇聯的外匯儲備已經枯竭，還欠了三百億的債務。蓋達爾說，“也就是說，蘇聯破產了”。他面臨的問題是，舊系統崩潰的時候，還沒有能夠取代它的東西。[5](#2009Nian_10Yue_Zai_Mo_Si_Ke_Dui_2)

蓋達爾為《真理報》擔任了一段時間經濟學方面的撰稿人之后，很快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作為《真理報》著名軍事記者的兒子和著名兒童作家阿卡迪·蓋達爾的孫子，他強烈支持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分離，這樣他就可以試驗米爾頓·弗里德曼所倡導的“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原則。弗里德曼在另一塊大陸上有過策劃從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過渡的經驗，因此在俄羅斯很知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位經濟學的權威在芝加哥大學培訓了一群智利經濟學家——他們被稱為“芝加哥男孩”（the Chicago Boys）——來幫助皮諾切特總統廢除薩爾瓦多·阿連德的馬克思主義經濟。俄羅斯版的“芝加哥男孩”現在已經從鮑里斯·葉利欽周圍的年輕激進經濟學家中浮現出來了。

葉利欽給蓋達爾的委任是廢除中央集權的經濟，蓋達爾相信現在擁有完美的條件來進行他所提到的無需麻醉劑的經濟大手術。國家相對平靜，軍隊意志消沉，強硬共產主義者被拔去了尖牙。但速度很重要。他需要破壞舊的體系來使得改革不可逆轉。然后，改革者認為，當物價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貨物很快就會出現在貨架上。他的同僚副總理阿納托利·丘拜斯接到了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任務，在這個國家，幾乎一切都是國有資產，從面包商店到汽車工廠都歸政府所有。丘拜斯向蓋達爾預測，不管最后結果怎樣，他都會被當做廉價賣掉俄羅斯的人來憎惡。蓋達爾知道他自己也得咽那口苦水。就像布爾布利斯警告過的，他們屬于一個敢死隊般的政府，政府成員在強制推行必要但不受歡迎的措施后將會被公眾厭棄。

俄羅斯改革者們憂心的是當貨物重新出現在普通商店時，將會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美國的顧問們還是很樂觀的。在12月25日下午的一個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托馬斯·沃爾夫跟俄羅斯經濟部長安德烈·涅恰耶夫保證，最重要的消費品的價格在放松物價的第一個月只會上漲70%。[6](#Ke_Ci__Kotz_He_Wei_Er__Weir___Zi)（涅恰耶夫對此持懷疑態度，他的懷疑是有理由的，因為1月份物價就飛漲了245%，并持續上漲到 250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一份工作底稿承認，“人們仍然對外國顧問存有懷疑，同時前超級大國自然不愿意承認他們還有得學”。

對這個由美國啟發的療法反應冷淡的人里面，就有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即使是在葉利欽努力與魯日科夫達成交易留下波波夫繼續擔任原職的時候，他的副總統還在不遠的一間辦公室里跟記者們談論“我們現在是如何用混亂代替了民主”。魯茨科伊支持的是聯邦內部的俄羅斯的“獨立自主”，他反對與蘇聯分離，他在辦公桌后面掛了一幅蘇聯地圖來強調這一點。俄羅斯總統和副總統的關系變得糟糕，部分是因為葉利欽拒絕讓他擔任總理，除了俄羅斯總統職位之外，葉利欽也打算把這種職位留給自己。

據科爾扎科夫透露，魯茨科伊曾告訴葉利欽：“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我永遠不會讓你失望。我將會是你的皇冠的看門狗。”而對于葉利欽來說，他的副總統已經變成了一個“夸夸其談的大兵”。魯茨科伊尤其厭惡蓋達爾和他的團隊，他將他們描述成一群“穿著粉色短褲、紅色襯衫和黃色長筒靴的決定經營俄羅斯的男孩”。他抱怨道，現在不是進行他們對國家所做的巨大試驗的正確時機。他告訴記者，只有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國家才能引進自由市場，但“今天，俄羅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民主”。

副總統強調他不想和葉利欽對抗——“要問為什么的話，那就是這樣做是不符合邏輯的！”——但事情必須先整理好，私有化不能以搶劫和欺騙的方式進行。對于蓋達爾來說，他對魯茨科伊只有鄙視，他評論道，這個士兵瀟灑的大胡子外表下是優柔寡斷的、不穩定的個性，試圖避免為不受歡迎的決策承擔責任。

俄羅斯議會的發言人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與很多保守代表們一樣回到舊蘇聯思維模式。他感覺“也許是時候提議讓總統解散他幾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了”。

先前，葉利欽的掌權已經在逐步變得脆弱，俄羅斯議會內部的分裂加深，這將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引起一場血腥的決戰。

此外，還有大眾醞釀著第一波對物價上漲的反抗。游行已經開始了。星期天，約五千到一萬人搬著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聚集在克里姆林宮附近，排成一條“饑餓線”后，用茶勺敲打空的鍋碗瓢盆，扮演在施舍處前的隊伍。泰德·科佩爾穿過游行的人群，發現他們已經在懷念死板的共產主義的嚴格控制了，他們既鄙視戈爾巴喬夫也鄙視葉利欽。科佩爾告訴他的ABC觀眾，“茶勺敲擊空罐也許已經成為這個不穩定的新聯邦最有力的象征”。

示威者的領頭人是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也是具有新法西斯主義性質的自由民主黨的領袖，他告訴他的追隨者，美國人來俄羅斯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是來查看俄羅斯的版圖，然后他們就知道該往哪兒扔炸彈了。他威脅道，他一旦掌權，將會在外太空堆滿指向美國的武器，讓阿富汗成為俄羅斯的省份，將西烏克蘭廉價轉出，最后引爆立陶宛沿境的放射性垃圾來殺死那些患有輻射病的人群。

在蘇聯走到盡頭的這一天，還有其他危險人物在討論怎樣利用國家的混亂狀態。就在莫斯科外多山的維登索沃地區的一棟別墅里，一些擔心國家未來金融結構的人開完了為期三天的秘密會議。從12月22日到25日，來自不同國家的約三十個人（其中大多數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和車臣人）一直在討論應該怎樣將前蘇聯劃分為不同的勢力范圍。他們都是竊賊領域（Vorovskoy Mir）的成員，與會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高等竊賊，被這個國家監獄中的罪犯選定為罪魁，他們之間通過一部竊賊法典維系忠誠。他們來自正在解體的蘇聯的各個角落，來此討論即將出現的新機會，控制一個巨大的商品黑市，從魚子醬和黃金到汽車和零部件，應有盡有。指令性經濟崩潰留下了一片空白，他們已經能夠按照初步的資本主義供求形式來運轉。他們的觸角伸得如此之廣，俄羅斯15%的流動商品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現在，他們正打算從將在新年被賤賣掉的國家資產中獲取巨額利益。[7](#Han_De_Er_Man__Handelman___Zui_F)

在奄奄一息的蘇聯，有組織犯罪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隨著國有資產被放出來私有化，這個現象即將成為革命后俄羅斯的一個主要現象。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最后幾個月，已經有很多財富是通過非法或不完全合法的途徑獲得的。不受控制的私有化正在快速進行。前共產主義負責人都在互相出租主要的工業資產，準備在法律允許時中飽私囊。大多數被葉利欽收歸國有的共產黨的資產，現已經被私有化了。

石油工業猖獗的腐敗導致了出口許可證的批量發行，允許企業家們用盧布購買石油，然后對外出售換取硬通貨。蓋達爾后來說道，這些蓋了章的紙（許可證）“就像是一種哲人石（魔法石），幾乎能即刻將越來越貶值的盧布變成美元”。石油商人和他們賄賂的腐敗的掌權派成員正在盡快將金錢轉移到國外。當俄羅斯總統獲得克里姆林宮的指揮權時，評論家伊利婭·米爾施泰因在《新時代》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對他發出警告。他寫道，葉利欽正在接管的這個國家“已經腐朽到頭了，是一個從頭爛到腳的國家，一個滿是動作快的竊賊和收受賄賂的官員的超級大國”。[8](#A_Lun___E_Luo_Si_De_Ge_Ming)

葉利欽不用媒體告訴他這些。12月末，兩個前克格勃官員給他寫信，宣稱高層共產黨官員正在挪用巨額金錢和黃金，將它們存放到國外的銀行賬戶上。蓋達爾設法從國家基金中弄到900 000美元來雇用國際安全和偵探機構克羅爾公司來調查這個指控。調查遇到了新俄羅斯安全部內部的不合作帶來的阻礙。一個月后，調查停止。

1. [貝克和德弗蘭克《外交政治》，第530頁。](#1_20)

1. [2012年2月對莫斯科人的訪談。](#2_20)

1.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對蓋達的訪談；以及蓋達爾《勝負歲月》，第129頁。](#3_19)

1. [威德爾（Wedel）《沖突與共謀》（Collision and Collusion），第 127—128 頁。](#4_18)

1.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對蓋達的訪談。](#5_18)

1. [科茨（Kotz）和威爾（Weir）《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第169頁。](#6_15)

1. [漢德爾曼（Handelman）《罪犯同志》（Comrade Criminal），第13頁。](#7_11)

1. [阿倫《俄羅斯的革命》（Russia’s Revolution）,第191頁。](#8_11)

# 第21章 中央無以為繼

葉利欽喝醉了酒給出的承諾——在將來對蘇聯的安排中，戈爾巴喬夫會在某種意義上“留下來”——很快就打破了。

12月6日，俄羅斯總統來到戈爾巴喬夫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告訴他自己明天要去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他承諾，在那里，他會和白俄羅斯總統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一起，嘗試說服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留在一個新聯邦里。

葉利欽從會議中擺脫出來時告訴記者：“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說服烏克蘭人簽署聯邦協議，”他補充道，“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將不得不考慮其他選擇。”他沒有說其他選擇是什么。

戈爾巴喬夫知道俄羅斯領導人已經完全厭煩了中央的存在，他感覺到背叛已經在進行中。他告訴切爾尼亞耶夫，他懷疑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雙方都決定摧毀蘇聯。

切爾尼亞耶夫已經從內心里認輸了。他只是走走過場，向戈爾巴喬夫提供各種文件去簽署，比如說蘇聯和其他國家在達喀爾召開的伊斯蘭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但這些都是“垃圾”。他在日記中寫道：“意識到只是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而不是國家需要我，真讓人心情沉重”，想到他的妻子和情人，他想知道，“她們會對此作何反應呢？”

帕維爾·帕拉茲琴科預測，白俄羅斯的這場會議結果將由一個事實決定，那就是他們三個人都因為自己的原因討厭戈爾巴喬夫。

1991年12月7日下午三點剛過，鮑里斯·葉利欽乘坐的俄羅斯政府飛機降落在位于莫斯科西南四百英里處的明斯克。陪同葉利欽的有副總理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和葉戈爾·蓋達爾、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和法律顧問謝爾蓋·沙赫拉伊。他們的護衛是由葉利欽的保鏢首領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委派的二十名身強體壯、配有突擊步槍的俄羅斯安全部成員。

飛機再次起飛后，往西南方向飛行，三十分鐘后降落在布雷斯特郊外的一個軍用機場。之后，一個小車隊載著這些俄羅斯人深入歐洲最后的原始森林之一，別洛韋日森林。在鵝毛大雪中，車隊駛過普魯然尼鎮（Pruzhany），并一直開到了波蘭邊境。車隊在域斯格里（Viskuli）停下來，這是一個為滿足勃列日涅夫的打獵愛好在七十年代建造的莊園，以方柱為門，旁邊有澡堂、村舍、看守小屋和服務區。

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中進行的，以保證代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這三位領導人的會面不受到記者或其他更危險的勢力打擾。白俄羅斯的克格勃首領愛德華·辛德洛夫斯基一大早就調來了重裝備的巡邏隊在森林里巡邏，并封鎖了附近的公路。他跟舒什克維奇保證“一切正常；我們與俄羅斯特殊安全部門保持著緊密聯系，不會有任何問題”。他們害怕的敵人是蘇聯軍方的保守分子，那些人可能會受到慫恿，來阻止他們將要做的事情。

舒什克維奇、克拉夫丘克和他們的高級官員已經到了，他們是在大半上午的時候從明斯克一起飛來的。烏克蘭總統和他的總理弗拉基米爾·福金一到就去打獵了。五十七歲滿頭白發的克拉夫丘克不想被人看見自己閑待著等俄羅斯領導人。這位因政治上詭計多端被稱為狡狐的前共產黨意識形態擁護者變成了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曾開玩笑說，我從不帶傘，因為我能在雨滴和雨滴之間行走。8月份的時候，他一開始是與政變者合作，后來退出共產黨，然后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

科濟列夫注意到克拉夫丘克有多緊張。他意識到烏克蘭領導人擔心葉利欽會威脅他，并主張成立一個新聯邦，這樣將會導致談判破裂，最后訴諸“南斯拉夫式的劇本”。葉利欽也記得克拉夫丘克非常緊張，甚至有點狂躁不安。蓋達爾回憶道，整個氣氛都帶著深深的焦慮，其中舒什克維奇是最躁動、最情緒化的。在兩個足智多謀而強大的斯拉夫隨從的陪伴下，白俄羅斯領導人都有些應付不了。他是一個方臉禿頭的杰出核科學家，但沒多少政治方面的經驗。他在位還只有十周的時間，當時白俄羅斯拒絕舊秩序，在八月政變之后將權力交給了改革者們。他在外的名聲是曾經指導過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這位后來刺殺肯尼迪的刺客曾在明斯克電子工廠當過工程師。舒什克維奇懷疑他的兩個鄰居是否真的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但他已經準備好跟隨。他相信蘇聯“已經很難進行統治了……是一個核怪物”。而且，他不喜歡戈爾巴喬夫，這個他以前奉為“神”但后來覺得沒法一起工作的人，“因為他從來聽不進別人說的話”。

克拉夫丘克明確知道自己要什么。在離開基輔前，這位烏克蘭總統曾告訴美國外交官托馬斯·奈爾斯，他要去別洛韋日森林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簽署一個國家之間的協議，其中將沒有中央的位置。[1](#Yin_Zi_Bu_Re_Jin_Si_Ji__Brzezins)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在這之前，他已經與俄羅斯總統和白俄羅斯總統密談了幾個月，才達成了他們即將做的交易——這就解釋了葉利欽在1月份的神秘言論，說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已經決定起草一份協議來替代蘇聯，還補充道：“我想我現在能告訴你們地點——明斯克。”

但是，在那個森林里的雪夜，當這三位領導人坐下來吃著野味和豬肉時，一切還是不確定的。

葉利欽用一個夸張的動作亮出戈爾巴喬夫那份聯邦協議草案，放在桌子上。克拉夫丘克記得他說：“你們會同意這個嗎？你們會簽字嗎？你們會討論哪些條款要剔除嗎？你們的答案將決定俄羅斯的立場。如果你們簽了，我就簽。”克拉夫丘克對三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不！”

從那一刻起，俄羅斯領導人不再需要為建立一個包含烏克蘭的聯邦事業空費口舌了。他實現了對戈爾巴喬夫的承諾，他確實又問了克拉夫丘克一次是不是要簽他的聯邦協議。克拉夫丘克拒絕了。終于到了破釜沉舟的時刻。在這片松樹林里，他的思緒回到了蘇聯對第比利斯和維爾紐斯的軍事行動，于是再次堅定了自己的決心，他們不會再“像溫順的兔子一樣收著爪子”，冷靜地等著一個新悲劇的出現。

他們一致認為在他們的級別開展協商有點冒險。所以，他們的智囊團應該連夜找出一個符合他們期望的解決方案。

緊張感慢慢消弭了。克拉夫丘克回憶道：“我們一邊喝著酒一邊聊天，開開玩笑，一片笑聲。別洛韋日伏特加（白俄羅斯的草藥伏特加）擺上了桌。我也喝了點。”烏克蘭總統不無得意地透露，即使是擁有大量俄羅斯人口的烏克蘭地區都在12月1日的投票中支持獨立。葉利欽大聲道：“什么？連頓巴斯也投了贊成票？”

十點到十一點之間，這三個人到了大澡堂，還有布爾布利斯、科爾扎科夫、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總理，他們在蒸霧中放松，一直待到半夜過后。舒什克維奇否認了后來說他們喝醉酒的指控，但是桑拿中的酒精含量很高。他還聲稱葉利欽都沒喝暈呢，而舒什克維奇本人連酒都沒碰，因為“我認為在簽署這樣一份改變命運的文件前夜喝酒就是在犯罪”。

這段時間，葉利欽團隊里的蓋達爾、科濟列夫和沙赫拉伊邀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專家在俄羅斯人住的小木屋里一起工作。然而，白俄羅斯人離開了，烏克蘭的代表們在外面漆黑的雪夜里待著，時不時派一個特使進到科濟列夫稱為“我們的創意實驗室”的小木屋。

在尋找終結蘇聯的確切方案方面，沙赫拉伊被證明是最有想象力的。他是一位哥薩克律師，有著一雙憂郁的眼睛和滿臉絡腮胡子，他替葉利欽起草了很多總統令，包括禁止蘇聯共產黨的命令。他建議，因為蘇聯是建立在1922年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還有外高加索聯邦，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所簽協議的基礎上的，所以，現在這三個依然存在的國家能夠合法解散它。

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在描述這次會議時，都強調他們對這個想法之簡單感到驚訝，并很快通過了。半夜過后，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從寒冷的戶外進來了。他們讀完協議后都點了頭。他們有一個拿給上司的方案了。協議是這樣寫的：“我們，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在1922年的聯邦協議的基礎上，作為蘇聯的三個發起國，根據國際法和地緣政治的事實，確認解散蘇聯。”

用蓋達爾的話說，這就是一把能夠讓他們“快速斬斷法律模糊性這團亂麻的刀，然后開始在事實上已經獨立的國家開始國家建設的進程”。

這些起草人提議了一個接替蘇聯的聯邦，獨聯體，其他蘇聯共和國都會被邀請加入。蓋達爾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訪中強調，“這是我們提出來的，不是總統們”。布爾布利斯也強調道，“最后的提議是由第二級別的官員商討的。我們到明斯克的時候，沒有任何藍本，沒有任何經過仔細權衡的建立新聯邦的想法。這都是在那里產生的”。

看守小屋里沒有復印機，官員們只有讓文件通過兩臺傳真機進行復印。蓋達爾手寫了包含十四個條款的文件。凌晨四點，科濟列夫吃力地穿過雪堆將文件拿去打字員的房間。看守小屋有一名速記員，葉夫根尼婭·佩特丘克，這個嚇壞了的年輕女性是這片森林主管的手下，她被白俄羅斯的克格勃官員臨時接來，據她回憶，她都沒有足夠的時間梳頭。[2](#_Zi_You_Sheng_Huo_Guang_Bo___Lib)科濟列夫不想把她吵醒，就把文件放在鎖著的辦公室門下。當早上打字員說她什么文件也沒找到時，大家都驚慌失措了。過了一會他們才意識到有一個清潔工將文件扔到垃圾桶里了。最終科爾扎科夫將文件從一袋垃圾中扯出來時，佩特丘克發現蓋達爾的很多字跡她都辨認不了，只得讓他把大多數的字句再念一遍。

當這邊的事在進行時，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在一起吃早飯，有煎蛋、黑面包、火腿和奶酪。俄羅斯總統的狀態很好。克拉夫丘克發現葉利欽非常冷靜。“我一點也不夸張！他的狀態非常好，精力充沛，想法豐富。”三位領導人在半上午的時候收到了蓋達爾手寫文件的復寫件，這是佩特丘克女士用她帶來的東德制造的Optima電子商務打字機快速打印出來的。他們同意采用成立聯邦的想法作為與蘇聯分離的遮羞布。現在一切都不可避免了。他們對草稿的段落進行了一些細小的修改，每完成一個條款就小酌一口白蘭地，然后把改完的稿子送去重新打印。文件又通過兩臺傳真機進行復印，最后的版本被夾在三個紅色的硬殼文件夾里。

同時，工人們將一張長形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搬進域斯格里看守小屋的前廳。官員們將文件夾放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國旗模型前。五個記者在臨近的村莊又冷又餓地等了一夜，連在等什么都不知道，他們被帶進來報道這個儀式。

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維奇和葉利欽進來后在桌子旁各就各位，他們的高層助手站在他們后面。舒什克維奇作為東道主坐在中間，葉利欽在左，克拉夫丘克在右。他們打開題為“關于建立獨聯體的協議”的文件夾。協議的內容詳細說明了新的現實。在七十年后，蘇聯名存實亡，它的兩億九千三百萬國民注定要被分隔在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中。這個新成立的實體的總部將設在明斯克。它將沒有國旗、外交部、議會、公民身份、征稅權或總統。然而，大家都致力于對核武器進行單一的軍事控制。其他共和國會受邀加入。

這時，突然出現一個聲音咒罵了一句：“筆上哪兒去了？”居然沒有提供書寫工具來簽署蘇聯的死刑執行令。站著的人都開始從口袋里掏出圓珠筆、氈尖筆和鋼筆。瓦勒里·德羅茲多夫，白俄羅斯《民意報》的副編輯也給坐著的三個人遞了筆。[3](#Luo_Ji_Nuo_Fu__Loginov__Di_462)

在一片寂靜中，三位領導人簽署了紅色文件夾里的文件。只有德羅茲多夫看了看手表，留意了簽協議的精確時間，諷刺的是他的表盤上是蘇聯的象征，錘頭和鐮刀。時間是1991年12月8日，星期天，下午兩點十七分。[4](#__Su_Wei_Ai_Bai_E_Luo_Si_Bao_1)

侍者們端著香檳忙碌起來，有著高高的天花板的前廳回蕩著碰杯的聲音。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擺好姿勢讓攝像機拍照，烏克蘭總統笑得像一只偷了腥的貓。

葉利欽在描述這一刻的時候這樣寫道：“我記得很清楚，一種自由和如釋重負的感覺席卷了我。通過簽署這個協議，俄羅斯……拋掉了半個世界的統治者、與西方文明兵戎相見和解決種族糾紛的警察等傳統形象”。

其他人的反應不一。沙赫拉伊覺得他們像是在埋葬一個親屬。蓋達爾回憶道：“我們所有人心頭都有一個重負。”

德羅茲多夫沒能拿回他的筆。他回憶道：“他們三個中有一個出于習慣將筆放進口袋。我覺得是葉利欽。”

打字員葉夫根尼婭·佩特丘克跟她的上司，森林官員謝爾蓋·巴柳科一起走出來呼吸新鮮空氣。已經快黃昏了，開始下起了小雪。她說：“看看，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我們都做了什么！”數年后，她抗議道：“他們給我什么，我就打印什么，過了一兩天才回過神來。”在她的村莊，離此12英里遠的卡門尤基村（Kamenyuki），她作為摧毀蘇聯的女人而變成了名人。

葉利欽沒有邀請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來參加這次在森林里的斯拉夫領導人會議。這位強大的中亞共和國的領導人是戈爾巴喬夫的同盟，還沒有宣布獨立。如果能夠讓他來別洛韋日森林加入他們，他們就可以給他展示一個既成事實，然后確保獲得尊重他的其他亞洲共和國的支持。但事情沒那么簡單。納扎爾巴耶夫當時正在從阿拉木圖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上。科爾扎科夫致電莫斯科烏努科沃第二機場的負責人，自稱“俄羅斯總統的保安負責人”，要求與納扎爾巴耶夫的飛機通話。機場指揮官粗魯地拒絕了，他說，“我的上司另有其人”。科爾扎科夫心想，這就是權力二元化會出現的情況。戈爾巴喬夫不被看重，但葉利欽沒有運用權力的技巧。[5](#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6)納扎爾巴耶夫在莫斯科著陸后接了電話。三個領導人都跟他通話了。葉利欽給他讀了文件的內容，但哈薩克領導人對于自己被排除在外覺得受到了嚴重的冒犯。他在自己的別墅給戈爾巴喬夫打了電話，告訴他正在發生的事情。戈爾巴喬夫對于事態的發展憤怒不已，他說服納扎爾巴耶夫第二天早上跟他一起在莫斯科對抗這些陰謀者。

看守小屋的三個人擔心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引起軍方的行動。蓋達爾承認有點擔心戈爾巴喬夫真會這樣做，“盡管我多多少少確定他幾乎做不到，因為他找不到一支聽命于他的軍隊”。雖然沙赫拉伊認為白俄羅斯的克格勃一直在告訴戈爾巴喬夫這個森林里的所有事情，他卻不怎么害怕，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已經沒有軍隊了”。[6](#Sha_He_La_Yi__Shakhrai_De_Ping_L)數年后，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吹噓道，如果戈爾巴喬夫給白俄羅斯克格勃下令逮捕這三人，這個命令將在“幾分鐘內”實現。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安德烈·格拉喬夫聲稱陰謀者們有一架直升機待命，如果有必要，他們可以逃亡波蘭，但是蓋達爾不記得有什么直升機。[7](#2009Nian_Qiu_Tian_Dui_Ge_La_Qiao_3)

蘇聯軍隊的負責人沙波什尼科夫元帥的態度很關鍵。整個星期天早晨，戈爾巴喬夫一直狂躁地給他打電話，每次都是問同樣的問題：“你從明斯克得到了什么消息？”每次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都是：“還沒有。”

葉利欽在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的旁邊給元帥打了電話。他直奔主題：“今天我們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白俄羅斯簽署了一份三國聯盟的協議。你的意見呢？”沙波什尼科夫問其他共和國是否會加入。葉利欽說：“是的。”“還有一個問題，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協議里提到軍隊了嗎？”葉利欽說：“是的，當然提到了。”俄羅斯總統朗讀了條款，確認獨聯體將會保留一個共同的軍事戰略空間，包括對核武器的單一控制。他告訴沙波什尼科夫，三位總統已經同意由他擔任指揮官。

沙波什尼科夫問道：“納扎爾巴耶夫同意了嗎？”葉利欽回答道：“是的，他給出了肯定的反應。”元帥感覺到納扎爾巴耶夫實際上可能對這個計劃很冷淡，但他沒有出言反駁。他意識到這樣的事情遲早都是要發生的，盡管他認為比起摧毀蘇聯，他們更急于擺脫戈爾巴喬夫。他接受了提供的職位。[8](#Sha_Bo_Shi_Ni_Ke_Fu___Xuan_Ze_1)

他一放下話筒，電話就響了。戈爾巴喬夫厲聲說道：“那么，發生了什么事？白俄羅斯怎么樣了？”沙波什尼科夫簡單說了一下與葉利欽的談話，給人的印象是俄羅斯總統打電話來是詢問意見的。戈爾巴喬夫打斷了他：“不要多管閑事。我警告你！”說完就摔了電話。戈爾巴喬夫意識到沙波什尼科夫已經受雇于葉利欽的團伙了，他將一直記得，沙波什尼科夫在撒謊時是如何“像一條蛇一樣在油鍋上耍滑蠕動的”。[9](#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7)

葉利欽同時還在嘗試接通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他把華盛頓白宮的電話給了看守小屋操作員。操作員回電話慌亂地說白宮轉接機不知道打電話的人的身份。科濟列夫接過電話，用流利的英語解釋了鮑里斯·葉利欽是誰，以及接通總統的重要性。

布什接了電話。葉利欽給他讀了協議的內容，告訴美國總統這是解決撼動蘇聯的危急的唯一出路。他稱呼布什為“親愛的喬治”，告訴他蘇聯協議已經走到了絕路，他們決定建立一個獨聯體。他說：“我必須悄悄地告訴你。戈爾巴喬夫總統還不知道這些結果。因為我們兩個人的關系，我十分鐘都等不了就想打電話告訴你。”

美國總統猶豫地說：“我明白了。”他有種葉利欽在照本宣科的感覺。他突然意識到俄羅斯總統已經決定分解蘇聯了。

葉利欽跟他保證這份協議遵守了美國承認要獨立的國家所要求的五個原則：和平自治、尊重現有邊界、尊重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權和尊重國際法。

第二天，布什在他的個人迷你錄音機上錄下了一段話：“我發現自己在這個星期一的晚上感到好奇，軍隊去哪兒了？他們太沉默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呢？場面會不會變得失控呢？”[10](#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_3)

葉利欽利用自由世界的領導人（布什）達成自己的優勢。告訴布什的做法進一步減弱了戈爾巴喬夫的權勢，葉利欽與美國總統的協商意味著他們已經掃除了白宮的障礙。

跟戈爾巴喬夫說這個消息的任務落到他們三個人中排在第三的舒什克維奇身上。電話花了一段時間才接通。舒什克維奇在告訴蘇聯總統他們做了什么的時候，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在一邊旁聽。

戈爾巴喬夫想知道，“自己怎么辦？你知道國際社會將會怎么看待這件事嗎？”白俄羅斯領導人回答道：“我當然知道；我們已經告訴布什了，他很平和地接受了。”

戈爾巴喬夫因為這個惡劣的無禮行為爆發了。“你們居然在自己國家的總統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先告訴美國的總統。這太丟臉了！”他要求跟葉利欽通話。

當俄羅斯總統接過電話，戈爾巴喬夫強忍著暴怒嚴厲地對他說：“你們在美國總統的首肯下，在我背后干的勾當，是無比羞恥和丟人的事。”他要求三位斯拉夫領導人第二天都來克里姆林宮向他解釋清楚。他現在完全看清了他的競爭對手表里不一。[11](#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8)

烏克蘭總統聽到戈爾巴喬夫要求他們解釋的想法不禁發笑。克拉夫丘克太不喜戈爾巴喬夫了——反之亦然——以至于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福羅斯的別墅現在已經劃分給烏克蘭，而他要送給任何保證不允許戈爾巴喬夫人內的人。他還想馬上就回基輔。現在是非常時期，他“害怕烏克蘭會受到暴力手段對待”。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都回到了自己的首都，而不是應戈爾巴喬夫的傳召去莫斯科。他們跟他無話可說，也不想冒著被逮捕的危險。他們二人后來都這樣解釋，他們總是覺得無法與戈爾巴喬夫共事，因為他一點都不直率坦誠，而他們發現葉利欽身上就有這樣的品質。在戈爾巴喬夫任期內，他們再也沒見過他。

當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在與情人柳達度過星期天后聽到別洛韋日協議的消息時，他不用任何勸說，就開始準備作為戈爾巴喬夫的忠實仆人提出反對。他在當天晚上寫道：“我不相信蘇聯能夠幸存下去，哪怕是在政變前都不相信。我卻繼續為蘇聯說話做事……但要問為什么？你只能一笑帶過。”切爾尼亞耶夫口中“卑劣的科濟列夫”，也就是俄羅斯外交部長，對媒體宣布，擺在戈爾巴喬夫面前的有兩條路，要么自動辭職，要么兵戎相見，這時“在戈爾巴喬夫陣營里的我們都嚇死了”。不管怎樣，除了把自己交給俄羅斯，他看不到其他辦法，因為蘇聯已經死了。[12](#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2Y)

葉利欽仍在擔心會出現一個“反政變”。他在深夜回到俄羅斯首都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后來聲稱葉利欽醉得要被人抬下飛機，有傳言稱，當時受兩位總統管轄的前克格勃阿爾法小組成員正在準備逮捕協議的三個簽約人，水泥路障也已經運往克里姆林宮來加強防御。俄羅斯廣播還報道，情報部門和軍隊將軍們非法聚集在一起，討論推翻共和國領導人的可能。

第二天早上，俄羅斯白宮的守備也加強了，抱著自動武器值班的警衛增加了，寒冷的空氣中回蕩著他們踏步的聲音。這是這個冬天最冷的一天，溫度降到了冰點以下。

葉利欽打電話告訴戈爾巴喬夫，他不會去克里姆林宮的，因為他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戈爾巴喬夫反駁道：“你瘋了嗎？”葉利欽回答道：“我沒瘋，但某人就不好說了。”

葉利欽沒有想到的是，瘋了的那個人是他這邊的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在當天早上聽到別洛韋日協議之后，馬上跑到克里姆林宮，懇求戈爾巴喬夫以討好美國的國事罪（state crime）逮捕“喝昏了頭的三人幫”。戈爾巴喬夫告訴他：“不要這么激動，還沒有這么嚴重。”善變的魯茨科伊現在痛苦地反對國家的分裂，因為他曾以這個國家之名在阿富汗出生入死。他準備了一份新聞發言稿來攻擊自己的總統，他的朋友們勸他不要這樣做。在發現沒多少人支持他之后，他又打了退堂鼓，幾天后又重新虛與委蛇地宣誓效忠葉利欽。[13](#Mei_De_Wei_Jie_Fu__Medvedev___Su)

據格拉喬夫所言，戈爾巴喬夫從來就沒想過要逮捕葉利欽，盡管他有權以嚴重叛國罪的名義逮捕他。“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躲在森林里的原因。”像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一樣，跟隨戈爾巴喬夫的某些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沒有派一個傘兵師前往森林逮捕“那三個充滿野心的野蠻人”的唯一原因是他討厭血腥。戈爾巴喬夫的前發言稿撰寫人亞歷山大·奇普卡后來痛斥那些將軍和上校們“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阻止這個駭人聽聞的事件”。已經成為葉利欽支持者的戈爾巴喬夫前顧問阿卡迪·沃利斯基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宣布了戒嚴令的話，軍方有可能會支持他。[14](#She_Hui_Jing_Ji_Yu_Zheng_Zhi_Yan)

無論戈爾巴喬夫想不想采取暴力措施，他最終都沒有嘗試。他還沒準備好觸發一場內戰。下令逮捕就意味著走上了通往血腥的道路。“我們不能挑起戰爭。我們不能。考慮到我們的人民現在的生活環境，這樣做是在犯罪。”

然而，克里姆林宮的效忠者們無疑都感到很痛苦。在星期天晚上的一個美國大使館招待會上，帕拉茲琴科譴責別洛韋日協議是第二個政變，一個公然的違法行為，把這個國家像某種繼承的遺產一樣瓜分，來達到擺脫國家總統的目的。

葉利欽壓住了自己的疑慮，在星期一十二點的時候到達克里姆林宮，科爾扎科夫懷抱武器坐在尼瓦車的前座上。跟他們一起來的還有幾車武裝保鏢，被布置在這座紅磚城堡的周圍。葉利欽的個人保鏢們堅持陪他走到戈爾巴喬夫在參議院大樓三層的辦公室門口，葉利欽進去后，他們就站在門口跟戈爾巴喬夫的保鏢干瞪眼。

納扎爾巴耶夫已經到了。他覺得葉利欽看起來因為宿醉糟透了。他馬上抱怨別洛韋日協議傷了亞洲共和國的尊嚴。

戈爾巴喬夫擺好與他的天敵干架的架勢，指控他“進行某種政變……在森林里開會，試圖讓蘇聯倒閉”。他想知道，獨立的國家是否會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葉利欽回答道：“是的，但是沒有戰略型武裝。”戈爾巴喬夫大喊道：“那不就是說烏克蘭將擁有470 000人的軍隊，比統一后的德國還要多100 000人！你是第一個承認波羅的海諸國的，也簽署了有關人權的協議，但結果呢？現在，有了歧視俄羅斯人的公民身份的法律。這就是民主主義者的作為！他們讓‘俄羅斯人滾出去’。”

葉利欽變得憤憤不平，打斷他說：“你為什么質問我？這條死路必須尋找一條出路，我們找到了！”

他們的爭吵沒得出任何結論。葉利欽在一個半小時后離開了。戈爾巴喬夫口述了一份聲明，聲稱結束蘇聯的法律是“不合法的、危險的”。[15](#Ge_Er_Ba_Qiao_Fu___1991Nian_9Yue_1)這與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3月份的全民公投上想要保留蘇聯的意志是相違背的。這將會使生活在俄羅斯境外的數百萬俄羅斯人陷入困境。他召集人民代表大會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對被他駁斥為三位領導人的“倡議”的協議進行判決。

在安德烈·格拉喬夫看來，人們太過關注自己的日常問題，不會為蘇聯采取行動。他們已經對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工程失去了信心，只是保持沉默。當天晚上，這位總統發言人去觀看了斯維亞托斯拉夫·里希特——一個烏克蘭人——表演的鋼琴獨奏，之后又在大晚上跟意大利和荷蘭的大使一起吃晚餐。他們一行人都沒有提到在白俄羅斯簽署的協議，他猜大家主要是不想“哪壺不開提哪壺”。[16](#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8)

戈爾巴喬夫在兩天后失去了采取軍事行動的機會。戈爾巴喬夫希望不管發生什么事情，蘇聯軍隊都要堅持下去，在蘇聯全境維系成一股緊密結合的力量，于是，他要求沙波什尼科夫為他在12月 10日安排一次針對全蘇聯高級指揮官的講話。他們對此的反應是冰冷的沉默。大多數將軍不信任戈爾巴喬夫，也知道他不再是掌權者了。第二天，葉利欽同樣給這些人開了一個兩小時的會議，這些人對葉利欽直爽的風格和他允諾90%的加薪反應更加積極。

在詹姆斯·貝克看來，這些舉動簡直就是地緣政治噩夢：“兩個克里姆林宮的重量級人物用盡手段牟取權力，號召軍隊跟隨他們，增加了潛在的內戰帶來的恐慌——再加上還有核武器的存在。”[17](#Bei_Ke_He_De_Fu_Lan_Ke___Wai_Jia_1)

沙波什尼科夫后來告訴貝克情況有多嚴重。他說，一些急性子的將軍想給總統下最后通牒，要求戈爾巴喬夫向葉利欽挑戰。這將會是八月政變的重演。關于軍事冒險的傳言仍然在莫斯科流傳。謝瓦爾德納澤接到8月份曾組織白宮防御的康斯坦丁·科別茨將軍的警告，軍方的保守分子仍然很強大，并在秘密進行組織。12月11日，《獨立報》的維塔利·特雷季亞科夫前來告訴戈爾巴喬夫，莫斯科到處流傳新政變的流言。戈爾巴喬夫告訴他，這些都是編的。

到12月12日，三個斯拉夫國家的議會都表示支持別洛韋日協議。在俄羅斯議會，188票支持、6票反對、69票棄權的投票結果迎來了掌聲。在沙赫拉伊看來，代表們意識到了協議使國家免于內戰。即使是一些強硬分子也跟葉利欽目標一致，想要送別克里姆林宮不受歡迎的占有者。共產主義代表謝瓦斯特亞諾夫催促他的同志們投贊成票，“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戈爾巴喬夫了”。

戈爾巴喬夫在聽到這條評論的時候雷霆大怒：“這些小人。戈爾巴喬夫的時代才剛剛開始！”[18](#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7)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揮著布爾布利斯在索契給葉利欽的秘密備忘錄，說它的主要內容是在“狡猾的戈爾巴喬夫”把葉利欽騙進新聯邦之前一定要阻止他。布爾布利斯否認俄羅斯領導人結束蘇聯是為了擺脫它的總統。他說，蘇聯已經死了。在白俄羅斯森林里的宣言是一個“醫療診斷”。[19](#Si_Di_Er___Bu_Xiu_De_E_Luo_Si)

葉利欽同伙們的語氣變得越來越難聽了。情報負責人波爾托拉寧故作和藹地說，蘇聯總統不需要擔心，他不會遭受和埃里希·昂納克一樣的命運。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告訴德國報紙《圖片報》：“戈爾巴喬夫又沒有麻風病。我們會找到很多事情給他做的。”格拉喬夫在這之后碰到了科濟列夫，告訴他別得意忘形了。

不論如何，戈爾巴喬夫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納扎爾巴耶夫沒有選擇，不得不接受在森林里做成的交易。哈薩克斯坦、三個斯拉夫共和國和其他還在蘇聯名下的七個共和國同意見面，討論怎么拋棄蘇聯并加入獨聯體。他們定好了時間和地點：12月21日，阿拉木圖。

戈爾巴喬夫發現還是很難接受蘇聯即將結束的事實，盡管他已經有所防備，用軍用卡車將一箱箱政治局檔案文件從克里姆林宮運到總參在阿爾巴特地區茲納門卡街的軍事總部。他仍然幾乎每天都接受記者、大使和國外政治家的來訪，介紹基本情況，一筐一筐地往外倒話，好像通過談論憲法合適性和限制機會主義者就可以像變魔法一樣變出一個折中辦法。當英國大使羅德里克·布雷斯韋特和來訪的英國政府官員雷恩·阿普爾亞德來核桃廳拜訪戈爾巴喬夫時，戈爾巴喬夫咧著嘴伸出手道：“現在什么情況——你們是來了解你們現在是在哪個國家，我現在又是誰嗎？”據布雷斯韋特觀察，總統精神飽滿，他那曬成棕褐色的皮膚，散發著冗煩的、狂熱的魅力。戈爾巴喬夫花了半個小時吹噓一個聯邦國家的好處，同時貶低現在當家的“強盜”、“危險人物”和“沒有經驗的平民主義者”。正當戈爾巴喬夫構建他的“空中樓閣”的時候，大使注意到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投過來的目光越來越悲觀，而切爾尼亞耶夫“面無表情”地記著筆記。[20](#Bu_Lei_Si_Wei_Te___Mo_Si_Ke_He_D_1)

12月13日，戈爾巴喬夫在一通電話里告訴喬治·布什，三個總統之間的協議只是一個草案、一個梗概、一個即興創作，而聲稱蘇聯已亡的宣言是膚淺的、蠻橫的。

布什放下聽筒后說道：“哎，戈爾巴喬夫現在真是可憐又可悲啊。”[21](#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6)

“強盜”頭頭（葉利欽）夸口說戈爾巴喬夫很快就要消失了。葉利欽告訴他在白宮的團隊，他已經給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個最后斯限——12月末或最晚1月份，到時候他們就可以結束一個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時代。

戈爾巴喬夫向他的助手提出了兩個選擇。他可以辭職或者繼續作為總指揮和核提箱持有者為各個共和國服務。切爾尼亞耶夫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茫然地看著他們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厲聲問：“你們怎么光知道干坐著，記下來，你們要將這個寫成稿的。”切爾尼亞耶夫私下里認為，“到今天，沒人會給他任何職位的。也就是說第二個選擇根本就是幻想”。[22](#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8)已經成了國家銀行的蘇聯中央銀行告訴戈爾巴喬夫，它將終止支付蘇聯軍隊成員和公務員的薪酬。切爾尼亞耶夫在他的日記中抱怨道，俄羅斯政府停止一切蘇聯給“軍隊、官員和我們這些罪人的支付。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沒工資了”。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杰夫認為，到這時總統的權力僅在克里姆林宮墻內有效了。

到了這時候美國人才得到消息，稱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助手們極度擔心葉利欽的支持者為了轉移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批評而貶毀他們。就連這個消息都是幾經周折才得知的。[23](#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7)

帕維爾·帕拉茲琴科邀請《時代》雜志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和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貝施洛斯于12月14日星期六前往他在莫斯科的公寓共進午餐。在讓妻子避開后，這位克里姆林宮翻譯官告訴客人一條消息，讓他們寫下來傳達給布什政府——不讓說是他透露的。這條信息要求美國領導人集團跟葉利欽強調，戈爾巴喬夫應該受到有尊嚴的對待。它警告道：“有些人正在給戈爾巴喬夫羅織罪名。重要的是葉利欽跟這件事毫無關聯。”

在他的回憶錄中，帕拉茲琴科聲稱他的消息來自一位（不具名的）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這個人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上靠近他，小聲告訴他有人正在給戈爾巴喬夫編織罪名。據這位線人聲稱，有一個秘密團隊正在瘋狂地搜集令人難堪的材料，來表明戈爾巴喬夫背地里是八月政變的一份子，他堅持要帕拉茲琴科將這個消息遞給美國人，然后美國人可以靠自己對葉利欽的影響力來阻止這件事情。

帕拉茲琴科堅持說自己不是在戈爾巴喬夫的催促下去確保讓美國提供保護的。“這樣做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符合戈爾巴喬夫的個性。”然而，美國人對此抱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帕拉茲琴科的行為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以保留蘇聯總統的否認權。不管如何，塔爾博特同意傳遞這條消息。

這個請求在時間上恰到好處。詹姆斯·貝克和國務院官員丹尼斯·羅斯在第二天到達莫斯科與俄羅斯領導人集體進行商談。塔爾博特到奧林匹克大道的五角酒店去見他們。他將消息給了羅斯，由羅斯轉交給貝克。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美國國務卿在克里姆林宮的圣凱瑟琳廳與葉利欽會面。這個豪華房間歷來用來接待重要客人，這是葉利欽第一次征用。沙波什尼科夫元帥坐在他的旁邊，明確顯示軍隊效忠的對象。葉利欽在耗時四個小時的談話開始前大聲宣布：“歡迎來到俄羅斯領土上的這棟俄羅斯建筑。”

貝克故意提到關于針對戈爾巴喬夫的犯罪行動的謠言。他告訴俄羅斯領導人，這樣的行動是錯誤的，是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的。“很多人都會關注戈爾巴喬夫身上即將發生的事情”。美國希望權力的轉移“像西方一樣以一種有尊嚴的方式”進行。

葉利欽回答的時候仿佛已經預料到美國的這種態度。他說：“戈爾巴喬夫為這個國家做過很多。他需要得到尊重，也應該得到尊重。是時候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領導人可以光榮退休的國家了。”

貝克單獨見了戈爾巴喬夫，也是在這座豪華的大廳，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也在場。戈爾巴喬夫的臉漲得通紅，說不出話來，就像高血壓發作一樣。在他們嚼著國務卿遞過去的薄荷糖的時候，貝克覺得，這是三個在政治上走投無路的人。跟英國人在一起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將別洛韋日協議稱為“某種政變”，由像路上劫犯一樣的人執行。這場談話逐漸冷了下來，毫無頭緒。謝瓦爾德納澤沒有什么積極的事可說：他知道游戲已經結束了。他在和一個美國熟人吉姆·加里森打電話時透露：“蘇聯正在土崩瓦解。我的工作是擔任這個過程的主持。”

戈爾巴喬夫當晚冒著暴風雪去觀看馬勒第五交響曲的演出，就當從俄羅斯最黑暗的時刻帶來的消沉中逃離。交響樂悲哀的小號獨奏就像是他事業的安魂曲。

次日，葉利欽致電布什總統，向他保證權力的轉移會以友好的方式進行。布什提醒他，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因為他們對和平作出的貢獻而備受尊重。葉利欽承諾道：“總統先生，我保證，并且以個人的名義向你承諾，我們會以最大的尊重來對待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一切都會以冷靜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不會有激進的動作。”[24](#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_4)

白宮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后來聲稱，美國總統不僅讓葉利欽相信和平過渡的必要性，還告訴他要對戈爾巴喬夫好點，給他一輛車、一棟房子，總之就是好好對待他。他講述道，后來布什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說：“你得表揚表揚葉利欽，或者至少別總是公開批評他了。不要總想著把他大卸八塊，主動挑起爭端。”

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還是擔心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等著他們，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向切爾尼亞耶夫透露，他認為葉利欽害怕受到他和謝瓦爾德納澤這些人的反對，會想方設法除掉他們。他們當時單獨待在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戈爾巴喬夫走出去給賴莎打例行電話去了，雅科夫列夫把聲音放得很低，以防有竊聽設備。他跟切爾尼亞耶夫嘀咕道：“我想讓戈爾巴喬夫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當大使，也許可以去芬蘭。葉利欽也不會反對的，我在這里對他而言太危險了。”切爾尼亞耶夫也警惕有竊聽設備，只回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笑。

但這些擔憂都在12月18日星期三的時候被放到一邊了，戈爾巴喬夫最終向葉利欽承認一切都結束了，同意在年末也就是12月 31日結束蘇聯及其統治體系。至于他何時辭去蘇聯總統的職務，他給自己寫了一個便條：“也許是在21日之后，也許是在新年后。”

克里姆林宮墻外第一個得知戈爾巴喬夫將在年前離去的人是一個美國人，也是謝瓦爾德納澤的熟人吉姆·加里森。當天，他正作為國際外交政策協會的主席訪問莫斯科，這也是他動員援助蘇聯兒童的任務的一部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把他帶到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聊天。加里森將是戈爾巴喬夫擔任總統期間的最后一個國外訪客，他回憶道：“戈爾巴喬夫精力充沛、心情愉快、滿臉笑容。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很驚訝他還有時間留給我這樣的人。”[25](#2010Nian_7Yue_Dui_Jia_Li_Sen_De)加里森告訴戈爾巴喬夫，他已經在兩天前組織往俄羅斯運送了大量的食物，用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安東諾夫運輸飛機；他還說，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飛機的副駕駛員含著眼淚說：“我這輩子都在練習怎么飛往蘇聯，但我以為我會載著彈頭飛到這兒。”

加里森從桌子旁站起來的時候，雅科夫列夫用一只胳膊搭住他說：“你應該知道我們在一周內就要辭職了。不要告訴其他人。”加里森震驚了，他問：“你是說真的嗎？”雅科夫列夫回答道：“已經沒有選擇了。”這個美國人又問道：“那我能做些什么嗎？”雅科夫列夫回答道：“是的。你能再派一架安東諾夫送食物過來嗎？你能弄些肉來嗎？莫斯科現在已經沒有肉了。”在離開克里姆林宮的時候，加里森給前百事公司的董事長唐納德·肯德爾打了個電話，肯德爾當時在經營必勝客，加里森安排他用C-5運兵機往俄羅斯運送一飛機罐裝牛肉。

另外，戈爾巴喬夫對他下臺的日期故意含糊了幾天。12月20日，在跟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通話中，他堅持說自己不會很快下臺，因為權力的過渡必須以符合憲法的方式進行。但房屋收回通知已經成堆了。當天下午，按照葉利欽的命令，國家銀行將總統賬戶凍結了，使得戈爾巴喬夫無法授權他自己或是他的個人工作人員的支出。另一道葉利欽的政令將克格勃阿爾法小組精英置于俄羅斯總統的單獨控制之下。

12月21日，星期六，阿拉木圖，葉利欽和十五個創始國中其他十個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簽署成立了獨聯體。他們忽視了戈爾巴喬夫寫來的一封長信，戈爾巴喬夫在信中主動提出扮演一個聯合的角色。這十一位總統簽署了文件，宣稱獨聯體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準國家實體。《莫斯科新聞報》記者維克多·基亞尼沙報道，戈爾巴喬夫的畫像籠罩在會議進程中，就像是無聲的譴責。他們在意的另一個人是“一直在蘇聯飛來飛去尋找核按鈕的”詹姆斯·貝克，貝克通過堅持他提出的國際認可五原則，實際上“打通了獨聯體，不論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葉利欽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告訴記者，他們已經討論好戈爾巴喬夫的未來。他說，在過去，領導人都是被從政治和社會中清除，接著被遺忘，然后要么是死后被改葬，要么被中傷。但他們不會這么卑劣。他們會允許戈爾巴喬夫繼續活躍在社會上，還會給他財政保障。

戈爾巴喬夫在得知這些共和國領導人舉止如此傲慢的時候勃然大怒。他怒氣沖沖地說：“對我來說，他們的存在污染了空氣，他們羞辱了我。”[26](#Lei_Mu_Ni_Ke___Lie_Ning_Ling_Mu_2)這位曾經對共和國來說擁有像沙皇一樣滔天權力的前共產黨總書記宣稱，自己“被這些人的背叛行徑震驚到了，他們將國家切割得支離破碎，就是為了報復，然后將自己捧為沙皇”。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同他一樣鄙視這些共和國領導人。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憤憤不平地抱怨道，他們的智商低到“只要你跟他們講話，你也會變成傻子”。[27](#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9)

葉利欽又給布什總統打了一次電話，告訴他獨聯體已經成立了，“所以中央自然也就不復存在”。布什馬上又給戈爾巴喬夫打了電話。

他發現蘇聯總統處于暴躁的情緒中，對葉利欽以及什么事自己都被撇到一邊的方式感到憤怒。他痛苦地說道，葉利欽背著他做了一個交易，將蘇聯解散了。“在政治上，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跟這些政客打交道。”美國總統讓他冷靜下來。布什跟他保證：“我是從非常專業和私人的角度來看待你的。”他認為戈爾巴喬夫“不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蘇聯的總統都被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震撼到了……他的權威正在流失”。

戈爾巴喬夫緊抓著克里姆林宮不放，讓切爾尼亞耶夫惱怒不已，葉利欽對待戈爾巴喬夫的方式也讓他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尼古拉斯二世至少還受到來自杜馬的代表團要求他辭職的待遇，他有勇氣放棄延續了三百年的王朝的皇冠，而戈爾巴喬夫簡直就是被粗暴地推翻的。”[28](#Tong_Shang__1991Nian_12Yue_22Ri_1)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感到驚訝，戈爾巴喬夫居然能夠這么長時間都抱著他能拯救蘇聯的可悲希望。“火車已經往前開了，戈爾巴喬夫在后面追趕，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歷史正朝著反方向前進。”雅科夫列夫自己很清楚共和國有多高興能夠與中央分離。一位總統曾粗魯地告訴他，“寧為雞首，不為鳳尾”。但戈爾巴喬夫無法想象他們竟是這樣想的。雅科夫列夫自問，是戈爾巴喬夫太吹毛求疵了嗎？不是。他們二人都因為自己許多不切實際的希冀感到深深的痛苦。

他總結道：“只有承認戈爾巴喬夫走在俄羅斯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前沿，批評才有可能是公正的。”[29](#Ya_Ke_Fu_Lie_Fu__Yakovlev___Wu_A)

1. [引自布熱津斯基（Brzezinski）和沙利文（Sullivan）合編的《俄羅斯與獨聯體》（Russia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第 43 頁。](#1_21)

1. [“自由生活廣播”（Liberty Life Radio），白俄羅斯公共服務系統（Belarusian Service），2006年12月8日。](#2_21)

1. [洛吉諾夫（Loginov），第462—463頁。](#3_20)

1. [《蘇維埃白俄羅斯報》（Sovetskaya Byelorussia），“桌上的四十五個人”（45 People at the Table），柳德米拉·馬斯柳科娃（Lyudmila Maslyukova）撰，2001年12月8日。](#4_19)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160—164頁。](#5_19)

1. [沙赫拉伊（Shakhrai）的評論來源于www.vesti.ru，2001年12月12日。](#6_16)

1. [2009年秋天對格拉喬夫的訪談。](#7_12)

1. [沙波什尼科夫《選擇》，1991年12月8日的一則日記。](#8_12)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48—849頁。](#9_11)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54—555頁。](#10_10)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49頁。](#11_10)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2月10日的一則日記。](#12_10)

1. [梅德韋杰夫（Medvedev）《蘇聯》（Sovetsky Soyuz），第 567—568 頁。](#13_9)

1. [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國際基金會《自由的突破》（Breakthrough to Freedom），第169，273頁；哈夫（Hough）《蘇聯的民主化與革命》（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第482頁。](#14_5)

1. [戈爾巴喬夫《1991年9月》，第67頁。](#15_3)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46頁。](#16_3)

1. [貝克和德弗蘭克《外交政治》，第563頁。](#17_2)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2日的一則日記。](#18)

1. [斯蒂爾《不朽的俄羅斯》，第232頁。](#19)

1. [布雷斯韋特《莫斯科河對岸》，第268頁。](#20)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55頁。](#21)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4日的一則日記。](#22)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55—456頁；帕拉茲琴科《我與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那些年》，第353—354頁.](#23)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57頁。](#24)

1. [2010年7月對加里森的訪談。](#25)

1. [雷姆尼克《列寧陵墓》，第499頁。](#26)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曰的一則日記。](#27)

1. [同上，1991年12月22日的一則日記。](#28)

1. [雅科夫列夫（Yakovlev）《霧靄》（Sumerki）, 1991年12月22日的一則日記。](#29)

# 第22章 12月25日：傍晚

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給他六年多前繼承來的、現已幾乎消亡的帝國作演講還剩下十分鐘的時候，他的發型師兼化妝師來到他的辦公室，替他準備上鏡。她手法專業地上粉遮住他的胎記，戈爾巴喬夫禿腦門上的這個血管畸形通常因為呈現出的紫色而被稱為葡萄酒色痣。戈爾巴喬夫早期發布的肖像畫上，胎記都被用畫筆修掉了。這是在這位共產黨領導人引進政治公開之前的事了。

蘇聯總統好奇CNN和俄羅斯電視臺的攝影機都去哪兒了。他以為他會在總統工作桌上進行離別演說。他問道：“他們要去哪兒拍攝呢？”作為這次電視報道負責人，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告訴他，在四號會議室已經布置好了一個模擬辦公室。戈爾巴喬夫問道：“為什么不在我的辦公室呢？”雅科夫列夫解釋道，參加的技術人員、攝影師和記者太多了，更別提那些設備器材了，在真辦公室準備播放的話，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現在一切都來不及了。CNN已經在樓下設置好了他們的播放操作。戈爾巴喬夫他們也只能去那兒了。[1](#2009Nian_10Yue_Dui_Ge_La_Qiao_Fu)

雅科夫列夫評論道，“CNN向153個國家播放”，強調辭職演講通過這個網絡達到的全球覆蓋率的重要性。

戈爾巴喬夫指出：“這其中也包括了獨聯體的十一個國家。那么，就不要冒險換地點了。”

他突然站起來，將告別演說和辭職的政令放進他的軟皮文件夾里，最后一次作為蘇聯的總統離開辦公室。

當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助手們進來時，模擬辦公室已經被弧光燈照得燈火通明了。攝像機、電纜和通訊設備剛完成設置和連接。臨時改變地點將會讓電視工作人員驚慌失措。

CNN的27名工作人員加上俄羅斯技術人員，以及一些官方的攝影師，要么在房間里忙來忙去，要么零零落落站在走廊上。電影制片人伊戈爾·別利亞耶夫正在指導俄羅斯的攝像機來制作自己的紀錄片。

這個房間被布置得盡可能像真的辦公室。地板上覆蓋著和戈爾巴喬夫辦公室類似的綠色花地毯。桌子旁邊是一堆電話，但這四部電話從沒接通過。在椅子后面，從鏡頭望去的左邊，一幅鑲著金邊的克里姆林宮畫像前，蘇聯國旗垂在一根十英尺高的桿上。后邊的墻上則掛著扎成扇形的窗簾。頭頂上懸掛著跟總統辦公室里一模一樣的大枝形吊燈。然而，真辦公室里放高背皮椅的地方放的是絲絨的盾形背椅，這樣能在牡蠣青的錦緞背景下，讓攝像機清晰地捕捉到戈爾巴喬夫的輪廓。

莫斯科美聯社辦事處的成員劉香成混在站著調整角度的攝影師中間。[2](#2010Nian_1Yue_Dui_Liu_De_Fang_Ta)劉香成生于香港，當湯姆·約翰遜打到他的移動電話上讓他盡快趕到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他正開車在莫斯科到處轉，尋找拍攝圖片的機會。約翰遜除了是CNN的總裁，還是美聯社的董事。沒有國外新聞機構能夠進入克里姆林宮見證這一值得載入史冊的事件，而約翰遜把劉香成和美聯社記者艾倫·庫珀曼的名字加到他的員工名單里，這樣就可以把他們偷偷送進去。

一開始，劉香成不太清楚正在發生什么事。“我一走進這個裝飾華麗的懸掛著枝形吊燈的房間，就知道有大事要發生了。不過，我在現場沒有看到任何俄羅斯記者或塔斯通訊社的攝影師。也沒有任何西方記者。湯姆跟我打招呼，說讓我留下來，因為在電視直播講話結束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接受CNN的采訪。我這才意識到戈爾巴喬夫馬上要進行辭職演說了。”

劉香成蹲在支撐著一臺巨大的一代蘇聯電視攝像機的三角架前，準備拍下戈爾巴喬夫卸下權力的決定性照片。

戈爾巴喬夫好不容易穿過混亂的人群，與湯姆·約翰遜握手后，在核桃木桌后面就座。房間很快就清空了，只剩下幾個CNN和俄羅斯的工作人員。切爾尼亞耶夫、格拉喬夫、帕拉茲琴科和兩個雅科夫列夫，即亞歷山大和葉戈爾，都站在拍攝范圍之外。

戈爾巴喬夫打開了綠色文件夾，里面裝著他的演講稿和兩道政令，一道是關于他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另一道是關于把軍隊指揮權和控制權移交給葉利欽的。一個助手進來把一個杯子和杯墊放在他右手邊的桌面上，里面是牛奶咖啡。戈爾巴喬夫抻了抻他的稿子，他低著頭，仿佛在自言自語，用平靜的聲音說：“如果你不得不離開，你就得離開。時間到了。”

在還剩下兩分鐘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跟切爾尼亞耶夫和格拉喬夫低聲協商。他又問了問應該在辭職之前還是之后簽署政令。他們決定之后會好些。

一個穿著紅色襯衫和及膝紫色開襟毛衣、身材結實的俄羅斯助手指著鏡頭問戈爾巴喬夫：“您覺得那個行嗎，有沒有覺得不舒服？”戈爾巴喬夫回答道：“沒問題。”

在現場報道臨近開始的時候，一個穿著灰西裝、藍襯衫、系著藍色領帶的保安彎下腰命令劉香成離開。劉香成拒絕了，保安憤怒地瞪著他。保安對他低聲呵斥，不允許他在演講的電視直播期間拍照。劉香成回答：“好的！”但是，他肯定不會照做。

一個技術人員將麥克風夾在總統的領帶上，戈爾巴喬夫從西服外套內側口袋里拿出一支氈尖筆。他在綠色文件夾上試了一下。筆不好用。他的發言人俯身過來，他回頭看了一眼說道：“安德烈，筆太硬了。你難道沒有軟一點的筆嗎？給我一支好用點的筆簽字。”

站在幾步開外的約翰遜看見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把手伸向口袋，拿出他的妻子埃德溫娜送給他的二十五周年結婚紀念日禮物，一支萬寶龍圓珠筆。這一突然舉動引起了房間里保安人員的警惕。卡斯爾笑著說：“他們就差拔出他們的AK-47了。戈爾巴喬夫對他們說：‘Nyet Nyet!’（沒事，沒事！）”[3](#2009Nian_9Yue_Dui_Qia_Di_Er_De_F)

約翰遜回憶道：“我們馬上就要向俄羅斯電視臺和全世界直播戈爾巴喬夫辭職、蘇聯解體和向鮑里斯·葉利欽轉移權力了。在直播開始前四十五秒到一分鐘的時候，我正站在離戈爾巴喬夫一人遠的地方。他拿出一支蘇聯制造的綠色筆來試用……筆似乎不太好用……然后我把手伸進自己的口袋，跟他說道：‘總統先生，您可以用我的筆。’”[4](#2009Nian_9Yue_Dui_Yue_Han_Xun_De)

戈爾巴喬夫接過這支泛著黑色樹脂光澤、有著金色筆尖的德國筆時，笑著說：“是美國筆嗎？”

約翰遜說道：“不是的，先生，應該是在法國或是德國制造的。”

“這樣的話，那我就用它了。”

媒體人員再次為蘇聯的結束提供了工具。

戈爾巴喬夫在綠色文件夾上試了試筆，覺得挺滿意，便結束了與助手們的討論。他將剛剛助手們的建議拋在一邊，拿起關于辭去蘇聯總統職位的五頁政令和關于放棄蘇聯軍隊總指揮職位的政令就簽。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歷史時刻也沒有進行直播，因為攝像機都還沒開。他將筆放在咖啡杯外面的桌沿上，然后將簽好的政令放在文件夾左邊。

全世界各個城市的觀眾都在收看CNN直播的一個蘇聯領導人所作的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辭職演說。

在華盛頓郊區，對神秘而封閉的蘇聯研究多年的蘇聯問題專家、記者、學者和經濟學家，都暫停為圣誕午餐做準備，觀看來自莫斯科的新聞。他們很多人還處于迷惑不解的狀態——因為就在幾周前，蘇聯似乎還能以某種方式持續下去。

正在戈爾巴喬夫準備進行廣播的時候，另一個一路鳴笛的車隊到達了克里姆林宮。這是俄羅斯總統，剛在白宮結束與莫斯科副市長尤里·雷日科夫的危機會議。他的車在七點前幾分鐘停在14號樓前面。葉利欽在根納季·布爾布利斯陪同下，乘坐電梯到達他在四層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一個助手打開了電視。

葉利欽的辦公室比在毗鄰大樓里戈爾巴喬夫的總統辦公室更有人情味。墻上裝飾著一幅葉利欽在政變中站在坦克上的照片、一幅裝飾華麗的宗教偶像畫和一幅他八十三歲老母親克拉夫季婭·瓦辛葉夫娜·葉利欽的裝裱油畫，這幅油畫是從一個有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傳播者——畫家伊利婭·格拉祖諾夫——的一張照片仿造來的。辦公室里還有一幅地圖，上面滿是彩色的大頭針，標記出種族和民族主義危機的熱點區域。

這群人圍在電視機前面，觀察戈爾巴喬夫按照葉利欽在十個月前發表的著名電視演說中公開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去做。但是，葉利欽要求戈爾巴喬夫辭職挑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驚愕。

現在，過渡的最后一個行動也全部就緒了。只等到戈爾巴喬夫結束講話，俄羅斯總統就會穿過那座窄院到達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在那里，在沙波什尼科夫和電視攝像機的見證下，他將正式接管核提箱，并將成為蘇聯最后一任總統合法的俄羅斯繼任者。

世界將看著這兩個對手在核提箱易主時握手微笑，長達七十四年的蘇聯統治將落下帷幕。至少計劃中應該是這樣的。

1. [2009年10月對格拉喬夫的訪談；格拉喬夫《最后的梯子》，第188—189頁。](#1_22)

1. [2010年1月對劉的訪談。](#2_22)

1. [2009年9月對卡迪爾的訪談。](#3_21)

1. [2009年9月對約翰遜的訪談。](#4_20)

# 第23章 核桃廳的交易

關于權力轉移的細節，是在蘇聯總統1991年12月25日晚上辭職演講的兩天前，由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磋商了九個小時后制定的。[1](#Ya_Ke_Fu_Lie_Fu___Wu_Ai_____1991)

在結束他政治生涯的別洛韋日森林密謀之后，戈爾巴喬夫經歷了悲痛的前兩個階段——否認和憤怒。在阿拉木圖之后，他過渡到第三個階段——討價還價。他現在不得不協商他的退休福利了。他已經讓助手們起草關于他的養老金和生活條件的政令，準備辭職演說的演講稿了。但他始終無法強迫自己推動事情走到最后一步。

葉利欽推進事情的方式有他典型的風格。12月23日，星期一的半上午，俄羅斯總統遞過話來，說他正在去參議院大樓的路上，想跟戈爾巴喬夫談談退出政治生涯的條件。在六年前的今天，戈爾巴喬夫將葉利欽提拔為莫斯科共產黨的領袖。

總統的助手們對于這種臨時通知感到很憤怒。格拉喬夫認為葉利欽一如既往地表現得反復無常、爭強好斗。[2](#2009Nian_10Yue_Dui_Ge_La_Qiao_Fu_1)但就像戈爾巴喬夫的前代理發言人謝爾蓋·格里戈里耶夫所言，“葉利欽現在已經握著戈爾巴喬夫的命門了”。既然共和國已經簽署即將于1月1日生效的獨聯體，就沒有蘇聯總統的位置了。

葉利欽的突然到場讓戈爾巴喬夫的人倍感尷尬。他們已經提醒泰德·科佩爾和他的電視工作人員，進克里姆林宮拍攝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科佩爾說：“當我們在星期一的早晨拿起設備時，得知戈爾巴喬夫將花上幾分鐘在辦公室錄制他的辭職演講。我們還得知，他正在修剪頭發，為錄制做準備。跟我們一起等的是戈爾巴喬夫的化妝師。期間，有個總統的私人保鏢過來告訴我們，戈爾巴喬夫馬上就到了。總統辦公桌后面放著兩面蘇聯國旗，光亮可鑒。來自蘇聯國家電視臺的兩臺大型攝影機的錄制信號燈已經在閃了。

“但是，他始終沒有出現。當時是十一點剛過，鮑里斯·葉利欽要來克里姆林宮開會。”[3](#2009Nian_10Yue_Dui_Qia_Pei_Er_De)

葉利欽已經在來的路上，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取消預錄演講的計劃，并快速決定他到底什么時候宣布辭職。他告訴格拉喬夫，他最有可能在明天現場直播自己的辭職演講。他嘆氣道：“拖延沒有什么意義。”

格拉喬夫建議道：“等到星期三是不是比較好？明天是12月24日，圣誕前夜。在許多國家，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讓他們平靜地慶祝吧。”戈爾巴喬夫顯然像他的新聞秘書一樣沒意識到圣誕節才是“最大的節日”，說道：“好吧，不過最晚就在星期三了。”

格拉喬夫問戈爾巴喬夫是否接受讓美國和俄羅斯的電視工作人員錄制兩位領導人互相致意的畫面。這將是一次塑造俄羅斯命運的兩個人物之間的重要會面，應該載入史冊。戈爾巴喬夫跟他揮揮手表示同意。

格拉喬夫知道葉利欽有多麻煩，也擔心他可能會懷疑有什么埋伏，于是他也去尋求葉利欽的允許。當葉利欽從電梯里出來時，側邊站著他警惕的保鏢科爾扎科夫，面無表情，格拉喬夫問他，攝像人員能否錄制他到達時的畫面。葉利欽不耐煩地哼聲說：“不可能，否則我就取消這次會面。”格拉喬夫給電視工作人員打信號讓他們離開。要看誰的臉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哪怕是在戈爾巴喬夫自己辦公室的附近。

科佩爾記得俄羅斯領導人在走向辦公室的時候怒視著他。他覺得葉利欽在生他的氣。“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戈爾巴喬夫身上。他覺得我應該把他挖出來。他才是新的弄潮兒。這是他的時刻；他正在吞并所有的權力。一分一秒從戈爾巴喬夫的手中奪來的權力。”

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訪中，葉利欽毫不客氣地告訴科佩爾他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我不喜歡他。”

葉利欽一直等到記者們都離開了，才跨進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門口。

克里姆林宮侍者葉妮亞端來一個托盤，上面有咖啡、咖啡杯、烈酒杯，還有兩瓶酒，一瓶是給葉利欽的伏特加，一瓶是給戈爾巴喬夫的五十年的白蘭地。切爾尼亞耶夫干巴巴地評論道：“這些酒是給他們就咖啡喝的。”在寒暄了幾句后，他們脫掉外套，穿著襯衫、系著領帶走到旁邊的核桃廳。1985年3月11日，蘇聯領導人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是在這個房間，共產黨政治局同意讓戈爾巴喬夫擔任黨的總書記和蘇聯毫無爭議的領導人。

這兩個對手坐在放著十五把椅子的柚木長桌的盡頭，在白色的枝形吊燈下，討論著在阿拉木圖達成的協議的后果。戈爾巴喬夫又生氣，心情又沉重，但還是放棄了。用格拉喬夫的話說，“已經覆水難收了”。

戈爾巴喬夫向葉利欽妥協道，為了和平和秩序，他將公開接受獨聯體作為蘇聯的合法繼承者。葉利欽認真傾聽戈爾巴喬夫關于巴爾干化可能帶來危險的警告。而相應地，他要求在接下來的六個月內，戈爾巴喬夫在他把休克療法應用到俄羅斯時給予支持，或至少不要批評他。

這次會面的氣氛不可避免地變得緊張。戈爾巴喬夫的助手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注意到，卑微不是戈爾巴喬夫的脾性，寬宏大量也不是葉利欽的風格。兩人同意邀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來擔任會議的“公斷人”。

這位六十八歲的政治公開之父一瘸一拐地走進房間。他是出于好奇才進去的。這意味著他“不僅是見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高尚事業開始的人，也是見證其結束的人”。像他的導師一樣，這位前加拿大大使和經濟改革強有力的支持者不想看到蘇聯的分裂，他反對葉利欽的所作所為。然而，俄羅斯總統卻因為他在八月政變中的勇敢表現和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行動而對他懷有尊重。10月的時候，葉利欽指派雅科夫列夫擔任一個洗刷政治壓迫受害者罪名的委員會的主席。

兩位總統就過渡的進度達成了一致。戈爾巴喬夫將在兩天后，也就是12月25日，引退。他將在25日晚上七點向全國播放辭職演說。結束演講后，戈爾巴喬夫會簽署辭去總統職務的政令和放棄蘇聯軍隊總指揮職務的政令。在那之后，葉利欽會在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的陪同下，立刻前往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接管核提箱。戈爾巴喬夫和他手下的人可以在他辭職后繼續使用他們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四天，一直到12月29日，來處理未竟事物，并收拾他們的辦公桌，然后，葉利欽將作為俄羅斯總統，與工作人員一起入駐克里姆林宮。紅旗將在12月31日從克里姆林宮降下。[4](#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9)夏哈納扎羅夫在會議中間被叫進去了一會，他要在第二天告訴戈爾巴喬夫的全體助手、官員、翻譯官、接待員、打字員和研究員，他們要在12月29日離開克里姆林宮，總統機構將在1月2日停止運轉。[5](#Xia_Ha_Na_Zha_Luo_Fu___Jie_Nuo_1)

而作為報答，戈爾巴喬夫將優雅地下臺，不挑戰葉利欽繼任的權力，并遠離政治，讓俄羅斯總統在實施經濟改革的時候能夠隨意使用權力。

基本事項敲定后，戈爾巴喬夫的秘書處長格里戈里·列文科和葉利欽的秘書處長尤里·彼得羅夫被帶進來，記錄關于戈爾巴喬夫未來福利的具體內容。

葉利欽后來聲稱：“戈爾巴喬夫交上來一大堆要求——他的薪酬包——有好幾頁長。幾乎所有的事項都是純物質要求。他想要一份與通貨膨脹相掛鉤的相當于總統薪水的養老金；一套總統公寓和一棟總統別墅；為他和妻子準備一輛車。但最不可思議的是，他想成立一個基金會，想要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棟大樓，即前社會科學學會大樓，還要安排好基金會的用車、辦公室設備和保鏢。他的心理邏輯很簡單：你不是那么想擺脫我嗎，那我只好掏空你的口袋了。

葉利欽同意讓戈爾巴喬夫一家退休后住進一棟小點的國有別墅和一套小點的公寓，配給他們兩輛公車和二十名工作人員，其中有保鏢、司機、廚師和服務人員。他拒絕批給前總統屬于自己的辦公室和職員，也減少了所要求的養老金數額和保鏢的數目。他簽署了一道政令，付給戈爾巴喬夫一份相當于其工資的養老金，也就是4 000盧布一個月——十倍于蘇聯平均工資水平，但按外匯率來算的話，只有40美元。這個安排不會讓戈爾巴喬夫陷入貧困。他已經收到他的回憶錄的預付版稅了。

他們接下來敲定有關戈爾巴喬夫核心團體的條款。他們同意成立一個雙邊委員會，由列文科和彼得羅夫帶領，為戈爾巴喬夫被撤職的員工找工作。蘇聯總統請求葉利欽讓他的同伴伊萬·西拉耶夫和夏哈納扎羅夫以合理的價格買下他們所住的國家別墅。西拉耶夫是蘇聯最后一任總理，這個職位在政變之后就失效了，而夏哈納扎羅夫在蘇聯混亂的最后幾年一直陪在戈爾巴喬夫身邊。俄羅斯總統同意了。他轉向雅科夫列夫，提出了同樣的條件。雅科夫列夫拒絕了。不過幾年后他后悔了當時的決定，因為莫斯科的房價飛漲。

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談妥的條款符合蘇聯最高蘇維埃一年前通過的立法。這項立法規定了離職總統享有養老金、一棟國有別墅，配有必要的員工、保鏢和運輸工具。這些條款與唯一被罷黜的另一位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4年獲得的條件有驚人的相似。赫魯曉夫，另一個自封的改革者，被政治局以所謂的政策失誤和錯誤行為免職。他獲得了一份養老金，被允許在離職后繼續在他的總書記別墅和城市公寓待一年，之后搬進了一棟小一點的別墅。但赫魯曉夫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他直接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直到七年后他去世時才再次出現在莫斯科的報紙上。這個前例讓戈爾巴喬夫消沉不已。他痛苦地流了好幾天眼淚。有一次問到赫魯曉夫退休后都在干什么時，他的孫子回答道：“他在哭。”戈爾巴喬夫不會變成一個無名人物，但他也在最后一天來臨之前流了眼淚。

雅科夫列夫回憶道，這兩個對手到了這個關頭還能設法進行一次非常公事公辦、互相尊重的會議。“他們時不時會吵兩句，但不帶任何怨恨。我很遺憾他們以前沒有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開始合作。”他認為兩邊的人吹的耳邊風促使他們之間的氛圍越變越差。

下午一點的時候，葉妮亞給這三個人送來午餐。他們各自吃著沙拉和色拉米、土豆和卷心菜派，喝著起泡的礦泉水。當這位侍者端著空托盤出來時，兩位總統的助手追問他關于會面的進展。他告訴他們，會議看起來已經以文明的方式開始了。

在關于過渡的物質條款達成一致后，列文科和彼得羅夫離開房間。只有雅科夫列夫留下來見證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戈爾巴喬夫給葉利欽出了一份證明，讓他有權閱讀總書記檔案的控制權。檔案里包含了從列寧建國開始由歷代蘇聯領導人傳遞下來的秘密文件，總數有一兩千份。他們被蘇聯高級官員稱為斯大林檔案。

盡管在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公開政策之下，過去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的許多罪行已經首次得到承認，但最高級別的秘密文件仍然掌握著蘇聯最高當權者的犯罪行為的證據，這些犯罪行為大多數都沒有公開承認。這些文件牽涉到最近的蘇聯領導人的掩蓋手段和對斯大林錯誤的否認，還有許多證實了以下指控的血腥篇章：在過去，蘇聯共產黨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陰謀，還牽涉進國際恐怖主義。

每任總書記在就任時都會接管這些檔案。他們都知道，或者可以找出，這些檔案所掩藏的秘密。

戈爾巴喬夫交付的一份文件詳細敘述了一項計劃，給左翼官方愛爾蘭共和軍派一艘裝滿武器的船，當時這個非法組織正在北愛爾蘭進行轟炸和殺戮。這個叫做“飛濺行動”的計劃得到了政治局成員、克格勃負責人尤里·安德羅波夫的首肯，回應了愛爾蘭共產黨領導人邁克爾·奧里約旦的請求，邁克爾聲稱他與官方愛爾蘭共和軍取得了秘密聯系。安德羅波夫在1972年8月21日簽署了一項內部通知，授權將一批從德國繳獲的武器沉入北愛爾蘭海岸的愛爾蘭海域，其中包括兩挺機關槍、七十支自動來福槍、十支瓦爾特手槍和41 600發子彈，后來讓一艘漁船上的“愛爾蘭朋友”拖起來。安德羅波夫表明，一艘偵察船Reduktor號已經選好了地點，利用回聲測好了水的深度。后來，葉利欽不能確切地說“飛濺行動”是否成功了，但他推測很有可能，“我們的‘朋友’又一次因他們標志性的爆炸和殺戮出名了，讓整個世界都顫動了”。[6](#Ye_Li_Qin___Wei_E_Luo_Si_Fen_Dou_3)

然后，戈爾巴喬夫把椅子往后推，走向他辦公室里的保險柜，從中抽出兩個用繩子捆起來的大信封，信封上的蠟封已經被拆開了。戈爾巴喬夫回到座位上，說道，有一份文件他們應該先看。他先給在場的兩位同伴閱讀文件上的內容。這是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首領）拉夫連季·貝利亞于1940年3月 5日發的內部通知，建議將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里的25 700名波蘭犯人處死。上面是斯大林用藍色鉛筆寫的字，“政治局決議”，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揚和伏羅希洛夫的簽名。戈爾巴喬夫還給他們大聲讀了來自前克格勃負責人亞歷山大·謝列平的證詞。1959年，謝列平給出了在1940年被槍殺的波蘭受害者的總數—— 21 857，并向赫魯曉夫建議毀掉一切相關文件。[7](#Duo_Bu_Si___Da_Dao__Lao_Da_Ge_2)

這份文檔是政治局曾下令屠殺波蘭官員的確鑿證據。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五年后，蘇聯的慣例還是繼續戰后編造的謊言，指責德國人在1941年入侵蘇聯后進行大屠殺。直到1990年4月，挖掘出的大量尸體和詳細的證據迫使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承認事實，但也只是部分事實。他授權蘇聯新聞機構塔斯通訊社因斯大林“極其可恥的罪行”向波蘭表示深深的懺悔，仿佛這是斯大林的個人行為。

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承認過有證據表明政治局完全批準了歐洲歷史上最糟糕的罪行之一。現在，最終拿出來的不僅有斯大林和臭名昭著的貝利亞共同犯罪，還有蘇聯共產黨犯罪的絕對證據。

雅科夫列夫越聽越憤怒。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一直在到處尋找這些文件。他馬上得出結論，戈爾巴喬夫一直都知道這些文件的存在，只是瞞著他。

他后來寫道：“戈爾巴喬夫當著我的面把裝著所有卡廷慘案相關文件的包裝袋給了葉利欽，信封被打開后，我發現里面居然是關于射殺波蘭軍人和平民的記錄。戈爾巴喬夫面無表情地坐在那里，就好像他們從沒討論過這件事一樣。我一次次地問他，在中央委員會總務處的政治局檔案中，有哪些文件是與這件事相關的，每一次都得到相同的回答——沒有。”發現戈爾巴喬夫多年來一直瞞著這些材料的存在讓他感到很困惑。“如果戈爾巴喬夫能夠公開這些，他將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受益良多；他不能很好地判斷他的人民，在自我判斷上則更加糟糕。”

戈爾巴喬夫后來聲稱，他是在前一天晚上才從列文科那里拿到這些罪證的，列文科通過這些檔案的主管來引起戈爾巴喬夫對這些檔案的注意，并堅持讓總統查看。據戈爾巴喬夫所說，看到“這些一口氣宣布成千上萬人的死亡的要命文件”，他都快喘不過氣了。[8](#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0)

戈爾巴喬夫的前參謀長瓦列利·波爾金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在兩年前有一次去波蘭訪問前，將前文中提到的文件展示給戈爾巴喬夫看，而他的上司告訴他不要將這些文件給任何其他人看，還說：“這是件要命的事。”[9](#Xi_En_Xi_Ya_La__Cienciala___Lie)檔案的注釋顯示，波爾金確實在1989年的時候打開過含有政治局下令射殺波蘭人的文件，還顯示出從斯大林往后的每一任蘇聯領導人，包括戈爾巴喬夫，都閱讀過這份秘密文件，自然也知道事實真相。根據戈爾巴喬夫所言，波爾金向他展示的兩份文件只講述了斯大林時期有一個委員會將大屠殺的罪名扣到納粹頭上。

切爾尼亞耶夫后來發表了一個仁慈的觀點，也許波爾金是想敗壞戈爾巴喬夫的名聲，他懷疑戈爾巴喬夫是不是真的見過那個處刑命令。

這三個人都贊成這份“確鑿證據”文件應該交給波蘭人。戈爾巴喬夫把文件遞給葉利欽，說道：“我擔心這會引起國際糾紛。但現在這是你的任務了，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在次年10月份將這些文件向俄羅斯媒體公開。[10](#Tong_Shang__Di_346Ye)

其他的秘密文件都塞在箱子里。戈爾巴喬夫說：“拿去吧——都是你的了。”雅科夫列夫后來才“目瞪口呆地”發現，這些文件包括一些連研究布爾什維克暴行的他都無法想象的秘密。其中有一道由列寧簽署的命令，在1918年到1921年的內戰中處死2500名位俄羅斯東正教牧師，不過這道命令有沒有執行就不得而知了。所有俄羅斯人都知道斯大林滿手血腥，但很多人都將列寧當成國父來尊敬，無法將他和大屠殺聯系在一起。

這位管理了蘇聯六年的男人詢問自己能否免于被控告。葉利欽說道：“如果你還在擔心什么事情的話，趁著現在還是總統，就趕緊承認了吧。”[11](#Ji_Mo_Fei_Ye_Fu___E_Luo_Si_De_Mi_1)戈爾巴喬夫沒有采納這個提議。

接下來，戈爾巴喬夫提到他將在莫斯科成立的基金會的問題，這樣可以在他辭職后給他一個為公眾提供服務的角色。他已經告訴他的助手們，這個基金會將是“一個強有力的知識中心，將開啟在俄羅斯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的進程，如果必要的話，這個中心將擔起強烈反對那些半吊子和平庸之輩的角色”。

現在，在核桃廳，戈爾巴喬夫用不那么刺激的語言解釋，這個基金會將是一個從事經濟和政治研究的非政府組織。他需要為他所稱的“社會與政治調查基金會”找到一棟合適的大樓。葉利欽反對“政治調查”這個短語。他不想有一個充滿敵意的基金會到處探聽俄羅斯的政府事務。戈爾巴喬夫堅持說，這個組織不會變成一個“反對者的搖籃”。他們的交談慢慢變得激烈，直到雅科夫列夫提出一個折中辦法。他建議道：“那我們就把它叫做‘社會與政治研究基金會’吧。”最終，他們將名稱定為：社會經濟與政治研究國際基金會（戈爾巴喬夫基金會）。[12](#Sang_De_Er__Sandle___Ge_Er_Ba_Qi)

葉利欽仍舊懷疑戈爾巴喬夫的意圖。他問：“你不會以這個基金會為基地創立一個反對黨吧？”戈爾巴喬夫回答道，不會，并且“只要俄羅斯的領導人進行民主改革，我還會支持和維護他”。得到滿意答復的葉利欽在契約上簽字，將莫斯科西北部列寧格勒大街上的一棟大理石門面的三層大樓移交給戈爾巴喬夫。這棟大樓曾經容納了一個為國外地下工作人員進行學術訓練的學院——列寧學院。

六點的時候，蘇聯總統出去了一會。他之前安排了與約翰·梅杰的一個告別電話。

英國首相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是了不起的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相信共產主義可以被改良的共產主義者，葉利欽則是一個認為它應該被摧毀的反共產主義者。去年7月，在倫敦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梅杰發現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有著自嘲式機智的魅力人物”，他用許多段子逗他發笑，其中就有排隊買伏特加的男人跑去槍殺克里姆林宮總書記的故事。但是，梅杰認為戈爾巴喬夫完全抓不住自由市場的基本要素和競爭的價值所在，他對私有化幾乎一無所知。不論怎樣，這位首相還是對戈爾巴喬夫離開政治舞臺感到傷心，于是打電話來問候。

戈爾巴喬夫的翻譯官從自己的辦公室被召集過來翻譯這段電話對話。帕拉茲琴科發現。在戈爾巴喬夫辦公室附近走廊上，保鏢崗位上的人特別多，其中包括了葉利欽的保鏢。他們中有個人還看了他的身份證明才讓他通過。這樣的事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翻譯官很快就發現，白蘭地在戈爾巴喬夫身上起了作用。他的呼吸間都帶著一股酒味，帕拉茲琴科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在說話的時候小心措辭，“也許是因為他不想因為喝酒而引起任何口誤”。格拉喬夫也認為他的上司臉看上去有點紅，在拿起話筒的時候還有點暈，好不容易才找著他與國際領導人談話時使用的熟稔腔調，不過一兩分鐘后就又恢復了。切爾尼亞耶夫觀察到，他的上司后來去跟梅杰打了個電話，他覺得這次談話中的真誠可能讓英國首相大吃一驚。

戈爾巴喬夫開口道：“親愛的約翰，今天，我正在試著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防止現在這里所發生的一切導致損害。你知道我仍然覺得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一個聯邦國家，但是，還要考慮到共和國的立場。”他再次向梅杰保證，蘇聯的解體不會導致另一個南斯拉夫的出現。“這一點對于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想，對于你來說也是。”他說，葉利欽和他已經談了六個小時了，關于他們“對國家和世界的責任”，已經達成了共識。他又補充了一句外交辭令，“我希望你能多多關照獨聯體和俄羅斯”。他回頭看了一眼格拉喬夫，似乎在確認之前協商的關于他辭職的時間，然后跟梅杰透露道：“我將在接下來兩天的某個時候公布我的立場。”

他發表的一句評論泄露了他到這個時候都還不甘愿接受自己的命運已成定局。他告訴梅杰：“我還不想說再見，因為事情仍可能還有轉機，甚至是顛覆。”

英國首相告訴戈爾巴喬夫，不管他做什么樣的決定，“毫無疑問他都將在自己國家和世界的歷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戈爾巴喬夫聽到這些話后變得非常激動。

他的眼睛因為濕潤而閃閃發光，回答道：“謝謝你所做的一切。賴莎和我非常喜歡你和諾爾瑪。”

在戈爾巴喬夫離開房間期間，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以一種更加放松的方式繼續交談，因為他們又喝了不少伏特加。俄羅斯總統責備雅科夫列夫公開批評他讓俄羅斯獨立的行為，雅科夫列夫反駁道，他認為這個決定是“不合法的、不民主的”。但這些都沒有針對個人的色彩。葉利欽問他，既然他現在已經當不成總統顧問了，有沒有什么打算。雅科夫列夫說，他將會繼續在基金會為戈爾巴喬夫工作。葉利欽說：“為什么？他不止一次背叛你。你又不是沒有其他選擇。”這樣的話在雅科夫列夫聽來就像是要請他到俄羅斯政府工作，但他沒有接茬。他說，他只是替戈爾巴喬夫感到難過。“上帝都不會讓任何一個人有他這么慘。”

雅科夫列夫負責任地警告葉利欽，不要讓情報部門權力過大，或讓它控制傳遞給他的信息。他提醒道，克格勃提供給戈爾巴喬夫的情報就成功地讓總統對民主主義者采取了強硬態勢。葉利欽同意了，他說，他將建立五六個信息渠道——盡管雅科夫列夫后來留意到，這些渠道也沒產生什么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談話中自然就出現了外國情報安全部的主管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的名字。就葉利欽所知，普里馬科夫經常喝高。雅科夫列夫干巴巴地說：“比某些人喝得不多也不少。”葉利欽狐疑地看著他，但也沒說什么。

戈爾巴喬夫似乎也不急著回去見葉利欽，就一直跟梅杰聊了半個小時。他手上的權力越少，談話的時間就越長。有一次，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從他的辦公室趕去參加一個已經遲到的會議時，有人聽到他說：“該死的，每次戈爾巴喬夫打電話來，都要啰嗦上半個小時。”[13](#Suo_Luo_Wei_Yue_Fu_He_Ke_Lie_Pi_2)

戈爾巴喬夫和梅杰道別后，跟格拉喬夫和切爾尼亞耶夫說道，他和葉利欽已經把事情都談妥了，現在“我要進去把事情都結束掉”。

格拉喬夫從沒關嚴的門縫里瞅了瞅戈爾巴喬夫辦公室里的情形，他注意到紅旗放在角落里，戈爾巴喬夫的眼鏡盒放在桌上，核提箱放在辦公桌上，所有這些都從視覺上證明戈爾巴喬夫仍是蘇聯的總統，哪怕只是有名無實的總統。他認為，“任何一個人只要取這棟建筑的一個橫截面，然后看向三樓的房間，都會看到這幅超現實的場景。在樓頂上，蘇聯的紅旗仍在飄揚”。

葉妮亞端著幾碟冷肉、熏魚和泡菜進了核桃廳。她還設法在廚房里給格拉喬夫和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弄到了面包、果醬和咖啡。他們在吃飯的時候，發現俄羅斯電視臺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的《四小天鵝舞曲》，正是八月政變的三天里蘇聯電視臺所播放的芭蕾節目。似乎電視臺里有人在微妙地發出信號，第二次政變正在進行，而這次是由葉利欽帶領的。

戈爾巴喬夫的這兩個同伴在葉妮亞匆匆進核桃廳又匆匆出來后，纏著她問里面的人情緒怎樣。葉妮亞很外交地回答道：“氣氛看上去不錯。”

在廚房旁邊的電視轉播室里，泰德·科佩爾和里克·卡普蘭正在干等著，他們把天線支起來了，通過衛星連接與紐約進行聯絡，以防樓下有什么爆炸性新聞。最終，他們放棄離開了。

核桃廳的會議又進行了兩個半小時。九點左右，在戈爾巴喬夫又干掉了兩小杯白蘭地后，雅科夫列夫注意到他已經有點支撐不住了。蘇聯總統說他有點不舒服，就出去了，到旁邊辦公室的休息間里躺了下來。

葉利欽和雅科夫列夫又單獨待在一起了。他們只好又小酌了一個小時。葉利欽豪爽地承諾，他將起草一份政令，指示對雅科夫列夫進行特殊的規定，因為考慮到他曾為民主運動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戈爾巴喬夫的這位助手對他表示感謝，但后來指出，“他中途忘了他的承諾”。

在相互道別后，雅科夫列夫看著葉利欽沿著克里姆林宮狹窄的走廊大步向前走，就像是在閱兵場上行進一樣。他覺得，“這是一個勝利者的步伐”，盡管俄羅斯總統可能只是在盡可能讓自己站直。葉利欽的助手們拿著檔案跟在他后面。格拉喬夫說道：“以他目前的狀態，給他任何敏感文件都是不謹慎的。”

葉利欽吃力地走出參議院大樓，踏進夜晚異常溫和的空氣中——氣溫剛到零度以下，穿過窄院到達14號樓。他最親密的同伴都等在那里：科濟列夫、布爾布利斯、科爾扎科夫、他忠誠的助手列夫·蘇哈諾夫，以及發言人帕維爾·沃夏諾夫。

他宣布：“都結束了。這是我最后一次去見他了。”

他的一名助手問道：“你的意思是從現在開始，他戈爾巴喬夫就得來拜見你了。”

葉利欽哼道：“來見我干什么呢？……對了，也許是來領他的養老金。”他們舉杯慶祝葉利欽最終凌駕于戈爾巴喬夫之上。[14](#Ke_Er_Man__Coleman___Su_Lian_Di)

蘇哈諾夫以勝利的姿態指著墻上的俄羅斯地圖道：“在這片宏偉的版圖上，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大過你了。”

葉利欽回答道：“就為了這個，一輩子也值了。”

與此同時，雅科夫列夫去看戈爾巴喬夫。他在休息間里找到了他。戈爾巴喬夫在哭。“他躺在沙發上流眼淚。”戈爾巴喬夫抬頭看著他的老朋友，說道：“薩沙，你瞧，就這樣了。”

雅科夫列夫承認，這是戈爾巴喬夫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戈爾巴喬夫說的這些話沒什么意義，但聽起來就像是一種知心話、一種悔恨、一種來自內心的絕望吶喊，它們闡述了（俄羅斯詩人費奧多·）丘特切夫的詩句：‘生活就像無法飛翔的折翼小鳥。’”

雅科夫列夫盡力去安慰同伴，保證他會光榮地退休，并通過他的研究機構變得舉世聞名。他自己都快哭出來了。“我如鯁在喉。我替他感到難過，難過得我都想哭。這個人昨天還是控制世界和自己國家的重要改變的沙皇，是世界上幾十億人民命運的主宰，今天卻成了又一場歷史危機了無生趣的受害者。”

戈爾巴喬夫讓他的朋友給他拿來一杯水，然后讓他靜一靜。雅科夫列夫評述道，“改革的黃金時期就這樣結束了”。他真誠地相信戈爾巴喬夫想給自己的國家最好的，但他卻看不到最后了。“他不明白的是，如果你要對舊系統那樣的龐然大物刀劍相向，你就要全力以赴……但他卻是一個漸變論者……他沒有在自己的手上沾上血腥，他想開啟一個文明的社會。”[15](#Ya_Ke_Fu_Lie_Fu___Wu_Ai_____12Yu)

在葉利欽的記憶中，這場延續一天的會議是“持久而艱難的”。他告訴一個記者，討論的內容不能透露，因為涉及國家機密的傳遞，但“在會議結束后，我只想趕緊洗個澡”。

而戈爾巴喬夫在多年后回首時，記憶中的這場與葉利欽的會議是“不正式的、看似友好的”，但他痛苦地表示，“葉利欽的話，就像他的許多承諾一樣，都做不得數”。

戈爾巴喬夫剩下要做的事情不多了，就只差告訴這個千瘡百孔的超級大國的公民們他要下臺了。

這是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最后一次見面，甚至是最后一次交談了。

1. [雅科夫列夫《霧靄》，1991年12月23日的一則日記。雅科夫列夫詳細地描述了這次會議。還有舒爾根的《蘇聯大使》，第294—298頁。](#1_23)

1. [2009年10月對格拉喬夫的訪談。](#2_23)

1. [2009年10月對卡佩爾的訪談。](#3_22)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66頁。](#4_21)

1. [夏哈納扎羅夫《杰娜·斯沃博德》，第294頁。](#5_20)

1. [葉利欽《為俄羅斯奮斗》，第311—316頁。](#6_17)

1.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10—314頁。](#7_13)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621頁。](#8_13)

1. [希恩西亞拉（Cienciala）、列別杰娃（Lebedeva）和梅特爾斯基（Materski）《卡廷慘案》（Katyn），第254—255 頁。](#9_12)

1. [同上，第346頁。](#10_11)

1. [季莫費耶夫《俄羅斯的秘密統治者》，第26頁。](#11_11)

1. [桑德爾（Sandle）《戈爾巴喬夫》（Gorbachev），第273頁。](#12_11)

1. [索洛維約夫和克列皮科娃《鮑里斯·葉利欽》，第281頁。](#13_10)

1. [科爾曼（Coleman）《蘇聯帝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第354頁。](#14_6)

1. [雅科夫列夫《霧靄》，12月23日的一則日記。](#15_4)

# 第24章 12月25日：入夜

歷史最終讓戈爾巴喬夫嘗到了苦果。12月25日，莫斯科時間晚上七點，東部標準時間上午十一點前三十秒，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總統取下他的大鏡片眼鏡，檢查鏡片是否干凈，然后戴了回去。他看了幾次表。然后，他抬頭看向鏡頭，開始照著一張打印出來的紙念，都省了用提詞器的麻煩。

他開始了[1](#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1):“親愛的同志們！同胞們！鑒于目前的形勢和獨聯體的形成，我現在停止我作為蘇聯總統的所有活動。我是因為一些原則性的原因做出這個決定的。我一直非常堅定地支持自治、國家的獨立和共和國的自主。但同時，我也支持保留一個聯邦國家的形式和保持國家的完整。”

即使到了現在，他也還沒完全放棄。通過用“停止”活動這樣的用詞，他留下了將來某天可能恢復活動的可能性。

他繼續說道：“事態朝著另外的方向發展。分割國土和分解國家的趨勢占了上風，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在這件事情上的立場自從阿拉木圖會議和該會議上做出的決定之后就沒有改變過。并且，我堅信，如此重要的決定應該遵照公眾的意愿。然而，我將在我的權力范圍內盡全力確保阿拉木圖協議帶給我們的社會真正的統一，為擺脫危機鋪好路，并促進一個持續的改革進程。”

格拉喬夫從鏡頭后看著戈爾巴喬夫，覺得他的聲音一開始有些不自然與空洞。“他的聲音就像要顫抖似的，而他的下巴確實顫抖了。”這一陣過去后，戈爾巴喬夫繼續講話時已經控制住了情緒。

他說：“最后一次作為蘇聯總統對你們講話，我覺得有必要聲明我關于自1985年就開始的道路的立場——尤其是存在大量矛盾的、膚淺的、偏倚的判斷的情況下。”

幾分鐘前已經簽署了政令放棄總統職位，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已經不是蘇聯的總統了，但他忽視了助手們的意見，失去了讓這個直播具有一點儀式性的機會。

命運決定了當我成為國家元首的時候，這個國家存在一些已經很明顯的問題。我們的物資很充足；有土地、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自然資源，而且上帝還賦予我們機智與天賦——但我們的生活要比其他工業化國家糟糕得多，而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在我就位時，原因就已經顯而易見了——我們的社會處在一個官僚指揮系統的緊緊掌控之中。這樣一來，我們國家注定要為意識形態服務，承擔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因此處于最緊繃的狀態。實施半吊子改革的嘗試有很多，但都一個接一個失敗了。這個國家正在失去希望。

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我們要徹底改變一切。

因為這個原因，我從未后悔自己沒有碌碌無為地在位幾年坐等退休。這是不負責任的、不道德的表現。我了解，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開啟如此大規模的改革是一項最艱巨且冒險不過的任務。但即使到了現在，我仍然堅信，開始于1985年春天的民主改革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是無可非議的。革新國家和徹底改變國際社會的進程被證實是比預想中更加復雜的。然而，讓我們先承認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進步吧。

社會獲得了自由，不論是從政治上還是精神上。這是最重要的成就，但我們還不能完全應對，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運用我們的自由。然而，不管怎樣，一個歷史任務算是完成了。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阻礙這個國家變得富裕昌盛的極權體系被廢除了。

這是民主改革道路上的一個突破。自由選舉、新聞自由、信仰自由、代議制立法和多黨體系已經全部變成了現實。

我們已經開始引進多元化的經濟，正在逐步實現多種所有制形式之間的平等。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農民階級正在振興，個體農民出現了，數百萬公頃的土地被分配給郊區和農村人口。生產者的經濟自由已經得到法律的保障，自由企業、股份制和私有化正在進行。

在將我們的經濟進程轉向自由市場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忘記這些都是為了每一個人的利益。在這些困難時期，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每個人得到社會保護——尤其是老人與小孩。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新世界。冷戰、軍備競賽、我們國家瘋狂的軍事化，這些使我們的經濟陷入癱瘓、扭曲了我們思想和破壞了我們品行的罪魁禍首都消失了。再也不存在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了。

我還想再次強調，在這個過渡時期，我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為確保核武器的安全控制已經竭盡全力。

我們將自己與世界對接，不再干涉他國事務，不再境外用兵，我們已經獲得了信任、團結和尊重。

我們已經成為在和平與民主的原則基礎上重組現代文明的主要根據地。

這個國家的各個種族和民族已經真正獲得了選擇自己的自治道路的自由。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民主改革追求，已經帶領我們走到了離簽署一個新的聯邦協議一步之遙的地方。

所有這些改變都需要最大的努力，都是在與老舊的、過時的、保守的力量——前共產黨和國家機構以及經濟管理機構，與我們的思維定式、意識形態偏見和寄生蟲似的平等主義心理所產生的越來越大的阻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下才得到的。這些改變與我們的不寬容、低水平的政治文化和對改變的恐懼產生了碰撞。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浪費了這么多時間的原因。在新的體系發揮作用之前，舊的體系就轟然崩塌了。這使我們的社會陷入更深的危機。

我意識到大家對今天的嚴重局勢的不滿，對各級機構和我個人角色的嚴厲批評。但我想再次強調的是：在一個如此遼闊的國家，考慮到其傳統的積重，根本改變的完成都是伴隨著艱難與痛苦的。

八月政變讓整體的危機達到了一個臨界點。這個危機最具災難性的影響是國家地位的崩潰。今天，我擔憂地看到我們的公民失去了一個偉大國家的公民身份——這樣的結果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沉重的。

我認為維持過去幾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是極其重要的。我們是在經歷了過去所有的痛苦和悲劇之后才贏得了這些成就。不論遇到任何情況，以任何借口，我們都不能拋棄它們。否則的話，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的所有希望都將被埋葬。

我說這些都是坦率而真誠的。這是我的道德職責。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過振興國家的政策、參與過民主改革的公民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也感謝其他國家的政治家、政治和公眾領袖以及成百上千萬的普通民眾——感謝他們理解我們的目標，給予我們支持，跟我們協商并提供真正的合作。

我離開是懷著擔憂的——但也對你們、你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懷有希望和信任。我們都是一個偉大文明的繼承者，它的復興和向一個現代的、莊嚴的生命的轉變，依靠的是每一個人、所有人。

我還想真心地感謝這些年來站在我身邊保衛正當的、正確的事業的人們。當然，我們本可以避免某些錯誤，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但我堅信，不久，我們共同的努力將會有所成效，我們的人民將生活在一個繁榮民主的社會。

晚上七點十二分，戈爾巴喬夫結束了他的演講。他看向鏡頭，最后說了一句：“祝大家一切都好！”

在俄羅斯電視臺，播音員葉蓮娜·米希娜宣布，“這是一個新的國家的新的一天”。幾秒鐘后，電視臺的各個頻道切換到正常播放狀態。有人切回到木偶劇，有人切回到一個關于嬰兒護理的紀錄片。

戈爾巴喬夫的一些助手和工作人員看到他們的領導人完成總統任期里最后一個行為時，眼里都含著淚花，切爾尼亞耶夫突然覺得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悲劇人物，“即使我這樣一個習慣天天見到他的人都覺得很難將這個術語用到他的身上，而他將因為這個術語被歷史銘記”。[2](#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0)格拉喬夫認為，在觀看的人之中，肯定有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在這個國家和世界注視下所犯的不可原諒的、不可彌補的錯誤。

對于半隱藏在攝像機后面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來說，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時刻，是他與戈爾巴喬夫在大約七年前開始的道路的結束。同時，戈爾巴喬夫又一次忽視了他的建議。他對演講的建議幾乎都沒有出現在最后的演講稿中，最后的版本大部分都是切爾尼亞耶夫的成果。他覺得戈爾巴喬夫沒有那樣的力量或勇氣去批判性地分析和理解已經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在這最后的日子里。演講最終顯示了戈爾巴喬夫是怎樣自從四個月前的政變開始就與現實脫節的。他為自己辯護、正名和挽救面子的嘗試是很牽強的。雅科夫列夫評述道：“這是缺乏自我分析的人的典型妄想。他沒有走出他自己走進去的那條心理死胡同，已經與整個世界相違背了。”[3](#Ya_Ke_Fu_Lie_Fu___Wu_Ai_____1991_1)

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戈爾巴喬夫身上的時候，帕拉茲琴科發現自己在想也許有人也在看著他，“在想自己幾個星期后會在哪里”。明天，他和同事們就要各走各的路了，他們的工作簿上將會蓋上“因為蘇聯總統官職的清除而被解職”。

CNN的俄羅斯翻譯官尤里·索莫夫實際上正在看著他的克里姆林宮同行，心想：“戈爾巴喬夫是帕拉茲琴科事業生涯最大的雇主，現在戈爾巴喬夫也隕落了。”[4](#2009Nian_9Yue_Dui_Suo_Mo_Fu__Som)

索莫夫不像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們一樣情緒激動。他注意到CNN的員工里有一半都是俄羅斯人，他相信他們中沒人關心這個。“我們中間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只不過是一次權力爭斗而已。它影響不了我們。”他不但沒有因一個帝國的覆滅感到震驚，反而認為所有的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崩潰了。他在多年后解釋道：“多年來暴露出來的都是混亂和盜竊。我當時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索莫夫并不是傾向于與政客們產生共鳴。他只是認為，“如果你不能工作到疲憊不堪和憤世嫉俗的程度，你就做不成一個好的翻譯；如果你太過于情緒化，你也做不成一個好的翻譯”。

然而，他確實為CNN的成就感到與有榮焉。“我們互相鼓勵。在一個國家領導人辭職的當晚對他進行采訪，這對以前的廣播網來說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CNN的制片人查理·考迪爾認為戈爾巴喬夫“動情而激昂的演講”是他聽過的最讓人難受的演講。“整個房間都彌漫著悲傷。在直播完后，戈爾巴喬夫就像是斗敗的公雞，看上去很糟糕——仿佛腎上腺素都用完了，沒了。”他想起了1968年林頓·約翰遜宣布他不能參加連任競選那天的場景，當時考迪爾是作為一名白宮記者進行見證的。“約翰遜總統發動了越南戰爭，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像戈爾巴喬夫一樣被人民拒絕，也像戈爾巴喬夫一樣作了許久的斗爭，最后不得不接受現實。”

湯姆·約翰遜在那天擔任林頓·貝恩斯·約翰遜白宮政府的助理新聞秘書。他也敏銳地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辭職和前美國總統決定不再參加競選之間的相似性。“在這兩個場合，我都感到一種悲涼。我覺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但都被自己釋放的力量掃除。”[5](#2009Nian_9Yue_Dui_Qia_Di_Er_He_Y)

戈爾巴喬夫一直等到確定電視攝像機已經不再拍攝。他嘆了口氣，向后靠了靠。在一陣短暫的沉默后，大家又開始忙活了。

克萊爾·席普曼和斯蒂夫·赫斯特拿來兩把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準備進行計劃中的CNN采訪。考迪爾堅持讓閑雜人等離開房間。“我的意思是我們正在做的是世界級新聞——不是在做地方新聞。”

戈爾巴喬夫懇求道：“我們能簡短點嗎？”仿佛突然間被抽干了力氣。在按計劃將核提箱交給鮑里斯·葉利欽之前，他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了。格拉喬夫告訴CNN，他們只有問四個問題的時間。

這次采訪是全球直播的，除了俄羅斯，在采訪過程中，戈爾巴喬夫說道，他希望隨著人們生活的改善，當他們在回首這段時期時，覺得它雖然艱難，但還是有必要的。“我們需要邁出一步，好在我們跨出了這一步。現在，我需要慢慢恢復，放松休息一下。”當被問到賴莎和其他家庭成員是怎樣接受他辭職這件事時，他回答：“他們很勇敢地接受了。”

在席普曼看來，戈爾巴喬夫很虛弱、挫敗、疲憊和憂傷，就像他已經精力衰竭，他仍然很疑惑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她感覺好像他們侵入了一個非常私人的時間。“我在那兒幾乎都感覺很糟糕了。就像是去參加葬禮的氣氛，”赫斯特驚訝于氣氛的憂郁，“他的眼睛里盛滿悲傷，全無之前的神采奕奕。”[6](#2009Nian_8Yue_Dui_Xi_Pu_Man_He_H)

莫斯科的中央電視臺在兩個小時后才播出了這個采訪，因為是在電視總部制片人心滿意足地發現里面沒有任何內容會冒犯到葉利欽之后才讓播出。

戈爾巴喬夫離開桌子站起來的時候，拿起那只萬寶龍筆，條件反射似的將這個閃亮的黑色物體插進胸前的口袋里。湯姆·約翰遜腦子在快速地轉動。他一定不能讓戈爾巴喬夫帶著他珍貴的書寫工具消失在走廊上，更何況它現在還有了歷史意義。這位CNN總裁在演講期間跟考迪爾小聲道：“我的筆怎么辦？”考迪爾嘀咕道：“拿回來！”當戈爾巴喬夫在往外走的途中停下來和他握手時，這位CNN總裁說道：“先生，我的筆！”帕拉茲琴科進行了翻譯。戈爾巴喬夫突然笑了笑，說道：“哦，對！”他把筆遞過去，就離開了。

席普曼感到很驚訝，戈爾巴喬夫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工具的重要性。“我看著湯姆、查理他們，我在想，這太瘋狂了。我們拿到了戈爾巴喬夫簽約移交蘇聯用的筆。”

有一個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倒是半真半假地想說服CNN留下這支筆。他得到的回答是：“沒門！”（2008年，約翰遜將這支筆捐給華盛頓的新聞博物館。）

劉香成為美聯社拍到了他想要的照片，捕捉到了這個場合的終結感。他說：“戈爾巴喬夫整晚看起來都非常冰冷，他馬上就要翻到演講的最后一頁了。我拿出我的攝像機，擺好，拍下了他（合上）裝有演講稿的文件夾的畫面”。[7](#2010Nian_1Yue_Dui_Liu_De_Fang_Ta_1)

按下快門幾秒鐘后，劉香成感覺到一只拳頭從三腳架后面重擊在他的腰上。湯姆·約翰遜看見那個保安在戈爾巴喬夫摘下眼鏡、關上文件夾時打了劉。他用口型問道：“你還好吧？”劉點了點頭。他急需將照片拿到城市另一端庫圖佐夫大街上的美聯社辦事處沖洗出來。那名打他的保安堵住門口。“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請求：‘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最后，他打開了那扇又高又厚的門，我跑過紅色的通道地毯，轉過彎，繼續以我最快的速度跑到走廊盡頭。所有等在那兒的西方的、俄羅斯的記者和攝影師都驚訝地看著我一個人跑了出來。有一些人還沖我豎了中指。”

“當我拿著彩色負片從暗房里走出來的時候，我深吸了口氣，因為我看到戈爾巴喬夫的畫面拍得很清晰，而演講稿文件夾被模糊化了，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第二天，這張照片幾乎登上了所有世界報紙的頭版，包括《紐約時報》。這讓我想起1989年在北京的一次經歷，當時我傳送了杰夫·懷德納拍攝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劉香成在他的書《蘇聯：一個帝國的隕落》中發表了這張戈爾巴喬夫的照片，書中還有其他美聯社的照片，這些照片讓美聯社榮獲了1992年普利策獎的現場新聞攝影獎。

戈爾巴喬夫的許多支持者被他的電視演講深深打動，盡管在與克里姆林宮隔岸相望的英國大使館里，大使羅德里克·布雷斯韋特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演講“莊嚴而恰當，但也僅是如此罷了”。

《文學報》的費德羅·布爾拉茨基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告別演講就像是有著莎士比亞深度的退場，宏偉而悲壯，讓他想起了《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臺詞：“重重的顧慮使我們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

列夫·科貝爾在他莫斯科公寓廚房里的一臺小電視機上收看了戈爾巴喬夫的演講。這位七十四歲的蘇聯現實主義雕塑家出生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同一天，因為雕刻了列寧大理石像和前東德馬克思市的巨型卡爾·馬克思像而聞名，他泡好咖啡，加入白蘭地，告訴路過前來看望他的約翰·肯普夫納：“我們與法西斯主義作斗爭，我們為蘇聯而斗爭，現在告訴我們蘇聯沒了。”對于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肯普夫納來說，這個圣誕節最大的挫敗是，他工作的報紙像許多競爭對手一樣沒有圣誕節次日檔（Boxing Day issue），所以他只能“見證著戰后歷史上最重要的幾天卻無法寫出來”。[8](#Ken_Pu_Fu_Na__Kampfner___Ke_Ge_B)

葉戈爾·蓋達爾在他舊廣場上的辦公室里觀看了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演講，他當時忙于一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央銀行合作的稱為“經濟政策備忘錄”的政策聲明。盡管他也為戈爾巴喬夫的垮臺推波助瀾，但他還是多少替他感到難過。“我認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一個好人。他最好的地方在于他確實不想通過暴力來保持蘇聯在東歐的權力。所以，他的離去不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而是

一個既成事實。”對蓋達爾來說，有三個關鍵的日期標志著蘇聯的終結。“第一個是8月21日，政變失敗。第二個是12月8日，我們達成了別洛韋日森林協議。第三個是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職。”[9](#2009Nian_10Yue_Dui_Gai_Da_Er_De)

布什總統在戴維營的電視上關注了戈爾巴喬夫的演講。在最后一任蘇聯總統開始講話的時候，美國東海岸還是一個溫和的冬日早晨的上午十一點。布什回憶道：“蘇聯的終結給了我很大的震撼；當時是圣誕節，是假日時光。”看到“共和國一個接一個獲得獨立，自由和自治穩占上風”，他感到一種“極大的振奮”。他一直很確信，到最后，即使有選擇的余地，中歐和東歐的人們以及蘇聯都會把共產主義撇到一邊，選擇自由。但是，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冷戰可能會延續更長的時間，對于核戰爭的恐慌可能還糾纏著他們。他后來指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我們都是勝者。我認為這也是讓結束冷戰的大部分進程成為可能的原因——因為它不是以犧牲任何一方來達成的”。[10](#2009Nian_10Yue_Dui_Gai_Da_Er_De_1)

根據美國中情局負責人羅伯特·蓋茨所言，在這個歷史性的一天，政府里沒有人覺得美國幫助摧毀了蘇聯，更沒有所謂的勝利感。他不認為布什總統會宣布冷戰的勝利。然而，他擔心這個“災難性的”事件釋放了被抑制七十年的力量，他們目前還真的不知道所有的后果。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認為戈爾巴喬夫值得更有尊嚴的退出。布什的這位國家安全顧問感到驚訝的是，一個充滿極大的、無休止的敵意的時代，其終結居然是突如其來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居然完全沒有鳴槍的儀式。在回顧往事時，他“對我們在促成這樣的結果中起到的作用感到驕傲……我們非常努力地將蘇聯往這個方向上推，保持著不至于在莫斯科引起暴動，更不至于引起全球性對抗的步伐”。[11](#Bu_Shi_He_Si_Kao_Ke_Luo_Fu_Te_5)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主席科林·鮑威爾以前去過莫斯科幾次，認為戈爾巴喬夫希望“在不換掉一個垂死病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心臟”的情況下復興蘇聯。他認為冷戰的結束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羅納德·里根總統所施行的勇敢無畏的領導。他寫道：“在那個圣誕節，難以想象的事情發生了。蘇聯消失了。沒有爭斗，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用一支筆劃了幾下……它就消失了。”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xxxiii-xxxvii頁。](#1_24)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2_24)

1. [雅科夫列夫《霧靄》，1991年12月23日的一則日記。](#3_23)

1. [2009年9月對索莫夫（Somov）的訪談。](#4_22)

1. [2009年9月對卡迪爾和約翰遜的訪談。](#5_21)

1. [2009年8月對席普曼和赫斯特的訪談。](#6_18)

1. [2010年1月對劉的訪談。](#7_14)

1. [肯普夫納（Kampfner），“克格勃審問了我的火雞”（The KGB Interrogated My Turkey）。](#8_14)

1. [2009年10月對蓋達爾的訪談。](#9_13)

1. [2009年10月對蓋達爾的訪談。](#10_12)

1. [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第564頁。](#11_12)

# 第25章 12月25日：夜晚

在戈爾巴喬夫開始講話后，鮑里斯·葉利欽很難強迫自己看著辦公室里的電視屏幕。他沒有拿到演講稿的復印件，他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宮的這位即將離職的占有者會說什么。然而，還不到一分鐘，俄羅斯總統就變得心煩意亂。戈爾巴喬夫沒有說他要辭職，而只是停止他的活動。他含蓄地批評葉利欽的“矛盾的、膚淺的、偏倚的判斷”，批評獨聯體的成立沒有依照“公眾意愿”。而且，他還承諾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確保阿拉木圖協議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真正的統一”——就好像他還能保證什么事情似的。

當戈爾巴喬夫開始為自己任期內的行為辯護時，葉利欽呵斥道：“把電視關了。我不想再聽了。”他告訴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去給他拿一份副本。格拉喬夫在戈爾巴喬夫的講話結束后將演講稿送到布爾布利斯手上。葉利欽讀完后，感到很惱怒，他覺得這是一份自私自利的政治宣言而不是一份政治告別辭。對于俄羅斯人民現在所享有的所有政治和精神自由，戈爾巴喬夫都要邀功。他一次也沒有提到過葉利欽的名字，或者哪怕是頭銜。他沒有將擊潰8月份針對他的政變歸功于葉利欽。他也不祝愿作為其繼任者的俄羅斯總統好運。也許葉利欽應該命令蘇聯廣播拔了直播室的插頭，他確實這樣想過的。[1](#De_Guo_Dian_Shi_Tai_ARDLan_Mu_19)

現在，就像往常很多時候一樣，這個容易動氣的西伯利亞人讓憤怒的情緒支配了他的行動。他拒絕按兩天前所協商的，去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接收核提箱。他怒氣沖沖地說，核提箱必須送過來。

他拿起電話，打給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帥，他正在參議院大樓二層的一個辦公室，等待被召喚去戈爾巴喬夫的房間參與這個歷史性轉交工作。跟他在一起的還有幾位將軍，都是來見證和幫助這個重要而具有象征意義的交換的。

葉利欽說道：“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我不能去戈爾巴喬夫那里了。你自己去吧。”

元帥表示抗議：“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這是一件需要謹慎處理的事情。我們應該一起去更好。況且，我不確定我一個人去的話，戈爾巴喬夫會不會把所有的（核）資產交給我。”

葉利欽說道：“如果有問題的話，再給我打電話。我們再想其他辦法進行移交。”

沙波什尼科夫并沒有十分驚訝。他也被戈爾巴喬夫惹急了。看著告別演講，他發現自己覺得這位總統已經待得太久了，他應該在政變后就辭職。[2](#Sha_Bo_Shi_Ni_Ke_Fu___Xuan_Ze_2)戈爾巴喬夫1985年成為共產黨的總書記時，人們對蘇聯抱有多大的希望啊！“他年輕、思維新式、精力充沛，有許多他的同事們沒有的長處。他引進了經濟改革、政治公開、民主化和人的價值。但時間過得越久，質疑和幻滅就越多。最主要的事情是——生活沒有得到改善。經濟仍然在持續惡化，政治形勢的發展之快讓整個體系開始崩潰。”葉利欽在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情況下擊退了政變者，這讓他認為，蘇聯的公民已經不再響應戈爾巴喬夫。很多人都不想蘇聯解體，這點他知道。沙波什尼科夫的妻子就不想劃定新的邊界。她一直擔心他們將來要出國去探望他們住在敖德薩的女兒，敖德薩如今在獨立的烏克蘭境內。但是，他們厭倦了蘇聯體系，他們只是不想要戈爾巴喬夫了。

元帥拿著裝有移交文件的公文包，爬樓梯到樓上，走進了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他在狹窄的接待室等了十分鐘，旁邊挨著坐在沙發上的，是被指派來保護核提箱的兩位上校，他們不引人注目，又神秘莫測，戈爾巴喬夫的一些員工已經不再注意他們了。他們保持低調的天賦屢次讓帕拉茲琴科印象深刻，他記得他們總是沉默地坐在那兒，臉上毫無表情但又奇怪地混雜著肅穆。

戈爾巴喬夫把沙波什尼科夫叫進去的時候，后者看見核提箱就放在這位前蘇聯總統的辦公桌上。他發現戈爾巴喬夫狀態保持良好，但明顯看得出不舒服。元帥陳述了他接到的指示，“葉利欽不來了，他來將核提箱拿給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認為這個場景“非常戲劇化，已經不是愚蠢可以形容的了”。在這場最終的較量中，畢竟是他占了上風。他手里掌握著俄羅斯總統需要用來使他的掌權合法化的東西。讓他自己來拿吧。戈爾巴喬夫不需要再回應他的對手的召喚了。[3](#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2)

事情成了僵局。葉利欽不會來，戈爾巴喬夫也不會讓步。兩位總統都必須簽署移交文件，這個條件滿足之后，才能在見證人面前恰當地完成程序。

當得知戈爾巴喬夫不肯移交核提箱時，葉利欽還是拒絕履行關于移交的最初協議。他低吼道，那就讓戈爾巴喬夫把它拿過來給我。戈爾巴喬夫必須到他的辦公室，或者圣凱瑟琳廳中立地帶，然后將核提箱在那里給他。圣凱瑟琳廳有著拱形屋頂和金色枝形吊燈，是四年前戈爾巴喬夫羞辱他的地方，因為他膽敢質疑經濟改革的步伐，戈爾巴喬夫慫恿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潑了他“一身臟水”。他指示布爾布利斯將他的要求傳達給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感到很憤慨。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得知在我們有協議的情況下，他拒絕前往。顯然葉利欽和他的隨從們聽了我的電視演講，然后爆發了。過了一會，我得到消息，俄羅斯總統提議去‘中立地帶’見面——圣凱瑟琳廳，也就是克里姆林宮里經常用來與外國領導人會談的地方……這樣一來，我剛退位幾分鐘，就面臨著無禮和放肆。”他相信，這種不按他們的安排辦事的行為不是葉利欽報復情緒的唯一反擊，而是葉利欽針對他的騷擾策略的一部分。

格拉喬夫認為，讓戈爾巴喬夫帶著核提箱去找葉利欽的“荒謬可笑的想法”是葉利欽更加好戰的顧問們提出來的，因為他們發現戈爾巴喬夫昂首挺胸、有尊嚴地下臺，而不是作為一個被打敗的敵人下臺。“葉利欽想向戈爾巴喬夫展示自己不再是他的下屬了。葉利欽的憤怒與他覺得今天是他的勝利日的情緒有關。然而，在戈爾巴喬夫的演講中，他讓每一個人意識到他所完成的歷史轉變。他不是作為一個被打敗的人而下臺的。這樣一來，葉利欽覺得在戈爾巴喬夫的光環下，他還是一個二流人物。他一定已經意識到他這一生都無法與他的對手匹敵。”

沙波什尼科夫嘗試著打破僵局。他建議戈爾巴喬夫先簽移交文件，然后由兩位上校中的一位將文件交給俄羅斯總統，在葉利欽確認收到文件后，戈爾巴喬夫就可以將核提箱交給沙波什尼科夫，由他拿過去給葉利欽。

元帥給葉利欽打電話，葉利欽在爆發之后已經冷靜下來了。他同意了這個折中辦法。一個上校拿著核提箱移交文件及蘇聯總統把軍隊最高指揮權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的政令一起離開。幾分鐘過后，葉利欽的辦公室打來電話，確認文件已經收到了。移交可以進行了。

一個上校打開了這個黑色金屬核提箱。戈爾巴喬夫檢查里面的設備。每樣東西都各安其位。他與兩位陪他走遍全球的值班上校握手，感謝他們的辛勤工作，然后道別。這兩個上校拿著核設備離開辦公室。沙波什尼科夫留下來與他的前指揮官最后再說幾句話。

在戈爾巴喬夫的接待室，切爾尼亞耶夫想弄清楚這些穿著軍裝的人進進出出是什么意思。他看見沙波什尼科夫離開時，“像往常一樣帶著笑，說‘你好！’”，但對整件事情“顯然覺得很尷尬”。

他和兩個雅科夫列夫走進去，跟戈爾巴喬夫一起坐在橢圓形桌子旁。他們發現他的臉是紅的，顯然對葉利欽的行徑感到不安。他們幫助他鎮定下來，幫他準備再次上鏡。

在兩棟克里姆林宮建筑之間進行口頭炮戰的時候，ABC的泰德·科佩爾和與他的工作人員一直在準備錄制核提箱從蘇聯總統到俄羅斯總統的儀式性交接。快到八點的時候，他被叫回總統辦公室。戈爾巴喬夫已經恢復了鎮靜。他微笑著歡迎ABC的員工。他告訴他們，核提箱已經在葉利欽那里了，仿佛沒有發生任何不順利的事情。“現在是葉利欽的手指控制著核按鈕了”。他剩下的“就是清理個人財務和一些文件”。

但是，葉利欽還沒有折磨完他的對手。

像所有人一樣，戈爾巴喬夫希望蘇聯國旗能在參議院大樓頂一直飄揚到12月31日。葉利欽的新聞秘書帕維爾·沃夏諾夫在12月17日特地告訴俄羅斯和世界媒體：“除夕夜，莫斯科河上中世紀建成的磚墻城堡克里姆林宮上空，象征革命的錘子鐮刀的紅旗飄揚了七十年，將被降下，標志著蘇聯時代的正式終結。”他說，隨后，俄羅斯國旗將以勝利的姿態在煙火的照耀下升起，迎來新的一年和新的時代。

在今晚，戈爾巴喬夫發表告別演講時，紅旗仍然飄揚在明亮的綠色圓屋頂上，經常在紅場上閑逛的人群和游客都能看見。但在戈爾巴喬夫結束演講二十分鐘后，兩個工作人員通過參議院大樓屋頂的一個活板門，出現在屋頂上，他們爬上屋頂弧面的金屬階梯，到達頂部一個設有齊腰高欄桿的圓形平臺上。在那里，他們從高高的桅桿上拉下20x10英尺大小的旗幟。旗降到底后，其中一個人將它收起來，就像餐館的服務員收拾桌布一樣。然后，這兩個人將戰前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套上繩索，沿著桅桿慢慢升起。他們抓住這塊巨大編織物的末梢，等它升到頂部的時候放開，這樣旗幟就可以借助旗桿內部一個管道噴出的壓縮空氣在西南風中歡快地迎風飄揚了。

紅場上沒幾個人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人提醒公眾或國外媒體在今晚等待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行為——更換列寧和斯大林執政過的大樓頂上的象征。只有俄羅斯電視臺在葉利欽助手們的提醒下讓一名員工就位，記錄這個事件。《紐約時報》的塞奇·舒梅曼回憶道：“我已經回到辦事處，正在寫關于戈爾巴喬夫辭職演講的報道；我不認為那里還有其他記者。”然而，他的妻子瑪麗和他的孩子安雅、亞歷山大和娜塔莎正在附近。“當蘇聯紅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降下，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的時候，他們碰巧正在紅場上。我的孩子們留意了確切的時間，晚上七點三十二分，然后給我打了電話。”[4](#2010Nian_4Yue_Dui_Shu_Mei_Man__S)

當繪有白、藍、紅三條水平條紋的旗幟在人造風里擺動得噼啪作響時，克里姆林宮救世主塔敲響了鐘聲，一直持續了幾分鐘。在克里姆林宮附近走動的人半是好奇半是擔憂地抬起頭。盡管救世主塔的鐘表每十五分鐘就敲響歡快的鐘聲，但笨重的鐘只為意義深遠的事件敲響過幾次。鐘聲讓更多深夜的散步者和游客注意到了三色旗。舒梅曼的家人記得有幾個驚訝的外國人發出歡呼聲，而一個形單影只的退役老兵則憤怒地指責著。當幾個俄羅斯散步者看到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發出了幾聲“哦！哦！哦！”，伸長脖子往上看的年輕人吹著口哨，發出笑聲。還有一個人鼓掌。

這個消息很快傳開了，外國記者們馬上趕往紅場。穿著厚重長外套的民兵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是列寧陵墓的一名哨兵，他離開去吃晚飯的時候，紅旗還在飄著，而當他回來的時候，那里已經變成了俄羅斯聯邦的國旗了。他告訴《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克萊里蒂，“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一個喝迷糊了的莫斯科人問陵墓附近的一個旁觀者：“你們為什么對著列寧發笑？”一個路過的人提醒他有一個外國人在旁邊看著，讓他噤聲。同樣來自《紐約時報》的弗朗西斯·X·克萊恩斯記下了這段對話。另一個莫斯科人說：“那又怎樣？他們是這些天來養活我們的人。”從德國度假歸來的攝影師烏里·克里茲發現，冷淡的公眾反應讓人覺得奇怪。他告訴《華盛頓郵報》的邁克爾·多布斯：“當柏林墻被推倒時，每個人都跑到街上歡呼。這是一件重要級別與之相當的事件，卻似乎沒人關注。”[5](#Ke_La_Li_Di__Clarity___Wu_Ren_We)

斯蒂夫·赫斯特從克里姆林宮的一扇窗戶看到了旗幟的更換，從那扇窗戶可以看到三角形的參議院大樓最高處的屋頂。“我從窗戶往外看，看到錘子和鐮刀旗降下來了。我記得那是一幕多么具有視覺沖擊的場景。”根據斯圖·盧里所言，正在CNN工作人員拆設備的時候，有人得到這件事的消息，一扇窗戶被打開來錄制這一場景。戈爾巴喬夫的保安人員要求把窗戶關上。湯姆·約翰遜沖他的翻譯喊道：“告訴他們所有責任由我來承擔。”但警衛還是把他從窗戶邊上推開了。盧里說道：“保鏢就是保鏢，全世界的保鏢都一樣。他們才不管CNN總裁的什么責任呢！”

安德烈·格拉喬夫離開這座俄羅斯城堡前往法國電視臺在格魯津斯基大道的辦事處時，驚愕地看到紅旗被“從克里姆林宮的炮臺上匆匆忙忙地扯下來，就像克里姆林宮是德國國會大廈一樣”。旗桿在總統辦公室的正上方，“戈爾巴喬夫很幸運沒有看到這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個外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錯過了拍攝這一幕的機會，花了200法郎從一個大膽拍攝了國旗更換的莫斯科人手里買下了錄像帶。

戈爾巴喬夫得知這件事的時候，認為這是對他尊嚴的再次侮辱。他認為是葉利欽“指示降下蘇聯國旗，換上俄羅斯聯邦的旗幟，并親自確保整個過程按照預定計劃完成，由電視臺攝像機拍攝下來”。戈爾巴喬夫想將紅旗作為紀念品，但是太遲了，它已經被塞進克里姆林宮的地下室了。

同時，CNN的工作人員成為大約十分鐘后核提箱交換的唯一目擊者，當時他們已經拆卸好設備，正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里集合。

盧里說道：“七點五十六分，我們在綠色模擬辦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我們這一群人到齊后，就可以一起離開了。在走廊的另一頭，戈爾巴喬夫辦公室門口附近，一個人拿著一個用布蓋住的手提箱出現，提箱上還有一根突出的天線。他走進了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我們正在見證核密碼由戈爾巴喬夫轉移到葉利欽的控制之下。”查理·考迪爾回憶道：“我們正由搬運工們帶路沿著一條長長的走廊往前走。突然，在我們前方二十五英尺處的一個側門打開了。武裝士兵從里面走出來。他們攔住路，讓我們停下。左邊的一扇門打開了。一個高級軍官走出來，胳膊下夾著一個盒子。對面的門也打開了，走出來一個差不多的人。他迅速立正。他們互相敬禮。這兩位軍官交換了自己手里的東西。”電視攝像機已經收起來了，錯失了記錄這一歷史時刻的機會。

斯圖·盧里自己還見證了另一小段歷史。他走在CNN工作人員的前面去確認租來的貨車已經在外面就位。“我快靠近卡車停放的地方時，看見一個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向我走來，將折成長方形的旗幟夾在胳膊底下。”盧里攔下這個人，拍了一張照片，這樣才爭取到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最后一面蘇聯國旗被拿走時的唯一一張照片。他馬上就后悔沒有提出將它買下來。湯姆·約翰遜后來嘗試從一個克里姆林宮官員那里買下這件象征物，但被委婉而堅定地拒絕了。

約翰遜與電視臺工作人員離開參議院大樓時，揮著他的萬寶龍筆，大聲喊道：“你們覺得我這支筆能賣多少錢？”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們歡呼著互相拍著同伴的肩背。約翰遜喊道：“我們做到了！我們做到了！”

他們成功完成了一件非凡的壯舉。當電視上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進行辭職演講時，屏幕右下角的一行字向世界上153個國家說明，他們正在收看的是CNN的報道。盧里聲稱：“在競爭激烈的新聞業的歷史上，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成功。”[6](#2009Nian_Qiu_Tian_Dui_Qia_Di_Er_1)

在華盛頓，布什總統的助手們正在給他看一份他們起草的聲明稿，歌頌戈爾巴喬夫將蘇聯人民從獨裁的令人窒息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看完后，他和顧問們開了一個電話會議，討論這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應對。斯考克羅夫特暗示，戈爾巴喬夫辭職的重要性不是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的“一個聲明就能應付過去的”。[7](#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8)

布什決定乘坐戴維營的海軍一號回到華盛頓，從總統辦公室向全國發表演講，強調克里姆林宮所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廣播公司和有線電視公司都暫停了在圣誕節東部標準時間晚上九點的預定節目，讓總統從總統辦公室做電視演講。盡管布什沒有直接宣布蘇聯的隕落是美國冷戰的勝利，以避免觸動戈爾巴喬夫的敏感神經——兩年來，他一直禁止他的工作人員將東歐和蘇聯發生的事情描述成美國的勝利，但演講中他多次使了“勝利”這個詞，顯然在暗示美國是勝者。他說，核威脅正在消退，東歐獲得了自由，蘇聯本身不存在了。“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這是我們價值觀的道德力量的勝利。每個美國人都可以為這種勝利感到自豪。”

在對戈爾巴喬夫表示稱贊后，美國總統承認了新的現實。他宣布美國承認和歡迎“由英勇無畏的鮑里斯·葉利欽帶領的”一個自由、獨立和民主的俄羅斯的出現。他宣布，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就是將來的俄羅斯大使館。他說，他支持俄羅斯獲得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并且從今天開始，美國將承認烏克蘭、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格魯吉亞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布什等到戈爾巴喬夫辭職后才承認俄羅斯，作為他對自己被罷免的戰友和結束冷戰的合作伙伴的一種個人表示。美國政府已經承認了組成原蘇聯的波羅的海共和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

布什總統最后說道：“對所有美國人來說，這是充滿巨大希望的一天。愿上帝庇佑獨聯體里新國家的人民。在這個世界和平、人間充滿善意的特殊日子里，愿上帝繼續庇佑美利堅合眾國。祝大家晚安。”

既然蘇聯已經成為歷史，白宮的官員們覺得可以自由表達認為戈爾巴喬夫緊握權力太久的觀點了。一個政府官員告訴《紐約時報》：“如果戈爾巴喬夫一個月前辭職，會比現在顯得有水準得多。他與這些事件擦身而過，降低了自己的行情，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他在歷史上的位置。看到如此有聲望和歷史重要性的一個人對歷史事件的判斷失誤，讓人覺得很悲哀。”[8](#Luo_Sen_Ta_Er__Rosenthal____Bu_S)一位匿名的發言人聲稱，布什私下里認為，在10月份馬德里的中東會議之后，戈爾巴喬夫就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了，在那次會議上，身無分文的蘇聯代表團還要請求西班牙政府為他們的旅館費用買單。

現任和以前的世界領導人紛紛表示對戈爾巴喬夫的稱贊。在倫敦，約翰·梅杰指出，改變歷史的是極少數人，但戈爾巴喬夫就做到了，不管今天發生了什么，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穩固的。在戈爾巴喬夫的關注下完成德國統一的赫爾穆特·科爾總理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戈爾巴喬夫在這個世紀歷史上的位置不會受到任何人的質疑。北約秘書長曼弗雷德·沃納說，戈爾巴喬夫為實現一個完整而自由的歐洲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歐洲對此表示感激。羅納德·里根聲稱，戈爾巴喬夫將永存于歷史中，而瑪格麗特·撒切爾為戈爾巴喬夫“不動用武力為世界所做的偉大事情表示感激”。

在明斯克，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沒有在電視上看戈爾巴喬夫最后的演講。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晚上的時候，這位白俄羅斯領導人聽說，在他們定下的官方保質期（新年前夕）前一個星期紅旗就被降下來了，蘇聯也走到了末路，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出力了。二十年后，當他被問到自己得知這個消息的反應時，舒什克維奇用一個詞回答：“正好！”粗略翻譯過來就是：“好極了！”[9](#2010Nian_1Yue_Dui_Shu_Shi_Ke_Wei)

1. [德國電視臺ARD欄目1991年12月30日引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海外情報檔案（FBIS Daily Report），報道了葉利欽在準許廣播節目上的疑慮。](#1_25)

1. [沙波什尼科夫《選擇》，1991年12月25日的一則日記。](#2_25)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65—866頁。](#3_24)

1. [2010年4月對舒梅曼（Schmemann）的訪談。](#4_23)

1. [克拉里蒂（Clarity），“無人為歷史的開創而歡呼”（No One Said Hurrah as History Was Made）；克萊因斯（Clines），“蘇聯的終結”（End of Soviet Union）；多布斯，“戈爾巴喬夫的退位結束了蘇聯時代”（Gorbachev Resignation Ends Soviet Era）。](#5_22)

1. [2009年秋天對卡迪爾、約翰遜、盧里、赫斯特和格拉喬夫的訪談。](#6_19)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59頁。](#7_15)

1. [羅森塔爾（Rosenthal）。“布什不情愿地推斷出戈爾巴喬夫試圖過久地握權”。（Bush Reluctantly Concludes Gorbachev Tried to Cling to Power Too Long）](#8_15)

1. [2010年1月對舒什克維奇（Shushkevich）的訪談。](#9_14)

# 第26章 12月25日：深夜

已經晚上九點了，克里姆林宮陷入可怕的沉寂。安德烈·格拉喬夫剛從格魯津斯基大道的法國電視工作室做完采訪回來。他在車載電話上接到一個電話，戈爾巴喬夫想讓他馬上回克里姆林宮。參議院大樓外面只有幾個司機和警衛。戈爾巴喬夫的新聞秘書發現三層的走廊上和辦公室里都沒有人。他在核桃廳找到了戈爾巴喬夫，跟他最親密的助手們都坐在橢圓形桌子旁。這是他的上司唯一一次給他打電話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社交。一瓶五十年的白蘭地已經打開了，杯子被分發到每個人手上。

戈爾巴喬夫很憂傷。他對自己隨隨便便就被免職感到很沮喪，甚至都沒有“像文明國家一樣的例行的”告別儀式。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多年保持互稱同志的關系的前共產主義者——打來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們得到的遺產。他說：“昨天還幾乎沒有人聽說過他們，明天他們就將是獨立國家的首腦。他們為自己的國家安排了怎樣的命運又有什么關系呢？”切爾尼亞耶夫鄙視這些無禮的領導人，他們應該將自己的政治事業歸功于戈爾巴喬夫，他們中一些人極為腐敗，僅為了保持權力就從共產主義跳換到資本主義。他在日記中指出，“納扎爾巴耶夫、卡里莫夫、尼亞佐夫，更別說克拉夫丘克或其他的二流貨色，甚至都不想費力打個電話來說些‘適合這個場合的’官話”，他指的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克蘭的總統。“你們能做什么！對戈爾巴喬夫創造出來的、剛起步的民主來說，蘇維埃人是最大的、最頑固的遺留問題。”[1](#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12)

格拉喬夫推測，他們都太害怕引起葉利欽的不快，因此“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找到道義的力量來向正被拋棄的戈爾巴喬夫表示一下個人姿態”。（直到五年后，共和國的新領導人中才有一位又跟戈爾巴喬夫說話了。吉爾吉斯斯坦總統，葉利欽的一個老朋友阿斯卡爾·阿卡耶夫在1996年歡迎戈爾巴喬夫來到首都比什凱克，并在一次公開場合宴請了他后，葉利欽此后有一年的時間拒絕與他握手，并在這之后他們第一次見面時責備他說：“阿斯卡爾，你怎么能這樣做呢？”[2](#Ke_Er_Dun___Ye_Li_Qin_____Di_391)）

前總統在這個半明亮的核桃廳給他的一小群顧問敬酒，克里姆林宮侍者葉妮亞在下班前留下了一些沙拉和肉菜。這群人包括了戈爾巴喬夫最親密的同伴和最得他心的人：有格拉喬夫，他在最后的幾天代表戈爾巴喬夫向世界媒體介紹基本情況，將一件沒有希望的事情做到最好；還有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國家電視臺的負責人；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幫助戈爾巴喬夫啟動了經濟改革；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他忠誠的助手；以及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所有這些人都是和他同甘苦共患難的、最進步的、最忠誠的顧問。

切爾尼亞耶夫是戈爾巴喬夫最親密的心腹、最直率的批評者，也是最多產的年代記編者。這位私生活復雜的古稀老人還是戈爾巴喬夫美好名譽的擔保人。在政變的三天中，他也在福羅斯，他證實了戈爾巴喬夫關于被短暫囚禁的描述。他的正直誠實和金字招牌——即使是瓦列利·波爾金都對他倍加推崇——確保沒人會認真對待在莫斯科和一些西方學術界流傳的中傷說法，即認為戈爾巴喬夫秘密參與了強硬派的陰謀。不過，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一直很融洽。當戈爾巴喬夫對波羅的海諸國進行制裁的時候，切爾尼亞耶夫寫了一封辭職信，但在痛苦了很久后，沒有將它遞交出去。他現在覺得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

作為指揮者和助手在一起工作，戈爾巴喬夫和他一起經歷了許多大風大浪。而且不管怎樣，他們之間有一種忠誠。他解讀事件的角度通常比戈爾巴喬夫更加敏銳。他私底下認為，葉利欽雖然作為一個人來講稍顯笨拙和平庸，但卻是這個歷史階段俄羅斯所需要的首領。而戈爾巴喬夫作為列寧所創造的一個暫時實體的產物，從來沒有真正理解俄羅斯和它在歷史上的位置。一年前，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承認，他開始不喜歡和戈爾巴喬夫一起工作。“他從來沒有說過他很欣賞我，沒有說過‘謝謝’，哪怕是提到我的貢獻會對他有利的情況下，也沒有說過。”波爾金對他的前任上司沒有任何好話，他在回憶錄中也附和了這樣的抱怨，聲稱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工作人員的關系缺乏人性的溫暖和相互尊重，“看到他像對待仆人一樣對待他們是很令人惱火的”。

而對戈爾巴喬夫來說，他在受到懷有陰謀的克留奇科夫影響的那些時日，對切爾尼亞耶夫產生了懷疑。他曾對他的參謀長透露，切爾尼亞耶夫不可信，因為情報可能就是從他這兒泄露出去的，他還指示波爾金限制切爾尼亞耶夫能夠看到的秘密情報。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一整天都待在克里姆林宮，主要是因為他覺得在這個傷感的時刻，應該陪在總統身邊。他是經濟改革的“第一代成員”，這些有才智的人從一開始就信任戈爾巴喬夫，熱情地投入改革體系的事業中。他是克格勃前身契卡第一任負責人弗拉基

米爾·雅科夫列夫的兒子，將《莫斯科新聞報》從一份共產黨宣傳報轉變成一份合格地體現政治公開的報紙，把握好了他認為戈爾巴喬夫已經準備好容忍的尺度。在戈爾巴喬夫一年前傾向強硬派的時候，他們一拍兩散，但三個月前，政變之后，一切都改變了，戈爾巴喬夫任命他為國家廣播公司的負責人以及他的政治顧問委員會的一員。他將自己與戈爾巴喬夫聯系得如此緊密是在冒險。俄羅斯總統現在掌握著國家電視臺，他明天就會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留下來。

像切爾尼亞耶夫一樣，圈子里的另一位雅科夫列夫過去也被戈爾巴喬夫的輕率欠考慮傷害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曾向切爾尼亞耶夫透露，在與戈爾巴喬夫一起工作的六年，他從沒聽到過一句謝謝。他抱怨道：“事實上，經濟改革的想法是在我還擔任加拿大大使的時候與他的一次談話中產生的，我甚至感受不到他的任何感激之情。”他們的關系有時非常令人擔憂，現在也仍然很復雜。就在一年前，克留奇科夫告訴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工。總統從此變成了妄想狂，甚至在1990年夏末的一天，突然冒出他的顧問正與其他激進者一起謀劃政變的想法。[3](#Shu_Er_Gen___Su_Lian_Da_Shi)于是，他跟蹤雅科夫列夫到幾百英里外的一個森林里，雅科夫列夫在那里和孫子們一起采蘑菇。在電話里，他幾乎指責驚訝得目瞪口呆的雅科夫列夫密謀反對他。這樣一來，死硬保守派就有理由懷疑戈爾巴喬夫這位助手的長期意圖。在蘇聯解體三年后，雅科夫列夫聲稱，他和謝瓦爾德納澤在經濟改革的那些年就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建議會導致體系的崩潰，他自夸道：“我們在對手們及時醒悟過來阻止之前就已經完成了。”[4](#Ao_Duo_Mu__Odom___Su_Lian_Jun_Sh)政變讓戈爾巴喬夫看清了克留奇科夫的陰謀，但他從未完全克服他對雅科夫列夫的不信任。他知道在政變后期待他在俄羅斯議會被羞辱的可不止葉利欽一個人。他注意到自己的某些同伴也在幸災樂禍地觀望著，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在摧毀體系上也幫了忙，雖然他經常因為戈爾巴喬夫的舉棋不定感到挫敗。這位六十七歲的亞美尼亞人在1980年代末的時候經常催促戈爾巴喬夫向社會民主轉變，向多黨政治前進，這在當時是無法想象的。他后來觀察到，“在革命體系中，經常會出現一種情況：我們在今天看來覺得陳腐的事物，在當時你連提都不能提”。戈爾巴喬夫也曾懷疑他泄露了處理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州的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沖突的決定，他讓克留奇科夫去調查，但沒得到任何結果。二十一個月前，只有夏哈納扎羅夫被邀請與米哈伊爾和賴莎單獨喝香檳，慶祝他的上司榮升為總統。現在，他在這里見證他的下臺。賴莎沒有來“送葬”。深夜的克里姆林宮一直都是男人的時間。

盡管有戈爾巴喬夫任職期間的所有怠慢和不公，在這最后的時間里，一種伙伴情誼的溫暖和感受回到了被脫去皇冠的皇帝和他致力于改革的侍臣之間。在空蕩蕩的克里姆林宮大樓里，這一小群助手一致認為，他們服務的是一個具有歷史影響力的人物，一位偉人。在1991年12月25日這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這種聯系將他們團結在一起，團結在戈爾巴喬夫周圍。

蘇聯國旗的降下對他們所有人都有不小的影響。即使是經濟改革最激進的改革者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都覺得這件事在撕扯著他的情感。他、切爾尼亞耶夫和夏哈納扎羅夫都在與希特勒軍隊進行的偉大愛國戰爭中在紅旗下戰斗。就在一年前，雅科夫列夫還宣布，他會保衛這個革命象征，“就像我的父親在四年內戰中保衛它，就像我在偉大愛國戰爭中保衛它一樣”。[5](#Deng_Luo_Pu___E_Luo_Si_De_Jue_Qi)它已經不在那兒了，不需要保護了。

安德烈·格拉喬夫認為這一天既是一次失敗，也是一場悲劇。它是一個在完成任務前就被迫離職的政治家的失敗，也是一個在計劃見成效前就被迫將它們放棄的改革者的悲劇。（在這群人中）相對年輕的發言人想起還有一些朋友缺席了，但至少不該來的人沒有出現。猶大沒有參加這次最后的晚餐，但“即使猶大曾經是戈爾巴喬夫的隨從，他現在也已經背叛了”。[6](#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9)

冷戰結束時戈爾巴喬夫身邊最重要的改革者沒有出現在這次聚會中。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是在老阿爾巴特街附近的波羅特涅科夫大道上自己的公寓里看辭職演講的，他現在正因為在祖國格魯吉亞發生的內戰而心事重重。這位前蘇聯外交部長跟兩位雅科夫列夫一樣，都是在政變后重新加入總統團隊的。他近來有時在深夜的時候與戈爾巴喬夫一起待在克里姆林宮，單純就是聊天，但他們永遠也恢復不了他們一起在國際舞臺上完成偉大事跡時那種友誼的溫暖了。謝瓦爾德納澤無法原諒戈爾巴喬夫袒護在1989年殺害他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者的蘇聯軍隊，也無法原諒當他被強硬派攻擊時戈爾巴喬夫沒有替他辯護。他覺得總統從來都不聽那些對他真正忠誠的人的意見。并且，他對戈爾巴喬夫在接受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沒有提到他頗有微詞。他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做點什么，說幾個字，謝瓦爾德納澤也可能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7](#Zi_You_Ou_Zhou_Dian_Tai__Radio_F)他確定戈爾巴喬夫開始憎惡他的外交部長在西方的受歡迎程度，推測道，“世界認識了我，信任我，而戈爾巴喬夫對這點很不樂意”。在政變期間，謝瓦爾德納澤公開提出關于戈爾巴喬夫合謀的可能性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后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謝瓦爾德納澤說這樣的話應該摸摸自己的良心。謝瓦爾德納澤還想在戈爾巴喬夫的告別辭中讓他承認自己在結束冷戰中所起到的作用，但他提出的關于辭職演講的建議被忽略了。現在他覺得當時接受做回原來的工作是一個嚴重的個人失誤。

當核桃廳的這些人在舉杯致敬又重新倒滿后，戈爾巴喬夫回憶起他早年作為一名職業共產黨員的日子，以及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性，蘇斯洛夫是幕后操盤手，塑造了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時代之間共產主義思想的禁欲主義。年輕的共產黨官員戈爾巴喬夫曾一度敬畏蘇斯洛夫，甚至跟他戴一樣的淺頂軟呢帽。蘇斯洛夫讓戈爾巴喬夫一炮走紅，他從來沒有想過，他的跟隨者有一天會以改革者的身份幫助摧毀共產黨。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則對蘇斯洛夫只有輕視。在他的研究中，他已經將他確定為斯大林掩飾下的一個大屠殺計劃的擁護者和負責人之一。他已經證實蘇斯洛夫參與了逮捕的組織，對將成千上萬的平民驅逐出波羅的海國家負有直接責任，并精心策劃了對杰出的蘇聯藝術家和科學家的迫害。在他看來，戈爾巴喬夫的導師應該因為反人類罪被審判。但他什么也沒說。

戈爾巴喬夫記得他剛到莫斯科工作的時候有多么戰戰兢兢，他成為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時，又是怎樣弄清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他告訴他的同志們，在完成他的回憶錄后，打算寫一本書來解釋經濟改革的想法是怎樣在他腦海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說到這里，他順便讓切爾尼亞耶夫告訴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高級助手霍斯特·泰爾奇克，不要把他已經在西方出版的書《八月政變》的錢發到莫斯科。[8](#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1)在不確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還是暫時將錢在外國存成硬通貨的好。

盡管戈爾巴喬夫在感激別人對他的忠誠方面有些遲了，但在他最痛苦的這個夜晚，“有這些最親密的朋友和同事陪在他身邊，分擔他擔任總統最后幾個月的巨大壓力和劇變”，還是很讓他感動。這里都是理解所發生之事的真正意義的人。“他們許多人在克里姆林宮通宵達旦地工作。他們的動力不是職業興趣，而是真誠的情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尤其是我與其中一些人在過去還有過沖突的情況下。”[9](#Ge_Er_Ba_Qiao_Fu___1991Nian_9Yue_2)他認為，像這樣的親密戰友能夠了解，他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是多么大的一個負擔，有些時候事情又多么艱難，這些事件又是如何經常讓他瀕臨絕望的。

這些憂傷的改革者在克里姆林宮一直待到了午夜，還不想接受最后一任蘇聯總統的最后一天就要結束，他們的事業也隨之結束的事實。

格拉喬夫回憶道：“我們喝了幾瓶白蘭地。氣氛肅穆而悲哀。

有幾分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覺。有一種所有人同甘共苦的感覺。”[10](#2009Nian_10Yue_Dui_Ge_La_Qiao_Fu_2)

戈爾巴喬夫在多愁善感地和同志們道別后，走到克里姆林宮廣場，他離開參議院大樓時，總統的吉爾車就已經在等著了。司機載著筋疲力盡的前總統穿過城市中心無人的街道，駛過莫斯科河大橋，沿著庫圖佐夫大街上了魯布列夫高速，最后到達別墅的車道。外面的溫度降低了，車頭燈反射著瀝青路面上堆積的凍雪上的冰凌。司機沒有像往常一樣將車停人車庫，而是掉頭離開，消失在夜色中。

當戈爾巴喬夫走進總統住處時，他震驚了。衣服、鞋子、書、裝框的照片和個人紀念品要么堆在地板上，要么塞在盒子和板條箱里，已經準備好搬往新家了。今天晚上不是和賴莎在小道上進行午夜散步放松的時候。況且，他已經感覺到有流感的癥狀了。

伊戈爾·別利亞耶夫制作了總統在最后幾天跟官員和外交家們談話的磁帶，并帶回他在莫斯科的公寓。這位紀錄片制作者拍攝了一些獨一無二的照片，關于戈爾巴喬夫處理未解決的事務的，如公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克格勃文件。別利亞耶夫崇拜他的莫斯科大學校友。他想讓他還在世時就受到俄羅斯人民的愛戴，想讓他被當成一個俄羅斯不能理解的人來感激。葉戈爾·雅科夫列夫了解別利亞耶夫的忠誠，讓別利亞耶夫全權負責ABC和蘇聯廣播的項目，記錄戈爾巴喬夫的離職。不出他所料，這位電影制作者發現，在電視中心，任何對戈爾巴喬夫的關注都是極其敏感的。除了實際的辭職播放和這部蘇美電影，莫斯科電視臺總部幾乎沒有人想被牽涉進一個積極關注戈爾巴喬夫對世界的貢獻的節目。

別利亞耶夫將膠卷藏在沙發底下，過了十年才把它們重新拿出來。一直等到2001年12月戈爾巴喬夫辭職十周年的時候，他才得以在俄羅斯電視臺播放他的紀錄片。

在克里姆林宮的另一角，葉利欽也待到很晚還沒有回家。但是，在戈爾巴喬夫喝著白蘭地的時候，今晚的葉利欽卻是清醒的那一個。葉利欽因為作為軍隊最高總指揮合法掌控核提箱的新責任而情緒有所緩和。當沙波什尼科夫來到葉利欽的辦公室完成核提箱的轉移時，他發現葉利欽興致索然。[11](#Ao_Duo_Mu___Su_Lian_Jun_Shi_De_J)就像以前一樣，脾氣爆發過后，隨之而來的是自我懷疑和悔恨情緒。

一個小時之前，在一個城市有兩個常駐的不同政治實體的兩位總統。現在，只剩葉利欽一個人了，他必須按照新規則辦事。他后來承認，獲得絕對權力的狂喜很快就被“嚴重的緊張不安”代替。

葉利欽對提箱里的通訊屏幕、授權按鈕和電話系統都非常好奇。沙波什尼科夫觀察到他是多么認真仔細地熟悉這套設備和它的工作原理，與軍官專家討論，解決了他們的住宿、路線、私人生活和工作流程等所有問題。“在那之后，我又與葉利欽待了一個小時，我們詳細討論了軍隊的問題。”

軍隊的問題是壓倒一切的問題。自從晚上七點最后的蘇聯領導人簽署政令辭去總指揮職務后，三千八百多萬蘇聯軍隊就不復存在了。他們所有人宣誓效忠的國家也不存在了。這個國家的核力量分散在四個共和國，但是現在隸屬于俄羅斯總統。作為以書面形式確定下來的獨聯體軍隊的國防部長和指揮官，沙波什尼科夫有新的職責。他向他的政治領導人表達了深重的憂慮，蘇聯這個龐大的軍事機器的解體可能會帶來混亂。

共產主義超級大國的崩潰在新獨立的共和國留下了蘇聯陸、海、空部隊。元帥必須監督俄羅斯國籍的常規力量的撤回，以及將所有核武器從俄羅斯的鄰國撤回。在蘇聯垮臺前，莫斯科軍隊的軍事行動范圍有865萬平方英里，從太平洋延伸至西歐。現在已經被控制在與挪威、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中國、蒙古和朝鮮接壤的660萬平方英里俄羅斯領土范圍內。

所有的軍事行動地圖都過時了。莫斯科現在失去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以及它們的戰略性波羅的海港口，失去了處于歐洲中心的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以及曾經忠誠的“斯坦國們”：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新政府們忙于攫取蘇聯的軍事資產。到處是一片混亂。俄羅斯指揮官們將船只和飛機重新進行安置，以防它們被其他共和國征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議下，葉利欽這天早上發布命令，讓蘇聯艦隊的驕傲、還在試航的龐大精密的新航空母艦庫茲涅佐夫號從克里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港口起航，將它重新安置在俄羅斯北部的摩爾曼斯克，防止它被新的烏克蘭當局奪取。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當天《消息報》的采訪中，將自己對在烏克蘭領土上蘇聯軍隊的立場傳達給莫斯科。烏克蘭總統再次向俄羅斯保證，他不反對葉利欽擔任他領土上的戰略力量的最高指揮，但有一個強制條件，就是將戰略導彈和策略核武器從軍事行動狀態解除。“也就是說，我們將擁有核武器，但它們將永遠不會被啟動。這樣的話，世界將會知道，如果出現任何不幸的事，都不會有烏克蘭的責任，不過但愿不會出現這樣的事。”

至于常規力量，克拉夫丘克承諾不會趕走俄羅斯軍官，也不會邀請在其他地方服役的烏克蘭軍官回到烏克蘭服役。“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得為他們的回歸做好準備，也要因此趕走正在這里生活的人。這將涉及大規模的民族的重新安置，會導致對抗……烏克蘭人快速回歸到烏克蘭是不現實的，還會讓生活在烏克蘭的115萬俄羅斯人心中滋生焦慮。”

至于戈爾巴喬夫最近經常抱怨俄羅斯人現在發現自己是在外國，克拉夫丘克尖銳地評論道，也有很多烏克蘭人住在俄羅斯，但俄羅斯沒有一間烏克蘭學校，也沒有一份烏克蘭語的報紙，然而在烏克蘭，一半的烏克蘭兒童是在用俄語教學的學校接受教育的。

沙波什尼科夫離開克里姆林宮的時候，已經快午夜了，他因事情的結果感到解脫。大使和記者們一直在問誰擁有對核武器的政治控制，這讓他備受折磨。當他走向他的豪華車時，一個俄羅斯記者喊了出來：“核按鈕在誰的手上？”他笑著回答：“在安全的手上。”

在城市另一端的五角酒店，CNN主管們正在慶祝他們機敏的新聞策略，聚會一直持續到深夜。這些美國人得意洋洋。對于斗志旺盛的約翰遜來說，這是“我們一生中一個難以置信的時刻”。幾個小時前，斯圖·盧里離開聚會，前往紅場附近巨大的混凝土賓館，俄羅斯賓館，那里有一個工作室，里面有一條衛星上行線路連接到洛杉磯，這樣他就能出現在CNN的拉里金實況廣播（Larry King Live）節目上。當他講述那支萬寶龍筆是如何被用來結束蘇聯時，他將筆舉起來讓美國觀眾能夠看到。第二天早上，約翰遜在吃早餐時向他要筆。盧里將筆從口袋里拿出來，遞了過去。他繃住笑臉道：“你就記得它是你的！”[12](#2009Nian_10Yue_Dui_Lu_Li_De_Fang)

CNN的慶功會被CNN經理弗麗達·吉蒂斯從格魯吉亞打來的電話打斷了，她那里正全面爆發內戰。[13](#Ji_Di_Si___Ge_Ming_De_Jie_Shu)總統茲維阿德·加姆薩胡爾季阿正遭受第比利斯武裝反動力量的襲擊。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索伯漢·丹諾和女攝影師簡·伊萬斯勇敢地冒著槍火，到達議會里面加姆薩胡爾季阿的防空洞，在炮火聲中對他進行了采訪。

吉蒂斯說：“這通混有噼里啪啦雜音的衛星電話告訴我們，在格魯吉亞領導人的地坑中的采訪已經完成了。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將磁帶拿回莫斯科，然后就有可能向全世界播放了。”

這將是另一個全球獨家報道。因為往返第比利斯的航班都停了，一個莫斯科的CNN制片人通過門路找到俄羅斯空軍的一名飛行員，飛行兩個半小時到達第比利斯，然后拿著磁帶立刻返回。這個帶著大裘皮帽的矮個子男人說一萬美元成交。湯姆·約翰遜先給了他五千美元，承諾他回來后再付另外的一半。這個飛行員在二十四個小時內都沒有再出現，而到那時BBC已經播出了他們對加姆薩胡爾季阿的采訪，CNN莫斯科辦公室也播放了阿曼普采訪的副本，是從一名通過格魯吉亞另一個機場的正常航班前來的通訊員獲取的。當那位遲到的飛行員最終出現時，他要求支付另外五千美元。

CNN員工一開始拒絕了，但因為陪他前來的是兩個充滿威脅的大塊頭保鏢，他們覺得，拒絕付錢可能是不明智的。吉蒂斯是這樣描述的：“我們付了錢，拿到磁帶，然后把磁帶扔進了垃圾桶。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已然融入舊蘇聯了。”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399頁。](#1_26)

1. [科爾頓《葉利欽》，第391頁。](#2_26)

1. [舒爾根《蘇聯大使》，第14—15頁。](#3_25)

1. [奧多姆（Odom）《蘇聯軍事的解體》（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第439頁。](#4_24)

1. [鄧洛普《俄羅斯的崛起》（The Rise of Russia），第9頁。](#5_23)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91頁。](#6_20)

1. [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2009年10月2日。](#7_16)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8_16)

1. [戈爾巴喬夫《1991年9月》，第120—121頁。](#9_15)

1. [2009年10月對格拉喬夫的訪談。](#10_13)

1. [奧多姆《蘇聯軍事的解體》，第371—372頁；沙波什尼科夫《選擇》（Vybor），1991年12月25日的一則日記。](#11_13)

1. [2009年10月對盧里的訪談。](#12_12)

1. [吉蒂斯《革命的結束》（The End of Revolution），第18頁。](#13_11)

# 第27章 12月26日：第二天

1991年12月26日的早晨天氣晴朗，但要冷得多。氣溫降到了華氏22度，總統別墅被積雪覆蓋的房檐上已經結了冰柱。戈爾巴喬夫早晨醒來，發現吉爾車沒在車道上等他。葉利欽的又一個承諾——戈爾巴喬夫可以把他的總統座駕保留到12月29日——沒有實現。戈爾巴喬夫的警衛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輛備用的吉爾車，切爾尼亞耶夫不悅地指出，這輛車還是由葉利欽“好心”提供的，這樣戈爾巴喬夫就可以回到克里姆林宮，在那里他還有三天的時間，或者說他相信他還有三天的時間，來清理辦公桌和完成最后一些預約。

這位新統治者正在讓戈爾巴喬夫意識到，他所倚仗的是俄羅斯總統一時的興致。葉利欽命令保安負責人科爾扎科夫挑選出戈爾巴喬夫的警衛和司機來進行騷擾，好讓他們一家盡快離開別墅。他后來聲稱，他的邏輯是，作為唯一的總統，他必須立刻征用總統住處，不管他承諾過什么。巴爾維哈4號別墅有一個軍事指揮所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所有通訊設備。國家軍事力量的最高指揮官待的地方，不可能沒有核按鈕相關設備和常伴核提箱左右的兩位上校。

盡管新的身份是平民，戈爾巴喬夫仍然坐在借來的吉爾車里沿著庫圖佐夫大街快速地行駛，前后都有警車護航。當他到達克里姆林宮時，俄羅斯國旗飄揚在參議院大樓炮塔上，他發現克里姆林宮警衛的態度明顯是前恭后倨。當安德烈·格拉喬夫和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來幫戈爾巴喬夫履行最后的職責時，他們也被迫意識到保安和服務人員現在聽命于另一個人。格拉喬夫觀察到他們是如何粗魯而故意地讓戈爾巴喬夫意識到他身份的改變的。

這兩位忠實的助手驚訝地發現，戈爾巴喬夫看起來非常憔悴和不適。他因為宿醉而感到難受，還要一邊和流感發作產生的疼痛和不適作斗爭。他不僅要面對被迫離職的毀滅性打擊，還要擔心困擾著賴莎的精神痛苦和對他們私人生活的干擾。他經過冥思苦想，認為他被免職的方式是“蘇聯所繼承的糟糕傳統中最不文明的”。

戈爾巴喬夫走進辦公室的時候憤怒地抱怨道，“他們把我扔出公寓，他們還把我的車拿走”，在他辦公室門上的銅牌上還寫著“蘇聯總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紅旗也還豎立在他辦公桌后面原來的地方。

切爾尼亞耶夫很好奇，為什么戈爾巴喬夫還是想使用克里姆林宮的這個辦公室。這會讓他的敵人們以不尊重的方式對待他。但他發現在這樣敏感的時候很難反駁戈爾巴喬夫。“他很固執，而我即使在爭吵的時候也不愿意尖銳地對他。他可能會認為因為他現在不是總統了，所以我變得放肆了。”

戈爾巴喬夫的告別演講晚于每日晨報的截稿時間，導致切爾尼亞耶夫得出“所有報紙都因為害怕葉利欽而不敢刊出演講全文”的結論。大多數的報道都是批評這位離職總統的。俄羅斯議會的機關報《俄羅斯報》（登出了全文）在頭版登了一篇評論，標題為：“西方相信戈爾巴喬夫，俄羅斯人相信葉利欽”。該報紙的資深專欄作家弗拉基米爾·庫茲涅切夫斯基指責美國想要保持蘇聯的完整，想要戈爾巴喬夫繼續擔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有力地顯示出他與主要的國際領導人是意見一致的”，而葉利欽則完全不同，他除了對俄羅斯的利益感興趣之外不關心別的，并通過將俄羅斯融入總的歷史洪流中來滿足這些利益。報紙引用了一個民意調查，調查顯示有63%的俄羅斯人樂于見到戈爾巴喬夫離職，66%的人深信蘇聯將在獨聯體中以某種方式保留下來。

對于擔心有人試圖抹黑的戈爾巴喬夫及其助手們來說，更讓人不安的是同一份日報的另一名評論家根納季·梅爾科夫，他要求對蘇聯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進行公開審判。在題為“紐倫堡的幽靈”的文章中，他指出，不是每一個德國人都因為納粹主義而有罪，但領導集團應該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承擔道德責任。他寫道，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有五千萬人被殺，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都沒有殺過這么多自己的同胞。

負面的報道讓戈爾巴喬夫的同伴們痛苦不已。亞歷山大告訴一個記者，“那些背叛者對戈爾巴喬夫的忘恩負義讓我感到很受傷”。

但是，也有幾份報紙表達了對被推翻的總統的同情和感激。前蘇聯政府的機關報《信息報》對戈爾巴喬夫被拋棄的方式感到很憤怒，它在頭版宣布，“他辭職的時候直率地直視著我們的眼睛。他已經盡力了”。報紙的專欄作家加亞茲·阿里莫夫對缺少一個恰當的告別儀式表示批評。“這是一個事關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尊嚴的問題，事關現任政治領導人的榮譽的問題。我們很快就會感到慚愧；就是現在，我們已經有一些人為此感到難過了”。一位同事尹娜·穆拉維耶娃指出，戈爾巴喬夫解放了新聞業，趕走了恐慌，打開了他們自尊心的“閥門”。“他留給俄羅斯通貨膨脹、街上的乞丐、百萬富翁和80%的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民，但也給我們留下了安德烈·薩哈羅夫和作為一個值得自豪的人類個人價值的實現。”

《星火》的編輯維塔利·科羅季奇若有所思地寫道：“戈爾巴喬夫對待這個國家就像我妻子處理白菜一樣。他以為只需要剝掉第一層葉子就可以去掉污垢。其實他該一直往里剝，直到什么都不剩。”

激進的青年報紙《共青團真理報》承認，盡管戈爾巴喬夫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水平，他卻改變了人們自身。“他不知道怎么做香腸，但他知道怎么給人們自由，而如果有人認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的話，他很有可能永遠一種都得不到。”

《真理報》在八月政變后就被關閉，后來被一個支持共產主義的記者團隊重新啟動，又被希臘企業家雅尼克茲家族集團接管。它發出宣言：“結束這場鬧劇吧！”這個以列寧的勛章作為報頭的前共產黨機關報，天天被葉利欽的官員騷擾。幾天前，他們的供電和電話都被切斷了，忠于俄羅斯聯邦的民兵查封了它位于辦公大樓十層的編輯辦公室。然而，《真理報》的主編亞歷山大·伊林設法每天制作出報紙。他小心地抵制住對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表示幸災樂禍的誘惑，說道：“現在還不到在離去的人背后扔石頭的時候。”

而共產主義報紙《蘇維埃俄羅斯報》的反應則與眾不同，它是兩邊都不放過。在它的頭版上發表了一幅漫畫，上面畫著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站在一堆灰燼上，戈爾巴喬夫說道：“現在我認為我們可以說經濟改革已經完成了。”

當戈爾巴喬夫正在處理早晨的信件時，意大利記者朱列托·基耶薩和同事恩里科·辛格到了，他們將對作為“平民”的戈爾巴喬夫進行第一個采訪。這兩位來自《新聞報》和《共和國報》的記者發現氣氛很奇怪。基耶薩回憶道：“一切都很混亂，每個人都在離職，葉利欽的人已經不耐煩地等在那里了。”[1](#2012Nian_1Yue_Dui_Ji_Ye_Sa__Chie)他們注意到，一面紅旗仍然堂而皇之地陳列在戈爾巴喬夫身后，仿佛蘇聯還存在，而他也還是總統。戈爾巴喬夫像往常一樣優雅地跟這兩位意大利人打招呼，但基耶薩還是察覺到了他的失落感。

這位前蘇聯總統講了一個故事來逗樂他的客人們。在他的事業早期，他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在西西里度假，一個法國游客奇怪地想勾搭他年輕的妻子，他不得不沖他揮了揮拳頭。基耶薩想：“也許那個人不是法國人，而是意大利人，戈爾巴喬夫這樣說只是想對我們客氣點。”在說到蘇聯被解體的方式時，戈爾巴喬夫泄露了一絲痛苦。他將蘇聯的結束稱為一場政變，將阿拉木圖峰會后共和國總統們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稱為斗雞比賽。

他自負地說道：“我自己隨著國家的改變而改變，但我也改變了國家。畢竟，要幫助自己的祖國恢復在國際社會的位置、恢復到符合普世價值的機會是很渺茫的。這就是為什么我有一種無論如何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的感覺。”

當這兩個意大利人問到他的家人對他的辭職有什么感受的時候，他回答得真情流露：“我很感謝我的家人能夠承受這一切。”他說，他生活條件的改變并沒有讓他感到害怕，指的是他從一棟宏大的國家別墅搬到一棟稍小一點但仍很宏偉的別墅居住，他可以終生使用那套別墅和國家提供的汽車、司機、保安和仆人。“我的家人和我都不是被慣壞的人。”

當問到在看見紅旗被提前從克里姆林宮上降下有什么感受時，他回答道：“我的感受跟這個國家千千萬萬的公民一樣。紅旗就是我們的生命。但出于對同胞的尊重，我不想將這個時刻戲劇化。”

在意大利人走后，格拉喬夫拿著一本《八月政變》的復印件請戈爾巴喬夫簽名，這本書是戈爾巴喬夫寫的一個短篇，描述他在福羅斯的經歷。這位前總統給他的發言人寫了一些感激的話，最后寫的是，“最重要的事還在我們前方。現在才到歷史時鐘上的午時”。當格拉喬夫在前廳看著作者的題詞時，抬起頭驚奇地發現時鐘的指針都正好指向十二點。后來他了解到，那個鐘表已經停擺了。[2](#Ge_La_Qiao_Fu___Zui_Hou_De_Ri_Zi_10)

沒過一會兒，一夜之間從西班牙駐蘇大使變成駐俄大使的何塞·昆卡帶著他的國家元首的慰問信到了。切爾尼亞耶夫抓住機會把大使叫到一邊，請他幫忙給安德烈·格拉喬夫找一份新工作。他知道昆卡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負責人關系不錯，于是問他是否可以在那里替他的同事謀一個職位。大使的表情馬上就變了。他語無倫次地說：“這怎么可以，這是不能接受的。”切爾尼亞耶夫回答道：“是，這是不能接受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在怕什么呢？你是在害怕科濟列夫嗎？你是怕他把你趕出去嗎？”[3](#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2)

在克里姆林宮地界上的另一個地方，蘇聯還在經受著死亡的陣痛。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議會——最高蘇維埃——正在剛進斯帕斯基門的那幢14號樓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大多數選舉出來的代表們代表的要么是已經失效的共產黨機構，要么就是已經獨立永遠離開的共和國。這次會議只有一個議程：宣布解散蘇聯和承認獨聯體作為它的替代物。

這些代表們一心想的是做做樣子抗議一下蘇聯的結束，然后，最后一次利用一下儲物充足的議會自助餐廳。他們在等著會議開始的時候，到處閑逛，坐在寬大的橙色扶手椅上讀著報紙，就像是早到的客人在電影院寬大的屏幕前等著電影開場一樣。這個房間以前確實是克里姆林宮的官方劇院，只不過在過去三十年間上演的卻不是虛構的劇目。

翹首盼望見證歷史時刻的記者們幾乎在人數上超過了凄涼的立法者們，但是，記者們本身并沒有多激動，因為議會的結束只不過是高潮過后一個蒼白無力的結尾。

會議剛開始，就有五個克里姆林宮員工——兩個戴著裘皮帽，兩個光著頭，一個戴著滑雪帽——出現在這棟大樓的門口。他們擰下兩邊對稱的4x3英尺大小的門牌，上面寫著，“蘇聯最高蘇維埃常務委員會”，然后把它們拿到貯藏室。

共和國的國會委員會主席阿努阿爾別克·阿利姆扎諾夫在臺上的一個寬大木桌旁入座，側面豎立著七面國旗，代表不到一半的前蘇聯共和國。他聲稱，注冊的代表已經達到了法定人數，可以針對結束蘇聯的決定進行投票，但出席的幾個俄羅斯議員和白俄羅斯議員都是為了看戲才來參加的。

阿利姆扎諾夫宣布，他們的前輩們“談到偉大的事業，談到世界革命，談到社會平等、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夢想。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開始在最大程度上回到資本主義……我們完全了解我們失去的是什么。我們不明白的是自己得到了什么”。他譴責那些“與一頭還沒被宰殺的獅子共舞”的新聞工作者，但也不得不承認，紅旗已經降下來了，他們的總統已經辭職了，這也是他們最后一次會議了。

強硬派共產主義者弗拉基米爾·薩馬林走上臺，強烈批評葉利欽的“軍事政變”。他用的詞極具煽動性和冒犯性，導致秘書都不往官方記錄上記筆記了。薩馬林抱怨道，這些事件已經讓代表大會屈膝了，而對于這個形象，反共主義代表伊利亞·扎斯拉夫斯基的反駁很有名，“這個代表大會從一開始就沒站起來過”。扎斯拉夫斯基在之前的一次會議上爭論道，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以警衛累了代表們就應該離開為借口，解散了戰前最后選舉出來的代表大會，“這次，累的不是警衛；累的是人民”。代表維克多·吉卜林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宣稱他不得不接受一份街道清潔工的工作。其他的代表就蘇聯的結束是悲劇還是喜劇交流了意見。

美聯社攝影師劉香成拍攝的戈爾巴喬夫辭職的照片這天登上了全世界報紙的頭版，現在他在這個幾乎空蕩蕩的房間里舉著攝影機到處走動。他回憶道：“空空的大廳里只有一個蘇聯立法者。講臺上的發言人宣布蘇聯的崩潰時，他還在打哈欠。”

阿利姆扎諾夫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結束了會議。他說：“既然總統已經辭職了，紅旗也從克里姆林宮降下來了，我們也到了離開的時候了。”代表們經過投票將蘇聯扔入歷史中。議案是這樣表述的：“根據代表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權力的、選舉出來的最高機構所表達出的成立獨聯體的意愿，各個共和國一旦認可阿拉木圖協議，各國議會就宣布蘇聯的解體。他們最后的行動是解除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職務，解散檢察官辦公室和國家銀行這些已經不存在的機構。”

代表們帶著財物和文件坐著海鷗牌汽車和伏爾加小汽車離開了，他們身后謠言四起，說他們搶奪了大樓里的電視、電腦和其他官方財產。俄羅斯政府財產安全部的負責人伊萬·博伊科后來否認有任何搶掠事件發生，不過，確實有一個官員無恥地想用一個提箱從憲法控制委員會拿走127 000盧布。但是，轉移或銷毀可能在將來導致尷尬或危險的文件，這確實是最后一個機會了。類似的行動正在莫斯科的許多辦公大樓里發生。塔斯通訊社引用俄羅斯總統方面的來源報道，克格勃和內政部合并而成的新超級保安部門的高層官員們，正在快速銷毀關于高級警官腐敗的文件。

多虧了白宮俄羅斯議會通過的一項決議，從俄羅斯地區選舉出來的蘇聯代表們可以保留他們的一半年薪。這個特許權并不是全票通過的。三十二歲的阿富汗戰爭老兵和極端民族主義者謝爾蓋·巴布林——他也是西伯利亞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的朋友——尖銳地評論道，他們應該被授予三十枚銀幣，因為他們再不能保護蘇聯方面的背叛行徑。

快到下午五點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離開了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他坐著豪華轎車穿過莫斯科河到達位于具有歷史意義的河后區（Zamoskvorechye District）的總統酒店。這個五星級酒店建于1982年，之前的名字是十月酒店，用來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當時它只被共產黨用來接待來訪的政要和友好代表。

沒有正式的國家告別儀式，格拉喬夫就在酒店的舞廳組織了一個由三百名俄羅斯和國外媒體代表參加的盛大招待會，來向戈爾巴喬夫致以最后的敬意。他在傳達給記者們的信息中，將這次招待會稱為“總統新聞服務部門組織的最后的情況介紹會”。在格拉喬夫看來，那些被邀請的人是“唯一能夠欣賞戈爾巴喬夫起到的真正作用的對話者，也不會因為表達他們的欣賞而感到難堪”。

酒店的主管一開始害怕引起新當局的不快，竭盡所能地阻止這件事情在他的管轄范圍內發生。一開始，他拒絕接受預定，堅持總統賬戶已經被凍結了。即使在格拉喬夫讓戈爾巴喬夫從自己的口袋里掏現金時，他還是一直拒絕，但他的俄羅斯上司們最后指示他接受預訂。切爾尼亞耶夫滿意地發現，這個酒店的經理雖然不再對共產黨負責，卻受一個與西方資本主義者合資的公司雇傭，所以，他不得不妥協。歸根結底，“私有化還是有點用處的”。

這位前總統到達時顯得非常消沉、疲憊，他親近的人擔心他馬上就要心臟病發作。

但當他爬上通往舞廳的寬寬的、鋪著地毯的大理石臺階時，歡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聲音就像香油潑到了他的身上。在樓梯的頂端，這么多的客人都開始鼓掌。他的心情立刻就明亮起來了。這里的人仍然想聽他要說的話。當他被這些善意的祝福者包圍的時候，睿智的光輝又回到了他的雙眼，他拿著檸檬伏特加加入了敬酒的行列。他擁抱了幾個朋友，他們是經濟改革的擁護者，其中有《莫斯科新聞報》的倫恩·卡爾賓斯基、《獨立報》的維塔利·特雷季亞科夫，他還為許多年來一直報道經濟改革的外國記者們親筆簽名。CNN的湯姆·約翰遜讓他用解散蘇聯的那支萬寶龍筆給自己的日記簽名。記者們也包圍了安德烈·格拉喬夫、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格里戈里·列文科和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來獲取最后幾天的內幕。

每個人都想知道戈爾巴喬夫下一步會做什么。他一邊從餐桌上抓起幾條沙丁魚，一邊講述在他的家鄉，北高加索的普里沃爾諾耶村，他八十歲的老母親在電視上看到他的演講后給他發了一條信息：“放下一切，回家來吧。”戈爾巴喬夫猜，要是他給她回電話，她肯定會說：“感謝上帝，休息一下，再做回自己吧。”[4](#Ge_Er_Ba_Qiao_Fu___1991Nian_9Yue_3)

他如此虛張聲勢地談到他未來將參與到政治進程中，讓許多記者覺得他是在為政治回歸打基礎。他承諾道：“我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但我不會離開政治舞臺。我有大計劃。”[5](#Ke_En__Kohan____Wo_You_Hong_Da_J)

跟往常在熱情的崇拜者面前一樣（盡管在場有幾個人曾嚴厲批評過戈爾巴喬夫），他口若懸河、豁達健談，有著一貫的魅力，巧妙地將過去二十四個小時內受羞辱帶來的消極影響隱藏起來。他只在只言片語中表達出他的怨恨。他抱怨葉利欽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反對他做的所有事情，他還附和理查德·尼克松在1962年選舉中被打敗后的著名言論“你不會再看到尼克松在周圍閑晃了”，尖銳地評論道：“要一直反對戈爾巴喬夫很容易。現在已經沒人給他們去反對了。所以，就讓他們各顯神通吧。”[6](#Tong_Shang_1)

他開玩笑說，在這塊曾經是蘇聯的土地上，現在有很多總統，失去一個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失去一個國家卻是另一回事。《新聞周報》的總編輯弗雷德·科爾曼發現戈爾巴喬夫的狀態極佳，放松，鎮靜。在喝香檳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告訴他：“一個偉大的任務降臨在我們這些人身上，我們完成了。現在其他人來了，他們可能會做得更好。我祝他們成功。”[7](#Ke_Er_Man___Su_Lian_Di_Guo_De_Xi)

切爾尼亞耶夫看著他的上司不得不“掏心掏肺地說了兩個小時……我們這些罪人也備受折磨”。他告訴《華盛頓郵報》的大衛·雷姆尼克，葉利欽已經騷擾、挑釁過戈爾巴喬夫了，而且是針對個人的，但戈爾巴喬夫認為他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不管前路是什么。“他的目標、他的戰略，所有的事情都為他作證，盡管有戰術上的失誤，盡管有過猶豫不決。他最大的錯誤是總想得到平衡，團結所有人，這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8](#Lei_Mu_Ni_Ke___Ge_Er_Ba_Qiao_Fu)

招待會進行期間，酒店吧臺電視上的新聞廣播員提醒觀眾，蘇聯結束的結果是，他們當天早上醒來已經不是一個偉大的超級大國的公民了，而是十五個獨立的不同國家的公民。

戈爾巴喬夫在招待會結束后回程的車上，經過的許多大樓上已經掛著象征政府更迭的俄羅斯三色旗。到處都看不到紅旗的影子了。12月25日，這個共產主義的象征從克里姆林宮降下就是一個信號，將全國范圍內公共大樓的蘇聯國旗降下，換上獨立的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

跟其他地方一樣，圣彼得堡的公共大樓上都飄揚著俄羅斯國旗。但政治啟蒙大樓的一根金屬桿上仍然飄揚著一面紅旗，這棟樓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國際商務中心，那些共產主義者得以保留一間辦公室。未來的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現在是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辦公室對外關系委員會的負責人，從他工作的斯慕尼學院可以看到紅旗。

這位前克格勃官員下令讓工人拿走紅旗。第二天這些共產主義者就升起另一面。普京又下令，他的人就又拿走國旗。市長索布恰克的一名助手弗拉基米爾·丘洛夫看著國旗來來去去。“那些共產主義者的國旗很快就用完了，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東西。他們最后用的東西中有一個甚至都不是紅色的，而是深棕色。這可讓普京受不了了。他找來一臺起重機，在他親自監督下，用焊燈將旗桿切倒了。”[9](#Pu_Jing___Ge_Wo_Er_Ji_Yang___Ji)

1. [2012年1月對基耶薩（Chiesa）的訪談。](#1_27)

1. [格拉喬夫《最后的日子》，第194頁。](#2_27)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3_26)

1. [戈爾巴喬夫《1991年9月》，第124頁，](#4_25)

1. [科恩（Kohan）, “我有宏大計劃”（I Have Big Plans）。](#5_24)

1. [同上。](#6_21)

1. [科爾曼《蘇聯帝國的興衰》，第355頁。](#7_17)

1. [雷姆尼克，“戈爾巴喬夫告訴布什，‘多關照俄羅斯’”。（Gorbachev Tells Bush, Watch Out for Russia）](#8_17)

1. [普京、格沃爾基揚、季馬科娃和科列斯尼科夫《第一人稱》，第95—96頁。](#9_16)

# 第28章 12月27日：掠奪者的勝利

12月27日，星期五，臨近八點，距戈爾巴喬夫宣布停止作為蘇聯總統的活動已經過去一天半有余，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像往常一樣，被家里的女人們梳洗整理之后，離開他在特維爾–亞姆第二大街54號的公寓。他鉆進兩天前從戈爾巴喬夫的別墅拿來的總統吉爾車，指示司機開車直接帶他到克里姆林宮。

這輛豪華轎車橫穿過環路，沿著特維爾大街行駛，右轉經過蘇聯國際旅行社，再左轉穿過克里姆林宮的博諾維特斯基門，最后停在參議院大樓的前面。他的副總理根納季·布爾布利斯、議會主席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和他的新聞信息部長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在等著他。

這四個人走進電梯，上到三層。在他們沿著走廊上的地毯明確地朝著目標大跨步走去時，警衛馬上立正敬禮，他們突然沖進總統辦公室的接待室，跟值班的接待員面對面。

戈爾巴喬夫還沒到。他與日本報紙《讀賣新聞》的記者約在十一點，總統辦公室。在核桃廳與葉利欽達成的交易之下，戈爾巴喬夫以為他能使用辦公室到星期天。但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詫異在等著戈爾巴喬夫。今天凌晨，在葉利欽的親自指示下，一群工人拿著一袋工具來到總統辦公室，將門上用黃銅字寫著“蘇聯總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的牌子拆掉了。他們將它換成了一塊寫著“俄羅斯聯邦總統，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的牌子。戈爾巴喬夫已經不受歡迎了。

葉利欽命令接待員：“帶我們四處看看！”[1](#Xia_Ha_Na_Zha_Luo_Fu___Jie_Nuo_2)不等回答，他就闖入了房間。他怒喝道：“以前在桌子上有一個大理石的鋼筆盒，去哪兒了？”他是在暗示克里姆林宮的財產正被離職的官員們偷走。秘書抗議道：“那里沒有鋼筆盒……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不用那樣的鋼筆。我們都是給他買氈尖筆。”

葉利欽盤問道：“好吧，那這里呢？”他盯著戈爾巴喬夫睡午覺的休息室看，只看到沙發和盥洗設施。俄羅斯總統來到辦公桌后面，開始往外抽抽屜。他發現有一個抽屜打不開。

他吼道：“這個為什么鎖起來？叫指揮官來。”一個助手拿著鑰匙來打開了抽屜。里面是空的。

又四處查探了一會，葉利欽召集克里姆林宮的工作人員，命令他們將戈爾巴喬夫剩下的物品全扔到走廊里。然后，這一小群人圍在辦公室里的橢圓形桌子旁坐下。葉利欽大聲喚道：“來人！給我們拿杯子來。”一瓶酒拿了出來，杯子里滿上威士忌，然后他們舉杯慶祝勝利。

接待室的秘書緊張地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告訴他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位助手說，葉利欽、波爾托拉寧和布爾布利斯占了他的辦公室，正在里面聚會呢，已經喝了一瓶威士忌了。還有，他的名字也不在門上了。

在狂歡了一個半小時后，葉利欽仁慈地對渾身發抖的接待員宣布，他不去視察核桃廳或國務院辦公室了。他以前都去過了。他和同伴們一路笑談著離開了。他離開時回頭說道：“行為規矩點！我今天還會回來的！”

幾分鐘過后，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來檢查辦公室是否已經準備好戈爾巴喬夫和日本記者的采訪。“我發現總統的東西都被扔在辦公室外面，還有在十點前辦公室必須準備好迎接新主人到來的命令。”

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被震驚了。“這簡直是噩夢！葉利欽越來越野蠻了。他正在踐踏一切……他一定是在報復我們昨晚跟媒體的招待會！”他再次為他的上司還想來總統辦公室感到十分氣餒。“為什么他要自取其辱？為什么他非得來克里姆林宮？紅旗已經從炮塔上降下來了……他也已經不是總統了。”[2](#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3)

戈爾巴喬夫在葉利欽走后不久到達克里姆林宮時，正處在狂怒中。12月18日，葉利欽公開宣布戈爾巴喬夫可以等到12月末或最多1月中旬來做出辭職決定。當他決定12月25日辭職時，葉利欽曾明確地、清楚地同意他能在他的辦公室一直待到12月29日來結束他的事務。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抱怨道：“葉利欽把總統的職責放到一邊，跑來親自監督我從克里姆林宮被‘驅逐出去’。我得知葉利欽、哈斯布拉托夫和布爾布利斯在早上八點半的時候占了我的辦公室舉辦宴會，為他們的‘勝利’喝了一瓶威士忌。這是掠奪者的勝利，我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形容了。”[3](#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3)

俄羅斯總統已經使用相鄰的克里姆林宮大樓里的辦公室一段時間了。但戈爾巴喬夫在下臺兩天后還繼續占著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權力寶座，表明一個單一聯邦國家仍然存在。這對新統治者來說是具有冒犯性的。葉利欽是俄羅斯唯一的總統，但國外媒體贊譽的卻是戈爾巴喬夫，仍然要求占有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室、在辦公桌后豎蘇聯國旗的也是戈爾巴喬夫。

格拉喬夫認為門牌和紅旗對葉利欽來說不僅僅是象征物，而是一場斗爭的目標，即討伐戈爾巴喬夫的主要戰利品。

葉利欽不喜歡后來媒體中出現的“傳言”，稱他們實際上是將戈爾巴喬夫的東西扔出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他做了一些反駁：“原來的占有者自然沒有把門把手拆下來。但他們確實拿走了一些家具，甚至將一些官員的國有金制鋼筆從墨水池里面拿走。好吧，這樣的事在我們國家已成習慣。”他否認有蠻橫的行為發生，責備“員工之間的不合”。他聲稱他們在采取行動一周前，就已經警告過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員工。“這段時間足夠他們打包文件了。從一開始，我就既不想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團隊——更確切地說，剩下來的人——被趕出去，也不想他們再待一個月來打包。長痛不如短痛。”[4](#Ye_Li_Qin___Wei_E_Luo_Si_Fen_Dou_4)

搬進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想法是幾周前在葉利欽的腦中成形的，那時形勢已經很明朗：蘇聯已經沒有未來了。在那之前，蘇聯還有可能以某種方式保存下來，所以沒有討論過戈爾巴喬夫離開克里姆林宮的事，因為他有可能繼續在那里指揮中央，不管中央被如何削弱。

直到幾周前，葉利欽給家人的印象都是他將在白宮統治俄羅斯。自從6月份被選舉為俄羅斯總統后，他就盡可能少地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去那兒也主要是為了正式的用途。他的女兒坦妮亞在幾周前說，“白宮是他真正的辦公室；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只是用來作秀的——招待外國客人和舉行其他官方儀式”。[5](#Suo_Luo_Wei_Yue_Fu_He_Ke_Lie_Pi_3)

葉利欽意識到，如果從克里姆林宮進行統治，會給世界懷疑他“對權力”有野心的借口。他的許多同事也會懷疑，一個經過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是否應該占用有幾百年歷史的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統治的城堡。一些人認為白宮，葉利欽在政變中英勇站出來的場景，才是俄羅斯的象征，而不是紅場上的沙皇城堡。

然而，對于克里姆林宮應該在最后一任蘇聯統治者離開后轉變成歷史和文化博物館的建議，俄羅斯總統感到不耐煩。他承認，克里姆林宮是一座藝術瑰寶，但它同時也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政府綜合大樓。“這個國家的整個防御系統和監測系統都與克里姆林宮連在一起，來自世界各地的加密信息都會被送到這里，這里還有最精細的安全裝置。”更何況，克里姆林宮“在將要遵循的政治方針里是穩定、持續和決心”的象征。

它曾經是戈爾巴喬夫的轄區，現在它是葉利欽的囊中之物。

對于葉利欽來說有一個不足之處，如果搬到克里姆林宮，將白宮作為某種獨立領域留給選舉出來的代表們，就會加深議會和總統統治之間的分隔，將白宮留給了它吵吵鬧鬧的議員們，會讓它成為一個在將來反抗他的補給站。

戈爾巴喬夫無法使用被弄得亂七八糟的總統辦公室，他只好下到二樓，到設備負責人格里戈里·列文科的辦公室來進行與日本記者約好的采訪。

他告訴這些日本記者：“你們知道，我認為自己已經完成了任務。”他指的是共產主義體系已經不存在了，社會也發生了改變。“重要的是人們發生了改變。既然他們已經品嘗過自由，我希望沒有任何事物能迫使他們回到從前的狀態。”[6](#Xia_Ha_Na_Zha_Luo_Fu___Jie_Nuo_3)

另一個日本媒體公司與戈爾巴喬夫的員工取得聯系，愿意出一百萬美元在第二天進行一個克里姆林宮的電視采訪。[7](#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4)戈爾巴喬夫一開始說他會接受，但被切爾尼亞耶夫勸服拒絕了，切爾尼亞耶夫指出，回到葉利欽找樂子的克里姆林宮太丟人了，要另外找地方進行采訪就更丟人了。列文科責罵切爾尼亞耶夫拒絕了這樣一個提議，但戈爾巴喬夫告訴切爾尼亞耶夫他感冒了，可能撐不住接受采訪了。將來會有更多的賺錢多的媒體采訪機會。

戈爾巴喬夫在中午的時候離開參議院大樓，低頭彎腰進入借來的吉爾車，穿過博諾維特斯基大門離開克里姆林宮，在葉利欽擔任俄羅斯總統期間再也沒有回來過。

中午剛過，葉利欽就回到參議院大樓來占領現在屬于他的辦公室，這次是一個俄羅斯攝影團隊陪著一起來的。他指示他們拍攝他作為克里姆林宮主人的第一個舉措。那就是簽署一道政令，規定俄羅斯對蘇聯國家電視和廣播公司“蘇聯廣播”（Gosteleradio）的管轄權。坐在戈爾巴喬夫騰出的辦公桌旁，俄羅斯總統簽署命令，將蘇聯電視臺轉變成奧斯坦金諾俄羅斯電視和廣播公司。他還命令葉戈爾·雅科夫列夫負責監管這次轉變過程，完成后擔任它的負責人，刺激得《消息報》發表了一個半開玩笑似的標題：“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奉命將蘇聯電視和廣播公司轉變和移交給葉戈爾·雅科夫列夫。”[8](#An_De_Luo_Na_Si__Androumis___Yi)

國家廣播電臺曾在葉利欽帶頭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抹黑他，曾試圖在九個月前迫使他保持緘默，現在最終完全落在他的掌控之中。雅科夫列夫宣布將增加新聞的輸入，其中有一個新的時事節目《新聞提要》（Itogi），主持人是備受歡迎的播音員葉夫根尼·基謝廖夫。由于俄羅斯總統的行政職責包括對國家第二頻道的控制，他命令兩個電視頻道都面向俄羅斯大眾播放——但他命令奧斯坦金諾在一年內脫離對國家的依賴，通過發放股票獨立出去。

葉利欽通過一系列活動開始了他作為絕對領導人的統治。在處理了電視臺的未來后，他發布命令，剝奪了叛逆的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對其所負責的五個國家委員會的控制。他還簽署政令，要求在未來幾周對商店、餐館、車間、伏特加釀酒廠、藥物工廠和嬰兒食品工廠進行私有化。銀行、鐵路和航空公司將隨后執行。集體農場必須將土地轉交到每個成員的手中，結束了國家對637 000 000英畝領土的壟斷。這道政令廢除了1918年的布爾什維克裁決：所有的私有土地、礦山、森林和自然資源都“被永遠取消”。

盡管越來越保守的議會沒有辦法阻止葉利欽發布政令，他們卻能用其他方法阻撓他。當天下午，議會駁回了檢察官瓦連金·斯捷潘科夫將八月政變時的國防副部長弗拉迪斯拉夫·阿恰洛夫將軍逮捕的申請，罪名是積極參與政變。在代表們中間，對政變陰謀者的憤怒正讓步于對他們動機的同情。8月被逮捕的十三名陰謀者仍待在巴特羅斯卡亞–蒂什納監獄等待提審，但他們的境遇得到了改善。

湊巧的是，瓦列利·波爾金也在當天因為健康狀況惡化而從監獄釋放。在因為參與政變而被收監的四個月中，戈爾巴喬夫的這位五十六歲的前參謀長對他前上司的鄙夷絲毫未減。他堅持認為，政變集體追求的不是別的，而是國家的繁榮與和平，不是對權力的渴求，政變失敗的原因是他們太過小心有禮而沒有訴諸武力。對波爾金而言，政變的失敗不是很多人所認為的美國的勝利，而是一個超級大國的組織混亂的單位被內部反對者擊潰。

同時，約一百名美國大型公司的總裁來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參加一個促進貿易的會議。他們是被已經不存在的蘇聯邀請來的。會議照常舉行，只是換成了葉利欽的人，時間推遲了兩天，這讓一些摸不著頭腦的管理者們松了一口氣。

隨著蘇聯的結束，芝加哥大學《原子科學家公報》的編輯們將末日時鐘的指針往回撥到離午夜十七分鐘的位置。六年前，戈爾巴喬夫上任時，碩大的指針停在離世界末日僅三分鐘的地方。（2010年1月，隨著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新的緊張局勢和伊朗核野心的出現，指針又被往前撥到離午夜六分鐘的位置。）

解除了總統職務的戈爾巴喬夫在晚上幫助賴莎整理新家。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抱怨道：“我們被迫在二十四個小時內搬到另外的住處。”[9](#Ge_Er_Ba_Qiao_Fu___Hui_Yi_Lu_14)葉利欽的保鏢將他們所有的私人物品弄得一團糟。它們還得被搜集起來打好包。對他們兩個人來說，這都是對他們家庭私人空間的羞辱性侵入。賴莎極其注重隱私，一直堅決讓私人事務遠離陌生人的刺探。在從福羅斯回來后不久的一天，戈爾巴喬夫回到家發現她在哭。她正在燒毀一捆信，是年輕時候的戈爾巴喬夫在出差時寫給她的五十二封信，她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大半輩子。她害怕會再有一場政變，無法忍受其他人讀到這些信。戈爾巴喬夫在多年后講述道：“她說，‘我們不能讓別人探聽我們的生活’，然后，她一邊哭著一邊將信扔進火里……我燒掉了我的二十五個筆記本。不是我的私人日記，而是工作日記，上面寫著一些細節、特征和計劃。我燒它們的時候在想，我這樣做多少能幫到她。”[10](#Mu_La_Tuo_Fu___Mi_Ha_Yi_Er__Ge_E_1)

戈爾巴喬夫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將堆積了多年的文件分類——有筆記、信件、電報、照片和文檔。他們堅持自己打包所有的東西，而沒有尋求幫助。切爾尼亞耶夫義憤填膺，因為葉利欽的人不僅這么快就將戈爾巴喬夫一家趕出去，還“拖了好久都不肯派一輛卡車來幫他們把東西搬走”。[11](#Qie_Er_Ni_Ya_Ye_Fu___1991____199_15)

有幾百本書要被裝進紙板箱里：索洛夫耶夫、克魯切夫斯基和卡拉姆津撰寫的俄羅斯歷史；一套十卷版的普希金詩選；高加索的浪漫主義詩人萊蒙托夫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抒情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的詩集；幾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裹皮邊兒的著作；此外是個人的最愛，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復印本，被翻過很多遍，戈爾巴喬夫堅持認為這本書讓他轉變成極權體系的反對者；一本薩克雷的《名利場》善本，是瑪格麗特·撒切爾送給賴莎的；以及一本裝訂精美的烏克蘭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詩集《科布扎演奏者》，賴莎喜歡引用他的詩句：“我的思想啊，我的思想，你帶來了怎樣的痛苦啊！／為什么你要在如此陰郁的字里行間與我對抗？”

作為自己的圖書管理員和歸檔員，賴莎負責恰當地管理這些書，不讓它們混在一起。在他們的書架上，總會有一個便條，上面寫著：“朋友——請按字母順序將書放好。”[12](#Ge_Er_Ba_Qiao_Wa_De_Shu___Wo_Xi)

賴莎還有一大堆照片要打包。其中有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共產黨官員溫文爾雅地鞠躬遞給賴莎一束康乃馨。那是鮑里斯·葉利欽，攝于1985年。

1. [夏哈納扎羅夫《杰娜·斯沃博德》，第309頁；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8日的一則日記。](#1_28)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2_28)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66頁。](#3_27)

1. [葉利欽《為俄羅斯奮斗》，第124頁。](#4_26)

1. [索洛維約夫和克列皮科娃《鮑里斯·葉利欽》，第270頁。](#5_25)

1. [夏哈納扎羅夫《杰娜·斯沃博德》，第309頁。](#6_22)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8日的一則日記。](#7_18)

1. [安德羅納斯（Androumis），“一封來自莫斯科的信”（A Letter from Moscow）。](#8_18)

1.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866頁。](#9_17)

1. [穆拉托夫，“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0_14)

1. [切爾尼亞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則日記。](#11_14)

1. [戈爾巴喬娃的書《我希望》中的照片。](#12_13)

# 第29章 爭斗的繼續

在新年前夕，只有不到三千人出現在紅場上送別被廢棄的蘇聯，歡迎資本主義的、獨立的俄羅斯的第一年。

在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國公民，其中有一些是拿著宗教象征的傳教士。列寧陵墓周圍的幾個共產主義者和一群揶揄的美國人中間，站著一排民兵。

救世主塔上的鐘敲響了午夜的鐘聲，穿著長大衣的哨兵聽到鐘聲開始走正步離開，像往常一樣將肘高舉在空中。煙花在紅場上空綻放，一小群人鼓了鼓掌。沒有政府成員來現場紀念這個場合，沒有教堂領導人和政治顯要來向七十年的布爾什維克統治道別。歡呼的大多是外國人，甚至連煙花都不是俄羅斯放的，一家德國電視公司為了讓這個場合在鏡頭前顯得更有節日氣氛而燃放了煙花。[1](#Ma_Ding__Martin___Ao_Lie_Ge_Xun)

在新年訊息中，葉利欽告訴俄羅斯人民，他們繼承的是一塊被毀壞的土地，但是不要絕望。他說：“現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純粹用陰郁、貶損的語調談論俄羅斯是不公平的。遭遇失敗的不是俄羅斯，而是俄羅斯被迫進行的嘗試。”

切爾尼亞耶夫認為，如果他至少提一下那個讓他能夠自由發表言論的人，可能會更令人愉快。

新年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夫婦在查看他辭職第二天搬去的莫斯科外烏索沃村的一棟兩層別墅。穿過大門就看見帶綠色房頂和芥末色墻壁的房子，還有一個標志著建筑年份1956年的風標，他們一定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就是那棟莫斯科河5號樓，位于百畝茂密森林里的別墅，戈爾巴喬夫一家在這里住了六年，從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1979年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到1985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這段時間。當他在1985年末搬進現在的總統別墅時，將這套房子分配給了新晉的葉利欽，葉利欽看到它宮殿似的房間和“足以為一支軍隊提供食物的廚房”，感到不知所措。

一開始，戈爾巴喬夫哪兒也不去，也幾乎不見人。他回憶道，“絕望和無助從來沒有把我打倒”，雖然他承認開始幾天對于他和家人來說在情緒上是難以平復的。一位前演講稿撰者、攝影師亞歷山大·奇普卡建議戈爾巴喬夫回到他母親所在的斯塔夫羅波爾村莊寫寫書。還有人建議他應該變得更加寡言而超脫。

葉利欽總統一家在戈爾巴喬夫一家離開幾個小時后，就搬進了巴爾維哈4號別墅。奈娜開始在墻上掛各種宗教標志，給屋子增添一種革命后的氣氛，還把格拉祖諾夫給葉利欽母親畫的畫像也掛上了。葉利欽太喜歡總統別墅了，甚至在工作日的晚上都喜歡回來過夜，而不去城市公寓。他喜歡它的運動廳、網球場、兒童游樂場、野狗欄（dog pound）、帶池塘的花園和華麗的橋，以及被圈出來的一段可以供他游泳和釣魚的莫斯科河流域。

奈娜不停的抱怨摧殘著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的耳朵，她說賴莎把好的家具都拿走了，換上舊東西，盡管物品管理人、房屋管理人和地產管理人都證實，什么東西都沒換掉。

俄羅斯總統還想看看戈爾巴喬夫之前在列寧山上的公寓。科爾扎科夫開車載著葉利欽夫婦，前去視察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一家被粗魯地驅逐出來的六間房大小的生活空間。這棟平頂的公寓樓是戈爾巴喬夫1985年下令建造的，暴露出他缺乏建筑品位。[2](#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7)瓦列利·波爾金將這棟“陰冷的、灰不拉幾的混凝土建筑物”比喻成一所預制學校。不管怎么樣，這個地段是極好的。它的背面是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用前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的名字命名，莫斯科河一個U形彎道高地上有樹木成林的彎曲河堤，林蔭大道便位于河堤頂部的邊緣。戈爾巴喬夫住在四樓，也就是頂樓，從這里可以看到莫斯科的全景，最顯眼的是諾伏迪維奇修道院，也可以看到遠處克里姆林宮的塔尖。這個面積2700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間，即使以蘇聯精英的標準來說都算大的。科爾扎科夫聲稱自己被內部裝飾的華麗程度震驚了。他指出“跟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閨房（和）裝有鑲滿寶石、縞瑪瑙和碧玉的極可意浴缸的浴室相比，一位法國皇后住處的精致與富貴都顯得蒼白單調”。奈娜尤其喜歡臥室里紋理細密的卡累利阿樺木家具。她想立刻就搬進來，但葉利欽覺得這個地方太像一個博物館了，一切都顯得那么呆板而正規。

還有另一件事也要考慮。戈爾巴喬夫一家搬進了同一棟樓里的一座三居室公寓。葉利欽一家將要跟他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不愿意冒險跟他們看不起的對手碰面，這個新的第一家庭決定不使用這套公寓。但他們把豪華家具和德國制造的廚房用具都拿走了，盡管這些都是安裝好且不方便移動的。

葉利欽把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特維爾–亞姆第二大街54號的舊公寓保留了三年，之后搬進了西郊奧森尼亞亞（Osennyaya）大街的一棟新公寓作為他的市區住所。他將那里的公寓分配給他最親密的同伴，包括葉戈爾·蓋達爾和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但這些特權住戶大多數時間都待在自己的鄉村別墅。他們在1994年的時候集體辦了一個喬遷喜宴，由總統管弦樂隊伴奏。葉利欽后來用自己的回憶錄換來的硬通貨版稅，在莫斯科西面九英里處森林里的高爾基定居點建造了一棟自己的三層別墅。

職務帶來的好處還有很多。葉利欽接管了戈爾巴喬夫那沙龍似的總統直升機伊爾-62，他在上面裝飾上俄羅斯字樣和俄羅斯三色旗。后來，他將其變賣，換了一架更貴的伊爾-96，里面有一張巨大的雙人床。他還得到了一輛從德國進口的裝甲寶馬車。盡管他曾經譴責共產主義領導人的額外津貼，但現在作為戈爾巴喬夫曾經所在的世界領導人圈子中的一員，他要有所有排場，堅持認為他的斗爭反對的不是共產黨的特權，“而是不受控制的、包攬一切的權力”。他的邏輯很簡單：在共產主義下，除共產黨領導人之外，誰也無法獲得一輛吉爾車。在市場經濟下，有錢就可以開任何他們負擔得起的車，也不需要感到羞恥。

葉利欽還迫不及待地炫耀他對核提箱的占有。他對自己的核責任尤其感到自豪。他要求兩位負責保護核提箱的上校應該站出來，而不是像當戈爾巴喬夫的隨從時那樣顯得不引人注目，他們應該有為他們專門設計的制服。不管他走到哪兒，都有兩個穿著黑色潛水寬松運動外套的官員陪同，他們的衣服上還有肩章，以及金色的穗帶和紐扣。

盡管俄羅斯和蘇聯之間的權力爭斗已經落幕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之間不會再有交集，但他們之間的爭斗并沒有因為他們在俄羅斯生活中的新角色而有所減弱。他們由歷史永遠地聯系在一起，因為真實和假想的輕蔑而沉溺在痛苦之中。葉利欽確保前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的政界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而盡管戈爾巴喬夫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仍然覺得在葉利欽“惡意的影響下”，報紙和電視都被鼓動寫他的負面報道。戈爾巴喬夫夫婦在戈爾巴喬夫辭職后去斯塔夫羅波爾進行為期兩周的度假時，《工人論壇報》發表了來自檢察長的一項聲明，聲稱戈爾巴喬夫授權克格勃在他們進行權力爭斗的時候對葉利欽進行監視，從瓦列利·波爾金的保險箱里發現的正是這份文件，這也解釋了葉利欽將戈爾巴喬夫趕出克里姆林宮的“不明舉動”。

從斯塔夫羅波爾回到莫斯科后，戈爾巴喬夫開始重建他作為一個世界重要人物的名譽。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格奧爾基·夏哈納扎羅夫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作為他的基金會成員也加入他的活動中。帕拉茲琴科留下來擔任他的英語翻譯。除了建立他的基金會外，戈爾巴喬夫還成立了綠色十字會，一個致力于促成跨國界的環境問題解決方案的國際組織。他們的首批來訪者之一是他們的美國老朋友吉姆·加里森。加里森問雅科夫列夫：“你們之前為什么不反擊呢？為什么不逮捕葉利欽呢？”雅科夫列夫回答道：“吉姆，讓我跟你說一些關于權力的事吧。你在一段時間內會擁有權力，然后，就像沙子一樣，它從你的指縫中溜走。你離開了，生活還會繼續。”[3](#2010Nian_7Yue_Dui_Jia_Li_Sen_De_1)

葉利欽監視著他自己陣營里的經濟改革元老，疑心他們不忠誠。當電視臺的負責人葉戈爾·雅科夫列夫告訴葉利欽，他出于禮節與戈爾巴喬夫夫婦在他們的別墅一起用過餐時，據雅科夫列夫描述，葉利欽的回答是：“你以為我不知道嗎！”然后，他幾乎哀怨地問道：“為什么他邀請的是你不是我？”雅科夫列夫回答道：“你瘋了嗎？你是總統，他什么都不是。”葉利欽抗議道：“他從沒給我打電話。他從沒打電話給我。他從沒跟我通過話。”[4](#Ma_Ding___Dui_Ji_Quan_Ti_Xi_Hui)

這段奇怪的對話讓這位電視臺主管得出結論，在葉利欽的靈魂深處，埋藏著對戈爾巴喬夫的“無比厭惡”。葉利欽在十個月后解雇了雅科夫列夫，因為他播出了一部關于高加索地區民族紛爭的紀錄片，這件事惹惱了他。

這兩個對手都急急忙忙地出版為自己謀利的自傳：《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回憶錄》（Mikhail Gorbathev——Memoirs）和鮑里斯·葉利欽的《總統日記》（Zapiski Prezidenta），英語出版標題是《為俄羅斯奮斗》（The Struggle for Rassia）。葉利欽得到了45萬版稅預付款，而戈爾巴喬夫得到了80萬的預付款。

在戈爾巴喬夫辭職三周前，詹姆斯·貝克在前蘇聯進行巡視。[5](#Bei_Ke_He_De_Fu_Lan_Ke___Wai_Jia_2)他的員工帶著幾萬美元在每個飛機場支付燃料。他的這次旅程與一次短期的柏林空運行動同時發生，在為期一周的時間里，五十四架C-5、C-141和C-130運輸機進行短期飛行，將總計3800萬噸食物和藥品運送到新獨立的獨聯體國家。國務院確保在每個機場都有一次急救航班同時與國務卿到達。

到莫斯科后，貝克發現葉利欽變了，不再表達含糊、膚淺，而是變得自信、見多識廣，而且是處理復雜事物的好手。

面臨總統選舉的布什總統在蘇聯的最后一天評論道，“我們都是勝者，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1992年1月28日，他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面前用的都是他的國情咨文演講，宣稱在與蘇聯的斗爭中美國取得了勝利。布什在宣布“借由上帝的恩澤，美國贏了冷戰”的時候，五百多名議員都站起來長時間鼓掌。

戈爾巴喬夫覺得受到了嚴重的冒犯。布什炫耀勝利的行為讓已經在俄羅斯私底下傳播的說法又有了佐證：前蘇聯總統因為向西方磕頭丟失他們的超級大國地位而應該受到譴責。戈爾巴喬夫控訴“親愛的”喬治陷入了“老舊的、對立的思維方式”。

后來，在休斯敦的一次共和黨會議上，布什在一片“美國！美國！”的喊聲中，宣布“冷戰已經結束了，最先獲得的是自由”。他的民主黨對手比爾·克林頓嘲笑布什夸耀自己打敗了共產主義，就像一只公雞聲稱自己喚出了黎明一樣。克林頓在秋天的選舉中打敗了布什。

在戈爾巴喬夫退休后，他一直堅持表明冷戰的結束不是任何一方的勝利，因為全人類都取得了勝利。一個核武器大屠殺的威脅成為了歷史，許多歐洲國家都獲得了選擇自由，俄羅斯的安全通過發展更加正常的國際關系得到了加強。西方宣稱勝利的保守派思想家“只是因為自大而膨脹”。

在晚年的時候，這位前蘇聯領導人因為北約向俄羅斯領土進行擴張而變得更加失望，他抓住每一個機會來提醒西方政治家，在關于德國統一的談判中，詹姆斯·貝克、赫爾穆特·科爾、道格拉斯·赫德和弗朗索瓦·密特朗都給出了保證，北約不會往東擴張。在關于德國未來的談判中，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堅持認為，“一個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當時他們都表示贊同。[6](#Ao_Ke_Lai_Li___Xie_Wa_Er_De_Na_Z)

葉利欽不再是一個為得到承認而奮斗的反叛者，也不再是一個害怕斥責的覬覦高位者，他用表示友好和同志情誼的信息轟炸了西方各國的首都。2月份的時候，作為無可爭議的俄羅斯領導人，他初次登上國際舞臺，飛去倫敦與首相約翰·梅杰共進午餐。在多年后，梅杰喜歡講一段顯示了葉利欽一本正經的幽默感的談話。他講述道：“我跟他說：‘鮑里斯，用一個字告訴我：什么是俄羅斯？’他說：‘好。’我有點驚訝——因為它當時正分崩離析。于是，我又說：‘那用兩個字呢？’他說：‘不好。’”

葉利欽從倫敦飛往紐約，正式接管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第二天又來到戴維營與他的新好朋友喬治·布什進行談話。他向美國總統保證，只有他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帥掌握著核提箱，核武器的控制也被轉移到安全的人手上。布什開著一輛高爾夫車載了他一程，送給他一雙手工縫制的有著銀制雕刻的牛仔長靴，作為他六十一歲的生日禮物。葉利欽被高爾夫車迷住了，他給他的孫子們訂了幾輛，讓他們在莫斯科總統別墅的花園里開著玩。

5月，在賴莎、他們的女兒艾麗娜和帕維爾·帕拉茲琴科的陪伴下，戈爾巴喬夫也去到美國旅行，這個旅程由羅納德·里根和喬治·舒爾茨共同接待，由他的美國崇拜者吉姆·加里森組織，他又能再次沉醉在對名人的奉承和純粹的崇拜混合成的陶醉中，這在自己國家是感受不到的。[7](#Bei_Shi_Luo_Si_He_Ta_Er_Bo_Te_9)富裕的出版商小邁爾康·福布斯將他命名為“資本主義工具”的私人飛機交給戈爾巴喬夫隨意使用，載著這群人飛往十一座美國城市，在這些城市里，他們住在五星級酒店，受到奉承的東道主的歡迎，其中有唐納德·特朗普、羅納德·里根

和大衛·洛克菲勒。在密蘇里州富爾頓，有兩萬人來聽戈爾巴喬夫的演講，這也是溫斯頓·丘吉爾進行著名的“鐵幕演說”的地點。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這位前共產主義領導人宣布“任何去俄羅斯市場的人都將有機會獲取巨大利益”，得到了交易者們的歡呼。

布什總統打算為戈爾巴喬夫舉辦一個正式的晚宴，邀請的客人都是3A級別的。這個消息傳到葉利欽耳朵里時，葉利欽讓俄羅斯大使弗拉基米爾·盧金去白宮，明確表示這將被視為對俄羅斯總統個人的冒犯。布什取消了在東廳舉行這次正式活動，改在從后門上樓的房間招待戈爾巴喬夫一行人，與布什一家、詹姆斯·貝克和蘇珊·貝克一起進行一次私人晚宴。戈爾巴喬夫的魅力和自我欣賞沒有使人失望。在他們走后，美國總統興奮地對貝克說：“真是一個人物啊，這家伙。”戈爾巴喬夫在回到莫斯科后，宣稱美國的財政援助是他的功勞，這激怒了葉利欽，因為他本來打算在下個月對美國進行國家訪問時敲定這件事情。

俄羅斯媒體幾乎忽視了戈爾巴喬夫的美國長途旅行。而對隨后葉利欽總統去美國的訪問進行了地毯式報道。葉利欽曾經反對俄羅斯領導人攜帶配偶出國訪問，現在這個概念也隨著過去的那個時代一起消失了。他帶著奈娜一起出行。葉利欽因為對國會參眾兩院進行的一個演講獲得了熱烈的歡迎，在演講中，他為美國公司掃清了在俄羅斯進行商業活動的障礙。他在國會山的演講結尾說道：“今天自由和民主的俄羅斯正向美國人民伸出友誼之手。”

葉利欽的隨從們很高興看到美國媒體對葉利欽的熱情。他的官員們驚喜地在《紐約時報》上發現邁克爾·瓦恩斯對葉利欽的評價：葉利欽最終得以“擺脫戈爾巴喬夫先生的陰影，戈爾巴喬夫曾通過玩弄民主統治，在蘇聯權力金字塔頂端瘋狂亂舞，迷惑住了普通的美國人民和他們的總統們”。[8](#Wa_En_Si__Wines___Hua_Sheng_Dun)

在權力過渡五個月后，不善于原諒的戈爾巴喬夫和好挑釁的葉利欽之間的關系急劇惡化。前蘇聯總統開始公開批評休克療法帶來的惡劣影響，讓物價飛漲，人們好不容易掙來的積蓄變得一文不值。葉利欽抱怨道，他這樣做打破了他不干涉政治的誓言。戈爾巴喬夫跟一個《共青團真理報》的記者爆發了：“聽著，葉利欽不是耶穌基督。我也不需要向他報告。不管是右翼報紙還是民主報紙都攻擊戈爾巴喬夫，試圖抹黑我，想要引起對我的憎恨和惡意。”他補充道，他只承諾過，不管發生什么事，他都不會把他的基金會變成一個政治黨派。

葉利欽指控戈爾巴喬夫“用校長似的口吻”發表危險而不可容忍的言論。他完全用一種蘇聯式的風格，讓內政部長維克多·維林對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進行一次突擊財政審計。不出眾人所料，審計員發現在國外操作中有“濫用款項”現象的存在。《真理報》還處于共產黨控制之下時對葉利欽進行誹謗性對待，現在葉利欽的媒體同盟對戈爾巴喬夫做了同樣的事情。比如說，《消息報》報道，戈爾巴喬夫在佛羅里達購買了一棟價值108 350美元的房子，但無法確認任何實際的地產交易。

大約在這段時間，擔任基金會副總裁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警告戈爾巴喬夫，有些人已經組成了一個專門工作組，來敗壞戈爾巴喬夫的名聲。戈爾巴喬夫告訴《新聞報》的記者艾爾奇奧·毛羅：“現在我看見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公開攻擊我。他們可能想要我離開這個國家，去躲在某個角落，因為我對他們來說是個麻煩。”尤其傷人的，是來自前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發言人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的一項指控，他現在正在巴特羅斯卡亞一蒂什納監獄等待政變的審判，他指控戈爾巴喬夫參與了1991年八月政變的陰謀。

獨聯體從未被當回事，就像他們的成立者一直以來所打算的一樣。所有的共和國都建立了自己的軍隊，發行了自己的貨幣。只有白俄羅斯表現出與俄羅斯重新結合的熱情。在基輔，克留奇科夫總統殘酷地拒絕了戈爾巴喬夫提出的進一步將聯盟統一的提議，他說道：“這是那個男人的不幸，他有毛病。每個人都在嘲笑他，而他還不理解。”

俄羅斯立憲法院傳召戈爾巴喬夫，要求他就蘇聯共產黨的活動給一個特別法庭提供證據。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次“奇怪的審判”是為了贏取政治分的策略，他怒吼道，即使是被用手銬拖到法庭上，他也不會參與訴訟的。法庭對他進行最高100盧布罰款的處分，約五美元，但拿走了他的外國護照。護照馬上就被歸還了，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去世，戈爾巴喬夫想要參加葬禮。

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的不耐煩在秋天的時候到了頂點。戈爾巴喬夫再次猛烈攻擊他對經濟采取的“騎兵攻擊式的”方法。1992年10月8日，裝滿三輛汽車的警察到達戈爾巴喬夫基金會，堵住大門，不讓員工入內。戈爾巴喬夫在幾分鐘后出現，站在臺階上對著記者發怒道：“他們是來沖戈爾巴喬夫找茬的，惡魔戈爾巴喬夫，黑暗王子戈爾巴喬夫，他們都是這樣叫我的。”葉利欽發布了一道政令，將大樓的所有權轉交給俄羅斯金融學會。戈爾巴喬夫基金會可以繼續留下，但要作為租戶向金融學會繳納租金和服務費。戈爾巴喬夫抱怨道，所有這一切都是典型的葉利欽行事風格——“吵鬧、粗魯、笨拙”，都是為了再次羞辱他，剪掉他的羽翼。

俄羅斯總統還回收了戈爾巴喬夫的兩輛吉爾車，以及作為辭職交易一部分的保鏢小組。前總統不得不用一輛標配的黑色伏爾加V8小轎車代步。

戈爾巴喬夫與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關系在雅科夫列夫接到葉利欽的一通電話之后破裂了。葉利欽告訴雅科夫列夫，戈爾巴喬夫在辭職前交給他的“斯大林檔案”揭露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秘密條款的原件，這份于1939年簽訂的條約在蘇聯和納粹德國之間瓜分了歐洲。文件里包括六英尺寬的地圖，上面有斯大林的紅色簽名和里賓特洛甫的藍色簽名。雅科夫列夫已經為關于布爾什維克犯罪的研究找尋原始文件多時了，但戈爾巴喬夫曾向他保證這些文件在1950年被銷毀了。雅科夫列夫大聲說道：“總算讓我找到了，我一直相信能找到它們。”文件上的姓名首字母縮寫表明戈爾巴喬夫知道它們的存在。[9](#Ya_Ke_Fu_Lie_Fu___Wu_Ai_____Di_4)這點也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前參謀長瓦列利·波爾金的證實，他在一本對他的前上司充滿憤怒的回憶錄中聲稱，他向蘇聯領導人展示過這些原件，但這位領導人告訴他“一個字都不要說”。秘密條款的發現使雅科夫列夫感到震驚，他回復葉利欽的時候“說了一些好話”。

葉利欽選擇性地公開了其他的一些文件，確認了戈爾巴喬夫定期查看雅科夫列夫的私人電話通話記錄。不止一次感到被背叛的雅科夫列夫在1993年離開了戈爾巴喬夫基金會，接受了葉利欽提供的工作，主管奧斯坦金諾電視臺。他還成立了自己的國際民主基金會，發表了一份關于列寧和斯大林時期的恐怖統治的報告，《蘇維埃俄羅斯一個世紀的暴力》。從1996年到他去世的2005年，他的基金會發表了八十八份來自蘇維埃檔案的文件。

雅科夫列夫的離去給戈爾巴喬夫親近的圈子里留下了不好的情緒。切爾尼亞耶夫指責他利用基金會的資源來“散布關于自己的神話”，然后，等風向一變，就為了葉利欽政府提供的一個工作拋棄戈爾巴喬夫，在他看來，雅科夫列夫的野心也許可以原諒，因為他在摧毀“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謊言和煽動行為”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我不能原諒的是他在國內外將自己視為高尚道德的衛道士的姿態，并將自己的形象精心制作為經濟改革的唯一發起人”。[10](#Qie_Er_Ni_Ya_Ye_Fu___Wo_Zai_Ge_E_13)波爾金在他的回憶錄中宣稱經濟改革和新思維實際上“主要是雅科夫列夫的杰作”，攪亂了一鍋粥。

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新世界秩序的共同建造者——的關系也走到了盡頭。擔任格魯吉亞總統十年后，他在第比利斯告訴一個記者：“戈爾巴喬夫曾經是我的朋友。我們曾經關系溫暖而親密。在結束冷戰和重新統一歐洲的過程中，我們共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從那以后，我們就分道揚鑣了。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冷淡。我不能說我們現在還是朋友。”[11](#Ma_Luo__Markwe____Xie_Wa_Er_De_N)

1993年1月，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個月訪問莫斯科，簽署削減核武器儲備的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條約，這是一個要將一切都歸功于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的進程的高潮部分。在與葉利欽總統聯合舉辦的紀念這個事件的記者招待會上，布什一次都沒有提到戈爾巴喬夫的名字。

比爾·克林頓在大約兩周后上任成為美國總統，他一開始不知道要怎樣理解葉利欽。他的顧問們警告他，布什就是因為和戈爾巴喬夫過從甚密而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他應該避免在戈爾巴喬夫難以預測的繼任者身上犯同樣的錯誤。克林頓覺得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支持葉利欽這個“大國中驕傲的乞丐”成為俄羅斯民主改革最大的希望。

克林頓在溫哥華與葉利欽第一次碰面，他發現葉利欽在整個晚宴就只喝酒精飲料，沒有碰他的食物。關于這個俄羅斯人縱飲的傳聞開始在高層流傳。1993年，在華盛頓，克林頓得知有一個重大的安全警報，葉利欽住在白宮對面布萊爾賓館里，秘密安全警察看見他穿著內衣出現在賓夕法尼亞大街上，想攔出租車去吃比薩。克林頓還說，在第二天，葉利欽醉醺醺地想從一個地下室出來時，被誤認為是一個入侵者，差點被槍擊。[12](#Bu_Lan_Qi__Branch___Ke_Lin_Dun_L)

隨著葉利欽在第一個任期內健康的惡化和失眠的加重，他已經不能完全控制酒精帶來的各種影響。在1994年去德國的一次旅程中，他抓著一根指揮棒在總理科爾的面前醉醺醺地指揮一個銅管樂隊。在愛爾蘭的香農機場轉機時，他沒能下飛機會見等在那里的愛爾蘭首相，阿爾伯特·雷諾茲。根據科爾扎科夫所言，葉利欽病了，如果飛機不起飛，他就穿著內衣坐在那兒哭。奈娜在另一個場合批評科爾扎科夫“讓我的丈夫成為一個醉鬼”，而對于這樣的指控，葉利欽的酒友聲稱他是這樣反駁的：“不，你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把他帶來時他就是一個酒鬼！”

在葉利欽的第一個任期內，他都因為從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帶給人們的惡劣影響而備受折磨。1992年1月2日，價格被放松后，價格的漲幅大大超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們的預期。超級通貨膨脹掃蕩了人們的積蓄，讓幾百萬俄羅斯人變成貧民，引起了不滿和憎恨。幾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自由出售任何東西的人們一排排出現在莫斯科街頭，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將家用品，如閑置的鞋或裝飾華麗的燈，出售來使收支平衡。沒有足夠的錢來滿足日常需求，人們的生活條件惡化。犯罪增加，拖欠薪水，貧富差距增大。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

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承受著痛苦。農場和工廠失去了津貼，不能購買原材料。在實施猛烈的資本主義的前六個月，國家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造成的壓力大到讓葉利欽的團隊推翻這個進程的程度。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引入單一匯率之后，導致盧布的狂跌和對美元的大量需求，以防止通貨膨脹。

1992年3月，傳言稱有一個通過解放原材料價格來遏制俄羅斯經濟的國際陰謀，俄羅斯議會被這個傳言激怒，于是阻礙了一個放松國內石油價格的計劃。已經獲得出口許可證的企業家們仍然能夠以幾乎免費的價格購買俄羅斯的石油，然后銷往國外獲取美元。這是開始了一個導致寡頭集團出現的進程。

私有化部長阿納托利·丘拜斯以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私有化工程，結束了國家對財產所有權的壟斷。按照與華盛頓國際金融公司共同制定的私有化法律分給工廠工人的所有權股份，都被工業負責人搶購，這些人大多是共產黨以前的忠實擁護者，他們一夜暴富。（美國大使館1991—1994年間的政治處負責人E·韋恩·梅利向華盛頓抱怨道，美國改造俄羅斯自身形象的“福音”嘗試，導致了寡頭集團的出現，以及一個犯罪和經濟崩潰的時代的開始。）許多新富將他們的錢送往國外，以硬通貨形式進行保管。在俄羅斯獨立的前兩年，俄羅斯中央銀行估計，流出國外的資金高達1000億美元，比在國內的投資和國際援助的總和還要多。

新富們因為將他們的錢砸往國外而聞名，也產生了大量的段子：一個“新俄羅斯人”問另外一個“新俄羅斯人”他的勞力士多少錢。在得知數額是5000美元時，他鄙夷地反駁道：“我知道在哪里你能買到一塊6000美元的。”還有一則段子，說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官員悲嘆道：“共產主義者告訴我們的關于共產主義的一切都是謊言。但不幸的是，他們告訴我們的關于資本主義的一切都變成了現實。”俄羅斯第一批億萬富翁中就有葉蓮娜·巴圖林娜，她經營一家建筑公司。她的丈夫尤里·魯日科夫在1992年成為莫斯科的市長，監管了二十年的建筑熱潮。

俄羅斯人對葉利欽經濟團隊的普遍看法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身上得到了體現，他在蘇聯解體三年后結束從美國的流放，回到國內。這位作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說，蓋達爾“讓他幾千萬同胞陷入貧困，嚴重損害了他們的積蓄”，而丘拜斯“以跟1917—1918年的國有化和1930年的集體化一樣盲目的瘋狂和毀滅性的輕率”頒布了私有化。[13](#Bu_Lu_Ke__Brooke___Ya_Li_Shan_Da)2009年，蓋達爾于逝世八周前在莫斯科接受關于本書的一個采訪時，說他不后悔他在1991年12月做出的決定，因為那些決定是完全必要的。“人們在坐等食物災難，能源供應也有崩潰的危險。只有通過放松物價才能讓食物回到商店。”他承認，從一個指令性經濟到自由市場的過渡中存在戰術性失誤，“但從戰略上來講，我認為我們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避免了一個核國家的人道主義災難”。

后共產主義時期的混亂中，幾乎沒有人逃過得勢的俄羅斯黑手黨的貪婪需求。在第一年呈給葉利欽的一份金融報告發現，俄羅斯城市里的五家銀行和大型私有企業中，有四家將它們超過10%的收入支付給犯罪集團。即使是小規模的沿街小販也是受害者。奧爾佳·佩羅娃回憶道：“從1992的某段時間開始，我們在阿爾巴特大街上賣東西。當地的流氓保護我們不被搶劫，我們給他們支付保護費。”[14](#2010Nian_2Yue_Dui_Mo_Si_Ke_Ren_D)買兇殺人屢見不鮮。1993年，有123名銀行雇員不是被槍擊就是被炸死。國有公寓的私有化還導致了一種極其丑陋的犯罪類型。領退休金的人被勸說賣掉他們的住處，免付租金留下來住，但之后就被推到汽車下軋死。

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這所有的一切證實了，他反對葉利欽如此野蠻地打破舊秩序是正確的。他抱怨道，莫斯科血腥的槍擊案比芝加哥禁酒令時期的槍擊案還要糟糕，數十億存在國外銀行等著流氓主人到來的美元，是因為葉利欽政府的默許或不作為才可能出現的。戈爾巴喬夫在1995年的回憶錄中嘲笑道：“葉利欽在奪得權力后就馬上忘了他反對濫用的憤怒言論，讓他的同伴們沉浸在共產主義掌權派想都不敢想的腐敗和特權中。”

隨著生活標準的直線下降，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大為不滿。休克療法越來越被視為一種西方強加的東西。大部分憤怒情緒都指向跑到莫斯科來向新政府兜售意見的美國和歐洲專家們。最高蘇維埃的發言人攻擊美國人實施的“卑鄙的”貨幣政策。善于煽動人心的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將美國稱為陰謀統治世界的“邪惡帝國、罪惡軸心”，設法獲取民眾的支持。

葉利欽設法抵制國內要求恢復津貼和固定物價的呼聲，但在1992年12月，他被迫將蓋達爾趕出他的政府，讓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來坐這個位置，切爾諾梅爾金是一位對國家工業的困境更具有同情心的政治家，但他很快發現，蓋達爾的改革已經到了無法重新進行食品物價控制的程度。蓋達爾在幾個月內就成功粉碎了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在一個幾乎不存在文明社會和主動性的、被壓抑了大半個世紀的國家建立起市場經濟。

情緒不穩定的葉利欽因為這些挫折變得無比消沉，甚至嘗試自殺。1992年12月9日，他將自己鎖在巴爾維哈4號別墅溫度過高的浴室里，科爾扎科夫撞倒門將他拉出來時，他差一點就窒息了。另一次，在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他拿出一把安全部長維克多·巴拉尼科夫在因腐敗被他解雇前送給他的一把手槍，威脅要對自己開槍。助手們勸他不要做傻事。他沒有扣動扳機。但這個武器也不是致命的：科爾扎科夫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將子彈在水里煮過了，已經無法造成傷害了。[15](#Ke_Er_Zha_Ke_Fu___Bao_Li_Si__Ye_8)

在最高蘇維埃里，葉利欽的敵人越來越多，共產主義者正在收復失地。然而，一項彈劾葉利欽的提議以一線之差失敗。蓋達爾評論道，“這說明俄羅斯人民終究不想要回到光明的共產主義未來”。但議會繼續通過反改革的措施，動員大家反對葉利欽。它掛上紅旗和無政府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的橫幅，囤積武器。它選舉魯茨科伊來擔任臨時俄羅斯總統，魯茨科伊任命了一個新的政府。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之間再次面臨著最終決戰。當葉利欽在1993年9月21日發布一道解散議會的政令時，這場危機進入白熱化。白宮武裝“保衛者”中許多都是新斯大林主義者和初期法西斯擁護者，他們開始在街上游蕩來表示對這道命令的反抗，一些人還戴著哥薩克騎兵的高帽子和腰帶。在接下來的幾天，他們襲擊了電視臺和莫斯科的其他關鍵建筑。10月4日，支持葉利欽的軍隊對著設障的白宮頂層發射了幾枚炮彈，迫使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投降。這次短暫的內戰造成了一百五十余人的死亡。后果是總統制政府更加獨裁主義式的風格。

戈爾巴喬夫將這次危機怪罪到葉利欽的頭上，將猛攻白宮稱為瘋狂的舉動。“軍隊居然被下令向民眾開火！這是不可原諒的！”他指責葉利欽披著總統制共和國的外衣，替一個君主專制政體做準備。

1993年12月12日的一次全民公投對俄羅斯憲法進行了修改，給予了總統更大的權力。一個權力更弱的新議會，杜馬，被選舉出來。它首先進行的行動之一，就是特赦1993年10月白宮叛亂的領導人們，葉利欽出于和平的考慮支持了這個做法。

1991年8月的陰謀者都被無罪釋放，只有瓦連金·瓦連尼科夫將軍堅持接受審判。1994年，這個案子在莫斯科進行聽證。戈爾巴喬夫作為證人被傳喚，發泄了對大赦政變陰謀者們的不滿。他宣稱：“如果我們將這樣的犯罪只當做一場鬧劇來處理，我們將會面臨著一個接一個的政變。我們已經經歷過利用八月政變的后果解散蘇聯的別洛韋日森林陰謀。然后，我們還經歷了1993年10月3–4日的血腥事件，我們親眼見到議會被炮火攻擊……如果我們的將來要由新的政變陰謀者決定，我們將永遠不會成為一個讓人們感覺自己是公民的國家。”

在所有的指控被解除后，瓦連尼科夫無罪釋放，并宣稱他被宣告無罪就是戈爾巴喬夫有罪的證明。2008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一個想要確認俄羅斯最偉大的歷史人物的面向全國播出的流行電視節目上，這位前將軍對斯大林表示支持。斯大林排在諾夫哥羅德的亞歷山大·奈夫斯基王子和革命前首相彼得·斯托雷平之后，名列第三。不管是葉利欽還是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進入最后的前十二。

葉利欽總統對1991年發生在波羅的海諸國的流血事件的憤怒，曾改變了俄羅斯歷史，而在1994年12月，他授權對俄羅斯車臣共和國進行一次全面的、殘忍的入侵，來結束它獨立于莫斯科的狀態。俄羅斯軍隊與車臣游擊隊進行了一場出師無名的粗暴戰爭，摧毀了車臣首都格羅茲尼，導致三萬到十萬平民的死亡。據說格拉喬夫將軍是在醉成一團爛泥的時候下令猛攻格羅茲尼的，俄羅斯戰敗后，他被葉利欽免職；1996年8月，雙方簽訂和平協議。

1996年，在大多人都預期他將因受歡迎度嚴重下降和糟糕的身體狀況而落選的時候，葉利欽再度參加俄羅斯總統的選舉。杜馬在1996年3月15日進行了投票，否認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1991年12月12日的決議，支持引發關于新俄羅斯的合法性問題的別洛韋日協議，葉利欽因此差點將選舉延期。他的女兒坦妮亞幫忙說服了他不要關閉杜馬，也不要將選舉延期兩年，因為這樣有可能挑起內戰。

他的主要對手是根納季·久加諾夫，來自俄羅斯共產黨的候選人。久加諾夫參加競選是為了振興社會主義祖國，他把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歸并為一個世界寡頭政治集團，認為他們都是俄羅斯的毀滅者。堅信“這個國家需要戈爾巴喬夫”的前蘇聯總統忽視了他的效忠者們的明智建議，也作為新成立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參加競選。

六十五歲的葉利欽戒酒，減肥，設法喚起新一輪的能量爆發，來參加第二次競選活動。美國和歐洲的領導人成群結隊地跑到莫斯科來為他們自由市場的支持者加油鼓勁。葉利欽的競選活動得到的幫助有寡頭集團的財政捐贈，適時宣布的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00億美元貸款，電視網絡反共產主義傾向，以及根據美國公共關系公司Ogilvy & Mather提供的專家建議制作的電視廣告。俄羅斯總統以54%的選票超過久加諾夫的40%選票重新當選。

戈爾巴喬夫因為在選舉中的表現感到恥辱。一部分人譴責他以改革的名義背叛了共產主義，另一部分人譴責他破壞改革來保衛共產主義，于是，戈爾巴喬夫只獲得了不到0.5%的選票。雪上加霜的是，葉利欽將他的名字從自己的就職典禮嘉賓名單上刪除了。

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就成了陰謀的聚集地。這是一個政治和經濟混亂的時期，在這期間，俄羅斯的自然資源以大甩賣的價格出售給受到優待的了解內幕的人。葉利欽變得越來越暴躁，任意使用權力，惡劣地對待他的工作人員。助手們認為葉利欽的保安負責人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正監聽他們的電話，他們只能用胡亂涂寫的紙條來相互交流。總是對過分親密覺得可疑的葉利欽一個接一個舍棄了他在獨立前的合作者。他讓根納季·布爾布利斯離開，因為他的灰衣主教每天煩人地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會議上、招待會上、別墅里，甚至是桑拿室里”。科爾扎科夫比他多待了五年，最終也在一次關于選舉基金的丑聞之后被解雇。他寫了一本有損葉利欽形象的書，《鮑里斯·葉利欽：從黎明到黃昏》，這本書惹怒了葉利欽，他們再也沒說過話。

自從1991年12月后，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接觸是在七年后。1999年，他發了一封慰問電報給這位六十八歲的前總統，因為賴莎·戈爾巴喬夫正因為白血病奄奄一息地躺在德國明斯特的大學醫院里。他寫道：“我想對你們一家正在經歷的苦難表示深深的擔憂。我知道看著自己所愛的人承受病痛有多么艱難。在這樣的時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互支持、溫暖和關心。我希望你，我尊敬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能夠充滿力量、堅持不懈，希望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能有勇氣與病魔作斗爭，并盡快康復。”

戈爾巴喬夫與他的老朋友意大利記者朱列托·基耶薩在明斯特醫院附近的公園里散步時，給他看了這份電報。他評論道：“這些都是中聽的話，一個很不錯的姿態。”[16](#Ji_Ye_Sa___Wo_Cong_Wei_Dui_Ta_Sa)

賴莎的病撥動了俄羅斯的心弦，尤其因為她是被與自己的慈善事業相關的病打倒的。戈爾巴喬夫讓他的員工去找新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讓他幫忙給賴莎的姐姐柳德米拉弄一張護照，好讓她來德國為賴莎捐獻骨髓，普京當時馬上就做出了回應。

戈爾巴喬夫激動地跟基耶薩說起這些善意的舉動。他從口袋里拿著一張從《信息報》上剪下來的皺巴巴的剪報，遞給這個意大利人，說道，他原以為要花上幾十年他們才能夠理解。在“高尚的女士”的標題下，新聞寫道：“也許我們俄羅斯人再次變得有人性……也許只是在這個悲傷的場合，但我們向兩個相愛的人，賴莎和米哈伊爾，表示極大的尊重。身材嬌小、舉止優雅、品位精致的賴莎與其他人不同。她曾是想要從可怕的陰暗中解脫出來的國家的象征。人們不理解她，或者也許是他們不想理解她。也許在這對夫婦當權時，我們所要求的太多。但是，事實是，沒有人能夠彎曲他們的意志，征服他們。”戈爾巴喬夫說，賴莎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哭了。

移植無法進行，賴莎在四周后的1999年9月20日去世，享年六十七歲。她長眠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葉利欽沒有去參加葬禮，但發布了一份聲明，紀念“這位離我們而去的美好的人、美麗的女人、親愛的妻子和母親”。

前總統的新聞書記弗拉基米爾·波利考夫認為，對戈爾巴喬夫夫婦的同情既有政治的一面，也有人道主義的一面。“人們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評估過去。他（戈爾巴喬夫）非常意外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又同樣突然離去，人們需要一個替罪羔羊。但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可能現在還坐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共產黨書記的位置上。如果葉利欽代替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被選為共產黨的總書記，俄羅斯什么也不會改變。現在，人們為以前不能理解這些而請求得到原諒。”[17](#Si_Di_Er___E_Luo_Si_Ren_Shuo_Dui)

1996年11月，葉利欽的身體崩潰，進行了分成五次的一個心血管手術。他再也恢復不到以前的程度了。1999年12月31日，他宣布，將剩下的總統任期交到弗拉基米爾·普京手上。普京從圣彼得堡市長身邊被提拔到葉利欽工作人員里的資深位置，再到克格勃的后繼者聯邦安全部門的負責人，最后成為總理，在擔任總理期間，他促成了與車臣的第二場戰爭。歷史上第一次，一個俄羅斯領導人自愿下臺。葉利欽告訴俄羅斯人：“對你們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我想請求你們原諒。我還想為不能替你們的希望辯護請求原諒。”

他像八年前戈爾巴喬夫一樣低調地離開了克里姆林宮。在下午一點的一個告別午宴后，回到辦公室的葉利欽遞給普京一支他用來簽署政令的短粗鋼筆。他說，“照顧好俄羅斯”，然后永遠地離開了參議院大樓。[18](#Nie_Mu_Zuo_Fu__Nemtsov___Fan_Kan)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都被邀請來參加普京作為代總統的就職典禮，但他們避免了碰面。

在戈爾巴喬夫去職的十周年紀念日上，他對與葉利欽合謀分裂蘇聯的共和國領導人的輕蔑絲毫未減。2001年12月25日，他在莫斯科告訴記者：“我被那些人的背叛行徑震驚了，他們將國家分裂就是為了報復，并將自己變成沙皇。”他在當時不能與他們對抗，因為那可能會在一個布滿核武器的國家引起一場內戰。“沒有了蘇聯，俄羅斯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某種斷壁殘垣吧。”

在被問到他是否幸福時，戈爾巴喬夫承認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但命運讓他帶領一個牽涉了全世界的革新進程。“上帝啊！還有什么能比這幸福呢！”

這位前總統同時從事著一個非常賺錢的職業——為廣告機構做模特。1997年12月，他出現在必勝客的廣告上，獲得了十五萬美元的酬勞。這則廣告里有一個在咖啡館桌子旁的場景，顧客們在爭論戈爾巴喬夫給俄羅斯帶來的是自由還是混亂，最后一個老婦人總結道，因為他的存在讓比薩上的澆頭延伸到了地殼的邊緣，然后所有人大喊道：“向戈爾巴喬夫致敬！”[19](#Sang_De_Er___Ge_Er_Ba_Qiao_Fu)戈爾巴喬夫做出這種有損尊嚴的行為是因為他的基金會需要資金。2005年，他在電腦游戲《街戰2》（Street Fight Ⅱ）中作為一個石雕形象出現。2007年，這位曾經擁有核提箱的人居然讓自己被用來替法國時裝商店路易·威登向全世界出售箱包。這則由安妮·萊博維茨拍攝的廣告中，沉思中的戈爾巴喬夫坐在一輛豪華轎車的后座上，旁邊的座位上放著一個路易·威登包，車開過被涂鴉覆蓋的柏林墻。包里伸出來的雜志上的俄語標題依稀可以辨認：“利特維年科謀殺案：他們想拿7000美元放了嫌疑人”，指的是去年在倫敦發生的俄羅斯流放者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的放射性同位素中毒事件。在他臨死前，利特維年科將事情歸咎于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的特工。路易·威登公司的廣告代理Oglivy & Mather否認試圖表達任何言外之意。《廣告周刊》（Adweek）雜志將這張路易·威登圖片描述成十年來最成功的商業攝影之一。

2006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七十五歲，他們之間的關系仍舊沒有緩和。葉利欽第一次公開譴責戈爾巴喬夫提前知道八月政變，卻等著看誰會勝出。戈爾巴喬夫的回應是，“葉利欽撒謊，這是血口噴人”。

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死于充血性心臟病，享年七十六歲，葬在新圣女公墓。當時在第二個四年總統任期內的普京宣布葬禮那天為全國默哀日。戈爾巴喬夫出席了葬禮，對他進行了模棱兩可的贊美，“向失去了一個同時肩負著有利于國家的偉大事跡和嚴重錯誤——一個悲劇的命運——的男人的家人”表示慰問。《生意人報》的作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寫道，戈爾巴喬夫情緒低落，突然間看起來老了許多。“很明顯他的痛苦與大廳里大多數人不一樣，隨著葉利欽的離去，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拉走了。”

兩年后，七十八歲的戈爾巴喬夫宣布他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回歸政治。這個名為俄羅斯獨立民主黨的政黨由他和億萬富翁亞歷山大·列別杰夫共同創立，列別杰夫是俄羅斯《新報》的部分所有人和三家英國報紙的所有人。這個政黨是“社會民主”性質的，提出的是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經濟學家們開發的“反危機倡議”。

這些年來，戈爾巴喬夫對美國的熱情進一步冷卻。2009年，當美國和歐洲在經濟危機中掙扎的時候，他指責“沉浸在冷戰勝利的狂喜中的”美國人認為西方體系不需要任何改變。“如果你堅持讓我提意見的話……我確實認為美國需要進行它自己的經濟改革。”[20](#Dao_Ge_Wei___Mi_Ha_Yi_Er__Ge_Er)

除了1991年末短暫的一段時間外，調查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一直對蘇聯的解體抱有悔恨。一種對蘇聯時代的懷舊情緒在發展，一部分是因為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部分是因為大家認為在舊蘇聯體系中也有好的地方，比如全民教育和各民族間的和平，還認為大家要有難同當。

盡管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八月政變中采取的是積極反對的態度，當時還走上街頭反抗圣彼得堡的政變者，他聲稱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把他的生活弄得一團亂。如今他卻認為，組織政變和試圖讓克格勃阿爾法小組在1991年8月向俄羅斯白宮的守護者開槍的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是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我對他懷有最崇高的敬意”。[21](#Pu_Jing___Ge_Wo_Er_Ji_Yang___Ji_1)在2005年4月25日聯邦會議的演講中，普京說：“不管怎樣，我們應該承認，蘇聯的崩潰是上個世紀一次重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至于這樣說的原因，他提到了成百上千萬俄羅斯人發現自己處在俄羅斯的領土范圍之外、個人積蓄的貶值、舊理念的毀滅、各種機構的解散、成為常態的大范圍貧困和寡頭集團的出現。普京最后說道：“誰能想到它就這樣崩潰了呢？沒有人預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即使是在他們最糟糕的噩夢里。”

普京總統恢復了一些逝去帝國的象征，試圖振興民族自豪感，撫慰難以約束的帝國效忠者，讓政治體系回歸穩定。他允許俄羅斯軍隊再次掛起紅旗，只是旗上沒有錘子和鐮刀。他啟用在與納粹德國的戰斗中激勵了俄羅斯人的蘇聯國歌，只是更改了歌詞，替換了葉利欽喜歡的米哈伊爾·格林卡制作的國歌。他下令將獨立日（6月12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1990年宣布獨立的紀念日）重命名為俄羅斯日，因為獨立的概念太過于強調克里姆林宮前帝國的解體。這位前克格勃官員還恢復了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名譽，政變后，費利克斯在盧比揚卡之外的地位搖搖欲墜。在他的命令下，2005年，秘密警察成立者的一個半身像被放在舊克格勃總部里的一個底座上。普京在第二個任期期滿后成為總理，打敗他的是他的追隨者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

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互動中，他們打破了蘇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提供了新聞自由，引進了俄羅斯的第一次選舉，解放了東歐的華沙公約國，讓曾經沒有權力的各蘇聯共和國獲得了獨立，結束了冷戰。這是他們的饋贈。

現在，俄羅斯人只要自己負擔得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去現代商店購物，去環境優雅的咖啡廳和餐館就餐，自由移民和去國外旅游，將他們的孩子送往國外的精英學校，即使不能在電視上也能在平面媒體中批評政治體制。但同時，向西方式民主的轉變因為共產主義的傾覆而擱置，電子媒體反映的是克里姆林宮的觀點，法庭屈從于權力，抗議集會被解散，政治上的驅動力是個人致富而不是理念，選民無力產生領導人不喜歡的結果，克格勃又以聯邦安全部門的形式回到俄羅斯生活的中心。

對于2011年3月2日已滿八十歲高齡的戈爾巴喬夫來說，俄羅斯的噩夢遠未結束。他抗議道，俄羅斯的領導人總是在降低他那個時代所取得的民主成就，他認為，最開始在俄羅斯舉行的唯一自由的、有競爭的、誠實的選舉是他在1991年結束前啟動的選舉。他評論道，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害怕民主，更愿意接受獨裁式的穩定。他說：“我們還在從極權體制走向民主和平的半路上。戰斗仍在繼續。”[22](#2010Nian_10Yue_28Ri_Dui_BBCDe_Fa)

戈爾巴喬夫如此不想離開的、葉利欽勝利奪取的克里姆林宮參議院大樓里的那個辦公室已經不在了。在1994—1998年一次重要的重建工事中被撤掉了。重建的參議院大樓現在是俄羅斯總統的禮儀性住處。

列寧的前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在同一條走廊上，里面的手工藝品早就被移走了，現在它們被陳列在莫斯科郊外高爾基–列寧村的列寧別墅里。占據了大克里姆林宮接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列寧在第三次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巨幅畫像，已經被一幅諾夫哥羅德的亞歷山大·奈夫斯基王子對戰日耳曼騎士的全景畫代替。

二十年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用他們不同的方式在1991年 12月25日導致了蘇聯共產主義體系的瓦解，這個體系的創建者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現在仍然安眠在紅場上的列寧陵墓里，用甘油和乙酸鉀保存著，溫度保持在61度。每天都有俄羅斯人排隊向他表示敬意，穿著長筒靴的儀仗隊仍然在聽到救世主塔上的鐘聲后，以堪比瑞士手表上數字的精確度，在每個整點時刻突然活動，走來走去，就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1. [馬丁（Martin），“奧列格尋求舊秩序”（Oleg Looks for the Old Order）。](#1_29)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172頁；波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00—201頁。](#2_29)

1. [2010年7月對加里森的訪談。](#3_28)

1. [馬丁，“對極權體系回歸的恐慌”（Fearful of the Return of a Totalitarian System）。](#4_27)

1. [貝克和德弗蘭克《外交政治》，第617—618頁。](#5_26)

1. [奧克萊里，“謝瓦爾德納澤”。](#6_23)

1. [貝施洛斯和塔爾博特《最高級別》，第465—468頁。](#7_19)

1. [瓦恩斯（Wines），“華盛頓的峰會 ”（Summit in Washington）。](#8_19)

1. [雅科夫列夫《霧靄》，第419頁。](#9_18)

1. [切爾尼亞耶夫《我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六年》，第150頁，注21、22。](#10_15)

1. [馬洛（Markwe）, “謝瓦爾德納澤說，戰爭本可以避免”（War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says Shevardnadze）。](#11_15)

1. [布蘭奇（Branch）《克林頓錄像帶》（The Clinton Tapes），第198頁。](#12_14)

1. [布魯克（Brooke），“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與善惡之戰”（Alexander Solzhenitsyn and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13_12)

1. [2010年2月對莫斯科人的訪談。](#14_7)

1. [科爾扎科夫《鮑里斯·葉利欽》，第245—246頁。](#15_5)

1. [基耶薩，“我從未對她撒謊，現在我不能對她撒謊”（I Never Lied to Her, I Couldn’t Now）。](#16_4)

1. [斯蒂爾，“俄羅斯人說對不起”（Russians Say Sorry）。](#17_3)

1. [涅姆佐夫（Nemtsov）《反抗者自述》（Ispoved Buntarya），第57頁。](#18_1)

1. [桑德爾《戈爾巴喬夫》，第274頁。](#19_1)

1. [道格威，“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20_1)

1. [普京、格沃爾基揚、季馬科娃和科列斯尼科夫《第一人稱》，第94頁。](#21_1)

1. [2010年10月28日對BBC的訪談。](#22_1)